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南开大学出版社图书评介集



〔津〕新登字 011 号

南开大学出版社图书评介集

(1983—1993)

霍彩素 孙淑兰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300071 电话 349318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河北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1/32 印张：16.25 插页：2

字数：405千

印数：1—2000

ISBN7-310-S00599-6/G·93 定价：9.80元

1. 南开大学出版社图书评介集

少年壮志为国酬
——天津发现的周恩来学生时代的文稿
刘焱

四十多年前，即 1952 年 8 月，在天津发现了周恩来学生时代的一箱珍贵手稿，内有中学作文（手稿）52 篇，旅日日记（手稿）一本，还有许多信件和相片。这件事人们知之甚少。我本人是发现这批文物的见证人，了解这件事的全过程。为纪念周恩来诞辰 95 周年，这批珍贵文稿将在新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披露。在此，我想向广大读者介绍这批珍贵文稿的发现经过及文稿的简要情况。

一 1952 年暑假，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主席张济同志向中共津市青委反映，听他的中学时的同学柴平说，他父亲与周总理在南开学校是同学，解放前他家里存有一个小箱子，里面有周总理的日记和作文等东西，柴平表示愿把这个箱子交给组织处理。当时我是天津市青委秘书长，马上和青委几位主要负责人作了研究，大家对此都非常重视，一致同意告诉张济立即去把箱子取来，张济取来箱子后交给了我，我开箱查看，里面有周恩来中学时的作文手稿、旅日日记手稿和许多信件、照片等。青委几位负责人传看后，决定就如何处理问题由我请示中共天津市委。我向当时市委书记于志远同志汇报了发现这批文物的情况，于志远同志电话请示中共中央后通知我：中央指示将这批文物妥为包装，附上一份发现这批文物经过的材料，派专人送中央办公厅。我除通知张济写这一材料外，因原来的箱子已破损不堪，锁已坏，没法关严实，便专门找青委机关木工老王师傅做了一个新木箱，并亲手将这批文物装入封好后，连同张济写的材料，一并交给于志远同志。当时，天津市委还专门附上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派专人送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当年中共天津市委的信和张济写的材料，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天津市委的信，原文如下：

中央并周恩来同志：

天津青委转来该处干部张济同志（天津市学联主席），从其同学柴平处取回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中学时代的作文和留日学习时代的日记本各一册，现送上。

中共天津市委
1952 年 9 月 12 日

张济同志所写的材料略谓：

柴平是归绥人，是我过去在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时的同学，……父名柴孺瞻……母仍在绥远教书，他提到母亲离津时，说在亲戚家存有许多东西，其中有周总理日记和作文。据说，柴父与周总理在南开是同学，参加社团活动，与周有接触。日记和作文，可能是周离开时存某同学处，后来转到柴父手中……我第二天即取回日记和作文。

张济 1952 年 8 月 14 日

从当时作文本的封面来看，是寄存前新装订上的，并署有周恩来的手迹：南开校中作文

一九二〇，十，十

显然，这箱文物是周恩来 1920 年 11 月初离津旅欧之前，整理后寄存的。据说，中央办公厅收到这箱文物手稿后，把它交还给周恩来同志。不久

前我听周恩来的侄子、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尔流同志说，他 1954 年秋天有一次到周恩来家，适逢周恩来和邓颖超正翻阅这些手稿，还拿给他看，并对他说：“这是天津发现送来的。”

听说，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同志将这箱文物，包括作文和旅日日记手稿，以及一些相片等全部交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二 这一箱文物中的作文共计 52 篇，都是周恩来手迹，每篇作文的题目下面，都署有“周恩来”三字。文稿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言写成的，没有标点，除个别篇目外，绝大部分没有注明具体写作时间。全部作文都经过教师的批改，每篇作文后面，都有教师的评语。

这些作文，真实、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学生时代逐步培育起来的热烈的爱国激情、超群的才思、独立思考的精神、诚信朴实的品格以及对亲友真挚深厚的感情。所有这些，不仅在他的作文中有充分反映，在当时教师批改作文的简短评语中也明确反映出来。现照录教师对几篇作文的批语如下：

——才思骏发，波澜老成，中后历陈时事，尤如贾长沙痛哭流涕之情，诚杰构也！

——茹古涵今，才思骏发，越后必能高人一筹，诚杰构也！

——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命腐矣！是篇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回不犹人。……洵杰构也！

——思清如水，笔快于刀。

——发摅至性，娓娓动人。作者笃于家庭，异日将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必能扩而充之矣！勉哉！

——青年有此文字，是不可限量之才。

——竭力尚作，朴实说理，与鼓弄虚饰，空滑了事者同异。周恩来学生时期，就十分富于感情。1916 年 2 月和 1917 年 1 月，在两篇叙述寒假事况的作文中，他除了称颂学校教工“殷殷爱护，恳恳启蒙，无异父母”之外，更赞同学间“相敬相爱”，相规相辅，在逾骨肉”的情谊。寒假中，见同学“争先恐后，提筐携物以就道，若惟恐不速”的情景，更使他每逢佳节（阴历新年）倍思亲，在作文中流露了对故乡、对父母、对同胞兄弟亲属的真挚深厚的思念之情，使教师都颇为感动，在这两篇作文批语中感慨叹道：

篇中叙及父母双亡，不忍蓼莪卒读，直令人昼夜心伤。古人云：读《陈情表》而不动情者，必非孝子，吾于此文亦云。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读至中间，几如李令伯《陈情表》，其诚款洵可嘉也。翔宇弟本多才，孰知其情之笃竟如此！

当然，除了上述这一类许许多多称赞的评语之外，教师在评语中也多有指出不足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 1913 年秋季入南开学校后，“初至英文非佳”，接连几篇作文教师评语亦不甚佳，周恩来思想有很大振动，便在一篇作文的页边写了以下一段自勉自责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奋发向上，严于律己的思想品格。

人人作此均佳，我独何故而草草率责？致劳先生之口舌，岂从斯无扬眉吐气之时耶！翔宇、翔宇，汝宜三思，须知人之所能为者，己即能为之。汉文落第，英文不及格，尚何面居于丁二班？若长此以往，恐降班有你，南开不久亦非汝插足之地矣！宏图壮志，竟将抛诸大海。活泼精神，亦将沉沦脑

外。虽有同志同仇，亦将不汝答矣！岂不羞煞也哉！

经过奋发努力，不久，周恩来各门学科考试都取得优异成绩。南开学校毕业后，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决心，于1917年9月初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呆了约一年零八个月，1919年4月返国。

三 箱内文物《旅日日记》，是用当时文具店专门制作出售的硬皮日记本写的，起于1918年1月1日，止于当年10月20日。旅日时期是周恩来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初出国门，耳闻目睹日本的一切，开扩了眼界。他抱着救国救民和“新思潮尤所切望”的心情，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解新的思潮和新的知识，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传到日本，对他有很大影响。这些，在他的《旅日日记》中都有所反映。

1918年2月3日，他写道：

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

2月6日写道：

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2月11日，他写道：

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第一，想要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2月15日至17日，写道：

这几天连着把三卷《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今后“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对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它。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5月19日，记载了他当天在留日爱国团体“新中会”发表入会意见时说：

希望大家有“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和马列主义理论在日本广泛传播，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也纷纷出现，他读了许多介绍文章，大开眼界。在4月23日的日记中，他开始欣赏俄国列宁派的学说，认为：

他最合劳农两派人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10月21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作为一名周恩来的研究者，经过几年的工作，我深深感到周恩来光辉的一生，是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他青年学生时代逐步培育起来的崇高理想、丰富知识、卓越才能和优良的品德作风，为后来成就伟大业绩打下了坚实基础。

（原载1993年1月17日《中国教育报》；

1993年1月9日《天津日报》）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前言

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

周恩来是本世纪世界知名的伟人之一。他一生的活动，与我们这个地球上近 1/4 人口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中国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他几乎都曾亲身参与，而且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他不仅获得中国人民的衷心敬爱，而且赢得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普遍赞誉和尊敬。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中国国界。他的光辉思想和崇高品德，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周恩来的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的重视。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生九十周年，总结交流中外学者研究周恩来的成果，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于 1988 年 10 月在天津举办了首次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中、美、苏、日、朝、英、法等国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 86 人，会议收到论文或报告 76 篇。与会各国学者围绕“周恩来与中国革命”、“周恩来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的思想品德作风”三个专题进行了研讨。许多学者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不少新见解，提供了许多至今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讨的问题，反映了周恩来研究的新进展。会议发扬了学术民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交流。论文和发言表明：周恩来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建设方面；在理论上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在实践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对周恩来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缺点、失误和历史局限性，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研讨。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周恩来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集中反映各国学者研究周恩来的学术成果，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解、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材料，推动周恩来研究进一步开展，特把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编辑出版，书名为《中外学者论周恩来》。

在讨论中，各国学者对这些论文中的某些论点或所引用史料的可靠性，有不同的看法，为尊重作者意见和便于讨论研究，仍按原稿收录。论文顺序基本上按学术讨论会研讨的三个专题分类，结合论文内容（综合性的论文按文首内容）涉及的年代先后，进行编排。由于经费和篇幅的限制，未能把所有论文都全文收入。有些文章在保留作者观点的前提下，在文字上作了删节；有些文章，尤其是其它文集已收入的，就只发表提要，请作者谅解。

（原载 1990 年 9 月 22 日《天津书讯》）

《党风不正的世界观根源》序言

李光灿

《党风不正的世界观根源》一书，是赵文禄同志研究党风与世界观问题的又一本颇具特色的新著，也是我国目前从哲学角度较为系统地分析党风不正问题的专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列为基层整党学习和进行理想、纪律教育的参考读物出版发行，这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整党工作和深入进行增强党性教育和理想、纪律教育，会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推进理论界研究党风不正的思想根源问题，也有现实意义。

胡耀邦同志在《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不正之风是从哪里来的呢？应该说，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能把不正之风说成是无产阶级政党固有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受了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是剥削阶级思想传染到无产阶级政党里面来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0页）胡耀邦同志这段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党风不正的思想根源，科学地回答了“既然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那为什么党内还会产生不正之风”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风与世界观的理论告诉我们，党风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所谓党风，是指党的本质风貌和思想作风。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世界观。标志共产党的党风的根本问题，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高度革命性和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高度科学性的有机结合。这种党风本质具体体现在一个共产党员——即工人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正是工人阶级高度革命性和马克思主义高度科学性的有机结合。一九八一年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于一个党员来说，党风不正发展到严重程度，就会发生部分质变和完全质变的危险后果。具体讲，就是使一个党员的思想发生蜕化和变质，这首先是从思想上（世界观上）丧失原来的工人阶级高度革命性和马克思主义高度科学性有机结合的思想本质。思想体系、世界观是党风的基础，党风是思想体系、世界观的精神风貌（风格）。工人阶级一整套优良作风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外在表现，而党内不良作风则是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必然反映。党内生活中的种种不正之风，是从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本质产生出来的，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命令主义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抗拒批评和不肯自我批评的人，是不懂得真理或者是害怕真理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作风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自由主义是行动中的唯心主义；骄傲自满是以“一点论”和唯心史观为根底的；官僚主义是唯心史观的一种反映；以权谋私是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的突出表现。如此等等，说明党内不正之风的发生，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剥削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共产党人的侵袭和腐蚀的结果。但就每一个人来说，是否产生不正之风，关键在于内因，在于个人主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懂得了这个道理，对于一切坏的作风，包括新老不正之风，都应当提到世界观上来解决。只有寻根刨底，才能大见成效。

关于党风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党风不正的世界观根源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理论界很少进行系统的研究。赵文禄同志所著的《党风不正的世界观根源》一书，则作了积极的努力和初步探索。该书依据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风与世界观理论，论证了党风与世界观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党风的本质是世界观问题，分析了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种种不正之风的世界观根源，强调了端正党风必须同改造世界观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作者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曾阅读了革命导师的有关著作和书信，广泛参阅了有关论著和资料，吸取了有益的研究成果，并深入到乡镇及厂矿企业了解基层党员、干部的需要和意见，同时还受到杨献珍等同志的指教。因此，致使该书的论述有新意、有深度，突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是一本较好的整党学习参考材料，也是进行党性教育和理想、纪律教育的辅助读物。

当然，本书作为一本探索、研究党风不正的世界观根源问题的专著，缺点和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又加上受整个书稿的体系和篇幅的限制，有些问题没有展开论述，有些问题没有涉及。但是瑕不掩瑜，总的说，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贡献是有益的，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启发着人们去深入思考，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它的出版无疑将会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热诚希望我国理论界，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改革精神，对党风与世界观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探讨，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著作问世，为党的思想教育事业做出更大成就。

1985年7月5日于北京
(原载1986年4月15日《天津书讯》)

宣传党风与世界观理论的一本好书

· 张汉如 ·

赵文禄、贺惠邦编著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党风与世界观》一书，自今年五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受到读者的欢迎，曾连印两版仍供不应求，最近中纪委决定将此书作为广大纪检干部业务学习的参考教材，向全国纪检干部推荐。根据第二期整党学习的需要，现在已再次印刷。这本书紧密联系当前党风的现状和党员的思想实际，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风与世界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借鉴国际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目前新的不正之风的内容、实质、危害和根源，是一本把党的建设理论与哲学理论相统一，党的作风同党的世界观相统一的反映时代特点的理论通俗读物，可以作为整党学习和进行理想纪律教育的辅助教材。

党风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我国理论界很少有人研究。本书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阐述，这是很有意义的。全书的中心论点是：世界观决定着党风，党风是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党风问题实质上是个世界观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整套优良作风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外在表现，而党内不良作风则是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必然反映。只有把党风问题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抓住整党的要领，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

本书在写作上的突出特点是，它较好地把握研究学术问题与进行理论宣传密切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是理论宣传的基础，理论宣传只有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说理透彻、论证有力。全书遵循“探求真理，严密体系，突出特色，服务现实”的指导思想，既阐明基本理论，又注意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当然，我们应看到，本书在内容的深度方面还有待提高，某些问题的阐述还应力求更全面准确。但是，作为研究和宣传党风与世界观问题的一本通俗读物，还是值得称赞和推荐的。

（原载 1985 年 10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党的建设原理》出版
佚名**

本书是受国家教委政治教育司委托，由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组织编写的，供高等学校党建课教学使用。

作为一部党建教材，本书力求吸收近年来党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基本原理作比较完整、系统、准确的阐述；同时，力争做到以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以便于读者理解、掌握。本书还力求反映我党执政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并注意解决当前社会上特别是高校青年学生中，在党建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使党建理论学习与当前党的建设实践紧密结合。

（原载 1990 年 12 月 20 日《天津书讯》）

**中共中央纪律检委员会教育室
推荐《党风与世界观》丛书**

青年理论工作者赵文禄等同志编著的“党风与世界观”丛书，已经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党风与世界观》、《党风与世界观简论》、《党风不正的世界观根源》、《整党整风与世界观改造》。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杨献珍等老一辈理论家的具体指导。

这四本书，从不同角度概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风与世界观理论的内容、核心和体系；分析了在长期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当前在党风上存在的问题，同世界观的内在联系；初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在改造世界观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阐述了从世界观上加强党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同时，还论证了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辩证统一关系。

这套丛书具有鲜明特色和现实意义，它把党的建设理论和哲学理论相统一、党的作风和世界观相统一。是广大纪检干部业务学习的一本很好的参考材料，对我们研究党风理论和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搞好党风建设，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原载 1985 年 9 月 27 日《党风与党纪》第 18 期）

· 杜然 ·
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
——同青年学生的对话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若干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一书对当代青年学生所关心而又感兴趣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体制改革前景的设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哲学基本原理与当代新的实践的结合等问题都作了逐一的、深入浅出的阐述和分析。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科学地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实践问题，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为广大青年学生认识和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并尽可能地吸收理论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在结构体系、理论观点，资料运用等方面有所创新。同时，在时间上、份量上能够适应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时数的要求。

该书在编写方面和内容安排方面力求体现三个特点：第一，根据关于马克思主义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的境界”要求，全书编排采取问答式，抛弃了传统的简单说教式，使本书区别于其它政治课教材而具有新意，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寓于现实的实际例子的说明中；第二，本着观点与材料统一；准确性，鲜明性与通俗性、趣味性统一的原则，融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学、美学等基本知识为一体，力求生动、通俗易懂。既可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的政治课教材，也能适合一般学习社会科学的读者阅读。所以，选材和论证大都是开门见山，简明扼要；第三，为了有助于读者对疑惑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本书通过实例介绍，使读者能从具体思维上升为抽象思维，以达到正确地加以思辨和借鉴的目的，本书还例举了如《丑陋的中国人》等书刊及一些流派思潮的主要梗概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达到可以解决当代青年学生思想中疑虑的一些问题的目的。

总之，该书的出版是对政治课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抛弃繁琐的介绍、空洞的评说的惯用手法，力图使青年学生在生动的实例介绍和分析中接受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原载 1990 年 1 月 20 日《天津书讯》)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
——《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十三讲》序言
张泽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代，我国人民正面临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在这个新时代里，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学生必须自觉地把自已培养和锻炼成为“有革命理想、讲革命道德、守革命纪律、有文化的又红又专的人才”，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必须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理想是人生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共产主义理想更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它像瑰丽的宝石一样吸引着当代大学生。共产主义首先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次是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是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先进和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因此，共产主义本身就体现了理想和现实的辩证统一。理想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和指导现实。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最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人们思想与行为中的体现，其特点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代大学生不仅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且要努力修养和锻炼，使自己具有文明礼貌、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艰苦奋斗、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一代大学生。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立国之本，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生的准则。然而，最近几年由于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使一部分大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产生了怀疑、动摇，甚至抵触情绪。这完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纠正。高等院校应当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大学生更应当自觉地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自由化，抵制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做拒腐蚀永不沾的一代革命新人。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必须具备“四有”，全面发展。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是党和国家对广大青年的殷切希望和要求。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来培养和造就大批“四有”青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道德、不文明、向钱看、厌学情绪，甚至腐败堕落等不良现象，使某些大学生受到一些影响，以致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纪律涣散，我行我素；金钱第一，目无法纪。所有这些不健康的情绪和表现，都必须自觉克服。要树雄心，立大志，争取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做一个有高尚道德，丰富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健康，文明礼貌的社会主义大学生。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大学生，必须刻苦钻研，锐意进取。“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向我们发出的号召。它包含有四层意思：为革命而学习；不间断地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广泛地学习，

不仅向书本学习，还要向社会学习；刻苦学习，要有“钉子精神”。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三次浪潮之中，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大学生珍惜时光，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勇于攀登；讲究方法，提高效率。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原载 1990 年 12 月 22 日《天津书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入门

平平

由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李振城同志编写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入门》一书，回顾并扼要地阐述了近十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一些领导人的论述，着力探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十三大报告基本精神的理解，并为深入探索这一问题提供线索与方法。1——2章概述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3——6章以本质、特征、模式、矛盾、规律、阶段六个基本范畴为基轴，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7——9章主要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必由之路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本书较好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读者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较完整的认识，激发人们探求和奋进。

（原载 1988 年 7 月 2 日《天津书讯》）

写在《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谈理想与追求》前面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
南开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获得了做人的权利，他，就是被人称为“真正牧马人”的曲啸同志。曲啸自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有着和电影《牧马人》的主人公许灵均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但是，无论下放劳动改造，还是在铁窗高墙之内，他一直相信党，坚信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了做人的权利之后，对过去不公正的待遇他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更加相信党，更加勤奋地为党工作，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追回已经逝去的岁月。他的事迹被广播和登报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上至白发老人，下至戴红领巾的少年，都为之感动，视为楷模，这说明他的事迹确实具有对全社会进行教育的价值。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曲啸同志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我们将他的讲演稿以及有关报刊上对他的事迹报道的文章汇编成册，献给读者。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曲啸同志的讲演稿外，大都选自《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共产党员》、《高教战线》等报刊，因涉及的报刊较多，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为了编排的需要，个别文章收录时做了必要的改动，部分标题作了适当的调整，其它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排时尽量将同一类型的文章放在一起。

本书由夏家善、刘竟华、王淑贵、李伦、薛礼同志负责编选。

（原载 1986 年 3 月 30 日《天津书讯》）

《辩证逻辑思想简史》序

温公颐

恩格斯说：“辩证思维……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566页）。恩格斯十分重视辩证思维的历史地位。这里他虽只举了古希腊和古印度的辩证思维，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存在，从整个人类辩证思维史上看，当然也在其中，那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古代有无系统的辩证逻辑，对这一问题，近年逻辑界有争论；但对古代辩证思维的存在，却是大家所公认的。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动用辩证思维的多，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就拿医学说，古代医学的诊治理论，从整体观出发，从对立统一观点分析问题，因而对于许多疑难的病症，能作出疗效极高的成果。古代名医，如医和、医缓和扁鹊等早已蜚声史册。其它如孙子兵法则已成为军事辩证法的典范。所以我国古代，不但有丰富的辩证逻辑思维的理论，如《周易》和《老》、《庄》等，而且还有辩证逻辑思维的实践，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陶文楼同志潜心辩证逻辑研究多年，造诣颇深，他不但发表出版了许多有关辩证逻辑的文章和书，而且承担南开大学哲学系辩证逻辑的讲座，博得同学们的欢迎！他的大著《辩证逻辑思想简史》行将出版，征序千余，聊草数语如上。我感到该书有如下的两个优点：即

第一，该书囊括了希腊、印度和中国三个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体系，给读者以相互比照，参考印证的效益。

第二，该书叙述简明，通俗易懂，便于初学者的阅读。

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有志辩证逻辑研究的同志，定能有所裨益，它是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

（原载1984年8月15《天津书讯》）

佚名《科学认识论简明教程》简介

佚名

李祖扬编著的《科学认识论简明教程》，其宗旨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阐述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本书并没有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去“概括”这一规律，而是通过科学发展史中的实例，让人们认识到唯物辩证自然观在科学发现中的巨大作用。本书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许多学科，并介绍当今各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

本书从科学问题入手，论述了科学事实、科学概念、科学规律、科学学说、科学假定、科学知识体系，共七个大问题。这一线索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并由浅入深，构成一个科学认识的基本框架。

本书质量很高，可用作大学自然辩证法及科学认识论课程的教材，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志及想了解科学发现轨迹和唯物辩证法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的朋友们，本书也是一本好读物。

（原载 1991 年 12 月 10 日《天津书讯》）

冯贵 介绍《欧洲哲学通史》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的前列，绝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然而，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的学习和锻炼才逐步形成和提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学习哲学史是培养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了从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人们渴望获得一部内容翔实、观点正确、结构严谨，语言简洁的欧洲哲学史。由冒从虎、张庆荣、王勤田编写的《欧洲哲学通史》，就是为满足上述需要而做出的有益的尝试。

《欧洲哲学通史》全书分为上下卷共七十五万字，除导言、结束语外，以七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思潮、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各国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和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哲学。本书是专供综合大学哲学专业、高等师范院校政治教育专业学习欧洲哲学史使用的教材，对于广大党政干部、党校师生学习欧洲哲学史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本书的主要特点有：

一、材料翔实，剪裁合理。哲学史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哲学家的言论展现他所处的时代的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有的哲学史著作由于引证不全，往往流于空泛的议论，也有的过分强调史料的意义，陷于堆砌材料之弊。本书依据多年教学经验，考虑到学生阅读哲学史材料的某些困难，对材料作了严格筛选和剪裁，令人感到材料贴切、充实而不冗杂、琐碎。

二、观点正确，分析透辟。本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欧洲历史上的主要哲学思潮作出的评价比较正确，具有独到的见地。例如，在欧洲哲学史上，休谟、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影响非凡的人物，对他们的评价似乎已有一种不可置辩的公论，但是作者冒从虎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并认真汲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独辟蹊径，鲜明地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三、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哲学史是认识史。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认识的发展常常在某些时代出现重大的成果。而在另一些时代则相对地显得平淡如常。《欧洲哲学通史》为了揭示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对于具有辉煌成果的哲学思潮，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十七、十八世纪西欧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都突出地给予注意，花费较多的笔墨给予阐释和评价，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哲学思潮也并不因为它们的地位不显赫而不予重视。

四、语言简洁，可读性强。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正确把握这个特点，可以准确地表达思想的丰富内容，而不给人以晦涩难读之感。无庸讳言，某些哲学史著作由于片面理解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常常招致语言冗赘。含意不明确之弊，使人感到如骨哽卡喉，难以下咽。《欧洲哲学通史》十分注意防止这种弊端，在语言的运用上颇费心计，部头虽大，但通顺上口，较易于理解。

（原载《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我国古代哲学著作入门书 《周易与卦象》

吴真

《周易》曾被称谓一部神圣的、内容无所不包的万世经典，是藏往知来的卜筮书（即算卦书），又是一部哲学、历史著作，历代学者都很垂重。在科学倡明的今天，国内外人民对它又发生了极大兴趣，不仅要用它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史料。它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发展，而且与现代的医学、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故现在又被称谓我国古代一部科学著作。国内外许多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都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广大群众也想了解这里的奥秘。可是《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即《易经》，文字古奥，形式特殊，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它有如读天书之难。《易经》虽曾有许多注本，但有的注本引文言释文较多，使读者连注文也看不懂，对原经文更是望洋兴叹。有的注本《经》、《传》混为一谈，使读者搞不清《易经》的本来面目。本书区别了《易经》和《易传》，不仅对《易经》特殊形式作了说明，而且对六十四卦卦爻辞逐字逐句，以通俗的语言作了解释和意译，并对每卦的卦爻辞所讲的主要内容、内涵的精义作了评析，力图使读者既能了解卦爻辞的字面意思，又能把握其内在的思想，为《周易》初学者提供学习指南。

《易经》内容宏富，包括了上古社会的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商旅、管理、军事、法律、天文、医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等，是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以前研究者对此多是笼统一提，没有通过分析每卦卦爻辞所包含的思想给以具体说明。因此，至今一般人只知道《易经》只是本算卦书而已，认识不到它的真正价值。本书每卦的评析部分对这一丰富的文化精粹作了挖掘，并指出了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其目的想使各行各业的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得到与自己本行业有关的历史知识，对搞好自己本职工作有所启迪，而且还可以认识到产生《易经》时的社会状况、文化概貌及《易经》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易经》的外在形式是一部算卦书，有一套系统符号，即卦象，这套符号系统对研究现代自然科学有重要价值。但它在《易经》中的涵义初学者不易看懂，本书对此作了通俗的说明，并揭示了卦象所象征的意义与卦爻辞所包含思想的内在联系，以期使读者从这些卦象中认识到《周易》就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自觉象征》，体会到我们上古祖先的抽象思维水平与世界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相比是比较高的。

卦象是古人用来占筮吉凶的，但卦象是如何形成？古人又是如何利用《易经》进行占筮呢？本书附录部分通过具体筮例，对此从介绍古代文化的角度作了介绍，并指出了它是反科学、不可信赖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古人预测未来的方法及思维方式。增加这方面的文化知识，有助于提高辨别科学和迷信的能力。

（原载 1990 年 3 月 10 日《天津书讯》）

《西有现代语言哲学》前言

车铭洲

语言哲学被视为现代西方哲学时代的标志，语言哲学家们更把语言哲学的兴起称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新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语言哲学之所以成为占据西方哲学中心地位的思想，在于它突出体现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向。

语言哲学的兴起与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转向是密切联系着的。在 20 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史上，哲学的主导精神是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哲学主要从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寻求关于“存在本身”和“认识本身”的实质和以一贯之的根本原则，建立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理论或学说体系，用以说明一切具体的事物和现象，因而哲学被视为高于一切知识的世界观。这种哲学传统在黑格尔哲学里达到了全面的综合。黑格尔把万物存在的基础和本质归结为“绝对理念”，把认识归结为“绝对理念”的自我认识，宇宙万物和认识过程由于“绝对理念”而结合成为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整体，整体的性质决定着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性质。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成了宗教的“上帝”的代名词。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看作“绝对理念”的全部内容的展现，穷尽了宇宙的真理，是为一切提供说明原则和标准的绝对真理。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客观主义、绝对主义、一元主义和整体主义，在 19 世纪西方思想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逐步突破传统的模式，得到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在哲学上表现为，思想家们高高举起“反形而上学”的旗帜，反对传统的世界观哲学，竭力使哲学非世界观化、具体化、多元化，矛头所向首先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美国哲学家莫·怀特在其《分析的时代》一书中指出，几乎 20 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从攻击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西方思想家们攻击的中心点是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思辨的世界观哲学。可以说，语言哲学正是从这种反传统的思潮和哲学具体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与传统哲学相对立，语言哲学家们宣称，哲学不是抽象思辨的学说体系，而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分析活动。他们突出强调的正是哲学必须是具体哲学这样一种哲学思想倾向。哲学的具体化倾向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的新转向，体现了整个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社会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的特征。

语言哲学的兴起也是与现代西方的所谓科学“基础危机”直接联系着的。19 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长足发展，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新思想和新学说大量涌现，科学学说的实际应用，带来了生产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这样，科学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成了一切知识仿效和追求的目标。于是科学本身成了人们研究的对象。科学知识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弄清楚了科学之成为科学的基础，不就可以以它为标准来重构一切知识，从而使一切知识成为科学知识吗？科学知识的“基础研究”成了科学理论家和哲学思想家研究的中心。在 19 世纪，数学以其严密的准确性、必然性和普遍的有效性被视为科学知识的典范。这样，科学的“基础研究”自然地又集中于“数学基础”的研究。首先是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基础是逻辑，由此产生了把数学逻辑化的思潮，数学基础的研究与数理逻辑的研究就结合在一起了。但是，正当数学家们信心百倍地致力于数学基

础的逻辑分析的时候，却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些数学家发现，数学的许多基本概念，经不住逻辑的分析，如“数”、“基数”、“序数”、“无穷数”、“集合”等等概念的定义，都包含着矛盾，数学这门被视为绝对可靠的科学的基础却是不可靠的。“数学基础”的研究导致了数学的“基础危机”。更严重的是，这种“基础危机”还不只在数学领域，其它科学如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也在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的分析下，出现了危机。科学“基础危机”的实质何在？科学家们发现，知识都是由符号或语言表达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的矛盾或混乱，就是知识的语言表达式的混乱。因此，要使知识成为科学的知识，必须研究什么是可以表达科学知识的正确的语言表达式，什么是有意义的表达式，什么是无意义的表达式，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真，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假，等等。原来一切知识的实质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这样，哲学也只能是语言哲学。可以说，语言哲学正是在科学“基础危机”中被激发出来的一种哲学思潮。

语言哲学兴起于 19 世纪后半期，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世界知名的代表人物。如 C.S. Peirce, G. Frege, G.E. Moors, B. Russell, L. Wittgenstein, E. Husserl, M. Schlick, R. Carnap, H. Reichenbach, J. Austin, G. Ryle, J.R. Searle, C.I. Lewis, C.K. Ogden, I.A. Richards, C.W. Morris, J. Dewey, N. Chomsky, D. Davidson, C. Strawson, A. Tarski, W.V.O. Quine, J. Hintikka, H. Putnam, S. Kripke, M.A.E. Dummett, 他们用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和有启发性的著作，不断为语言哲学注入活力，推动着语言哲学的发展，使得语言哲学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学派。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多，学说多，学派多，对于什么是语言哲学，没有完全一致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些语言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学科，它主要研究语言的指称、意义、真假、必然、可能等这类一般性的问题，形成关于语言的一般性理论。这些语言哲学家把语言哲学称为“Philosophy of language”。有些语言哲学家则认为，语言哲学只具有方法的意义，它主要研究言语活动、语言的实际使用，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做尽可能详尽的分析，以说明语言的正确用法，使人们免于误用语言，以此来保证知识的科学性，还可有助于解决由于误用语言而造成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语言哲学家把语言哲学称为“Linguistic Philosophy”。对语言哲学的这两种见解，前者突出表现为逻辑主义，后者突出表现为日常语言哲学，形成语言哲学中两个主要分支。不过，尽管这两种见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由于它们都把语言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探讨的课题和内容上，也存在着共同的地方。

一般说来，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是语言的意义问题以及科学知识的合理表达形式问题。语言哲学的研究表明，这一问题涉及到语言与实在、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意向、语言与信念、语言与真理、语言与逻辑、语言与用法、语言与翻译、语言与符号、语言与信息等等十分复杂的问题。语言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及他们提出和论述的理论或学说，构成了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语言哲学的学说和理论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几乎每一位著名语言哲学家都提出和阐述了独具特色的学说。诸如 Peirce 的符号学说和语言意义和实践效果理论；Frege 的含义指称理论，Russell 的类型理论和描述理论，Husserl 的语言意向性理论，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意义证实理论，Wittgenstein 的逻辑图画理论和语言游戏理论，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

Tarski 的罗辑语义学说,Quine 的整体证实理论,Kripke 的意义因果链理论,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和学说,体现了语言哲学家思想的活跃和多方面的研究。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语言哲学的著作如林,学说如林,要求我国对语言哲学感兴趣的人们都通过直接阅读语言哲学家们的大量著作而了解语言哲学的学说,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必要的。为了使人们用比较少的精力,花比较少的时间,就可以掌握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主要学说,我们特意从西方关于语言哲学的总论性著作和论文中,选取有代表性的部分,编辑成《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这本书,并译成中文,为读者提供一本西方人写的关于语言哲学的总论性著作,或许是有意义的。

本书按内容区分为《语言与实在》、《意义与指称》和《意义与真理》三个部分。广义地说,语言是一种符号。从哲学上研究语言的性质,首先必须研究符号的性质。而符号和语言的性质,又是与实在密切联系着的。《语言与实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从符号、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论述符号和作为符号的语言的一般性质。本世纪初出现了符号研究的热潮。关于一般符号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20世纪以来对于符号的研究,目的之一也是揭示语言的性质。从这一部分中,读者可以了解到符号学研究的先驱 C.S. Peirce 关于指号、指号学、指号的三重指称的观点,了解到他通过分析指号、对象、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指号与对象之间的代表关系或指称关系作出的阐释。Peirce 在他的分析中,明确提出了“解释”就是“适当的意指效果”这条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的基本原理。C.W. Morris 把 Peirce 指号理论系统化了,他把符号研究分成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分支,从而为符号学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Morris 自觉地把他的指号理论作为实现科学统一的工具,力图用它纠正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颇,使它们在一条有三股车道的马路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与相相适应,Morris 对意义问题的分析显得十分系统。他接受了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影响,采取一种功能主义的意义观,全面地分析了意义的各种成分之间的连锁性。

符号研究的另外两位先驱 C.K. Ogden 和 I.A. Richards 则更加关心符号和语言的社会影响,他们认为人类的许多不幸可以归咎于语词的魔力,因而他们的研究目的是建立一门作为教育工具的符号学。这种思想对于以 A. Korzybski 和 S. Chase 为代表的普通语义学具有重要影响。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意义问题、指称问题和真理问题等都是这个问题的特定方面。J.N. Mohanty 的《语言与实在》专门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我们希望第一部分的论述作为语言哲学的导引,能使读者顺利地进入语言哲学领域。

意义和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題。《意义和指称》这一部分的内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了语言意义学说的历史以及现代语言哲学关于语言意义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从古代希腊开始,哲学家们出于研究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的必要,多次论述到语言的意义和指称问题。Plato 从语词的意义就是其指称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他的理念实在论;Aristotle 则由分析名词与动词及形容词的关系,进而区分实体与偶性;Stoics 和 Epicureans 为了研究逻辑问题而分析意指关系;中世纪哲学家为解决共相的实在性问题而区分意谓和指代;近代英国经验主

义哲学家 F . Bacon 和 J . Locke 则从经验主义出发提出语词的意义是人心中的观念，这一切，在 W . G . Hardy 的《思想史上的意义问题》一文中得到了清楚的历史描述。

对于近百年来产生的众多的意义理论，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分类。美国哲学家 W . P . Austin 认为主要有三种意义理论，即指称论、观念论和行为论，如果加上他自己赞成的意义即使用的理论，那么就是四种。如果我们采用这种分类法，那么本书第一部分中涉及的 Peirce、Morris、Ogden 和 RiChar ds 的理论都可以归入关于意义的行为理论。关于另外三种意义理论，A . R . Lacey 的《意义》一文提供了清楚的发展线索。R . M . Martin 的《戴维森、辛提卡和奎因的意义理论》和 A . R . Lacey 的《意义》的第三部分为我们展现了意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从另外几篇关于意义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B . Russell、H . P . Grice、J . L . Austin 和 P . Ziff 这几位有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家的意义观。

指称问题是个与意义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当代语言哲学中，从 Frege 明确对涵义和指称进行区分到 60 年代，哲学家们似乎一直在以某种形式主张意义决定指称，A . R . Lacey 的《意义》的第三部分阐述了 S . Kripke 和 H . Putnam 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因果指称理论。J . N . Mohanty 的《论指称》，在对 B . Russell、G . Frege、C . Strawson 和 C . I . Lewis 的指称理论提出分析批判后，从 E . Husserl 的现象学观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指称观。

语言的真假二重性问题或真理问题，也是语言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意义与真理》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语言哲学的真理学说。A . R . Lacey 的《真理》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语言哲学家提出的种种真理观，分析了他们研究真理问题时所采用的新观点。大致说来，语言哲学家比较有代表性的真理理论有 A . Tarski 的语义学真理概念（Lacey 认为这是一种弱符合论）、M . Dummett 的认为关于真假的讨论是关于特指值和非特指值的讨论的观点、A . Ayer 的认为“真”不是真正的谓词的真理多余论、G . Frege 认为“真”和“假”是陈述的指称的名称的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除了实用主义真理观之外，本书选的文章对其它几种理论均有论述，Dummett 的《真理》反映了当代多值逻辑研究对语言哲学的影响，是他关于真理问题的重要论文。J . N . Mohanty 的两篇文章分析了意义问题与真理问题的关系，批判了把其中一个还原为另一个的种种企图。

语言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众多哲学家专心研究的课题，还表现在对语言哲学问题的不同看法，常常直接影响到其它哲学分支中的问题的讨论。有的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了决定形而上学、认识论、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本书选入 A . R . Lacey 的《怀疑论与语言》，目的就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例证，说明语言哲学的研究如何影响人们对其它哲学问题的思考。

1982 年至 1983 年，我作为荣誉学者（Honored Scholar）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哲学系做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语言哲学。大学的 Wilson Library 有丰富的藏书供我利用，哲学系的资料室离我的办公室很近，借阅图书杂志尤为方便。哲学系 J . S . Earman 和 J . Owens 等教授的个人藏书也供我使用，他们还根据自己的经验，随时给我提供必须研究的资料。这样，就使我接触到了比较多的材料。回国之后，根据我国语言哲学研究的进程，编选了这本书，请李连江同志译成中文，并作了扼要的内容介绍。

在这里向为我提供资料的美国教授同行和朋友们，向译者李连江同志谨致谢意。

1987年12月于南开大学
(原载1989年3月18日《天津书讯》)

评《马恩列斯哲学发展史》

· 王之榜 ·

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号召，这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振海主编的《马恩列斯哲学发展史》一书，是目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一部具有独创性的研究专著，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得力著作。

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它写于1986年至1988年，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无端受攻击最严重的关头。作者在这个时候不受各种思潮的干扰，敢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阵地。它以哲学党性原则为武器，理直气壮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主题没有转换，它始终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15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证明，对这个世界的任何背离都要导致无产阶级事业的失败，任何否定或割裂这个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事业的结合都会导致它的僵化和停止。这部著作正是从这样的高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了总结和概括。同时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反权威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对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及其哲学理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因此，这部著作一方面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教材。

该书另一个特点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主线和特点。作者在后记中指出，通常的马哲史著作并非以阐述马列哲学发展为自己的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列的思想史、科社史、政治学说史、文化史、社会学史、劳动价值论、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等等都囊括其中，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东西，超量的引入不必要的其他学科的内容，模糊了马哲史的主线，失掉了马哲史自身的特色，使读者和学生不得要领，往往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所不讲、无所不“解”的糊涂认识。本书的特点是紧紧抓住世界观，以其为轴心全面展开哲学各个基本原理的论述，其他问题也从世界观角度进行研究。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从社会形态上进行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作为哲学的最终成果来研究的。这就避免了与其他科学的不必要的重复，又突出了马哲史的特点。出于这种认识，作者把马哲史同思想史、文化史、科社史、社会学史等等作了恰当的区别，给人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角度、全新的观点。

同时把马恩列斯哲学提到首位。研究和阐述马哲史从根本上说就是研究和阐述他们的哲学发展史，它是马哲史的主体、核心和灵魂。该书紧紧抓住这一主线，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阐述他们哲学的互补和发展关系，考察哲学基本原理和原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又在原理原则的联系和发展中再现它的历史。它是逻辑中的历史，又是历史中的逻辑，简明系统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马哲史进行了新的探索。它在博采众家之长，广泛吸收研究成果的基地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许多颇有启发性的新思想。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分期，作者不仅把它划为四个大阶段，而且每个大阶段里又分成若干小阶段，明确提出了起始年代和标志。列宁哲学思想除

了划分十月革命前后两大阶段外，也对各大阶段中划分出小阶段。大小阶段的提法和划分有不少独到之处，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思想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的发掘上也有一定的深度，如作者认为列宁的认识论不是机械的反映论，它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历史观和自然观，认识论和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逻辑性、科学性和党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新阶段。其他如对马恩早期哲学发展主线、列宁关于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思等等，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象其他著作一样，这部著作也有不足和缺欠。但是，瑕不掩瑜。它仍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

（原载《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10期）

《宗教：精神还乡的信仰系统》评介

溪波文

宗教对于我国大多数人来说，是极陌生的。可以这样说，宗教只是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熟知名词而已。那些信教的人，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教徒们，对于宗教的真正内含与作用，多数是不明不白的，好象他们天生就应该信奉宗教。其实，人们之所以信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宗教说教，这是环境教育的结果。

要想正确认识宗教，就必须学习大量有关的书籍，但这是一个庞大的书单，在这腾飞的时代，人们是抽不出这许多时间的。近期，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卢红、黄胜华和周金生著的《宗教：精神还乡的信仰系统》（大学生知识丛书）是一部好书。有了它就可以不必要再去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就可以全面了解宗教的真谛。这本书我认为不只大学生们可读，凡是对宗教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拿来读，这是值得的。因为您能从这本不算厚的书里窥出许多您所不曾了解的东西，作者是在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以后并加以研究才写成了此书，翻开此书每页，都能得到新的知识。它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并结合了西方很多著名哲人的观点，来全面性地总结宗教的，虽然研究的主题严肃，但读来却并不枯燥乏味，它的特点为立意新颖，语言通俗。世界影响最深的教派，作者都为我们想到了，为我们阐述了各教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为我们论证了宗教到底为何物，宗教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哪些效用。

（原载 1991 年 4 月 10 日《天津书讯》）

一本颇具参考价值的教科书——苏联《社会心理学》介绍 乐国安

不久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苏联的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该书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根据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共 346 页，计 27 万 6 千字。

这本书是由苏联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大学心理系教授安德列耶娃编著的，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把它列为大学心理学系的教科书。

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得到研究。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心理学界，而且社会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管理部门、乃至工厂、学校、商业部门、医疗单位、部队等等都越来越感到学习、研究社会心理学对于本领域的科学研究、本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很有好处。于是，不仅在一些大学的心理系、社会系开设了社会心理学课程，而且不少其它行业的同志也争相举办与社会心理学有关的讲习班，或是选派人员外出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这充分说明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学。但是，社会心理学的教材建设却远远满足不了当前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力量翻译了这本《社会心理学》。这的确是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做了一件好事。看过这本书，能够使我们对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情况有大体的了解，对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体系不无启发作用。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自己的资料 and 实际研究相当缺乏的情况下，只要介绍了国外的有关材料就一定起到这种积极作用。我们介绍外国的东西，不可良莠不分，不可采取一概拿来主义，而要择其善者有目的地引进。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翻译的这本《社会心理学》正是贯彻了这一原则。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的作者“对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其应用的研究方向等做了全面的阐述。本书概念清楚、内容充实、系统性强，是苏联社会心理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本书可作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及可供广大教育工作者、宣传工作者、青年学生以及其它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同志们参考。”

这本《社会心理学》有下述几个特色：

—

强调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作者在“引论”编中用三章六十余页的篇幅论述了社会心理学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社会心理学思想形成的历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其余各编章中，即使是在介绍社会心理学的具体内容方面，也仍然把这些方面中出现的理论问题摆到了重要的地位而予以论述。这种做法，显然有别于西方，特别是有别于美国的一些社会心理学专著或教科书。我们认为，这一特色是应当受到肯定的。诚然，一门学科的形成并不是从理论开始，但一旦总结出了理论，后学者便应当从理论学习开始，这样可以使人们头脑清醒，不至于被众多的所谓“事实材料”而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枉走弯路。我们在从事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和体系建设的时候，在向学生教授社会心理学课程的时候，都可以从

安德列耶娃的这本《社会心理学》的强调理论研究的特色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二

具有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长期沿着非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发展的传统是无济于事的。相反，还造成了许多新的困难。社会心理学同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联系，比心理学其它各个分支都更为紧密，因而对这门学科的西方传统经验需要做原则性的、批判性的重新认识”。“本教科书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阐述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范围内并根据苏联普通心理学的原则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这门科学的基本要点”。由此出发，作者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这就意味着它接受关于社会现象的实质、关于认识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心理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原理，并在分析自己对象的专门方法中实现这些原理。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要以辩证唯物论的指导思想去论述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内容。同时，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要能做到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原理，那么社会心理学者则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者的这种立场和观点，也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所需要的。当然，究竟作者在具体的论述中有无真正做到这点，读者在阅读了全书之后可以得到自己的答案。这里我们所要说明的是，根据这本书的作者的上述观点，我们至少应当承认，“在国外，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心理学方面我们可以取得借鉴的地方主要是苏联”（潘菽：我们要加强向苏联的心理学学习。《苏联心理学》1984年年刊）。

三

提出并介绍了集体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在西方的社会心理学中，很少研究集体问题。这在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不可能建立象集体这种类型的人们的共同体。……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集体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集体也只有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之能成为人们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社会心理学在方法论上“没有一个对团体的专门观点，没有首先从共同活动的观点来观察团体。优先使用在实验室实验情境中来研究小团体的方法，这一事实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对团体活动内容分析”（该书第251—252页）。我们要建立的自己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放弃对集体问题的研究，则显然是不完整的。安德列耶娃的《社会心理学》把集体问题列为专章予以论述，不仅有研究历史介绍，也有方法论的述评，这些，无疑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吸收价值。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特点之外，这本书还有不少不同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地方。例如，关于方法论问题，作者提出，方法论有三种不同水平，一是一般方法论即研究者的哲学观点（采用的一般认识方法），二是具体的（或专门的）方法论即某知识领域采用的方法论原则的总和，三是研究的具体方法

总和。作者认为，无论用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都不能脱离一般方法论和专门方法论的指导，这种见解，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具体研究颇为重要，体现了作者比一般西方学者高明之处。

当然，这本书也并非十全十美。作者对于某些实际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的看法我们可以不去苟同；此外，具体材料不够丰富以致有些章节显得缺乏生动直观性，也不能不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取其精华”，也不会降低它对我们的参考价值。

最后，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止于翻译介绍外国的东西。我们热切地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由我国社会心理学者编写的体现了我国特点、具有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理论体系的社会心理学专著和教科书。

（原载《外国心理学》1985年第3期）

评三本《社会心理学》

袁振国

洪荒时期，人们衣不裹体、食不饱腹，全部精力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消耗殆尽，没有力量再去关心求生以外的事。然而，人们一旦暂时摆脱了险恶的自然环境，暂免于紧迫的衣食之累，对于自身生理健康的关注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当人类有了新的发展，闲暇时间更为充裕，思维的空间更为开阔之后，一个新的意识又产生了：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肉体之外，似乎还有一个灵魂在游荡。因为人睡着和醒来不一样，在梦里迁想妙得，醒来却无影无踪。因此，人类思维的鞭子，便开始“拷问”起灵魂——心理的秘密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便是执鞭者之先驱。这种持久的历史“拷问”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无处不蕴藏着丰富的心理活动。两军对垒，士气为重；男女相爱，心理上的相同和互补是最稳固的基础；成功的广告和商品推销，也是心理上打动顾客；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亦需克服长期与世隔绝的心理障昏……社会越发展，认识就越深刻，研究的能力也就越增强。所以，难怪有人预言，未来的社会是心理学的社会。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虽然迅速，起步却较晚。十八、十九世纪的英、法、德等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激烈动荡，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开始注意到了社会心理问题。至于社会心理学正式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则是二十世纪初期。第一部《社会心理学》出版于1924年，作者是美国弗洛伊德·奥尔波特。书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和实验方法，开创了系统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先河，因此他被誉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所以，虽然社会心理学的诞生大有“蓄之既久，其发也速”的味道，先天条件优越，但毕竟年纪尚幼，还欠成熟。最近我国介绍过来的苏联和美国的三本《社会心理学》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大学教材，但内容之不同、风格之迥异，在心理学的各分支中大概是相当突出的。

苏联安德列耶娃著的《社会心理学》和苏联多数理论著作一样，给人的印象是：严密整饬，求全务得，在风格上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在论述这门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时，似乎有点自信胜于谦逊，颇给人以非他莫属之感。至于品评起不同流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多少缺乏一点“费厄泼赖”的宽容精神。由于它坚持教科书应当“记述的是科学上‘毫无疑问’的东西”，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假设和有争议的实验未能列入书中，这就不免使得该书显得有些苍白。但是，不可否认，该书在概念的明晰和系统的周延上是卓显其长的。耐着性子读完的读者，就会发现，那种严谨的学风还是不乏助益的。它根据社会心理学以研究群众心理和个性在团体中的地位为对象的观点，严格区分了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普通心理学的区别，逐层展开了人际交往和相互作用的规律、团体社会心理学、个性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的讨论，最后又专门讨论了社会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既想保持浓厚的理论色彩，又力图服务于实际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这本书坚持了苏联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两大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二是对集体心理（为集体发展的阶段和水平，集体形成的心理条件等）的研究，既继承了苏联集体研究的优良传统，又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特色，体现了与资本主义研究的明显区别，无疑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与此相比，美国的两本《社会心理学》则显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系松散、注重实用、时代感强烈。在理论上或者是独树一帜创一家言，或者是兼容并蓄、无有主见。在内容上则取材随便、注重实验材料。但同中有异，就美国这两本书自身比较，其侧重点和写作风格还是判然有别的。

弗里德曼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兼容并且隐遁主见的典型。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大量的事实材料推给读者，相信读者自身的判断力，缺点是各种实验、各家观点纷至沓来，缺少分析，往往给人观点模糊、堆砌材料的感觉，容易给读者琢磨不定、似是而非的印象。但也要公允地说一句，它绝不是零乱的拼凑。一遍读后，掩卷而思，就不难发现，书中观点及其对材料、理论与实验、历史与现实、结论与发展等几方面关系的处理是颇具匠心的。同时，它的一个特别可贵之处，是在广泛涉猎诸种研究课题的前提下，对六十年代以来各类重大实验和观点介绍尤重，故内容丰富、材料充实。但不无遗憾的是，作者忽视了帮助读者对社会心理学的纵向了解，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理论流派几乎无所涉及。而这在巴克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中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补偿。它和上本书比起来，更明显的特点则是很有一点创一家言的味道。它撇开了许多无关的理论介绍，注重从若干理论观点去考察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在笔调上不如上本那样轻松活泼，但自有其明显的理论深度。当然，这并不是说该书就枯燥无味。事实上，用作者的话说，它还是注意将引起读者的兴趣和传授知识结合起来的，不过作者在章节的安排上更注意从个体到群体的逻辑序列。

这两本书虽然都涉及了社会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为研究的方法问题、社会知觉、群体结构与领导、个体社会化的心理过程、口语和非口语交往等，但由于作者的研究重点不同，弗里德曼主编的《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认识方面，为社会知觉、归因理论、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人际的吸引与喜欢等方面更见功力，巴克主编的《社会心理学》在对越轨行为、社会压力等方面的研究更显其长。因此，关注和有志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读者，将这三部书对照阅读，倒是饶有趣味并且备感受益的。

（《社会心理学》，[苏]安德列耶娃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社会心理学》，[美]弗里德曼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社会心理学》，[美]巴克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原载《书林》1986 年第 5 期）

《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
(中文版)出版

李兴云

本书是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古畑和孝主编的。全书围绕人际关系——人与人的各种社会、心理现象，如何协调和改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实际应用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阐述。

全书共分十三章：什么是社会心理学；对人认识；归属过程；态度和态度变化；对人魅力；传播；遵从和脱离；攻击和援助；协作和竞争；公平和公正；社会的比较；领导才能；作为科学的社会心理学。本书内容充实，注重应用，对于研究和协调直接的(日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可从中获得启迪。

本书可供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专业师生参考。亦可供思想政治工作者、组织管理工作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学爱好者参考。

(原载 1986 年 5 月 30 日《天津书讯》)

谈《社会学参考书目》

叶积奇

日前逛书店，购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合编的《社会学参考书目》一册，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买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它了解一下国内各大学在这个科目上的藏书情况。

出版说明指出，此书是汇集了全国三十余家大型图书馆的藏书编辑而成。所收书籍，上自清末社会学在我国出现开始，截止到一九八二年底，共计三千六百余册。

至于出版这部书，据编辑单位表示，“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通过检索和查阅，帮助从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同志了解社会学研究有关领域的历史与现状，以便更好地分析、研究和解决社会理论和社会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部分的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全书共分九大类目，各类目再分多个项目，项目下再设子目，翻查起来还算是方便的。

九个类目分别为（一）社会科学总论；（二）社会学理论；（三）社会学方法论；（四）社会史、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史；（五）社会调查；（六）分科社会学；（七）社会病态与社会问题；（八）社会工作；（九）社会学辞典、工具书。

此外，还有四个附录，其中包括两个书目。

对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社会学研究基本上自 1949 年以后便停止了，有的只是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等。恢复社会学这门学科，是 70 年代后期的事。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学研究范畴上，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落后了差不多三十年。

这种情况，在这本书目中有所反映。

书内所列出的大部分书目，都是解放前刊行的译本或著作。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学的经典作品，不论什么时候都有参考价值。不过也有不少在资料和方法上已是颇为过时的著述，已同样编入这个书目中。书目中有一定数目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去对某些社会问题加以论述的著作，大抵是较为通俗的，学术性不大。解放后刊行的有关作品，很多翻译自苏联，观点自然是马列主义的。

这几十年来西方出版林林总总的社会学理论书译本在这本书目中少得不成比例。事实上，国内也是在近两三年来才大量翻译这方面的著作的。笔者认为若了解一下 1949 年以前中国出版过一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译本和著述，此书可以参考，但作为今天社会学研究的参考资料，书目则未免有点除旧。

（原载 1986 年 7 月 21 日香港《申报》）

震撼时代的强音——推荐《人·历史·社会》 陈岩

改革浪潮冲击着社会各个角落，也冲击着学术理论界。新思想、新观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青年知识分子以他们那饱满的热情、多维视野、全方位思维模式，站在社会思想革新的前沿，向世人展示了思考着的一代投身于改革的雄心与才智。《人·历史·社会》便是他们理性思维之硕果。

如果说改革只限于哲学意义上的物质领域，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改革不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上，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革，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更新是改革的根本。这部论文集正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是怎样的形象？现代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怎样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为历史发展机制是否妨碍史学的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历史作用？等等。在这本书中，青年学者们通过各自专门研究，从严肃地探讨学术观点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分别作了较为严谨的阐述。他们以自身的心理特性再现了青年学者探索、开拓、进取、求知的欲望。要求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高度的自我意识是他们的特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形象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书文章涉及文学艺术与传统文化、经济学、史学、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门科学，代表了青年学者一定的理论水平。它的内容虽涉及广泛，但始终向我们隐含地揭示一个主题思想：现代社会需要现代型思维者。

朋友，当您翻阅这本书之后，您一定会感受到青年学者以笔墨弹奏出震撼时代的强烈音符，从他们身上看到改革的希望。“理想的冲突”，不！他们决不是乌托邦主义者，而是立足现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现实的人。

（原载 1988 年 9 月 3 日《天津书讯》）

科塞《社会学导论》中译本问世

小马

刘易斯·科塞主编的《社会学导论》，由杨心恒副教授主译，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会学导论》一书由当代社会学大师，结构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任指导主编，功能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科塞任主编，1983年在美国问世。默顿因中程理论等方面的建树而蜚声社会学界。科塞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多年，著述甚丰。他因强调并分析了冲突的社会功能而确立了自己在社会学界的地位。他撰写的教科书因文字流畅而流传甚广。本书的原本由现代化理论大师英克尔斯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杨心恒副教授推荐，杨心恒副教授组织翻译。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逐一校订了有关的术语。为了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全书的脉络，他执笔撰写了《译者前言》。先读前言，定有收益。这是因为前言中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所要研究和所要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我们要赞成的东西。”学习和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当代社会学导论性质的教科书，好的首推布鲁

姆等编写的《社会学》，凯普劳的《社会学基础》，斯宾塞和英克尔斯合编的《当代社会学基础》以及科塞等编的这本《社会学导论》。科塞这本长达五十四万字的《社会学导论》之所以能和中国读者见面，是因它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抽象理论与形象思维结合，可读性强。该书每一章在重点难点之处，都专门引述了某一名著中的片断或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帮助读者理解有关的社会学观点。形象思维推动了抽象思维，进而把理论印刻在了读者的头脑之中。我曾拜读过国内若干社会学概论性质的书，发现作者们强调书的理论性，忽略了书的可读性。读完几页后就须“休息”；而不象《社会学导论》，一旦开读，就“读”不释手了。可读性与理论性并不是相对立的两面，令我们拍案叫绝可因妙语连珠，也可因文笔行云流水。如果理论界能写出更多的两性合一的佳作，就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了。

理论的揭示与实证的研究结合，强调社会学学科的特点。科塞等作者在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感到他们不容易摆脱已被概念化的理论，在面对经验研究时手足无措。所以科塞等作者在发展学生社会学的想象，以掌握人与社会、个人经历与历史、自己与世界间相互影响所需要的精神质量的同时，强调走向真理的最为可靠的途径是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由此，书中还详细介绍了调查研究如何发展、发现理论的过程。例如，书中叙述了克劳沃德和奥林关于犯罪群体的研究，米尔斯的精英人物的概念如何被修改了等等。

科塞等作者希望《社会学导论》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在了解自己方面前进一步，更好地面临挑战。在目录内容的编排上，也看出作者的苦心。第一篇关于社会的一门科学，包括了社会学的观点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两章；第二篇基本概念，包括文化、社会、社会化和组织四章；第三篇包括了社会不平等、离轨行为与社会控制、种族与民族、性别四章；第四篇社会制度，包括家庭、经济、教育、健康、宗教、政治六章，最后一篇讨论了社会变迁问题，篇名为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包括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人口与生态学三章。作者的苦心印证了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格言：“认识为

了预测，预测为了控制。”

通读全书，深感作者在编写这本书时，为读者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学的观点，灵活地运用社会的知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许多个人遭遇的困难，只有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这一级水平上才能获得理解，也才能得到解决。社会学提供了获得理解和得到理解的途径。《社会学导论》一本把这些途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成为目前国内所有的社会学概论性质书籍中的佼佼者。

（原载《社会学与现代化》1990年第4期）

《中国社会思想史》（上）读后 李文

一个好的史学家，应有史学、史才、史识。

此三者已为王处辉同志初步所具，这是我读了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后产生的一个印象。

有史学即指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作为泱泱世界文明大国，中国数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而于其中，有关社会思想，伦理思想方面的又最为丰富，因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对此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论述，此处只拟举出梁启超的一家之言便足以立论。梁启超是这样说的：“世界哲学大致可分三派，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哪一时代、哪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为儒家最为博深切明”。既然古代西方的自然学说，印度的宗教学说，中国的社会、伦理学说，都是最丰富的，那么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开掘，整理、研究便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同时也意味着要对中国社会思想方面的史料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掌握，也着实不容易。概观《中国社会思想史》，所占有史料不可谓不丰，算得上“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了（韩愈语）。书中内容不仅涉及了老子，孔子等有名的人物、涉及了王符、谭峭等不算十分有名的人物，也涉及了古代的神话。尤其是整本书处处让人读起来都不会感到牵强附会、力不从心，相反，倒是令人感到游刃有余。表明作者熟悉中国古籍，具有相当的国学功底。

有史才即指史学家应善于表达，能写出有文学意味而又明白通晓的文章。这就要求史学家应在一定思想、观点的指导下，采用一定的方法，将繁杂纷坛的史料“以一贯之”，并要求史学家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在中国新学史史上，出了名的关于中国的史学书无非有以下几部，一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系采用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贯”中国的史料，另一本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导论》，采用罗素逻辑构成论的方法整理中国史料，即将历史分散开来，又聚拢回去。其他的几本，则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整理史料。早期的，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来的，乃有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侯外庐、蔡尚思、李泽厚等人编写的中国思想史等。王处辉同志的《思想史》亦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阶级的观点为指导写就的，而且他专门处理的是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史料，这便在思想方法上走对了路线，同时又有了开拓意义。

在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指导下，王著又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西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功能、社会化、社会整合、社会变迁等作为基本的分类工具，因此又使行文具备明晰性、层次性。全书的文字，既经得起推敲，又很简洁、流畅，严谨与文采兼具。

有史识则指要善于处理史料。如上述，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资料太多，且由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儒学传统侧重神秘体验，中国人的思想又有较高的模糊性，学人用词，意义多不明晰，且由于中国大陆建国后至今尚未有同类著述问世（台湾60年代出过龙冠海、张承汉合著《社会思想史》），这样，就没了相应的参考框架。故如何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分清主流、支流、关

键与支节，即如何取舍断制，有详有略，实在太难。而据我所知，王处辉同志穷搜苦集，几载披阅，几载增删组合，终于搞出了今日《思想史》这个基本框架，让读者通过阅读，便可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有一有序的了解，并可按图索骥，进一步钻研，这实是一桩功德。

任何人都不能割断历史。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社会学说、只有与祖先的社会思想、社会学说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筑在祖先的文化遗产之上，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处辉同志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有长久的建设意义的。谈到不足处，我初步想到二点，愿与王处辉同志相商。一是本书关于社会历史背景方面说的不够深入，明显地是“内史”的写法。而我看来，社会思想史更应该是“外史”与“内史”的有机结合。二是用什么样的现代社会学术语概括诸家诸派的思想，《思想史》一书还有深化的余地。借用西方的一些学术术语不失为一条简洁有效的途径，但如能在借鉴西方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更紧密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提炼、铸造出一些专门术语来，用以归纳、概括、整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可能更贴切些，效果更好，意义更大。

说到希望，那就是能尽快地读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下册。相信那是一本更出色的书。

（原载《社会学与现代化》1990年第4期）

预测社会发展的手段
——介绍《社会预测的方法论》
曹静

本书是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 1985 ~ 1990 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中的社会学专业教学参考书。

作者[苏]B·B·科索拉波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预测学的基本内容,是对近年来社会预测研究与实践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概括,书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读者通过此书可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预测的学说和对社会未来的预测。

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性,论证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是共产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科学预测。

书中对人类社会当前的形势做了深刻的揭示与分析。人类社会在前进途中不断出现重大问题,如当前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等,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危及整个人类的安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对西方未来学持批判态度。西方未来学提出,今后人类社会的前景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其矛头所向都是企图否定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共产主义的论断。书中对此做了严肃的批判。

社会预测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现时代,任何重大社会决策,都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减少失误,必须进行科学的预测。此类专著的介绍,将有助于我国社会预测活动的开展,此书对开阔知识领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也将有所裨益。

全书共分六章: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体系中的社会预测;二、社会预测学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客体;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预测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四、社会预测与社会过程的管理;五、部门的社会预测;六、区域与全球的社会预测。

(原载 1991 年 6 月 10 日《天津书讯》)

读《人际交往与社交新观念》有感

王辉

当我翻开《人际交往与社交新观念》这部书稿时，一种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不仅由于我过去长期从事党政工作，深感人际交往的重要，而且，更由于从重建社会学以来，虽然作为一位初学者我参加了全国社会学进修班的学习，对人际交往研究还是欠缺的，这部紧密联系社会生活的书已经问世，使我倍感亲切。

布帛菽粟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其实人际交往何尝不是如此呢？婴儿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了与父母的人际交往。从家庭、邻居、学校、工作单位以至扩展到社会和整个世界，处处都有人际交往，“人生何处不相逢”！从生到死，无时不在处理着人际关系。生者对死者的怀念，“物在人亡空有泪，时殊事变独伤心”，不也是人际关系的皮映吗？从古至今，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复杂多变的人际交往，“节物后先南北异，人间冷暖古今同”。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减少了人际交往的时空限制，使人际交往向着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多类型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人际关系日益复杂，形成了开放性多维网络结构。因此，人际交往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际交往与社交新观念》正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人际交往的一种有益尝试。这本书兼有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其中论述不仅以经验为依据，而且把人际交往放到宏观社会背景中考察，提升到理论层次上来思考。同时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实际，揭示人际交往规律性，给人以启迪，为人们开展健康的人际交往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从这部书稿行将付梓联想到社会学研究。我认为，在研究社会学的对象、概念体系、方法上下功夫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学研究扩展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象人际交往这样的新领域多么值得开拓啊！又如对企业经营的研究，难道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吗？社会学家为什么不可涉足，从社会学角度对企业经营的社会因素进行研究呢？再如对精神卫生的研究，1987年，由中国、美国学者在天津联合召开的国际“应激与心理健康”学术会议上，美方有不少是社会学家，而中方参加者都是医学家。为什么我们一些社会学家不参与这方面的研究？看来应当冲破学科的界限，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开放和横向联系，并促使其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该稿撰写者张向东副教授过去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又有十几年实际工作的经验，近些年来转入社会学研究，勤奋刻苦，潜心钻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当吸收各路人马、各方面人才，借助于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知识交融，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原载 1991 年 8 月 25 日《天津书讯》）

《新中国法制建设》序 林亨元

陶希晋同志是我国当代法学家，党和国家在法制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局局长等职务。1979年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顾问。

陶希晋同志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他坚决主张“依法办事是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也是我国法制协调发展的中心环节”，他把制定新的法规和整理原有的法规看成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他主张“必须进行经常的法规整理工作，从整理法规入手更有助于新法规的起草工作”，并认为“对法规的经常整理和不断的废、改、立的过程，也就是法制完备的过程。”

他非常关怀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专门人材的培养，曾多次在各政法院校讲授有关法学理论的课程和作有关法制建设问题的报告。

陶希晋同志对法学特别是对民法学有较深的研究，一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各项法律在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在建国以后较长的时间里，从事立法工作，参加和主持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和法令，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主张的建议。

他所写的文章，所作的报告和所提的建议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司法实践富有参考价值，法学界同志早就期待着整理和出版他的一系列著作和报告。现收集了他在建国初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国际法和法规整理等方面的主要论著和报告等三十六篇，汇编成《新中国法制建设》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满足了人们的期望，为我国法制建设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87年2月

（原载1989年1月28日《天津书讯》）

《你想得到专利吗？——专利工作便览》简介
张敬双

我国专利法即将在 1985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行，为了系统地普及专利知识，为了帮助申请专利人顺利的办好各种手续，曾参与过我国专利法工作的何润华、马连元二同志编写了《你想得到专利吗？——专利工作便览》一书。该书广征博采近年来关于专利工作的各种论述和资料，从实用的角度介绍了专利制度、如何申请专利、技术贸易、专利文献利用、专利侵权诉讼以及企业专利经营策略等项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覆盖了与专利有关的各方面的工作，并附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实施细则，对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法律工作者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都是一本工作手册性质的参考书。该书已经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 1985 年《天津书讯》）

荟各家之萃的法学读物
《法律与自由》
· 佳火 ·

法律和自由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探讨、研究。如何寻觅前人的研究成果？南开大学出版社愿向大学生和其他青年朋友们奉献荟各家之萃的法学读物——《法律与自由》。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室的严存生同志所著《法律与自由》分“前马克思主义论法律与自由”和“马克思主义论法律与自由”两大部分，列举了西方古、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法学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温斯坦莱、斯宾诺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比尔、康德、黑格尔、约翰·密尔等十三位大师对法律与自由的代表性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辟论断，并作了归纳和阐释，读者可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能浏览古今法学大师论著的精华，以达事半功倍之效。因此，这是一本篇幅适中且可读性强的法学读物。

“历史是真理的火把”。本书通过回顾历史上人类对“法律与自由”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下法律与自由的实际，可以促进对法律的本质和作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从而使认识更全面、更深刻；还可以帮助我们批判地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把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本书有较强的适用性，它将为每一个探索“法律与自由”这一古老而现实问题的读者提供方便。

（原载 1987 年 4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借鉴小强了解应用——介绍《罗马法原理》

小强

古代的罗马奴隶制国这已经消失 1000 多年了，而罗马法仍发生着作用。

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法学家集团出现在古罗马，世界迄今所知最早的并且完整保存的西方法学著作，也成于罗马。罗马法对反映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作了详尽的规定，因而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许多法律关系，对资本主义民法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经典作家称之为“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马恩选集》4—248 页）著名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有关人的权利能力以及物权和债权部分，就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制定的。中国从清末开始的“民律草案”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也都深受罗马法影响。至今，我国的“民法通则”制定，以及今后的民法制定，仍要借鉴罗马法的精华体系。

罗马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呢？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曲可伸副教授所著《罗马法原理》对此作了详尽的回答。

该书着重论述了罗马人法、物法、债法的产生、发展、基本内容和对后世的影响，完整地介绍了罗马婚姻家庭法、诉讼法，对当时罗马社会制度，法学流派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作者对罗马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功底，对古罗马繁杂、深奥的法学原理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如对古罗马有夫权婚姻和无夫权婚姻的介绍就属此例。作者能够在简明的介绍中使读者发现罗马法的深奥，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它是初学罗马法者不可不读的入门之作。

在介绍古罗马法律制度同时，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立场上，对罗马各种法律制度给予了科学的评价。

在保持罗马法原貌的同时，对物法，债法等对现实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部分着重论述，并引导读者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联系起来。

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法学家李光灿教授对此书亲笔作序。

（原载 1988 年 5 月 7 日《天津书讯》）

十倡十戒开拓前进——《管理改革的开拓者》序

高占祥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新任务、新问题，要求我们从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把那些同我们的伟大事业不相适应的东西克服掉。在工作实践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切身感受，无以名之，姑且叫做“十倡十戒”。

一、提倡胸怀全局 力戒脱离中心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我们要经常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战略全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高屋建瓴，知道自己部门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才能使本部门工作这节“车厢”不脱离党的总路线的轨道。

议大事、懂全局这个问题，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有的同志不关心大事、全局，工作起来，心中无底，脚下无根，摇摇摆摆，开创了新局面；有的同志搞本位主义，不顾全局，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有碍四化建设、有损全局的事情；有的同志目无全局，不顾统一，指导局部就会犯脱离整体、盲目乱干的错误。事实说明，没有全局在胸是下不好一着棋的。

党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全局、大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以完成这个总任务为中心。目前正在进行整党，就是为了保证实现这个总任务。任何偏离和干扰这个中心的作法都是背离十二大的方针路线的，都是错误的。

二、提倡锐意创新 力戒因循守旧

开创新局面，要求我们每个同志都有一顆不断创新的进取心。创新，才能前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弃旧扬新、不断创造的过程。创新并不是异想天开，随意杜撰，而是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在实践中积极探求解决新课题的新途径、新方法。

在现代化建设中，创新就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存在着不少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错误观念和模式，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实际出发，冲破这些旧框框，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

创新与改革并不是把过去的一切工作经验统统摒弃。相反，过去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传统、好作风、好方法，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丰富，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经验是宝贵的，但把狭隘的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时代已进入八十年代，思想还停留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因而政治迟钝，思想保守，习惯于用旧思想、老套套看待事物，评论是非，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改革的阻力，这是目前干部队伍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要做改革的促进派，创新的带头人，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坚

决破除。大量生动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则进，创新则活。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变守业为创业，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

三、提倡勤奋苦干 力戒懒散怠惰

唐代韩愈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业”，是四化大业，较之韩愈所说的业，伟大、艰巨得多。它要求我们百倍于前人勤奋地工作。勤奋，就是要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稀里糊涂混日子时代应该结束了，舒舒服服当干部的日子也应该结束了。勤奋，就要勤于思考，要不断地认识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提出新思想；勤奋，就要自己动手、动口，自觉地向自己的惰性作斗争，克服那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坏作风；勤奋，就要有一股子干劲、钻劲、创劲，有一颗永不衰竭的进取心。

要做到勤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现在，有的干部精神不振，懒散怠惰，缺乏为四化献身的精神。这些同志往往是“心里装着小算盘，围着私字打转转”，没有从“自我”的小天地，走上四化建设的大舞台。

应该指出，我们现行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往往压抑人的积极性，使勤奋的人勤奋不起来，甚至使勤人变懒，懒人更懒。为什么懒了多年的人一到深圳往往就勤奋起来了？主要的一条是那里打破了“大锅饭”，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为了使每个人勤奋苦干，还必须对现行体制中的弊病进行大胆的迅速的改革。

四、提倡务实精神 力戒空谈陋习

务实，就是崇尚真理，讲究实际，注重实干，思想必须付诸行动。

提倡务实精神，必须反对空谈陋习。这些年来我们基本上扭转了“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实事求是的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空谈陋习并未完全绝迹。有的干部汇报情况，布置工作，会议发言，对群众作宣传，多是些空洞抽象的调头，缺少真知灼见，缺乏说服力和号召力。这种作风任其蔓延，势必贻害四化大业，误国误民。历史上，空谈陋习并不少见，魏晋士人“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北宋官僚“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都是高谈阔论、泛泛空谈造成误事害国的典型。我们的四化建设，需要的是说实话、办实事、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四化大业，要踏踏实实地干点实际工作。要以求实的精神，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弄清一两个问题、解决一两个问题。全党有四千万党员，如果每个党员解决一两个问题，就是几千万个问题。这比夸夸其谈、洋洋万言要有用得多了。

五、提倡调查研究 力戒闭门造车

对调查研究，多数同志是重视的，但也有的同志重视不够。有的领导同志整天忙于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拔不出脚来搞调查；有的同志过去接触过一些实际，有一定工作经验，觉得搞不搞调查研究关系不大，有的同志习惯于

材料堆里看材料，电话机里听汇报，办公室里想套套。这些同志的一个通病，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与生动丰富的生活现实割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决定，处理问题，怎么能不跌跤子呢？要开拓前进，就必须坚决克服那种闭门造车，用老经验对待新问题、凭主观想象作决策的坏习气。

一个聪明的领导者，总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感，不仅懂得把调查研究摆到重要日程上来，而且还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调查研究上面去。

社会生活是异常复杂的，往往有许多假象。要想窥见到事物的内涵，把握住它的本质，必须把传统的调查方法与科学的社会统计方法结合起来，这单靠少数几个领导者是不够的。应该在领导同志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充分发挥有关职能机构和智囊人员的作用。

六、提倡大胆“冒尖” 力戒嫉贤妒能

农村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冒尖户”，给农业战线带来了一派生机。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哪里“冒尖”者多，那里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要大力扶持各个行业的“冒尖”人才。

有的人，对贤能之士、先进分子，不是抱着崇敬、爱惜和学习的态度，而是站在一旁冷眼相看，躲在背后嘀嘀咕咕，不见贤思齐之心，有嫉贤妒能之意。他们自己胸无大志，不求进取，却对别人吹毛求疵，对“冒尖”人才的缺点，不是善意帮助，而是“以小疵掩其大德”，求全责备，讽刺挖苦。个别人甚至无视党纪国法，造谣诬陷，压制人才，以至“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这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是败坏我们事业的腐蚀剂。它所以能够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内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功过不分，赏罚不明，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我们要坚决同这种歪风邪气作斗争，对妒贤嫉能的人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要“冒尖”，总难免要冒出点问题来。大凡只要干事，一点毛病不出，一点漏洞没有，一点错误不犯，是从来未有的。因为干工作而出了点毛病，比那些不干事混日子的人要强百倍。在事业上“冒尖”的同志，要勇于顶住由嫉妒而造成的压力，在那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以至恶意诽谤面前，镇定自容，投以睥睨的目光，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方今之急，在于人才”。各行各业的“尖子”，是时代的英才，民族的精华。因而，各级领导者对“冒尖”人才，应当在政治上给以关怀，工作上给以支持，生活上给以关心，满腔热情地为人才成长开拓道路。在四化建设急需人才的今日，不爱惜人才的领导，是不合格的领导；压制人才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

七、提倡大胆碰硬 力戒好人主义

敢于碰硬是革命者应有的胆略、气魄和战斗风格。碰硬，就是向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进行挑战，向歪风邪气进行挑战；就是《国际歌》所讲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但是，正义在同邪恶、同错误进行斗争的时候，总会遇到阻力，有时要付出一些代价，甚至要担一些风险。“好人主义”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一些同志，在错误思想、行为面前，不讲直理讲面子，

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是非讲人情，四面讨好，八面玲珑。这种腐朽庸俗的作风，是同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的。

敢于碰硬，首先要做到自身清正，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唯有如此，才能挺直腰杆，凛然一身正气，敢于理直气壮地扶正祛邪。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坚持原则、大胆碰硬的同志遭到报复，受到孤立；而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却能左右逢源。为着党和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必须下决心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在整党中，我们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同“好人主义”这种庸俗低级的处世哲学作坚决斗争，做一个正气浩然，刚直不阿的好干部。

八、提倡讲究效率 力戒疲沓拖拉

在党政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办事不讲效率，拖泥带水，议而不决，互相推诿，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带普遍性的问题。现在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转变。在科学技术和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具体的日期要求，甚至没有时间观念，这种小生产的积习，旧官场衙门的遗风，同开创新局面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工作效率低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无人负责。要根除这一弊端，就要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把每个单位、每个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搞得清清楚楚，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根据工作效率高低、表现好坏、成绩大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这样才能激励人们多快好省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

开创新局面，一定要有当机而断的魄力。鲁莽从事是不行的，但顾虑重重，徘徊观望，也会坐失良机，贻误工作。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大胆地去干。这样做，难免犯一点错误，但这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拉拉、长期不解决问题的错误，要好得多。

要提高工作效率，还要善于运筹时间。领导者要学会把重要的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拒绝去做那些不必要的事情。要做时间的主人，不推、不拖、不等、不靠，抓紧时间工作。不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都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

九、提倡令行禁止 力戒纪律松弛

纪律好坏，也反映着一个单位的精神状态。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是精神振作的表现。我们过去革命的胜利靠铁的纪律，今天开创工作新局面，也要用严格的纪律做保证。现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整顿和加强纪律，是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每个党员、干部要努力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现在有的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仍然采取消极的态度，对目前的改革采取观望、阻挠或抵制的错误态度，这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改革，是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对每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允许在改革中犯错误，不允许阻挠和抵制改革。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纪律的尊严，对那些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乃至处分。听任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斗争，不制止，不处

理，本身就是对纪律的一种破坏。当然，我们提倡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并不是要人们束手束脚，谨小慎微。不要一强调纪律，就事无巨细，都请示上级。对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工作，要敢于独立负责。

十、提倡刻苦学习 力戒满足现状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我们要自觉加强自己的才能锻炼和素质修养，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知识水平。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要学习文化，学习科学，学习管理。

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陈旧率越来越快。社会各个方面都处在迅速变革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理论水平低的同志，固然要加倍努力学习，就是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同志，对学习也丝毫不能放松。每个同志都要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里，满足、松懈、就会落后，甚至被淘汰，这是时代向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做为领导者，要十分重视、关心干部的学习，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同时要加强检查、督促、考核，努力造就一支适应四化建设需要，勇于开创新局面的干部队伍。

（原载 1984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

读邹至庄先生《中国经济》

肖四如 傅继军 晏松柏

1984年美国纽约HarperandRow出版公司出版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计量学研究室主任、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的教科书《中国经济》，以其细致的分析方法、丰富的实证材料，在美国经济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4年及1985年邹先生两次来中国主持西方经济学研究会，向中国经济学者宣讲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引起了中国经济界的关注。国内一些刊物先后翻译该书的部分内容。1984年底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这样，它便成为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国外学者系统地论述中国经济的专著。

《中国经济》的内容结构

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评介中国经济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改革及将来的趋势。对这些分析方法也作了较通俗的介绍。全书共分八章，每章附有参考资料及习题。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提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指出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下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并提出了Pareto最优作为经济活动的评判标准。然后作者描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转怎样使经济过程的均衡结果达到Pareto最优，从而决定产出与价格。作者接着分析了市场出现垄断者的情形，以及国家市场机制下调节及管理经济的职能。

第二章讨论中国经济怎样运转。作者首先建立了一个集中计划经济模型以描述197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讨论这一体制下经济单位的行为及效率，说明它是如何解决前一章提出的三个问题的。接着在上述模型中引入市场因素（即私人企业的参加及国营企业获得部分自主权），描述1980年以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同时分析改革后经济单位的行为及效率。最后在这些基础上讨论改革的可能方向、程度及后果。

第三章描述中国农业经济。作者首先建立总量生产函数来描述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分析生产增长的效率。接着用现代经济学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公社制度农民的行为以及统购制度下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的原因，进一步分析了农村体制改革后的经济效果。

第四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首先建立总量生产函数并给出计量分析结果，说明中国工业增长的效率。接着剖析了一个大企业——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经营管理说明企业内部的组织、企业管理者及职工的行为、经营的效率。最后讨论了中国工业改革及其效果。

第五章讨论中国消费经济，作者从城乡消费结构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状况。然后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定量配给制度及消费税制两种消费制度的经济效率，也讨论了剪刀差问题。

第六章讨论中国宏观经济。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衡量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国民收入及其增长率的计算。然后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效率。接着作者建立了一个描述中国改革后经济关系的模型，它是由九个独立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作者逐一分析了这些方程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最后利用统计数据给出了一组简单的计量结果。

第七章分析中国的人口及人力资本，描述了中国的人口及就业政策的经

济效率。

第八章讨论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外投资。作者首先介绍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的外贸政策，指出存在的问题。

作者在全书的一、二章建立了分析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工具，第三章以后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多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从一种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邹先生认为目前世界任何一国的经济都客观存在两种机制的作用，即集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只是所含市场机制成分的不同。中国目前的体制主要仍然是集中计划经济，但含有重要的市场经济因素。可以看作是强调集中计划的混合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客观地表现为市场因素的增加。要了解中国经济，首先应该了解完全集中计划经济及完全市场经济两种极端而又简单的模型，再进一步讨论在集中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因素后的情况，这样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就十分清晰了。

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目前国外比较流行决策论的研究方法。从经济活动的客观特性出发，看经济管理者是如何实现其指挥的（决策结构），经济单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动力结构），实现各种经济活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状况（信息结构）。邹先生的《中国经济》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方法。经过细致的分析之后，他指出，社会的一切生产和分配由统一的计划机关来决定（集中的决策）。计划部门要有效地组织这种生产和分配，需要知道每个消费者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以及每个生产者的经济条件（纵向的信息联系），并强调非物质的刺激（动力结构）。由于计划机关要掌握和处理如此繁浩而又日益变化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决策的效果就无从保证。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由消费者和生产单位独立作出（分散的决策），每个企业只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条件及其产品和投入的价格（横向信息联系）。运用这种分析方法，我们过去的经济处在决策、信息、动力结构不协调的状态。我们实行的农村的责任制及扩大企业、地方的自主权，正是决策权力的分散。在企业内部层层建立责任制，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正是动力结构的调整。而完善统计，加强各种宏观控制，正是信息结构的调整，使经济体制趋于协调、高效。

这种分析方法可为我国经济界借鉴。我们过去习惯的分析方法总是先把经济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从所有制出发分析所进行的一切经济活动区别，忌讳其共同性。这种分析方法混淆了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区别，难以把握客观经济活动本质，也根本地排斥着现代经济分析工具的应用。

第二个特点：重视行为分析。不同经济体制下，经济单位的行为不同，从而经济活动的效果及方式不同。了解一个经济、考察一个经济的效率，首先应该分析在该经济制度下经济单位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行为分析。这个特点在《中国经济》中也体现出来。作者在分析了市场制度下消费者、生产者及政府的行为之后，分析了中国过去在集中计划体制下消费者、农民、农业生产单位及工业企业、计划者本身的行为，说明制约着这种制度下经济效益迅速提高的根源。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的行为是在其收入及商品配给的约束之下，求自己消费效用的最大化（与市场

机制下消费者行为无异)。农民、工人的积极性被束缚，在生产中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效率，因为他们工作及工资固定，不能使自己的劳动转移到边际效益高的部门，以获得高的收入。企业管理者的目标是完成计划，对提高经济效益兴趣不大(因为那只会导致下年计划指标的提高及投入计划的减少)，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投资及要素投入的“饥饿症”。计划部门本身只是忙于协调和平衡各种无休止的要素及资金投入的要求。显然这样一个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接着作者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单位行为的变化，认为大包干后农民的行为与市场机制下生产者的行为是一样的，对成本和效益的关心以及竞争的条件，使生产的效率发挥出来。

西方微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消费者个人行为与企业行为分析的基础之上，宏观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亦愈加强调其微观基础，微观行为的变化作为宏观政策的反映，在评介不同宏观政策作用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东欧国家也很重视对经济行为的研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Kornai 在他的名著《短缺经济学》一书中，亦比较详尽地分析了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行为，论证了这种体制下普遍存在的“资金紧缺”与“投资饥饿”的根源。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邹先生的分析方法及其他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为我们借鉴。

第三个特点：合理运用数学模型。作者使用了大量数学模型以说明中国经济(也介绍了基本的模型技术)。简洁性是作者运用数学模型的明显特点。他认为，如果要回答同样一组问题，那么模型越简单越好，如果指定了有待说明的一组经济现象，那么我们宁可使用所含方程为数较少而同样说明问题的模型。一切科学理论都应具备的一个优点就是简洁性。在分析工农业生产增长的效率时，书中运用简单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通过系数估计，得出结论：中国农业的增长小于投入量的综合效果，即农业产量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使用更多的日前投入量和劳动，而不是通过现代化。中国工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技术的改进。在说明中国的消费时，作者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定量配给制的经济效率及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问题，指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利用间接手段如比价、工资、税收及补贴为实现 Pareto 最优而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并说明中国过去较低的收购价格是缺乏这种效率的。为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增长问题，作者运用简单的多马模型，指出国家投资的经济效率不高，国民收入统计所记录的大部分资本，对提高远期产出所起的作用不大。

书中运用数学模型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模型前提条件的说明。每一个模型用来解释中国经济时，须先证明模型所含经济含义在中国的适应性。作者为说明中国宏观经济关系，建立了有九个方程组成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说明 1979 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这些方程大都反映了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是否适应呢？作者花了很大篇幅逐一分析。

作者运用模型方法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是重视统计数据的分析处理。他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与七十年代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因此，反映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模型，计量分析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数据资料的不完备。1979 年以后我们只有短暂的一段时期观察中国经济，因此不能系统地运用计量方法。同时由于中国几次大的政治动乱，对于时间序列的数据必须慎用。在用历史数据分析经济关系时，一要搞清每一统计指标的经济含义，二是要对历史时期作定性分析，对于不反映客观经济关系的数据予以剔除。书中的分析

表明，对于统计指标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以 1952 年不变价计算或以 1980 年不变价计算，这个速度分别是 5.99%和 3.89%，这自然影响到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运用数学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目前国内正在兴起的一股热流，数量经济工作者可以从邹先生的书中得到不少启发。

第四个特点：注重比较研究。评价一国经济，应立足于该国的国情特点，这些特点应从比较中体现出来。邹先生的《中国经济》很注重比较分析，以清晰地揭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如在中国农业一章，作者分析了 1952 至 1980 年中国经济发展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发展经历，指出大部分资本形成都是在工业部门之内，人口仍然没有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农业生产占国民收入约 42%的比例。在分析家庭支出的模式时，作者不仅比较了中国不同省市的消费结构，同时比较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四类家庭支出的弹性。在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时，作者比较了几个国家的情况。

几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作者提取 1980 年到中国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印象：中国经济学大多集中于经济哲学一类的抽象研究，对中国经济任一方面的具体研究做得较少。作者的批评是中肯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界的学者绝大部分精力花在经典著作的考证、译义及解释，实际的经济活动如何运转讨论极少。近几年来经济改革带动了经济科学的改革，经济工作者研究的内容比原来广泛了，方法比原来多了，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解释了许多成功的政策。这也证明了各国经济活动确有统一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宏观规律可遵循。然而我们的经济学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我们还没有一本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系统的经济学，从中专学生到经济研究生，需要死记硬背的抽象概念，仍然是主要学习内容。给人效率的概念、成本与收益的概念、经济单位行为的概念、经济活动总量及个量相互联系的系统与信息的概念、数学模型的方法，仍然做得很少。经济科学的改革尽管是社会的呼声，其具体行动仍然只是在少数研究者中酝酿。

我们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就是我们所要求的理想的一本著作。《中国经济》按照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国外企图了解中国经济的学生们的教科书。尽管作者希望给中国经济学者和管理者一些启发，但由于其没有亲自经历中国的实践，在一些理论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全书的基调是否过分地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对科学的计划性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涉及较少？可能是这样。又如，合理地评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行为，仍是当今世界急待突破的课题。再如，作者对中国经济历史及改革的评价都是在消费者效用最大或 Pareto 最优这些基本准则下做出的，这些准则是否适应于一切经济社会？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提法有何同异？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方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使用“混合经济”这一概念，以说明计划和市场都在起作用的经济制度。从政治角度看似乎混淆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调和了矛盾。但从理解宏观、微观经济活动关系上、从量的关系看，这一概念却是否为经济学家理解各种制度的区别、联系的钥匙？进一步澄清这一概念，有助于经济科学的改革。

从《中国经济》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

论方法（如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庭行为的理论、市场与价格的理论、短缺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等）无疑是可以借鉴的，但其理论内容是否完全适用？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还是让经济学家们去探讨吧。

（原载《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

《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序言

千家驹

解放初期，在五十年代，我们成立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准备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书。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范文澜、陈翰笙、千家驹三人负责。我们首先与海关总署联系，把旧中国海关所保存的秘密档案整理并翻译出来（因档案绝大部分为英文）。其次就找食品工业部的盐务总局，准备整理盐务总局的档案资料。我们为什么要首先整理这两方面的资料呢？因为在旧中国，关税与盐税占我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关、盐两税的税收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关税由于用作我国外债与赔款的担保，帝国主义者就以此为借口，掌握了我国的海关行政权和关税管理权。盐税则由于民国二年（1913）的善后大借款是以盐税为担保的，所以盐税的管理权也落入帝国主义者手中。关、盐两税的收入，都由洋人掌握，存入外国银行。它们把关、盐两税扣除外债与赔款本息之后的剩余部分，交给中国政府支配，名之曰“关余”与“盐余”。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政府便是靠着“关余”与“盐余”过日子的。其次，我们之所以选编海关与盐务的资料，还因为帝国主义者不仅利用其职权控制中国的关、盐两税，而且还借此来操纵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甚至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左右我国的政局。

盐务方面，由于盐是民生必需品，无论贫富、男女、老少，盐总是人人要吃的。过去的封建王朝以及民国以后的历届统治者，都用盐来盘剥老百姓。他们划定运销范围，不许人民自由运销，官商勾结，垄断市场，黑幕重重，讳莫如深。盐的成本本来是很低的，而老百姓却只能吃质劣价高的食盐。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地区，甲地之盐销之于乙地，就认为是私盐，轻则没收充公，重则枷号刑讯，视同盗匪，名之为“私泉”。在清朝以至民国，盐官是最肥的缺，盐商是最阔的商人，他们互相勾结，利用盐这项民生必需品，盘剥人民，脑肥肠满，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贫民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则谓之“私盐”，当为盗匪治罪。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由来已久。在《聊斋志异》上，有《王十》一篇，蒲松龄老先生伪托了一个神鬼故事，发泄他对盐商的愤懑之气。他还加了一段评论，极有见地，兹摘录如下：

异史氏曰：盐之一道，朝廷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其私者也。近日齐鲁新规，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其善于他邑则廉其直，而售诸土人，则倍其价以昂之，而又设逻于道，使境内之人，皆不得逃吾昂，其有境内冒他邑以来者，法不宥。彼此之相钓，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逻获，则先以刀杖残其胫股，而后送诸官，官则桎梏之，是名私盐，呜呼冤哉！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本境售诸他境非私，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冤矣！

这一段话，也许青年人不懂是什么意思，翻成普通话大意就是说：“在清代，山东有一种规矩，盐商开的盐店，都有一定的销售地区，不要说这一县的市民不许到别的县去买盐，就是应该在本店买盐的市民也不许到另一店去买盐，而各盐店又故意设钓饵来引诱别处的市民来本店买盐。他把卖给别处市民的盐价定得低些，卖给本地区市民的盐价定得贵些，于是设巡逻的人在路稽查，使本地区的人谁也不能不在本店买贵盐，如果有本地人冒充别

县的人来买盐的，查到后要严加惩罚。彼此互相设钓饵来引诱别处的人来买盐，于是越境冒充的老百姓愈多。一旦被查获后，先把他的脚胫骨敲断，然后送到官府治罪，官府就把他们关押起来，这叫‘私盐’，这不是冤哉枉也吗！商人漏税上千上万不算‘私’，老百姓买一升半斗的便宜盐，却叫做‘私盐’。本地区卖给别的地区不叫‘私盐’，而本地人买本地区的却叫‘私盐’，这真太冤枉了。”

这就说明清代盐商的黑暗与剥削的残酷了。到了民国，盐的垄断制度与清代并无本质的改变。销盐和食盐都划分区域，谁也不许越境，当时叫引岸制度，每一盐商，都有专卖的执照，叫引票。引是衡量名，明制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清时淮盐大引栈秤六百斤，小引为岸秤六百斤，故称“引盐”，引盐之税叫“引税”，经营盐业的商人叫“引商”。引商认缴某一地带之引税，就在该地取得专卖权，其地叫“引地”，亦名“引岸”，政府发给允许运售的票据，叫做“引票”。在民初一张专卖的“引票”可以值上万两的银子，许多盐商都存有许多张引票，这就是他们的动产。就是说一张专卖证可以卖上万两银子，运销食盐利润之巨，与老百姓因吃盐而付出的代价，可以想见了。

解放以后，盐的运销由政府统一管理，过去盐商的积弊一扫而空，现在人人可以吃到好盐，吃到便宜盐了。但搞经济史的人，却不可以不知道过去。这本盐务史资料便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资料。本书没有把中国历代的盐务资料包括进去，因为那样做不但篇幅过于庞大，亦与近代经济史的体例不合。本书共分四卷，从1912年起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结束为止，分别辑录了：（一）1912—1927年北洋政府时期；（二）1927—1937年南京政府时期；（三）1937—1945年日伪统治区；（四）1937—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有关我国盐务的资料，每卷开始均冠以前言，说明本编资料的基本内容，并加以分析，以便读者得一梗概，藉此线索，查阅所需资料。

本书主要资料来源是解放初期食品工业部盐务总局、外贸部、海关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所藏的档案，这些都是原始资料。至于报刊上所发表的第二手资料，除为保持全书体系的完整而必不可少者外，概未列入。

本书资料之所以自1912年开始，一方面固由于这是中华民国元年，同时亦由于1913年善后大借款成立后中国盐务开始受帝国主义的控制。搜集内容偏重于财政经济方面，至于食盐和工业用盐生产方面的资料，则属于另一范畴，尽量缩小。

本书原由南开大学潘源来、李建昌、杨敬年、岳毓常等四教授于五十年代辛勤劳动，编成初稿，后经范文澜同志等审阅后提出意见，退还作者修改，正拟着手，即遭“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原稿被抄，不知下落。历时十余载，1982年意外地发现，失而复得，且完璧未损，因原编辑者均已年逾古稀，或负担其他科研任务，故改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室刘佛丁、朱秀琴、丁长清、汤仁、李宝珠五同志根据范老意见加以修订补充，全书结构，亦有较为重大的变动，去芜存精，全书仍约一百二十万字左右。

回想是编之制，发轫于五十年代，我是提议人之一，几经变乱，历时卅年，卒告完成，成事之难，感慨系之。我在垂暮之年，还能亲见此书之出版，内心是很高兴的，他们索序于余，义不容辞，故略辍数语，以当介绍。

(原载《盐业史研究》1987年第1辑)

一本有独到见解的经济理论专著
——读「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
冉晴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光华教授、张骏副教授所著“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管理体制研究”一书，是一本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所有制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研究的经济专著。该书共分九章，主要从所有制的基本理论、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目标模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单位等方面分析阐述了我国所有制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所有制理论研究已经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需要从所有制理论方面给予指导和解决；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近几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二是所有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要想解决好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和关键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好所有制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作者著作此书。该书总结归纳了我国所有制形成的基础、原因及经验教训；剖析了所有制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制结构的目标模式，从而形成了具有独到见解的所有制理论，使其在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并填补了我国在所有制某些理论上的空白，对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论述上采取了历史进程和逻辑思维过程统一的方法，使人可以清晰地了解我国所有制理论体系及实践发展的全貌。

二、在分析问题中紧紧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融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改革有益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同时体现了所有制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意见。

三、该书观点新颖。在第三章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目标模式，第四章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联合经济与股份经济，第六章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第八章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经济调节体系，以及国家的经济职能等，作者都提出了一些区别于传统观念的理论和看法，其中有些是刚刚被人们认识或还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颇有价值的观点。

此书，对于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研究、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同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所有制理论的专著。

（原载 1987 年 12 月 18 日《开发报》）

《当今中国经济生活的热门话题》

——横向经济联系的理论与实践

蔡孝箴

蔡孝箴社会主义横向经济联系，由于它在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方面所显示的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众多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它进行研究。近几年来，随着横向经济联系实践的发展，对它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了大量的论文，而且开始有了专著。现在摆

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横向经济联系问题的专著。本书作者从198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横向经济联系问题的调查研究，先后撰写过几十篇论文。这本书就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注重社会主义横向经济联系的研究方法。这不仅表现在本书用了专门的篇幅阐述什么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全书各章都较好地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特别强调要根据社会主义横向经济联系的实践经验提出问题 and 研究问题。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横向经济联系的研究发展，是开创性的实践；而对社会主义横向经济联系的研究，则是在开创性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式以供套用，也没有多少经典著作可资引证，而主要的是以现实的经验为借鉴，是从已有的经验的分析中，从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过程的一般事实的概括中进行思考、分析、归纳和综合，从而得出一些应该得出的结论。由于这本书通篇都是这样研究问题的，因而它的立论就很有说服力。

从这本书各章的题目来看，大多是在别人的论文当中已被提出过和论述过的问题。但在读了本书以后，却感觉不到它与其他论著有雷同之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有作者独到的精辟见解和深入透彻的分析，尤其以横向经济联系与“条”“块”关系的变革、以大城市为依托组织合理经济网络、经济区与经济区域的联合方式等章的论述，更见功力。本书不仅观点新颖剖析深刻，而且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活泼，所以具有可读性。

（原载1988年10月1日《天津书讯》）

简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顾金吾

庸俗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部分内容的评价，经济学理论界存在着许多分歧，而由纪明山等同志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把马、恩、列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论述辑录起来，介绍给广大读者，可使大家受到多方面的启迪，更可从中学到经典作家评述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该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全面系统地辑录了迄今为止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关于马、恩、列著作中对庸俗经济学的论述，并按马、恩、列对庸俗经济学的产生、特点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的论述，进行了系统安排。在选入资料上，即有马、恩、列著作的评论；也有注脚的内容。

二、编选的资料精炼、准确。在决定同一经典作家的不同著作中关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某个观点的资料的取舍时，只准确地精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三、选用的某些资料具有珍贵性。有些材料是较为少见的。

总之，这本书是目前国内有关此类的唯一的一本工具书，它对于有关科研人员和研究工作的同志有普遍的实用性和较高的参考价值。是一部必备的参考书。

（原载 1980 年 2 月 4 日《天津书讯》）

土地人口问题之后的又一盏红灯
读《土地经济学概论》有感
福元

记得还在读小学时，我就从课本上了解到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后来，国内的报纸、书刊、广播等各种宣传渠道都对此做了大量宣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已经成为中国引以自豪，并能使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有力的证明。但是，曾几何时，中国人已深感“人口众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的巨大压力，人口生育不得不有所计划、有所限制了——这是在我们面前亮起的第一盏红灯，“人口众多”再也不能成为我们引以自豪的资本了。

近几年，就在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反省过去的人口政策，饱尝着“人口众多”的苦果的时候，传统的“地大物博”的宣传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继续增长，我国土地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大物博”，我们的国土大则大矣，但就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而论，我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则是倒着数的。这个事实不能不提醒我们，我国的耕地面积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寸土地，过去那种任意侵占耕地和浪费土地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对土地问题不提起高度重视，那么它所引起的后果将不亚于人口问题。

土地问题上的紧张局面已在我国亮起了又一盏红灯。它不仅仅是土地管理机构的事情，而应当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应十分关心的大事。因此，对于土地经济学的研究，也应成为各级政府，各有关机构的重要研究课题。甚至应当做为一项迫切任务来抓紧抓好。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振良等人编著的《土地经济学概论》系统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土地仍具有商品经济属性，土地所有权必须在经济上得到实现，因此必须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结构、土地利用及其规划与管理等，它还对社会主义土地商品经济属性、地租地价、土地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

（原载 1989 年 5 月 20 日《天津书讯》）

《亚太地区经济关系与中国》

蔡玲

由冯承柏教授任主编、宫占奎副教授任副主编的《亚太地区经济关系与中国》一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详细论述了亚太地区经济在巨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亚太地区的制成品贸易及其自然形成的国际贸易分工与合作，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本在亚太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美国如何从全球战略出发确定自己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等问题；下篇着重分析了战后中国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南朝鲜、香港地区等的双边关系及经贸往来。

本书在分析、论述过程中，用大量资料，从理论上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可能性、现实性，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各国和地区经贸往来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该书虽为一理论性专著，但作者在分析问题时，大量引用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是该书最大的特点；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数据使用较多，作者每说明一个问题都大量引用数据作进一步论证。

（原载 1991 年 12 月 10 日《天津书讯》）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开放政策》评介

张岩贵

由著名的跨国公司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念祖教授和前南开大学校长、联合国跨国公司顾问滕维藻教授主编的《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探讨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实施过程之间联系的论著。本书汇集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菲律宾、匈牙利和我国大陆及香港地区著名专家、学者关于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观点，是 80 年代后半期中外学术频仍交流的国际性研究成果之一。该书是以美国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8 年出版的英文同名书为基础，在篇目和内容上进行调整、充实和修正以后向国内读者推出的中文版新书。

我国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跨国公司这支国际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已逐渐发挥、并无疑将继续增强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无疑将继续增强其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和幅度，除了受制于中国内外原有客观经济基础以外，还取决于跨国公司活动的性质特点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施进程这两者的相互作用，而该书对此有多层面的探讨。该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在宏观方面，陈荫枋教授对世界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的作用进行了精确的概括。该部分还从微观方面，对跨国公司的经营导向和组织特点，信息技术对公司全球战略的影响等作了描述。

该书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世界上若干国家与国际上利用和管理跨国公司的政策和经验。该书在从东道国就外国公司对本国发展结果与格局的影响必须保持警觉这一观点出发，在政策和措施上探讨如何在继续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货物方面与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方面之间保持平衡和互补关系，探讨如何将跨国公司目标与东道国政府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控制在最低水平上。

第三部分关于中国的资料相当丰富，该部分论述开放以来我国的政策和经验，围绕着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与政策，展开不同观点的阐述，王念祖教授所探讨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在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沿着正常的曲线前进这一问题，令读者掩卷后仔细思考。

（原载 1989 年 9 月 23 日《天津书讯》）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评介 纪益员

由汪茹贤主编的《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已经出版。该书是全国综合大学管理类专业纪益员协作教材之一，它同《工业企业管理原理》、《工业企业生产管理》、以及《市场学》等共同组成一套《工业企业管理》系列教材。本书是这套教材的第二分册。

与不少同类的有关企业经营管理的教材相比较，该书以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理论为指导思想，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线，立足于企业经营战略，论述了企业战略目标的选择与管理，企业的市场调查与预测，企业经营决策与计划，企业营销组合以及企业投资与技术改造等问题。它不仅阐明了企业经营管理中计划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在我国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应该放在适应市场状况，及时调整企业经营活动，不断增强企业实力，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它不仅阐明了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一般原理，还进一步举例说明这些原理的应用和有关的计算方法。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与企业家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科学的经营管理理论作指导，企业就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原载 1989 年 9 月 30 日《天津书讯》）

一本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著作 读《不同类型国家引进外资和技术剖析》 徐平

天津市“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张士元教授、王蕙菁副教授和皮黔生同志主编的《不同类型国家引进外资和技术剖析》（以下简称《剖析》）一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 11 章，并附有前言和附录。各章基本是由长期从事有关国家经济的教学、研究或实践、并具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学者执笔撰写。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就意味着要参与世界市场、进行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因此，引进外资和技术也就必然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一方面由于时间不长，另一方面也由于世界经济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增强适应和竞争能力，赶上世界经济变化的潮流。《剖析》一书堪称为在这方面的一次可贵的尝试。

《剖析》一书作为科研、教学领域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主要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内容全面，涉及广泛，覆盖面大。《剖析》一书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苏联和东欧，以及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技术的理论、政策、经验与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所以是选择了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苏联和东欧以及巴西、印度、南朝鲜和新加坡等国。在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述中，虽然也有许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象这样内容广泛且覆盖面广的专著实属为数不多。该书在对各国的研究中，广泛论及了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历

史、理论、特点、政策、经济效果、经验与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总结出经验与启示，使该书既有丰富的实际材料，又有较深入的理论分析，读后，使人感到内容翔实、有理有据。

(2)《剖析》一书主要侧重于利用国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在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方式中，直接投资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分往往更大。《剖析》一书正是针对这一特点，适应我国引进外资与技术工作的需要，着重研究了各国在此方面的诸问题，以求对我国引进工作有所借鉴和裨益。这也是该书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色。(3)《剖析》一书在研究外国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同时，力图与我国现阶段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为我国这方面的工作提供某些经验。该书选择和剖析的不同类型国家，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和得出的基本结论、启示等，都对我国的引进工作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例如：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论述中主要强调了引进外资和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基本经验；对苏联东欧等国的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分析其理论、政策、经验和教训；在对巴西、印度、南朝鲜和新加坡国家的研究中，就其问题和经验，也做了全面的阐述。因此，该书为我国引进外资和技术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这本书还结合我国的实际，特意安排了“天津市利用外资的方式、特点和政策”与“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及其管理”两部分内容，以介绍并展示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因此，由于该书涉及内容广泛而全面，它既有利于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全面了解，又有助于读者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得出有益的借鉴。

当然，《剖析》一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难免有不足之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作为学术著作，内容涉及面广、资料丰富且分析深入，是一本难得的重要学术专著。

(原载《南开经济研究》1990 第 4 期)

《天津金融简史》出版

张敬双

由南开大学金融系、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等单位有关人员编写的天津市第一部金融专著——《天津金融简史》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以解放后 40 年的金融史为重点，反映了天津金融历史发展的概况。天津金融业发展历史悠久，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金融中心。不论在金融机构上和业务数量上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和了解天津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对了解全国金融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书阐述脉络清楚，资料翔实。通过以史为鉴开展金融研究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银行管理水平将起一定积极作用。

（原载 1989 年 2 月 4 日《天津书讯》）

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尝试

田雨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在系主任蔡孝箴教授的带领下,从1979年就开展了城市经济的研究工作,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蔡孝箴教授主编、郭鸿懋教授副主编的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就是他们这些年来对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此书在内容、体系和方法论上都作了比较深入、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新的观点,是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次新的尝试。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对其研究对象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从宏观上研究城市与国民经济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关系;有人认为应从微观上研究城市内部特有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也有人认为应研究社会主义城市经济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实现城乡融合整个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本书作者立足于中国的当前客观实际,主张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研究以社会主义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在宏观上突出了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课题,在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中应当占有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在微观上突出了城市经济增长问题,认为这对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其它城市问题,如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应当同城市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样,该书内容就由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增长这两个核心贯穿起来,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上有重点地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律性。在体系结构上,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是关于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第二章至第四章,基本上属于宏观部分,中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城市化,从城市化产生的历史条件、城市化一般原理及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与城市规模三个部分详细阐述了城市化的有关问题;第五章至第十三章,基本上属于微观部分,其中心内容是城市经济增长,并且详细论述了与城市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诸多城市问题,如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交通、城市土地、城市住宅、城市环境、城市财政与资金,以及城市管理。无论从此书对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对象的表述还是从此书的体系结构上来看,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从内容来看,此书从中国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出发,在城市经济运行机制中,力求体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观点和见解。

比如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时,作者首先详细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即农业、工业化、体制与政府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并总结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最后研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在分析中,作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对工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城市化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我国历史上城市化过程呈现出来的速度慢、水平低和波动大的特点,无不与农业的发展状况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种情况,作者认为与我国以前实行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用行政办法,人为地制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以此来进行工业积累的价格政策;对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等。作者认为这种政策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固然有益，但从长远的和总体的观点来看，又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必须引入一些市场调节的力量来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证，使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进一步发展，这样，才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进程。又比如在分析我国技术革命与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部分时，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指出，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当前技术革命发展的需求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必须实现转型。为此，作者认为必须要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节机制进行宏观和微观的调节，在微观上，必须重新建立符合商品经济规律要求的企业经营机制，在宏观上，要建立起促进城市以至全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宏观调控机制。

还比如，在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住宅部分，作者都花费较大篇幅，详细分析了我国城市土地和住宅的供给和需求，指出，要实现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城市住宅商品化，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城市土地市场和住宅市场，用城市地租和住宅商品价格来控制城市土地和住宅的需求，调节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加强城市住宅分配的管理和监督。

最后，在方法论上也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地方：

1. 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注重借鉴西方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在中国城市经济的实际中有进一步发展。其最典型的是对城市经济增长部分的分析。作者运用西方城市经济学理论中的“需求指向”和“供给基础”的城市经济增长机制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过程和中国城市产业的特点和问题，并且把中国的城市大体上分解成四种类型：完备型、成长型、初创型、起步型，进而对各自的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过程作了质与量的分析和评价。该书作者认为，对我国处于完备型的城市，应以内涵的经济增长为城市发展的特色；对处于成长型和初创型的城市，则应立足于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稳定基础上，以主导产业促进城市整个产业体系的完善与技术进步；对于处于起步型的城市，则应把经济增长立足于形成较为完善的地方产业系统。2. 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原则下，此书努力保持城市经济学本身的特色，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不是按照政治经济学单纯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特别是在体现城市经济学特色的几个问题上，如城市经济问题的空间观点、城市问题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的分析上，此书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在城市生态环境部分，专门分析了城市环境的外部不经济以及对策。作者指出，企业无限制地排污是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主要因素，产生这种情况的经济原因有二：一是环境资源作为社会财富与企业等社会集团或经营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不直接相关；二是由于环境治理投资的直接无偿性，使污染者没有治理污染的经济动因。因此作者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分析这种外部不经济问题，建立环境损益图来分析环境影响的经济效果，并且指出，要采用经济手段，使企业排污造成的外在成本（环境外部费用）内在化。

又比如在城市规模与效益部分，作者专门分析了城市因空间聚集而产生的聚集经济效益和聚集成本，认为聚集经济效益包含消费者聚集经济效益、厂商聚集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聚集经济效益，聚集成本包含外在成本、“门槛”成本和疏散成本。在一定的城市规模限度内，聚集经济效益的增加远远

快于聚集成本的增加，从而对提高城市的运营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利，但超过一定的规模限度，聚集成本也会迅速增加，所以探索适度的城市规模和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是非常必要的。

3.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既把历史与现实的城市问题进行比较，又把不同类型的城市问题进行比较，使分析、论证有理有据。最典型的要数城市化部分的分析。作者既注重对城市化的一般理论的分析，又注重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行分析，其中作者详细分析了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城市化的类型和特点，最后总结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若干趋势，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样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当然，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研究对象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体系都仍然处在探索之中，本书尽管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原载《南开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日本《资本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日文版《资本论辞典》中译本评介
李元亨 受益

由南开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魏坝审定、国际经济系薛敬孝教授等人翻译的日文版《资本论辞典》中译本，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国外有关《资本论》研究的大型辞书，它的问世对于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和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对《资本论》研究的成果，深入《资本论》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文版《资本论辞典》是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久留间鲛造、宇野宏藏等五人主编，经过五年多的努力，于1960年出版的。它是68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创作，集中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注释《资本论》的大型辞书，也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资本论》工具书。

日文版《资本论辞典》的主要目的是：“阐明《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的概念规定”，“严密解释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中所使用的各种概念及其明确规定为主要内容，以防止发生有关对《资本论》的误解和混乱”（见中译本第3—5页）。

该辞典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名目辞条，阐明各种经济学概念的规定；第二部分为人名辞条，整理、解释了《资本论》引用并作为批判对象的学者、著作家的有关论述；第三部分为《资本论》的结构、年表、创作史、各国版本介绍及典故注释等的概括说明、解说和考证。

该辞典全部内容的主要特点是：名目辞条选择综合性较强，释文也较全面、系统、深入和准确；人名辞条中的人物生平、著作、理论倾向及马克思所作的批判，既然全面又翔实；至于《资本论》的结构、年表、创作史、各国版本介绍及典故注释等，则概括清晰、明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叙述得既简明又扼要。具体说来，可从如下三个方面看出。

1. 在阐述某个范畴或说明马克思对某一作者的批判时，不仅贯通《资本论》三卷的内容，而且还联系到其他有关著作，条目解释可独立成章，自成体系。例如，“生产性劳动”一条，就将《资本论》三卷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的有关内容综合归纳在一起进行了解释：意义，说明生产性劳动具有多种含义；第一层意思是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既从产品角度说明了一般意义的生产性劳动，又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性生产条件下总体工人劳动的生产性；第二层意思是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对资本来说具有直接生产性的劳动，含义窄于第一层意思；补遗，不仅说明了运送商品和人的运输雇佣工人的劳动的生产性，而且说明了教师和商业雇佣工人劳动的生产性。又如，“西斯蒙第”一条，不仅概括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对西斯蒙第的评述，而且概括了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和《共产党宣言》中对西斯蒙第的评述。

2. 大多数辞条的解释比较全面系统。例如，“价值形式”一条包括：价值形式论的地位和课题；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价值表现的迂回道路；价值形式的发展，几乎概括了《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的全部内容。又如“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一条包括：意义；规律的论证；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本规律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意义，也

包含了《资本论》第3卷第3篇第13、14、15章的内容。再如“市场价值”一条包括： . 意义； . 市场价值决定的必然性； . 市场价值的制约作用； . 利润率的平均化与市场价值（=市场生产价格），概括了《资本论》第3卷第2篇第10章的内容。

3. 辞条的解释有一定深度。例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条包括： . 本来的意义； . 更深入的规定，本条的解释包含着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的深刻理解。如果联系“价值规律”、“社会需要”和“市场价值”的解释，更可以看出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重含义理解的深刻程度。本辞条总结时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在本来的意义上是，在标准的生产条件下，具有标准强度和熟练程度的劳动生产或再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这一意义之外，还同新的社会总劳动的分配有关，马克思指出：‘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中文版第466页）辞条从社会需求、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和价值决定的关系，分析论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着重分析了第二重含义。由于社会要按照社会需求的比例将社会总劳动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因而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受到进一步的规定，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需要也参加市场价值的决定，是决定市场价值的消极条件，消极地制约着劳动对商品价值的决定。在关于第一、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关系上，认为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价值做了积极的决定，而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对商品价值进行消极的限定。30年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持这样的见解，足见其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又如，“可变资本的周转”一条，既考察了个别可变资本的周转，又从社会角度考察了可变资本周转。特别是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安排好两类生产问题的论述：一类是周转期间短的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既从社会取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向社会提供产品；另一类周转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只从社会取走生产资料的生活资料，而不向社会提供任何产品。因此，“在有意识地安排生产的社会里，向周转期长的生产部门如铁路建设，投入多少劳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必须事先计算”（中文版第310页），处理好两类生产，否则，安排不当，生产期长的生产部门的扩大，一方面会由于预付资本增加而压迫货币市场，另一方面会由于长期不向社会提供产品而只是取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引起这些物品的价格上涨。30年前，把马克思从社会角度考察可变资本周转得出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不说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具有相当深度的。

总之，该辞典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资本论》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30年前出版的这部辞典，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足以证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研究的重视和较高水平。

当然，该辞典也难免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条目选择综合性较强，有些范畴未能单独列出，因而有些内容的分析就不够深入；一些重要范畴或规律有遗漏，如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章规律等；有些范畴的解释比较粗糙，如对地租的解释就没有把《资本论》第3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的结论统一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因而缺乏深度，对总地租的解释不够准确；文字叙述尚欠通俗，而且重复较多；另外，引文也太多，使人有堆砌之

感；等等。尽管存在这样一些不足之处，但该辞典仍不失为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资本论》工具书。

日文版《资本论辞典》的中译本，凝结着译者、校者和审定者三年的辛劳和汗水。他们忠实于原著，力求做到信达雅，字斟句酌，翻译水平较高，这也与他们长期潜心研究《资本论》的较高理论修养分不开。我们相信，日文版《资本论辞典》中译本的出版，必将有益于我国经济学界对《资本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原载《南开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

《资本论辞典》

译者前言

薛敬孝 李树果 王建宜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久留间鲛造、宇野弘藏等五人主编的《资本论辞典》，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 68 人的集体创作，集中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注释《资本论》的大型辞书，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资本论》的工具书。

本辞典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名目辞条，第二部分为人名辞条，第三部分为《资本论》的结构、年表、创作史、各国版本介绍、典故解释等。名目辞条是其主要部分，约占全书的 2/3。这一部分的内容，总的来说，对《资本论》的解释比较准确，有较高水平。其特点是：（1）在阐述一个范畴时，不仅贯通了《资本论》三卷的内容，而且有的还联系到其他有关著作，如《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例如，“剩余劳动”一条，就将近《资本论》三卷的有关内容融汇在一起进行了解释；关于“资本主义地租”，除考察了《资本论》中的论述之外，还考察了《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书信集》等著作中的论述。（2）从总体看，条目的解释比较全面。例如“价值形式”一条，几乎把《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第 3 节的全部内容都概括了进去；“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一条，也差不多把《资本论》第 3 卷第 13、14、15 章的内容包括进去了；“商业利润”还涉及到了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问题。（3）条目的解释有一定深度。例如，在解释价值规律和社会必要劳动时，谈到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含义，认为是商品价值量的更深入的规定；又如，在解释可变资本的周转时，从社会可变资本的考察中分析到必须处理好两大类的社会生产：一类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从社会提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给社会提供产品；另一类是在一定时期内，既从社会提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给社会提供产品；再如，在解释级差地租时考察了追加投资的产量比劣等地的产量还好、还低或者相等的情况，即生产价格上升、下降或不变时的级差地租。但是各个辞条的解释不很平衡。其不足之处是：

有些条目的解释比较粗糙；有些条目的解释深度不够，如在有关地租的条目中没有涉及到总地租。个别辞条在对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解说上不够准确。此外，还存在着重复较多、文字不够通俗、引文较多等缺点。

构成本书特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第三部分的解说，特别是有关《资本论》创作史和各国版本介绍，对于研究《资本论》，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传播等，都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翻译始于 1983 年底，经过译者、校者和审定者三年的辛勤劳动和连续工作，终于在 1986 年 12 月底最后完稿。

（原载 1990 年 1 月 13 日《天津书讯》）

经济学领域的新学科——价格学 ——简评《价格学原理》 袁志和

贾秀岩同志主编的《价格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最近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原理》是一本系统论述价格学原理的理论性教科书。它包括总论、价格形成、价格构成、价格体系、价格水平、价格形式和价格管理等共七编二十八章，内容丰富，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价格学教科书。我认为该书的优点是：

（一）从理论上充实和完善了价格学科。

价格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近年来，在经济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涉足于价格理论的研究，探讨价格学研究的对象，以及如何建立价格学科，完善价格理论等问题。《原理》第一次从价格领域的特殊矛盾中分析出价格的矛盾“实质上是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矛盾”。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借助于价格，并在交换中通过价格同价值的一致或背离来实现的。”从而指出：“价格学是研究商品价格运动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即研究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分析哪些商品的价格偏离了价值及其偏离程度和发展趋势，探索如何使价格有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这些观点对进一步探讨价格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原理》指出，价格学科要自成体系，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实与历史相结合、本国与外国相结合的原则来建立价格学的科学体系。它包括：综合性价格学科，研究价格学原理和实践的共性问题，舍象掉各部门价格的具体特点；部门性价格学科，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各业的价格特殊问题；史学性价格学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价格的特点；工具性价格学科，是把价格学渗透到一些工具性学科中而形成，如物价统计学，经济数学在价格学中的应用等等；比较性价格学科，是对各国的价格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价格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容的系统性，形成了纵横联接的格局，为揭示价格的运动规律奠定了基础。

一门学科体系建立后，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作指导，才能完成该学科的研究任务。《原理》不仅指出了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把这个观点运用于实践，指出在价格学科研究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等。给人们在探讨价格理论问题上以有益的启迪。

（二）结构严谨，内容丰富。

研究价格运动规律首先要研究价格形成规律，《原理》以价格形成和价格构成两个层次组成第二、三编的主要内容。研究价格形成问题要从理论上说明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即由原始价值、生产价格和社会主义以价值（或其转化形态）为基础的历史演变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价值可以划分为 c 、 V 、 m 三个部分，价格也可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即物质耗费的货币支出、劳动报酬的货币支出和盈利。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又表现为生产成本、流通费用、利润和税金四个要素，即通常说的价格构成。此外，价格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价格构成的研究是对价格形成规律研究的具体和深入。

研究价格运动规律，必须研究各种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第四编“价格体系”的内容。在这编中，从商品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阐述了商品的差价、比价关系。特别对“按质论价”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原理》设专章进行了深入考察，强调了这两个问题在价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合理安排质量差价的原则和方法以及缩小“剪刀差”的主要途径，突出了本书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这对我国当前进行的价格改革是有现实意义的。

研究价格运动规律，不能只停留在静态上，还必须研究其动态变化。《原理》在第五编中专门研究了价格水平的动态变化，把对价格运动规律的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价格运动规律是我们制定物价工作方针的客观基础。研究和阐明价格运动规律，就使人我们制定物价工作方针的客观依据。

研究价格运动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利用价格杠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原理》设第六、七两编阐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形式和价格管理。论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遵循价格运动规律采取多层次的价格形式的必要性。阐明了五种价格形式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与之相适应的价格管理体制，提出了完善这一体制必须实施价格计划、价格预测、进行物价统计和不断提高价格工作者素质等重要问题。

这样，从分析价格形成入手，经过对价格构成、价格体系到价格水平的分析，一步一步地揭示和阐明了价格运动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价格形式、价格管理，从而形成价格学原理的完整体例结构。

（三）深入探索，有新意有创见。过去由于传统经济观念的束缚，学术界对价格理论的研究甚少，《原理》一书不仅丰富了价格理论研究的内容，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

《原理》提出了价格的特点与习性。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价格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与调整性相结合的特点”，但是作为价格一般，它还具有一定的习性，即：“综合反映性，系列衔接性与利益消长性。”作者论述了价格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实现商品交换的经济杠杆”，主要体现在“价格是经济活动的联接者，是经济信息的传递者，是经济利益的调节者。”在国民经济中价格的作用表现在：运用价格的杠杆作用指导投资方向，促进生产按比例地发展，实现国家工农业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促进企业贯彻经济核算，促进商业按照市场需要组织商品货源，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建立商品可供量与社会购买力的平衡，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补充渠道。

该书在“价格形成与其它经济杠杆”一章中，通过对价格与工资、价格与信贷、价格与税收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价格虽是经济杠杆中最重要的杠杆，但在利用价格杠杆时又要有其他经济杠杆相配合，才能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按质论价是价格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书中指出按质论价既不是比价，也不是差价，在贯彻按质论价原则中要考虑到价值、使用价值和供求关系。这在按质论价问题的理论探讨上更深入了一步。

价格水平变动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原理》第一次提出了要把价格总水平和零售物价水平相区分，并阐明了区分的必要性。分别给物价总水平和零售物价水平以新的科学概念。在稳定物价的理论依据上，提出了影响价格水平变动的“二元函数理论”，和调整价格要“有升、有降”的原则，阐

述了相对稳定与合理调整的关系以及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途径。

为了正确地运用价格杠杆，该书不仅系统论述了各种价格形式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指出在价格管理中制定价格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确提出计划原则和价格工作的特点等，这是该书特有的内容。

（四）不拘一格，百家争鸣。

《原理》既是一本价格学科的专业教材，又是一本价格理论专著，为了使读者从中得到丰富的知识，用发展的观点去把握价格理论，该书简介了价格的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格理论上的贡献和马克思主义价格理论的创立，为揭示价格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共性和个性做了历史的考察。

学术界对价格理论中很多问题有争议，该书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对各派观点，书中一般都作了介绍，使读者开阔思路。例如，关于价格形成中的盈利问题，书中列举了目前争论的几种观点，比较了工资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和综合利润率的计算方法和优缺点。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上，介绍了目前的几种不同观点和不同计算方法，并阐明了作者自己的见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风。毋庸讳言，该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各章节在理论分析的深度上不够平衡，其中第六、七、二十四这几章似嫌薄弱，另外，由于该书写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前，虽然书中有不少预见性观点已被实践所肯定，但《决定》中有些新精神没来得及吸收进去，希望再版时予以补充与修订。

（原载《南开学报》1985年第3期）

掌握价格运动变化的指南
——再读《价格学原理》修订本
杜然

《价格学原理》一书是由南开大学经济系贾秀岩教授主编的，由于它理论性强，教材实例丰富，深受许多价格学专业的师生及研究人员的厚爱，并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为了充实价格学的基本理论及与我国紧密相关的价格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内容，在贾秀岩教授的主持下，重新编写了《价格学原理》一书，作为修订本重新与读者见面，此书较之原版《价格学原理》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1．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在价格学的基本原理上，修订本大量删节了带有推测性的理论结论的内容。从价格的不断运动趋势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异同点对价格理论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现象上，而是透过现象探索其内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浓缩价格最基本理论的精髓，使读者掌握价格学基本理论的真谛。

2．突出了本书的完整性。原《价格学原理》的成书是在探索中完成的，当时我国价格体制改革正处于初期，难免在教材的内容上会缺乏系统的阐述。随着价格体制的改革，市场机制的介入，价格学原理越来越丰富。修订本正是借助价格体制的改善，研究和发现一些新的价格基本理论内容，增加了价格规律、价格模式两编内容，并对价格构成、价格体系、价格管理三编内容重新编排，作了一些修订补充，从而使《价格学原理》更加系统、完整。

3．巩固了本书的稳定性。摈弃了带有明显过渡性的论述内容和一些具体规定。从宏观角度在理论上阐明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研究价格构成、价格运动趋势。

（原载 1990 年 10 月 27 日《天津书讯》）

介绍《东西方价格理论》

《东西方价格理论》一书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佐兰·皮亚尼所著。自一九七二年问世以来再版八次，它不仅对南斯拉夫的教学和研究，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在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也有可取之处，“如果没有西方各国经济学家较新的著作，价格理论是不能被充分阐明的。”在对东西方的价格理论进行分析比较的同时，作者对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价格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了苏联模式的局限性，总结了南斯拉夫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曲折。作者还依据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力图探索以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自由活动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正常价格。为了将问题研究得更透，作者非常注重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问题，这就使读者对现代价格理论中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渊源有一个清楚而系统的了解。

（摘自《读书》1991年第1期）

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新探索
——评季陶达著《约·斯·穆勒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
鲁明学

季陶达教授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在他去世之前不久，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晚年著作《约·斯·穆勒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他之所以要在晚年研究 19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是为了对这位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家作出恰当评价。60 年代，季陶达教授主编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把约·斯·穆勒选了进去，但 80 年代初，当他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一书译成中文之后，对穆勒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生了怀疑，于是便开始研究穆勒的经济学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穆勒的全部论述，经过五年潜心研究，写出了我们现在所评论的著作。

季陶达教授的这部著作系统介绍了约·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一书，全书除“前言”和“总结”之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约·穆勒的传略，突出讲述了约·穆勒自学成才的人生道路，高度赞扬了他刻苦勤奋的自学精神和毅力，并介绍了他的一些自学方法，以激励那些没有入学机会的人们效仿。第二—六章详细分析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内容，阐述了他关于生产、分配、交换、社会进步及财税等方面的理论，对约·穆勒及其经济学说从发展经济的角度作出了新评价。

第一、认为约·穆勒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衰落时期的代表，在理论上基本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并在某些方面发展了他们的学说，特别是比他们更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季陶达教授声明，他在 60 年代主编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犯了一个大错误”。

第二、赞扬约·穆勒对资本主义分配不公所持的批判态度，认为他主张改进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保证工人的劳动所得是站在维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改良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真诚地同情无产阶级。

第三、赞扬约·穆勒在资产阶级营垒中对共产主义作出的公正评论，指出他不仇恨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哪种制度更好，仍需比较，并且反驳了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各种攻击。

第四、详细分析了约·穆勒经济学说中的各种错误和庸俗成分，主要是批评了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把分配规律同生产规律割裂开来，把生产规律看作永恒不变的规律，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季陶达教授认为，古典经济学最卓越的代表斯密、李嘉图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和庸俗成分，所以约·穆勒著作中的这些错误和庸俗成分并不影响他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地位。

季陶达教授的这部晚年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一、该书是一部研究专人专著的政治经济学说史著作，对经济学说史教学和研究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特别是该书不仅分析介绍了约·穆勒著作中的一般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对其中所阐述的应用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从而探索了经济学说史学科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途径。

第二、该书评介的约·穆勒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应用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例如，约·穆勒研究了生产要素增加

的法则及其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了如何从改良劳动者素质（包括知识、技术、品德等）和劳动组合形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研究发明了生产要素增加的法则及其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节制人口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研究了影响各阶级收入的现实因素，研究了货币与信用、各种信用票据及其用法、国际贸易及国际汇兑的具体实施、经济立法、赋税、国债等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季陶达教授认为，以上这些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均有参考价值，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原载 1991 年第 2 期《南开经济研究》）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
——写在《社会保险指南》出版时
葛华

解放前，我国一直没有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社会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从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我国于50年代建立了属于社会保险范畴的劳动保险和福利制度，并公布了相应的法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社会保险问题未得到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医疗、退休、养老等本应由社会统一解决的问题一直由企业各自包揽。

然而——

“退休职工的退休养老费用已使中国老企业不堪负荷，成为其向前发展的沉重负担”！

“20世纪末至21世纪四五十年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急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其前后，完全的家庭养老将不再可能！”

——现实已提出了严重警告。

经济发展对企业搞活的要求，计划生育对‘养儿防老’的诘难，使我国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来不成问题的退休养老等西方社会属于社会保险的问题急剧表面化，而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显得无可比拟的严重而迫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探索。理论没有历史实践可资总结、借鉴，实践缺乏理论来指导。然而，另无选择！这就是我国80年代后期面临的状况。

只有借鉴历史和先进，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的自身；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少走弯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对我国上述情况的了解，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天津市劳动局组织编写了《社会保险指南》这本书。我国劳动人事部门是近几年负责我国社会保险工作的主要部门。天津市劳动人事局的同志在近几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对此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研究。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因此，本书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是较为成功的，也可以说它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完成的。

首先，作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保险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和从事实践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本书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作者们对实践工作经验的提炼和对理论政策的理解。

其次，本书从理论阐述上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全书不仅介绍了我国社会保险理论的最新成果，而且总结介绍了我国在社会保险问题方面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不仅介绍了国外保险的理论 and 法规、而且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险的实际工作方法。

第三，本书在写作方法上也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它不仅从理论角度对我国的实践进行了总结；而且强调理论回到实践中去的思想，强调对实际社会保险工作操作技术的指导。因此，它不仅有“理论与实践”（第一部分）、“国外社会保险”（第四部分）这些结合实践的理论介绍，而且有“问题解答”、“名词解释”、“法律、法规与政策”（第二、三、五部分）这些指导实际工作操作的实践指南。

（原载1991年10月10日《天津书讯》）

一部有特色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
——《西方经济学说史概要》评介
徐平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鲁明学、纪明山二同志编著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概要》（以下简称《概要》）一书，是一部最新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科书。该书作者多年从事专业经济学说史教学，对经济学说史有较深的研究，这本书就是他们多年教学和科研成果的结晶。

该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全面系统地介绍并评价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各派、各家的经济学说。在分析中，作者坚持以原著原意为依据，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因此这本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与以往同类教科书相比，具有如下一些新特点。

第一，该书运用唯物史观，全面阐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其内容既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同时为了照顾到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也简要地论述了古代、中世纪的经济学说和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前史”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全书不仅着重论述了这些学说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主要科学贡献和缺点错误及其根源，而且也注意分析了这些经济学说的产生、发展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变革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因此，这本书评介结合，条理清楚，有助于读者从各个方面了解各种经济学体系的本来面目及其彼此的相互联系。可以这样说，它是一本比较全面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并具有自己特色的教科书。

第二，该书对各个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主要理论和影响作出了比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对各种经济学说的评价分析时，该书是从两个角度并分四个方面进行的。两个角度即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作用，既分析其科学贡献的局限，又分析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四个方面是：（1）分析各种经济学说在当时反映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揭示其阶级实质；（2）分析各种经济学说的理论观点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同现实经济生活是相一致还是相矛盾，揭示理论的正确或错误程度，以及反映客观真理的程度；（3）分析各种经济学说自身在逻辑上有无问题，其理论诸观点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揭示其理论的严谨程度；（4）分析各种经济学说所起历史作用的性质，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其所起这种历史作用的条件与限度，揭示其应用价值、借鉴意义的大小。这样的评价分析，避免了把各种经济学说简单地同马克思经济学说相类比的毛病，从而能够对各种经济学说作出客观的、历史的和全面的评价。

第三，该书在内容上增加了一般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没有的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篇，介绍了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拉姆赛、理查·琼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贡献。把他们的经济学说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来研究，对于全面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加深理解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四，该书作者注意到了国内对约·斯·穆勒评价的不同意见，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对穆勒的经济学说作出了新评价。这本书不再象以往流行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那样，把他归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之列，与此同时该书也未把他列入后期古典经济学家，而是把他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摹仿者、折衷主义经济学家来看待。这有助于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

论。

第五，该书对各经济学家的具体理论观点的评介同其他经济学说史著作比较起来，也有许多不同之点。这些不同之点，有的是补充了新内容，有的是根据原著纠正了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中的某些介绍同原意不符之处，有的是在评价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下面分别阐述之。（1）属于补充新内容的（除补充了“后期古典经济学”之处）主要有：对各个经济学的理论大都概括地论述了其一般特征，这是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所没有的。以往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在评介奥国学派的经济学说时，往往不讲他们关于补全物品价值的理论，《概要》一书则补充了这一部分内容，这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奥国学派的理论。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在评介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时，未能同边际效用分析联系起来，而《概要》一书则分析了克拉克一般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原理及其在静态经济学中的应用，说明了边际效用分析是克拉克边际生产力论的基础。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对马歇尔垄断价格理论评介比较简单且不完整，而《概要》一书的作者则根据马歇尔的原著，增加了垄断价格的图象分析，对马歇尔这一理论作了比较完整的评介。

（2）根据原著纠正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中不符合原意的介绍方面主要有：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往往认为配第的“政治价格”就是其“市场价格”，《概要》则指出，在配第那里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大多把斯密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说成是“经济自由”，而《概要》认为斯密经济学说中心思想是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富国裕民”。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有的把李嘉图对劳动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区分等同于对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区分，而《概要》的作者则根据李嘉图的原著指出这是两种不同的区分。

（3）在评价上提出新见解的，除了对约·穆勒经济学说的新评价之外，主要还有：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在评价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时，往往只分析其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很少具体分析其历史作用，而《概要》一书在指出其基本观点错误之后，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两上方面具体分析了重商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往往认为斯密双重研究方法中，内在法即抽象分析方法是科学的，外在法即综合归纳方法是错误的，《概要》一书则认为，对斯密外在方法全盘否定是不妥当的，并指出斯密的两种研究方法都有合理因素，也都有缺点，二者可互相补充，从而使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既有一定的质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数量分析。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一般认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结构混乱，而《概要》作者在研究了李嘉图著作的内在逻辑和写作过程后，认为李嘉图《原理》一书的结构基本清晰。以往经济学说史著作对庸俗经济学家的学说，往往只注意批判其理论上的错误，而对其学说的历史作用则不加注意，《概要》一书在批判庸俗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观点错误的基础上，对有些代表人物如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巴师夏等人，则联系经济发展的史实际，具体分析了这些人的学说在反对封建残余、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历史进步作用，并说明了这些学说能起这种历史作用的条件和限度，此外还适当肯定了这些人的理论中某些个别观点所含有的科学因素。

总之，《西方经济学说史概要》一书，作为一本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体系构架、评介方法和具体评述等方面都有一些新颖之处，是一

部较好的经济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但是，该书截止于马歇尔，对本世纪 20 ~ 30 年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没有论及，这无疑是一个缺陷。

（原载《南开经济研究》1991 年第 6 期）

《管理公共关系学理论与实践》序

陈炳富

公共关系是现代管理学不断发展的新成果，是从其它管理职能中逐步分化出来的重要职能。它全面、科学、艺术地运用人际沟通、组织沟通、大众传播以及其它各种媒介，强调以真诚的态度、周密的计划、客观的信息、持久的努力，与组织内外公众相互交流，在交流中促成理解、信任与合作、在塑造组织良好形象的同时，达到组织、公众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早期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上的“技术管理”（科学管理），以后出现了“人群关系理论”，开始重视管理过程中人的影响因素。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上，重视人际关系、人际沟通对管理绩效的作用，进而形成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也从“技术管理”发展到“人性管理”阶段。公共关系的出现则进一步将企业内人际关系的管理扩展到企业外部，扩展到所有制约、影响企业发展的内外公众关系的管理。这一发展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变化速度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和竞争日趋剧烈的新形势的需要。公共关系思想反映了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企业管理思想的核心，反映了对公共关系方法、手段、人员要求的综合性、科学性、艺术性，以及公共关系目标对于企业命运的战略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权威人士把公共关系水平看作是评价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与否以及管理水平高低的尺度。

随着对外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正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经营实体，同样会面临公共关系问题，同样需要建立和发展企业的公共关系职能。公共关系引入我国已有八、九年的历史了。特别是近年来发展尤为迅速，已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从“三资”企业发展到其它各类企业，从工商领域扩展到政治、教育和社会团体等各个领域，公关咨询公司也有十几家。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公关从业人员已达万人，而且社会需求仍在增加，公关热方兴未艾。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公共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年经过一批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努力，公共关系这门新兴管理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向社会宣传推广正确的公关思想和技能做得还很不够，人们对公关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以至在“公关热”中也出现了诸如“美女”公关、“拉关系”公关、“行骗”公关、“赶时髦”公关等等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开展公关教育，普及科学的公关知识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一项工作。

现代公共关系起源于美国，并在长期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美国的公关教育最为普及，水平也较高。作为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及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规律与技术的公共关系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学习引进公共关系尚属起步，应该象对待其它管理理论一样，首先老老实实在地学习、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为今后创立符合国情的中国公共关系学打好基础。译介西方公共关系学的经典著作及高水平教科书，正是现阶段建设我国公关事业，发展公关教育，保证公共关系健康发展的很好途径。

这本书是南开大学管理学系李景泰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讲学期间，由美国的同行学者特别推荐给他的一本权威的公关著作。原作者罗俾特·罗雷（Robert·T·Reilly）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

著名的传播学教授，在北美有广泛影响。这本书被多所大学指定为必读教科书。

我认为该书有以下一些显著的优点：

1. 强调公共关系的管理本质，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全书；按照公关实务过程安排篇章，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特别适于企业界人士及工商管理科系师生学习研读。

2. 内容起点较高，包含了高层次公关人员所秘备的公关理论及方法；在传播技巧中，对公关写作给予了特别重视，而这是公关入门者的必备技巧，借此可胜任基本的公关工作。

3. 专章论述公关在工商企业、财务金融方面的应用知识。

4. 行文过程中选用大量案例，可读性强。

5. 视野广阔，充分注意到公关实务过程中各种社会、文化、政治、技术、其它管理职能等因素的影响及其综合作用，较好地体现了公共关系作为综合性应用性学科的特色。

6. 充分反映出各种技术创新在公关中的作用（如电脑的应用）。

令人欣慰的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编译著作较好地保留、体现了原著的特色和优点，并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从我国公关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需要出发做了适当的编改，使之更适合我国读者的研究和学习。

这部译稿是由李景泰教授组织几位青年教师、研究生和实际工作者根据原著 1987 年最新版（第二版）用半年多时间完成的。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我国的公关教育、科研以及实际工作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原载 1991 年 1 月 25 日《天津书讯》）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序

肖灼基

城市化是一个国际现象。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以后，世界各国先后开始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特点。比较研究各类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特点、趋势和利弊，探索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课题。

多年以来，各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城市学家、生态学家曾经对城市问题进行多领域、多方法、多层次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富有创见的学术论著。但是，立足中国，以中国城市化为经，以世界各类国家城市化为纬，经纬结合，纵横交错，这种研究尚属罕见。高珮义同志的博士论文《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选题新颖，结构独特，对于城市科学的发展，对于制订我国城市发展战略，都有重要意义。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城市化含义作了科学的界定；对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作了简要的考察；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现状、特点、问题和发展趋势，作了全面、系统、详尽的论述；在剖析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基础上，从历史起点、发展进程、规模结构等方面，对中外城市化进行了深刻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多元化、非均衡、逐级递推、综合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全书观点鲜明，论述透彻，逻辑严密，文字流畅。

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必须以丰富的资料为立论的基础。资料丰富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作者花费很大功夫收集和整理了与研究内容有关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在运用资料上颇见功力。书中引用的许多统计资料，无论时间序列、数量序列、地域序列、国别序列，都相当完整，具有系统性。书中列举的许多统计资料，如中外城市化水平比较、中外城市化速度比较、中外城市首位度比较等，指标口径统一，具有可比性。书中选用的许多统计资料，或来自官方和权威出版物，或是根据有关资料综合整理，或是作者亲自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权威性。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上的开拓和创新。作者在城市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不管这些见解是否成熟，是否完善甚至是否正确，都应该承认，它是作者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长期探索、辛勤劳动的结晶；它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在这里，我愿意向读者介绍书中若干创新观点，并加以适当评论，以期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一、关于城市化的内涵

什么叫城市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生态学家，城市学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给予定义；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对城市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重大变化的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的过程和机制；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化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一些人口学家认为，城市化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等等。人们从不同侧面力图揭示城市化的本质，至今仍未取得较为公认和一致的意见。

本书作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同学术界现有的城市化概念比较起来，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化的本质特征。

其一，它揭示了城市化发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进行农畜产品交换的集市，这是最初的城市雏形；随着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手工业和商人集中活动和居住的村镇，这是城市的萌芽；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城市诞生了。它距今已有几千年历史，但城市的出现并不是城市化的开始。城市化是生产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产物，并随着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强调城市化是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转化，这就划清了城市与城市化的界限，抓住了城市化与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关系，揭示了城市化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其二，它突出了城市化的经济特征。城市与乡村比较，有许多不同之处。人们可以从人口规模和构成、地域景观和范围、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来描绘城市的特征。但不可否认，城市与乡村的主要区别是经济特征不同。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单一农业为主体，以人力畜力为动力，使用手工农具耕作。从传统落后乡村社会转到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最根本的变化是商品化代替了自然经济，工业化代替了单一农业，现代工具代替了原始手工工具，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大大提高。因此，强调城市化是从传统落后向现代先进的转变，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最主要区别，揭示了城市化最本质的特征。

其三，它说明了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的进程，往往受到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发因素以及人们主观意志的影响和制约。有些因素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有些因素则发生相反的作用。但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城市化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不管人们花费多大力气，反对城市化是不可能的，阻碍城市化进程必将受到惩罚。

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不少国家曾出现严重的城市病，给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造成严重困难。有些人以此作为反对城市化的依据。其实，所谓城市病，既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城市化水平还不够高的现象。城市病的产生，既有体制、管理、观念、经验、行为方式等原因，更重要的是经济原因。一方面，城市化已达到一定水平（例如城市人口已占有全国人口的50%），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不雄厚，市政建设、住宅建设、环境建设不完善，与城市化水平不同步。这是发生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城市病作为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的成本和代价，往往是难以避免的。随着经验的积累，人们可以把成本和代价降至最低点，但却难以做到完全不要成本和代价。尤其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城市病是可以治愈的。当着城市化已达到较高程度，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实力已十分友厚的时候，城市病就能得到控制和治愈。昔日曾经发生严重城市病的伦敦、东京等大城市，现在城市的环境状况已根本改观，环境质量已大大提高，城市病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如果以城市病作为反对城市化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理由，显然难以服人。

二、关于城市化的三大规律

研究各种类型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特点和趋势，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城

市化的普遍规律。只有认识规律，才能自觉地遵循规律的要求，充分发挥规律的作用。

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对比分析，概括和论证了城市化三大规律，即城市化进程阶段性规律、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规律。

城市化三大规律，反映了城市化的历史实际。作者研究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发现城市化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城市人口占有总人口 20%以内，城市化进展较为缓慢；城市人口占有总人口 20%—70%，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占有总人口 70%以上，城市化进展较为平稳。整个城市化过程呈“s”型。当然，不同国家由于城市化起步条件和特点不同，阶段性的表现形式也有差异。但是，阶段性的存在和一定阶段加速发展的现象，则是一条普遍规律。它不仅已经为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所验证，而且将为处在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国家所证实。

城市化三大规律，揭示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从城市化的历史看，首先是现代工业的兴起，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和各种社会条件；其次是城市化的逐步推进，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不断完善的服务、日益扩大的市场、四通八达的交通，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改变了空间面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文化素质、人际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出现城市化；同样，如果没有城市化，工业化也难以实现。

城市化三大规律，为制订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城市化的发展，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因此，制订城市化发展战略，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和掌握城市化规律，按照城市化规律办事。例如，既然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互促关系，城市化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就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城市的特点就必须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就必须与经济发展趋势相协调。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超前城市化，必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降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反，无视经济发展需要，人为地阻碍城市化进程，必然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降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里需要强调本书提出的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的问题。首先，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既然反映了世界城市化的整体运动趋势，也适用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城市化的运动趋势，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次，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是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规律，而不是贯穿城市化始终的规律。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大城市还处在萌芽状态；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大城市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受到限制，超先增长的规律逐步减弱以至失去作用。再次，大城市超先增长是由于大城市是有重大技术经济优势引起的。实践证明，同中小城市比较起来，大城市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是大城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超先增长的主要原因。复次，大城市超先增长并不排斥中小城市的发展。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功能不同，它们之间是互补互促的关系。城市的优化结构，大中小城市的最优比例，是由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资源条件和交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决定的。最后，大城市超先增

长与人为的、行政的或其他非经济因素引起的大城市盲目膨胀不同，它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由经济因素引起和制约的。这种超先增长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只要没有外在因素的干扰，其超先的时限和幅度基本是合理的。

当今世界不少城市学家，尤其是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都惊呼大城市发展过快，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少国家的政府，也制订了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当然不无道理。世界一些国家大城市的生长，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已经大大超先，呈畸形状态；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膨胀，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出现大量社会问题。但必须指出，一些大城市存在的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居民住房紧张、城市交通拥塞、市场供应紧张、犯罪率上升等等，不能简单归因于大城市发展本身。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有社会制度的问题，如历史上一些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大城市的弊病，主要是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引起的；有些大城市超先幅度太大，速度太快，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未能相应发展，社会管理很不完善；有些是政府对大城市的政策失当，在投资、住房、工资、福利等方面实行向大城市大幅度倾斜的政策，人为地增强了大城市的引力。因此，要消除大城市的弊病，必须找出造成弊病的主要原因，对症下药。这里还必须指出，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暂时也可能奏效。但从长远看，效果是不大的。解决大城市过度“超先”的根本出路，是掌握城市化发展规律，协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关于“高氏定律”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许多未知的规律和定律，需要人们去探索、发现和论证。当人们发现了被实践证明确实存在的规律和定律时，人们对这些规律和定律所依以存在的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就大大增强。

本书作者高珮义博士在研究城市化问题时，并未满足对城市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作一般性描述，也未满足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城市化问题作一般性对比。他研究的目的是，从世界城市化进程和发展趋势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定律。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是由他发现并在本书中初步论证的城市化三大定律，即城市聚变引力定律、乡村裂变推力定律、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尽管高珮义博士对这三大定律的论证和阐述还很不充分，很不完善，但我认为，发现三大定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我十分乐意向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被我称之为“高氏定律”的城市化三大定律，并谈谈我对高氏定律的一些初步看法。

高氏定律之一：城市聚变引力定律。其主要内容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集中……会释放出一种新的能量。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集中的规模越大，释放出的新能量就越多。这种能量多到一定程度，并且必须多到一定程度，便会创造出全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城市文明，即开放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文明。这种开放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文明，一方面对其周围的乡村或小市镇产生强大的直接引力效应，使该城市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又对其他中小城市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它们纷纷仿效，形成一种间接引力效应，从而这些中小城市中的某些竞争力强的城市，便发展成为大城市。这一过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遏止。对于某个大城市来说，如果其周围没有出现新的引力中心，同时也没有人为的障碍，那么这一过程一直要到周围乡村或小市镇的人口全部吸取完毕才能结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一过程一直要到中小城

市和乡村基本上都享受到人人都想享受的大城市文明时才能结束。”

高氏定律之二：乡村裂变推力定律。其主要内容是：“整个乡村好比是一个一个原子组成的‘原子堆’，一般来说，没有外力的推动，它很少发生根本性变化。扩散和传播到广大乡村中去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城市文明，就好比是打入乡村原子堆的无数的中子，诸如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思想、新观念等等。一旦这些中子打入，就会使乡村发生裂变，产生出推力效用，以适应城市引力效用的需要”。

高氏定律之三：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其主要内容是：“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时（例如20—30%），城市文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在社会（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普及加快，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多于城市人口数，城市文明的社会覆盖面大于城市社区所包括的范围，全社会（国家或地区）享受城市文明的程度高于城市人口的比重所反映的程度。”

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各个国家城市化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乡村的衰落和每个城市的兴起的原因更是各不相同。但运用高氏定律，都可以使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现象，发现推动城市化的共同的本质的原因。根据城市聚变引力定律和乡村裂变推力定律，一方面，城市由于人口的集中、信息的交流、经济的发达、交通的方便，产生了巨大的新能量，形成对乡村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受到城市文明影响的乡村人口，逐渐熟悉和接受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形成向城市迁移的推动力。运用高氏定律，可以较准确、较科学地解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尤其是大城市超先增长的内在动因。

高氏定律清楚地表明，城市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无论城市聚变引力效应，还是乡村裂变推力效应，都象物理学中原子碰撞和原子裂变产生的效应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既然城市引力效应和乡村推力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因而采用人为的、行政的办法加以改变，必然收效甚微；尤其是，当着城市引力效应十分强烈时，人为地阻止乡村推力效应发生作用，必然难以奏效。当然，正如人们既可以利用原子能为战争服务，又可以利用原子能为和平服务一样，人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方式、途径，调节和控制城市引力和乡村推力的力度和方向，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城市化既有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方面，也有发生城市病的消极方面。高氏定律表明，无论城市化曾经造成多大的社会弊病，无论人们对城市化产生多么强烈的愤懑，无论世界城市化初期发生多么野蛮的强迫乡村人口迁至城市的杀戮，城市化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现象。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定律表明，城市文明优于乡村文明，城市文明的作用超过城市的范围，受益于城市文明的人口超过城市人口。因此，城市化是历史进步的标志。这里的问题是，必须使城市文明真正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而不应为少数人垄断；必须为乡村人口创造享受城市文明的条件，而不应把乡村人口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必须使城市人口普遍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而不应在城市的某个阶层、某个角落残留着城市文明的死角。

必须指出，本书仅仅是在学术界首次提出城市化三大定律。作者对这些定律的论述是不充分、不完善的。我们期望作者进一步探索，作出更充分、更完善、更深刻的论述。但必须承认，作者提出这些定律，其理论勇气和开拓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四、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

一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反映该国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文明诸方面的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和发展方向，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城市化发展战略正确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包括乡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不仅影响经济效益，而且影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仅影响一定时期，而且影响深远。

本书作者在阐明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定律，研究世界各类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特点、利弊和发展趋势，对比中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现实情况、规模结构，借鉴国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战略，即“多元化、非均衡、逐级递推、综合发展”战略，并对这条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作了详尽的论述。

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国内学术界曾经进行长期的研究，提出不少战略构想，开展广泛的讨论。这些战略构想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研究的水平和进展，给人以启发。高珮义博士的战略构想，既吸取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里我想指出以下几点：

城市化发展战略，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本书作者提出上述战略时，根据城市化发展战略综合性的特点，详细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社会与经济、城市与农村、人口与环境、物质条件与文化背景等各方面情况；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双向互促共进规律的要求，提出了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的构想；根据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等情况，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城市化的模式；根据实现城市化战略目标的艰巨性、复杂性，提出了逐步推进的战略步骤；根据城市化所要达到的效益指标，提出了各个阶段均应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但近期应以经济效益为主，中期应以社会效益为主、远期应以生态效益为主。这些战略构想，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有可靠的客观实际为依据的。

世界城市化已经经历了 200 多年的历史，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类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有过不少经验教训。本书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注意吸取国外城市化的一些经验教训。必须指出，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绝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东化，不仅不能全盘化，半盘化也是行不通的。即使在西方国家，无论城市化的进程和特点，也是英国与德国不同，美国与日本不同。艺术上的临摹决非上乘之作，经济社会模式的模仿更不可取。但这并不是说，外国的经验教训不值得借鉴。我国的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在社会制度、历史条件、文化背景方面根本不同或很不相同，但作为从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城市社会转化的城市化，则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因此，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许多经验，例如：人口城市化与产业革命化、生产商品化、技术现代化、市场国际化同步推进，对我国城市化有借鉴意义。当前发达国家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我国很不相同，但也有些问题，例如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存在的问题，例如城市化经济动力不足、脱离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的城市化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等等，更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关注。总之，本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特点、利弊和趋势的论述，为制订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借鉴。

本书作者不仅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及其实现步骤，而且对这个战略

的可行性作了说明和论证。作者认为，从人口和资本这两个城市化最主要的条件看，本书提出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都是可行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资金短缺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最大难题。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实现上述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资金并不短缺。作者用大量实际资料支持这一论点，并且认为，从目前的物质条件看，本书所提出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论述有根有据，有说服力。

本书对实施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着墨不多，有些问题（例如“取消户籍管制”）还需慎重研究。

本书从理论到实际，从外国到中国，从战略目标到对策建议，构成一个较全面的城市化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尚没有一部象本书这样全面、系统、深刻地对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这种状况与当前世界城市化的大趋势，以及与中国在世界城市化大潮中所处的地位，很不相称。因此，出版本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填补了国内外关于城市化研究的这一空白。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外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城市化问题的各个学科领域的同志，都将大有裨益。可望由于本书的出版，将会把国内外的城市化研究，特别是国内外的中外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高珮义博士在理论研究上走过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他的优点是刻苦钻研，敢于创新。本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在由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为主席并有多位权威学者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上获得高度评价。作为导师，我祝贺高珮义博士的学术成就，并希望他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更大贡献。

1990年6月30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原载《新华文摘》1991年第3期)

[南开博士丛书] 第一本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
纪益员

目前，南开大学上百名博士活跃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们思路开阔，博采众长，不时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新观点、新思想，是理论学术研究的一支实力雄厚的生力军。为了及时反映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鼓励中青年在学术研究中开拓创新，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南开博士丛书”。高珮义的博士论文《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

介绍《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不能不特别提到此书的作者高珮义。高珮义没有上过大学，他是拿着一张初中毕业证书从农村考上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为此，他曾做过合同工，只身夜宿海河船上，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是南开的领导和老师帮助了他。在他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后，又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他念念不忘南开的师长，把渗透了他的心血的博士论文交给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所有关心他的人们的回报。鉴于论文的开拓性贡献和他对南开的一片深情，南开大学出版社决定将他的博士论文作为“南开博士丛书”的第一本出版。

《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城市化的含义作了科学的界定，对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作了简要的考察，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特别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现状、特点、问题和发展趋势，作了全面、系统、详尽的论述，在剖析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基础上，从历史起点、发展进程、规模结构等方面，对中外城市化进行了深刻的比较研究，进而在城市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该书的理论创新之一，是给城市化的含义以新的界定。作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定义揭示了城市化发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突出了城市化的经济特征，说明了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与学术界现有的城市化概念比较起来，这个定义较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化的本质。

该书的理论创新之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对比分析，从世界城市化进程和发展趋势中，发现并论证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化的三大规律、三大定律和城市行为的理论。三大规律即城市进程速度的阶段性规律；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城市化水平与经济的双向互促共进规律。三大定律即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城市聚变引力效用定律；乡村裂变推力效用定律。三大定律被高珮义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称之为“高氏定律”。“高氏定律”使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现象，发现推动城市化的共同的本质的原因，清楚地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无论城市化曾经造成多么大的社会弊病，无论人们对城市化初期发生多么野蛮的强迫乡村人口迁至城市的杀戮，都不能改变城市化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志的事实。问题在于，应该使城市文明真正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为乡村人口创造享受城市文明的条件，使城市人口普遍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

该书的理论创新之三，是提出了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战略，即“多元化、非均衡、逐级递推、综合发展，并对这一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作了详尽的论述。与传统的城市化战略相比，它有着许多全新的内容和特点。

(原载 1991 年 10 月 10 日《天津书讯》)

研究天津人口史的著作
《天津人口史》出版
李竞能

《天津人口史》研究的是 1949 年 1 月天津解放以前本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书中考察的主要是 1860 年天津被迫开辟为商埠以后的人口发展史，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人口发展史。

研究天津人口史，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天津人口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从而有助于深入认识和彻底解决现实存在的天津人口问题。

整理天津人口史料和撰写天津人口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项填补天津人口史研究的空白的艰巨工作。以往的史籍，虽然有谈及天津人口、载有人口数字、甚至载有人口统计资料的，但没有一本是系统研究与论述天津人口历史发展过程的著作，更缺乏比较系统的历史人口统计资料以及对人口因素的系统分析。这部《天津人口史》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最先进行尝试的一本书。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大都见于史书或地方志，天津的历史人口数字也不例外。天津建城的历史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有了天津卫城才有天津卫志，才可能有专门记载的天津户口数字。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天津卫志始修于明朝正德年间，至正德十四年完稿付印，万历年间重修，现均无传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天津卫志是清朝康熙十三年刻本，其中能够找到有关人口情况的一些零碎的记述，而谈到户口数字的只有一句夹注：“人丁除老弱逃亡外，康熙二年十年编审过共丁叁千二百八十二丁”。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值得怀疑，因为志中接着又说：“天津一区，流寓错处者多，版籍不清……”随后，记有天津历史人口数字的地方志还有重修《天津府志》、《天津县志》、《天津县新志》《畿辅通志》等，大都只载有户口总数。

清朝道光廿六年（1846 年）刻印的《津门保甲图说》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一本比较详细谈及天津人口的书。它从户口保甲编制而涉及人口，最先指出天津人口的地域分布，并从天津县人口中划分出天津城关人口和乡村人口，当年天津县人口为 442,343 人，城关地区人口则为 198,716 人，约占全县人口的 44.92%，其中城内人口为 95,351 人，约占 21.56%。此外，它还记述了人口的职业构成。全书的记述虽然仍嫌简略，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十分可贵的人口史料。

天津人口史料直接来源于人口调查和人口统计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事。1902 年 8 月天津创设巡警局，从 1903 年开始进行了天津首次大规模户口调查，同年发表了 1903—1906 年的天津市区户口统计数字。1910 年（宣统二年）天津警察厅又一次进行大规模户口调查，以便搞清户籍、男女人数、壮丁人数，为征兵作准备。这些调查使天津人口数字比较落实，但是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人民害怕实报户口将要纳丁税，所以“每当调查之时人民多匿不以实”。其后，1928 年旧内政部搞所谓全国人口调查（实则是十三省的人口调查）时，也调查了天津人口，公布了调查所得人口统计数字。

天津市 20 至 40 年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主要来源是以下三个渠道：第一是旧天津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报告或统计报告，前者如旧天津市政府的《市政周报》、《市政公报》、《天津市政府工作概况》等，后者如《天津市政统计月报》、《天津统计年鉴》、《天津市政统计及市况辑要》、旧

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等；第二是介绍当时天津情况的书刊，如《天津指南》、《天津快览》、《北京天津事情》等；第三，有关租界人口、特别是外侨人口的情况，则主要来自原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的报告，还有 1927 年（昭和二年）天津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编的《天津概况》等。这些资料大都是在天津市公安局档案室中查到的，目前已属难得的史料。将这些宝贵的人口史料逐年逐项收集起来，加以系统整理，使其体现天津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一项极富学术价值的工作。

（原载 1990 年 8 月 18 日《天津书讯》）

助你在股市中成功！
《股票债券投资与交易技巧》
张世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资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大地上正迅速发展，蓬勃兴起的上海、深圳股票市场正在被人们所关注。1990年11月26日上海市证券交易所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近年来我国股票、债券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有价证券的初级市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与之相适应的证券交易市场日趋活跃。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宣传、普及证券投资知识，帮助广大社会公众增强证券投资意识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本着这一目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组织该校金融系的专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编写了《股票债券投资与交易技巧》一书。

该书立足服务于股票、债券投资者，力求简明易懂，突出常用知识的重点介绍，尤其是对股票、债券的基本知识和投资运作技术等做了较为精炼的说明，具有知识性、实用性、通俗性的特点。

全书正文共分为：证券交易基础知识、证券投资、股票价格波动与预测、证券投资风险与收益、投资技巧、如何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以及证券投资常见术语七个部分。为了帮助证券投资涉世不深的人了解和掌握证券投资方法，按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分别在：第一、二部分中说明了证券及证券交易的一般概念如证券的性质、种类、特征以及证券投资的一般原则、途径以及证券投资方法等；第三、四部分中就证券投资中的有关问题着重进行了分析说明，证券投资特别是股票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为此在介绍投资收益的同时，又专门对股票投资的风险、股价波动及预测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第五、六部分旨在说明证券投资的技巧和分析说明证券投资人的心理因素，具有良好的投资心态是投资成功的关键；第七部分主要就证券投资常见术语作了介绍。

由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处在初创阶段，许多做法尚待规范化。因此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本着“洋为中用”的精神，参阅了介绍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知识的有关书籍和资料。

（原载 1992 年 1 月 25 日《天津书讯》）

评中国第一部保险经济理论专著：《保险经济学》

李继明

现代保险从 1805 年作为保护英国贸易利益的工具输入我国，已有 180 余年的历史。初始阶段，我国尚不具备现代保险滋生的经济关系，因此不可能产生和需要保险学术理论作导向。

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列强争相入侵，商品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外商保险公司纷至沓来，主宰了保险市场。旧中国虽建立了一些民族保险业，由于民族资本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当时保险与现实经济的关系，处于扭曲状态，所以也没有自己有价值的保险著作问世。

新中国建立之初，保险事业曾一度有发展之势，可是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受到压制，特别经过 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确立了大锅饭体制后，我国国内保险业务随之停办。这一时期保险之所以大起大落，除客观上“左”的经济指导思想导致外，和保险经济学术理论的贫乏，也有很大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 1980 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保险业务得到飞跃地发展。濒于绝迹的保险教育事业与保险学术理论园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足的是不论保险教育方面的论著和保险刊物上的文章，大多是站在保险业务的角度，存在着就保险论保险的倾向，偏重于保险理论的探讨和保险实务经验的阐述。保险是经济学范畴的一门学科，虽然也有少数文章，涉及到保险经济方面的论述，一般属于片面性的。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保险经济方面具有学术意义的著作，尚付阙如。南开大学刘茂山教授，倾七年左右的心血，编著的《保险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我国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基本方法，全面系统揭示保险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性的第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这本书在整体体系上颇有特色。表现在以保险经济关系为经，以保险商品论为纬，将其作为二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有机联系、相互照应、风格一致的交叉立体结构。盖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精干，写法新颖，形成科学的逻辑体系。尤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见地，使人读后很容易获得启迪。可从本书二条主线的若干论述中得到佐证。

在论述保险经济关系中，作者将其高度概括分为四个方面，即保险分工协作关系、保险经济利益关系、保险经济数量关系和保险经济效益关系。例如在保险分工协作关系的论述中，将保险与国民经济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的关系，一一详尽地加以分析论证，很自然地勾划出保险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在保险经济利益关系的论述中，既从宏观上将其与财政、信用、企业等有关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作了分析，又从微观上对保险业与内部职工之间的经济利益进行了阐述，还着力地论述了保险经济关系确立必须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些描述，无疑有助于对保险所涉及到的有关方面尤其是与被保险人经济利益之间产生的矛盾如何得到正确处理的理解，例如在保险经济数量关系的论述中，阐述了影响保险经济数量的诸因素，清晰地表达了掌握保险商品需求与供给的规模和结构，从而合理组织保险市场的意义；又例如在保险经济效益的论述中，指出社会主义保险业讲求经济效

益的目的，促使辩证地理解处理好保险的社会经济效益与自身微观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必要性。此外通过对保险经济关系的四个方面的勾划，重点突出了保险经济运行的过程，应有利于完善社会生产关系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这些论述，都具有保险的学术价值，使人读后得到启迪，并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对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改革开放的理解，也是有益的。

关于这本书的保险商品论，在第一篇第一章中就从研究经济原理入手，开宗明义地指出保险经济关系是一种商品经济关系。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保险商品的形态和内容，论证了保险是服务性的商品。进而分析了保险商品的二重性，具有创见地阐述保险职工的具体劳动创造了保险商品的使用价值，保险职工的抽象劳动创造了保险商品价值，以及保险商品在保险经济主体和客体双方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这些论述，都具有学术价值。随后的四篇从保险经济市场、保险经济运行、保险经济效益、保险经济管理的内容，均结合以保险商品论的观点来揭示现代保险的规律性。其中很多方面的论述都具有学术价值，举其一斑即可窥其全貌。例如在保险经济市场中论述的保险商品价格区分为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等；例如在保险经济运行中论述保险需求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是保险商品的购买力和购买动机等；例如在保险经济效益中论述的提高保险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取决于保险商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正确处理保险商品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等；又例如在保险经济管理中论述保险商品在销售过程中形成保险具有负债性、保障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所以比一般商品更需要进行严格的管理等；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不仅令人开阔对保险的视野，更有意义的是对保险的健康发展具有保险学术理论的导向作用。

这本书在写法上也有特色。一是具有群众性，作者从1986年下半年学期开始，经过为南开大学金融系保险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保险经济学的讲座，在讲授过程中虚怀若谷地采纳了同学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不断加以充实和修订。嗣后又在1989年约请一些同学逐章逐节征求意见，吸收其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进一步进行充实修订，方予以脱稿，是教学相长的产物。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本书运用的资料，是作者花了很大气力和时间，在国内和香港深入保险企业，经过细致的调查收集，去粗存精，作为论据或事例，故具有实用性。从而也可以体会出其学术价值。

作为一部具有学术经济价值的著作，并不意味已尽善尽美。《保险经济学》这本书也不例外。诚如作者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的：“任何科学都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保险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如此。随着保险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保险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保险经济关系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保险经济学的内容和结构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总之，刘茂山教授编著的这本《保险经济学》，是一部既富有学术价值，又具有应用价值的保险经济理论专著，适用范围是很大的。不仅适用于大专院校金融保险系作为必修课的教材，也是相邻学科以至我国保险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一本有益的参考书。

（原载《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3期）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部巨著
——介绍《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1—4册）
张敬双

《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深刻反映了我国近代史的盐务，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控制，内受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及日伪政权的封建官僚、军阀、买办、盐商的操纵把持，对中国人民进行双重压榨和掠夺的历史变迁。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辑录了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的盐务资料，如有关善后大借款过程中各方面的往来函电，有关盐务稽核所的权利为外人所把持等，借以说明各国列强是如何攫取中国盐政权的，是如何利用盐政干涉中国内政，与北洋政府互相勾结一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第二卷辑录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1927—1937年）的盐务资料，如有关盐务稽核所取消，恢复、职权变动及其任用洋员状况等，借以说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和帝国主义从矛盾到相互勾结在一起，继续出卖中国盐政，及他们勾结旧盐商，不断增加盐税，加重人民负担的历史事实。第三卷辑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中国沦陷区（1937—1945年）的盐务资料，如“七七事变”后至抗战胜利前八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华北、华中沦陷区控制盐政、掠夺盐业资源的资料，借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沦陷区的伪政权相勾结，疯狂掠夺我国盐业资源及对我国盐业的严重破坏。第四卷辑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国民党统治区（1937—1949年）的盐务资料，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举办官运，实施盐专卖和盐专卖停办后的产运销管制政策，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日伪盐田、工厂及其所经营的盐业公司、中和盐业公司成立经过和经营情况等资料，借以说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逐步实行垄断，独占，对从事盐业的中小生产者和民族制盐工业的掠夺及对全中国人民进行的额外剥削。

该书的特点有三：

第一，本书资料丰富，且大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资料来源是解放初期食品工业部盐务总局、外贸部海关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及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所存的档案，这些都是原始资料。利用这些原始资料，编者进行了认真的选择、整理、翻译等大量工作，辑录成书，不仅资料丰富，而且条理清楚。每卷开始均冠以前言，说明本卷资料的基本内容，并加以分析，以便读者得一梗概，借此线索，查阅所需资料。

第二，该书的出版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在旧中国，关税和盐税占我国财政收入之百分之六七十，而近代的中国，关、盐两税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他们不仅肆意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而且借此操纵我国的政治、经济，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左右我国的政局。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后人应当永远记取的。

第三，本资料选辑来之不易，有其特殊的珍贵性。它是经过两代研究者相继努力的成果。早在五十年代，就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由老一辈研究者范文澜、陈翰笙、千家驹等人负责，由南开大学潘源来、李建昌、杨敬年、岳毓常等四教授辛勤劳动，编成初稿。正拟出版，即遭十年浩劫，原稿被抄，不知下落。历时十余载，1982年意外地发现，原稿失而复得，且完璧未损。后又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室刘佛丁等五同志修订补充，于1991年四卷全部出版。几经变

乱，历时卅余年，方告完成，为国内外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原载 1992 年 9 月 15 日《天津书讯》)

《风格·流派·史迹》序

阎丽川

在世界文化史上，各国、各民族的艺术都是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中得到发展的。今天，要适应世界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势头，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思想闭塞、眼界狭窄以及知识结构僵化、老化的局面。了解国际上各种文化艺术动态、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信息、艺术教育事业的体系方式方法和新成果，对我们目前的艺术创作、研究工作，对我们的艺术教育的改革，都是有益的。

向世界各地、国家和民族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艺术，不应只是一种愿望、设想或仅仅反复讨论种种方案，而应该立即进行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个别人从事这一活动是不够的，一部分人进行这一工作也不够，要有众多的有志者共同进行翻译、介绍、研究。

为此，就有一个掌握工具——外语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八十年代的新一代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了。然而，据我了解，不少学习美术的青年，甚至一些中青年教师，尚不能熟练地掌握外语，还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

《风格·流派·史迹》这一外国美术译文丛书的出版，不论在交流外国美术信息方面，还是促进美术工作者学习外语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作为提供学术研究的信息和资料，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我想，只要不违反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原则，只要无损于我们民族的尊严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国际交往的和平友好关系，都无关紧要。来自国外四面八方的材料，存在不同的思想观点是自然的事，不仅是容许的，也正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只有知己知彼，才能谈得上借鉴。

《风格·流派·史迹》一书，选编了十多篇有关美国、苏联、德国、阿拉伯国家、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造型艺术方面的译文。这些译作对于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美术爱好者来说，读之可以增进文化艺术知识；对于美术专业工作者，尤其是美术史论研究者来说，也可以作为资料参考。

愿译丛早日出版，以飨读者。

（原载 1987 年 8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旅游文物艺术》序

阎丽川

安旭同志 1934 年生于著名钧瓷之乡，50 年代初于河南艺专毕业后，曾在河南省文联创作研究部等文化单位工作，现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副教授。多年来安旭同志从事美术研究与创作，问世之作颇丰。他于 80 年代初赴西藏讲学期间，考察了西南高原古老的民族文化，撰写了一批论文和书稿，其中《西藏壁画本生图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日本美乃美出版社联合出版，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他的专著《藏族美术史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近年又应西藏有关厅、局的邀请主编《藏族服饰艺术》一书，走访了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 7 个省市和自治区，博览了边疆文化艺术和民族风采，在他考察期间，除完成了民族艺术的研究课题外，还接触了大批文物艺术实物，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

《旅游文物艺术》是他在南开大学旅游学系授课的一部讲稿，经整理而成专著。它包括原始社会文物、历代金石、陶瓷、丝织、木漆、地上地下建筑、墓葬、石窟、碑碣，也包括民间工艺美术及少数民族服饰艺术等等。分门别类给予了知识性、鉴赏性的简要说明。作为一门基础课业或者普及读物来说，在目前适应广大青年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特别是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很适时的。

当今世界各地旅游事业极为兴旺发达。我国各地随着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和巨大影响，旅游业也显示出蓬蓬勃勃兴旺势头。我们这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以提供寻幽揽胜的名山大川、园林古建、石窟塔寺和各式各样的文物艺术。

而日益提高的、现代中外旅游者的欣赏口味，也不止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了。现在谈论的旅游，已经成为一门相当复杂的新兴学科，它涉及到历史、地理、文物、艺术、宗教和风土人情等各个领域。无论对旅游者还是旅游业来说，如果不博览有关知识，进行研究和思索，就很难找到测幽探微的门路。只凭一点玩乐好奇之心，贸然从事旅游活动，怕是徒劳无益的。

作为旅游者及旅游工作者，需要了解的文物艺术的知识面是很宽的，无论是史学方面还是美学方面，线越长，面越宽越好。

《旅游文物艺术》作为广大旅游者的“向导”和旅游工作者的“顾问”，没有必要作过细的历史考证和太具体的艺术分析，只须分门别类，提纲挈领，加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把眉目点醒为止。留有探索余地，使读者心向往之。总之，应该作到宏观方面不可忽略，微观方面力求简明。至于分寸究竟在哪里，尚待作者、读者通过实践进一步体会。愿与作者、读者共同研讨之。

（原载 1988 年 11 月 5 日《天津书讯》）

开展旅游美学研究服务我国旅游事业

——评《旅游美学》

乔修亚

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对旅游学的深入研究，开展旅游美学的研究和教学已成为旅游教育发展的需要。

开展旅游美学的教育，首先要开展旅游美学的研究，探讨旅游美学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只有认识到旅游美学的现实意义，才能确定旅游美学和旅游美学教育在旅游事业中的地位及其在旅游教育中的作用。

在探讨什么是旅游美学之前，首先需要研究一下什么是旅游，以及旅游的目的是什么。有些同志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把旅游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这是无可非议的。旅游业的兴起正是旅游这种活动引起的。旅游的出现，尤其是现代大规模旅游的出现，必然要有许多人来为它服务，必然要出现为它服务的各种机构，需要交通工具、旅游设施、旅游饭店等。这样，也就带来了经济收益，于是出现了旅游业。所以，我们把旅游业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于光远同志认为：“旅游是现代社会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他又说，旅游的基本内容是“观光旅游”。于光远同志的说法和我们要探讨的“旅游”比较接近。我们认为不仅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更重要的是要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旅游，才能认识旅游的特征和价值。

1966年，法国学者让·梅特森说：“旅游是一种消遣活动，……其目的在于消遣，休息或为了丰富他的经历和文化教养。”梅特森的话指出了旅游的特征——“消遣活动”，因为娱乐和消遣正是旅游的审美特性，我们还是从人类本能的欲求讲起。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有三个本能的欲求：一、希望物质生活的改善；二、生理上的欲求；三、要求精神生活的满足。作为一般的动物，则没有精神生活的要求，它们为了生存和传宗接代，只有食欲和性欲的要求。而人类的本能的欲求中还有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即审美欲求。当人类处于原始状态或低级阶段时，最迫切的要求是物质生活，而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则处于次要地位。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衣、食、住、行不断得到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必然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高。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将会创造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生活方式，以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不断增长的要求。“旅游”正是人们现代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高层次的消遣活动。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说：“人为什么要追求刺激和消遣呢？都是让生命力畅通无阻，要从不断的活动中得到乐趣。……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

旅游的目的很多，诸如崇拜异国或异地的文化艺术，通过游览和观赏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文化艺术的修养；向往异国的宗教，抒发仿古探奇之幽思；向往异国或异地阳光灿烂的海滨，等等。但是不论哪一种目的的旅游，都会在不断地活动中寻求娱乐和消遣，得到美的享受，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添生活的乐趣。由此可见，旅游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游览、观赏性的审美活动，而旅游美学则是一门研究旅游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价值的学科。旅游美学同绘画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建筑美学……一样，是美学的一个分支。由于它主要是研究旅游这种具体的活动，所以它的实用性

是很强的。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为，旅游美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非常具体的，都是旅游和旅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美，是迷人的，令人神往的，令人探求的。美丽的桂林山水，优美的西湖景色，雄伟的泰山，清秀的峨眉，以及黄山云海的滚滚烟波，仙人洞内的涓涓流泉，……不知吸引着多少中外游客，大自然无私地向旅游者展示着它的美！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舞蹈等文化艺术遗产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美，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为中外旅游者所赞叹，所向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美，富饶的美学宝藏，是诱导旅游者旅游的客观因素。

（原载 1990 年 9 月 8 日《天津书讯》）

《旅游心理学》出版

李兴云

本书为国家旅游局教育司组织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北京二外三校部分教师合编的旅游学科全国统编教材。

本书是将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旅游实践活动，重点研究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分析旅游业工作中的心理因素。它对改善旅游业的经营管理，提高旅游业服务质量，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全书共分四编十六章；一、旅游心理学概述；二、旅游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三、旅游者的动机；四、旅游者的知觉；五、旅游者的态度；六、旅游者的人格；七、团体对旅游者的影响；八、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特征；九、旅游服务心理；十、导游服务心理；十一、旅游商品服务心理；十二、旅游交通服务心理；十三、旅游企业管理心理——概述；十四、职工个体心理；十五、职工团体心理；十六、领导心理。书中内容丰富，系统全面，条理清楚，注重应用。

此书可作为高校、中专旅游学科教材，亦可作旅游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心理学爱好者的学习参考书。该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 1986 年 8 月 30 日《天津书讯》）

研究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 关于《藏族服饰艺术》的问答

· 忆延 ·

南大东方艺术系安旭副教授主编的《藏族服饰艺术》，已由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中论及藏族服制源流，涉及族源学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并谈到藏族服饰衍变和地域差异诸多民俗学问题。日前，编者回答了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问：《藏族服饰艺术》一书论及藏族服装形制，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已形成，有何意义？

答：服饰的衍变标志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对藏族服饰溯源研究，涉及藏族源学。本书以生动具体的材料证明，藏族是远古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羌人同西藏雅隆一带藏族先民融合而成。这一历史事实是“外来论”歪曲不了的。

问：当今人们都在注意时装，研究古老民族服饰有什么意义？

答：我国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少数民族服饰往往是族属特征，它是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钥匙，利用它可以打开民族、民俗文化的宝库。在我们面前展现五彩缤纷的民俗事象。对它的研究，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宗教信仰、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物质生产水平等等，远远超出了服饰艺术本身的意义。

问：你认为在考察藏族服饰中，最有趣的是什么？

答：民族服饰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而差异性 is 普遍的，藏族服饰的地域差异会使您感到美不胜收。藏族生活在青藏高原以及横断山脉及其东部金沙江流域，地区广阔，气候万千，为适应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因而各地服饰绚丽多彩。林芝地区，地处藏东峡谷，布满了原始森林，生活在这里的藏胞喜欢穿一种无袖袍“古秀”，其特点是肩宽，无袖、无领，

穿时必须以带束腰，形制独特。

发型、发饰的地域差异也很明显，青海牧区妇女以群辫为特点，康区妇女头饰中，有一种核桃大小的珊瑚球发饰，引人注目。拉萨、日喀则妇女的头饰“巴珠”和“巴戈”形状别致。而且在旧时为贵夫人的头饰传统形式。

（原载 1987 年天津《今晚报》）

我写《大学音乐简明教程》

蒋振环

音乐教学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崇高、优美的情操，增强学生的想象力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大学音乐简明教程》正是为了适应目前大学音乐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它曾在南开大学音乐选修课教学中试用了数年，广大学员对这本教材给予了热烈的欢迎。此次又在征求同行专家的意见的情况下，对它作了修改补充，希望它能在大学音乐教学和社会上广大音乐爱好者自学音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生音乐教育比较薄弱，致使大学生中“乐盲”甚多，许多大学生不仅不懂乐理和五线谱，甚至连简谱也不会。他们学歌只能随录音带哼，缺乏起码的音乐审美能力，对世界上优秀的音乐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我们不仅应该在各类大学（包括中专）开设音乐课，而且应该从实际出发为学生们提供简明适用的教材。由于大学的音乐课是选修课，课时较少，学生们课后又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巩固，因此大学音乐教材必须具有简明性、实践性的特点。由于既要帮助大学生进行基础乐理和音乐知识的补课，又要帮助他们提高音乐鉴赏水平，丰富其文化生活。因此，音乐教材必须注意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系统性、实用性与趣味性的结合，总之，要使大学生们学有所用，学了能用，帮助他们掌握进行音乐审美活动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不仅丰富他们当前的文化生活，而且为他们终生的音乐审美实践打下一个初步基础。

根据上述考虑，这本《大学音乐简明教程》包括“基础乐理与视唱”和“名曲欣赏与音乐常识”两大部分：

上编“基础乐理与视唱”分十章讲述，从识谱入手结合讲授系统的基础乐理，由浅入深，由易而难，从最基本的音阶的排列及拍子的长短，讲到音程、和弦及调式。在每一章中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乐理知识与视唱练习紧紧地糅在一起。在视唱方面，既编排了一些纯技术性的节奏练习和练习曲，也相应地选用了一些乐曲片段和完整的歌曲，以便在帮助大学生们提高识谱水平的同时加深对音程、和弦及调式的理解。比如：在“和弦”一章中，除介绍各种和弦及它们的性质外，着重在和弦的运用上下功夫，详细介绍和弦的功能进行、和弦的选择及简单的伴奏音型运用等问题，并让学生进行和声布局设计训练。

在上编中，对五线谱知识也作了介绍，强调了五线谱的科学性和对学习乐器所起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五线谱视唱练习让学生掌握C调、G调、F调的固定和首调唱名法，从而为学生学习乐器创造必要的条件。

下编“名曲欣赏与音乐常识”同样也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并特别注意了趣味性，除第一章“怎样欣赏音乐”是讲解音乐欣赏过程中所包含的四个心理要素及在欣赏音乐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外，其余二到十一章均以名曲赏析为主。这十章共选择了在中外影响较大、较符合大学生们的欣赏层次的不同类别的十七首乐曲。为调节欣赏口味，有意地将中外作品穿插地进行安排，在每一章中，根据该章赏析对象的创作特色，介绍该作品的作曲家的生平、与之有关的音乐常识及乐语解释，并在分

析音乐作品过程中将这些有关知识与具体乐曲对上号，形成以音乐赏析为中心结合有针对性地介绍有关音乐常识的课程结构，体现赏析性与知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这十一章中，基本上包括了应掌握的基本音乐常识。当然，这十七首作品的赏析，只能起引路的作用，因为审美实践本身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灵活性，编者只是希望在它们的启示下，使大学生们能初步掌握欣赏规律，然后各自发挥音乐审美的主观能动性，到音乐的海洋中去漫游，从而获得最大的审美享受。

本书除用作大学教材外，亦可用作专科学校的音乐教学。各行业音乐爱好者亦可用作自学教材。

（原载 1991 年 1 月 25 日《天津书讯》）

《外国教材中心工作研究》出版

沈友益

教材是传授知识和培育人才的重要工具。编写教材需要积累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教学经验，需要编著者的艰辛和创造性的劳动。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外国教材的学科内容和编写技巧也是编写教材不可缺少的营养和借鉴。我国在清末洋务运动期间引进过大量外国教材和著作，对于开创我国近代科学、教育起过重要作用。民国时期，龙门书局引进大量外国教材，对当时科学人才的培养也起过重要作用。现在我国许多老一辈科学家，可以说是学龙门版的外国教材成材的。1952年成套引进苏联教材，对当时我国的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工作的影响作用，大家早有论断。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亲自抓科学教育工作，对教材建设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他指出：“教材要从最先进的讲起”，“要引进外国教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编写新教材”。在他的指示和直接关怀下，大批引进外国教材，使粉碎“四人帮”以后编写的教材能够程度不同地更新了内容，较好地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这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教材可以说是我国教材建设史上的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十年来，外国教材中心的建设工作，在国家教委、林业部、卫生部、农牧渔业部等有关部委的关心下，在有关各学校领导，图书馆的支持下，经过各“中心”同志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可以说，经过十年的努力，一个初具规模的外国教材中心体系已经形成。

最近，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指出，高等学校教材在理论联系实际和反映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改进和加强。这些问题的发生，外国教材引进工作的薄弱，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外国书价的上涨，引进外国教材和图书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了。由于出版成本提高，翻译外国教材也日益减少。因此，在纪念外国教材中心创建十周年和《外国教材中心工作研究》一书出版之际，要更加努力精选各种高质量、最新、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外国教材；要加强引进教材开发利用，促进资源共享；要继续开展外国教材研究工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材建设工作发展。争取再积十年的功夫，一定取得更加可喜成果。

（原载 1990 年 12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新技术革命一百题》前言

卢亚士

新技术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猛烈地冲击全世界。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三年国庆前夕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这次新的产业革命，对正在向四化进军的我国人民来说，既然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时机利用得好，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的经济，就可以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另一种则是，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漠然视之，那就会使我们同世界的先进水平差距继续扩大。我们应该避免第二种可能。

邓小平的号召、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理论界、经济界、科技界、教育界、新闻界以及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均迅即组织力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举办多种形式的学习会、报告会和研讨会，这种热潮方兴未艾。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既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四化建设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要适应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因此，大家都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时机，要使我们改革后的体制具有更加强大的吸收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能力。

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都十分关心这次新技术革命。我们编写这本《新技术革命 100 题》，以问答形式比较系统、全面、通俗地介绍新技术革命的有关名称、概念，历史上的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这次新技术革命的社会背景、内容、特点、目标、趋向和影响，各国的对策以及与我四化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在编写中，我们尽可能广收博采近年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真诚地向专家学者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学识浅陋，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尚在研究讨论中，加上时间仓促，错误、缺点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原载 1986 年 8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博采多闻引人入胜——《古今中外》读后 路禹

最近，在友人处读到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中外》。这是一本寓教于趣的好书，告借归来，挑灯夜读，睡意全消，彻夜无眠，唯觉书中胜境之诱人，不知窗外东方之既白。

作为百科知识的普及读物，涉及历史文化、古今人物、成语典故、影剧艺术、思想修养、天文气象、人体生理等各方面的知识，可谓博彩多闻、引人入胜。甫一涉猎，便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渐次深入，更是如入宝山，流连忘返。

尽管本书分门别类，条目繁多，然而归属适宜、博而不杂，不同知识水平、不同职业阶层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里找到切合自己需要的东西，收获相应的效益，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

譬如，当前世界各科技强国，正在高温和低温超导材料的研究上，你追我赶，竞争激烈。我国一些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也正在参与这一角逐，并曾数度领先……。关于这个问题，关心的读者可以在《奇异的低温世界》里，获得这方面较为完全的知识。

再如，我国历代王朝各在何处建都，由于历史的衍变，朝代的更迭和某些地方名称的改变，一直扑朔迷离，不易弄得清楚。对中国历史上地名的变更和历代建都何处感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我国历代的都城》，相信你会得到满意的解答。

又如，《双关趣话》中，讲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双关故事，闪烁着机敏智慧的光芒，给读者留下了隽永难忘的印象，阅读时慎勿轻易放过。

总之，本书博采众家之长，每篇各具风采，可以锻练思维、增智益慧。诚能一编在手，定当开卷有益，愿读者诸君幸留意焉。

（原载 1987 年 10 月 30 日《天津书讯》）

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古今中外》
郑道启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中外》一书（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化广播杂志》节目组编），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我国搞图书发行工作的，每天都在和书打交道，但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却了解得甚少。平时也积累了一些有关方面的资料，也只不过是一鳞半爪，很不全面。如“演义”是什么意思？我过去就不懂它的含义。读了《古今中外》这本书后，才知道“演义”是指由史话本发展而来的长篇小说。

《古今中外》这本书的内容极为丰富，知识面很广，不仅仅是限于历史文化这一方面，而且还有古今人物、成语典故、影剧艺术、思想修养、天文气象、人体生理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小百科”。一册在手，能使你学到各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性的文章，读来又使你感到十分有趣。例如：人们常把新婚叫作“蜜月”。那么，“蜜月”这一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蜜月”这个词来自西德。在西德易北河河口，靠近北海沿岸的汉堡港，居住着古代欧洲的条顿人，条顿人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男女举行婚礼之后，夫妇两人每天都要喝蜜糖水或者用蜜做的酒，从结婚的第一天起，一连喝三十天，也就是一个月，天天如此，不能间断。因此，西德的条顿人把婚礼后的头一个月，叫做“蜜月”。这就是“蜜月”的由来。

总之，本书的特点是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而文章又写得短小精悍，一篇一个内容，随时可以翻阅，而且还可作为资料保存，具有藏书的价值。它确实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

（原载 1988 年 1 月 9 日《天津书讯》）

“天煞星”的杀手锏
——《围棋攻击战略》译序
赵德宇

日本超一流棋手加藤正夫以四冠王之殊誉雄居当今日本棋坛之首，引起了国内棋手的普遍注意，围棋业余爱好者也无不欲穷其奥秘。《围棋攻击战略》这本书以作者棋风的形成过程为主线，一层层地揭开了其“天煞星”的面纱。它精选了作者多年实战中的战例（其中多是一般爱好者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而又颇难决断的局面），帮助读者打开行棋思路，体会攻棋“原则”。

本书从布局、中盘、官子各阶段有机联系的整体出发，阐述实战攻杀中应掌握的分寸。它向读者展示：攻杀绝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战术，而是一种全局战略。在本书里，作者正是从战略和战术有机配合的角度来阐述攻杀趣旨的。

在本书中，作者还叙述了其棋风形成转变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我认为，这些体会对业余爱好者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读者把它当作一本“攻杀大全成”、来读，我看也是可以的。因为，作者在本书里系统地表述了其作为“杀星”的攻击理论以及各种攻杀技术适用的具体场合和运用方法；同时，也比较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棋手对攻棋的不同认识及其不同的攻棋方法，这对愿意认真研读它的读者尤其是业余爱好者端正攻棋思路、提高攻杀能力，是受用无穷的。

尤为可贵的是，无论是初学者、中级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棋手，都能从本书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它不仅是在介绍一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在阐发一种思想。

（原载 1990 年 5 月 12 日《天津书讯》）

制空与攻逼 介绍《围棋新思维》 葛华

“武宫创立的‘宇宙流’是世界围棋艺术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其构思宏大，气魄超群，堪称一绝”。这是中国棋圣聂卫平在武宫正树的一本译著的序中对“宇宙流”的评价。确实如此，武宫以其一反“金角、银边、草肚皮”古则而执著于中腹的独特气魄和棋风，在日本乃至世界棋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棋风同时也赢得了广大业余爱好者的钟爱，这在专业棋手中是非常少有的。说他在昭和棋圣吴清源及其同好木谷实等创造“围棋新布局”之后，又开围棋布局一代新风，大概并不过分吧。要不然，人们就不会把他对围棋的思考方法叫做“围棋新思维”了。

然而，“金角、银边、草肚皮”的训诫以其千余年的生命力流传于棋坛且至今不能废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吧。“宇宙流”爱好者成千上万，而成功者却很寥寥，与过分违反这一古则也不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武宫成功的奥秘何在呢？《围棋新思维》分上下两篇分别介绍了其“制空战略”与“攻逼妙法”即道出了个中秘密。

围棋的目的在“围地”，这是古今之通理；武宫的“新思维”也逃不脱这个框框。角、边好取，而中腹难围，这是“围法”的一般原则；武宫“新思维”就“新”在超越了这一通则，因此，其“新”就新在技法上。因为围棋是黑白双方的棋枰上竞技的艺术。“宇宙流”是以大模样为背景来围地的，对手不让你围地就必然要来打入。因此，“宇宙流”的难点就在于：一是如何构筑大模样并使其地域化；二是如何攻击对手打入的棋或弱棋。这二者实际又是通过“围地竞争”互为表里的。所以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宇宙流”的基本骨架。解开了这互为表里的两个难点才算真正得到了“宇宙流”的精髓。

在《围棋新思维》这本书中，武宫正树把这两方面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了读者。下面从该书上、下篇中各选一手，以飨读者“先睹为快”之饥。

图一是武宫正树在日本第29届本因坊循环赛（1974年）中执白对林海峰九段的一局。黑9之后，一般定式是，经黑d、白e落了后手。然而，在此之前自己走了白4这一新奇之手，白e与此显然缺乏联系。基于此，武宫走了出乎一般人意料却是与白4相关联的白10大飞。这就是武宫流构筑模样的走法！白10之后，a、b两点必得其一，都是构成模样的要点。以后围绕此手展开激战直至局终（参见该书上篇第二章）。

图2是武宫正树在日本第29届本因坊战中向石田芳夫挑战的最后决战局。一看就知是武宫执黑！白走1位定型后，黑走了黑2、白3的交换。黑下一手走在何处？武宫走了黑4拆一，真是一石三鸟的好着！首先它使自身左下得到安定；其次造成对白一子的攻势；从而第三使右边三连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在以后的攻防战中，黑4果然发挥了攻守兼备的作用（参见该书下篇第五章第二节）。

当然，看完这两手虽能使读者稍微领略到武宫流的精彩，但仅此是不能洞见其精髓的。还是请读者去看《围棋新思维》吧。相信读者不仅能从中领略到更多更精彩的场面，而且通过对“制空战略”（包括“中原趣旨”、“大飞的魅力”“模样屠龙”、“腹空”、“模样围空”五章）与“攻逼妙法”

（包括“攻逼的分寸”、“攻逼的步调”、“厚势与薄味”、“‘大包袱’内的攻防”、“攻逼与治孤”五章）的学习，定能更深地了解“宇宙流”的奥秘和骨髓，从而提高自己的棋艺。

（原载 1992 年 5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写在《中国国家棋大赛中局选评》发行之前
金启昌

一局棋从开始到结束，一般要经历开局、中局、残局三个阶段。开局子力齐整，处于动员部署阶段。对于弈者来说，无论开局如何娴熟，充其量是先走不失主动或扩大主动，后走反夺主动而已。在开局阶段即能判定胜、负、和的棋局是少见的。残局是经过长时间搏斗，双方实力大量消耗后的境地，优劣已可了解。就残局而论，如面临失势呈败之阵，纵有娴熟精巧之技，也难挽狂澜于既倒。因此，中局十分关键，它既承上启下，又继往开来。中局子力尚多，接触频繁，变化复杂，鏖战激烈，无论是大刀阔斧的攻杀，还是精雕细琢的争斗，都是对双方棋手的严峻考验。所以，认识和掌握中局的基本战术规律，对于提高棋艺，临搏取胜，确属成败攸关。

中局战术研究的主要课题，可概括为四个字——先、子、势、杀。此四字乃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得先还是失先，是算度每一种变化首先要考虑的。一般说，先手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得子。子，是实在的物质力量，自然不容忽视。在子力拼杀时，往往预伏着得子失先、失子得先或弃子抢先的变化。围绕子的争夺，有谋子反谋子、困子反困子以及巧妙运子和间接、直接兑子等一系列战术应变。所以，子和先是密切关联的。如得子得先，就形成了优势；失子失先，即呈劣势。杀，即运用相应战术，调动子力，向对方进行全面进攻。当然，杀并非指一时一子而言，它贯穿于中局决战的始终，如弃子抢杀、对攻互杀等，都是运筹于全局的。

钻研中局，提高中局拼搏能力，除了实战对弈外，重要的是从诸多的名手对局中学习借鉴。笔者不揣浅陋，多年来致力于中局探索，从近十几年的国内外重大棋赛对局中，采摘了中局精华，分类编选了180个局例，并在每局前附有图谱，冠以形势分析和得失评注，以冀与广大中国象棋爱好者共同探讨和学习。

（原载1991年8月25日《天津书讯》）

《张伯苓纪念文集》出版 崔国良

由天津南开大学编辑的《张伯苓纪念文集》已于四月三日出版发行。

彭真、李鹏等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为文集出版题了词。彭真的题词赞扬张伯苓先生是“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李鹏的题词是“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周培源、费孝通、曹禺、陈省身也分别题了词。

今年四月五日，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张伯苓先生把满腔的爱国热忱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博得人们的广泛尊敬。

纪念文集的首篇，是周恩来同志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写给张伯苓先生的信。文集还收入了张伯苓先生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南开大学教师撰写的四十余篇回忆、纪念文章。

（原载《198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

受桥牌爱好者欢迎的读物
——《桥牌叫牌指南——1100 题释疑》
佚名

《桥牌叫牌指南》为美国桥牌大师维克多·摩勒的新著。书中对桥牌叫牌的开叫、应叫、无将叫牌、阻击叫、强牌和弱牌的再叫、满贯叫、强三开叫、防守叫、平衡叫、各种流行的约定叫、争叫、心理叫以及战术叫牌等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并以 1100 个问答题的形式予以说明。全书深入浅出，简单易懂而原理深奥。无论对初学者或有一定基础的桥牌爱好者都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和参考书。

书中的各种叫法，以自然叫牌法为基础。但并不局限于机械地按照大牌点来叫牌。特别是以下几点很值得我国的桥牌选手们借鉴，对同样牌型或同样的大牌点由于 10 以下的中间张不同而叫牌有所不同；同样的牌有时叫无将，有时却应该叫花色；开叫的位置不同而叫法也不同；对扣叫的灵活运用等等。

全书共分十五章，有叫牌问答题 1100 例。其最后一章的 100 例是综合前十四章中各种叫法的总结性问答题以及自我评分测验。

目前我国国内出版的一些桥牌书籍及有关报刊的牌例大多数是讲解桥牌打法的，即讲作庄技巧的书多，也有少数讲防守技巧的书。至于探讨和研究桥牌叫牌技巧的书（不是叫牌系统）则几乎没有。1987 年《桥牌》杂志第三期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对全国桥牌队式赛综述指出：“我国桥牌选手‘胡冲乱撞’的太多，这次搞了男女甲组各一百副实战（以冠军队赛况为主）的顺序抽样统计，男甲组中叫牌问题占 77%；作庄问题占 6%；防守问题占 17%。女甲组中叫牌问题占 68%；作庄问题占 18%；防守问题占 14%，，男女都在叫牌问题上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在一百副牌中甲级队所叫的局，满贯的数额及其客观成功机会率中显示；男甲组不合标准的至少占 63%！成功机会趋于零的占 46%！女甲组中不合标准的至少占 46%！成功机会趋于零的占 36%！我们有些牌手只是死记硬背一些叫牌系统，机械地按大牌点来叫牌，而不能根据牌型、牌点、中间张以及局况、位置、对手情况等灵活运用叫牌技巧。”为此，在我国普及和加强对桥牌叫牌技巧各种基本功的学习实为必要。

此书将是各级桥牌讲座和学习班的良好教材。

（原载 1990 年 3 月 10 日《天津书讯》）

关于《三江侗语》

邢公畹

南开大学汉语侗傣语研究室所编语言学专刊第一种——《三江侗语》是1980年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所做的关于侗语的语言学田野工作的报告，全书共三十万字，内容除概说外，有：一、语音系统，二、声韵调配合总表，三、故事和传说的记音和汉语翻译，四、风俗谭记音和汉语翻译，五、歌谣记音和汉语翻译，六、词汇总编。

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人口约有120万，居住于湖南、贵州和广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唐代诗人柳宗元有两句诗道：“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咏的就是侗族人。侗语属于汉藏语系侗傣语族的侗水语支。解放以前，国内外语言学界对侗语的调查研究是一个空白点。1956—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曾经组织力量对侗语进行过普查，到1980年曾出过一本《侗语简志》（收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对音系较复杂的南部侗语的一个方言点作较详尽的描写的专著，《三江侗语》是第一部。

现在三江侗族青年虽然还是说侗语，但是已经不大会说本族流传的故事，也不大会唱本族的歌谣了。我们的发音人差不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最会讲故事的一位阿婆已经是将近九十岁的人了。侗族是没有文字的，这些故事、传说、歌谣，如果不趁现在记录下来，再过几年，就有失传的危险。“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这些材料，不仅对于语言学，就是对于民间文学、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是很有意义的。

侗族民歌，清新隽永，令人惊叹。这举个忠实的汉译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唱歌儿不算心欢，什么才算欢？甜话儿不甜，什么才算甜？仕才郎死后剩下了一颗做官的印；叫得好的公鸡死后只留得夜沉沉；河里龙王脱身死后空留宝；咱们姑娘们趁着年华正好唱欢情。”这在下到侗语区之前是不知道的。

（原载1984年5月15日《天津书讯》）

《汉语研究》（第二辑）出版
张敬双

由南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编辑的《汉语研究》第二辑已经出版了。这是一套以对外汉语为主要对象的语言研究丛书。第二辑的主要内容有：张志毅的《论泛称词和特称词》；向光忠的《同义词的辩识与义素分析法》；苏梅的《词的言语义》；詹人凤的《有关“多”和“少”的对立和不均衡性的若干考察》；陈思泉的《汉语语法层论析》；宋玉柱的《说“有的”——兼及“有些”》，尹润芾的《浅说老舍作品中的一些口语格式》；何平的《“个”“一个”的语法和修辞功用》；赵金铭《外国人基础汉语用字表》草创；阎立羽的《对比语言学说略》；张柏玉的《句义蕴含及其教学法的研究》；张孝忠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二题》；国赫彤的《小说中的天津方言词语选注》等，从不同的侧面，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原载 1985 年 1 月 7 日《天津书讯》）

一套独具特色的古汉语教材

《古代汉语教程》

· 张敬双 ·

目前社会上古代汉语教材已有数种，但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解惠全副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独具特色。

该书共分上、中、下三册。内容包括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音韵和训诂。

这套教材有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知识性。该书每课都有通论部分，把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和常识，分门别类地做了详细而又深入浅出的介绍。

第二，科学性。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老师们，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和教学经验都凝聚在这一教材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体系。

第三，系统性。该书不仅从内容上系统完整，包括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音韵和训诂各个方面，而且从编写体例上也自成体系。每课分基本知识部分、课文部分和练习部分。三部分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相互贯通，相互印证。讲什么常识，就选什么典型课文，搞什么样的练习，使古代汉语知识的学习，变成一个完整系统的过程。

第四，实践性。语言是一种实践活动，学习古代汉语也不能离开实践。该书每课的课文与练习两部分，就是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了什么古汉语知识，就要拿到课文中去运用，就要做什么样的练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该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 1988 年 7 月 9 日《天津书讯》）

中国古代最早的分类词典 《尔雅》

《尔雅今注》序

张清常

《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大致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而编纂的词典。包括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具有解释语词的小词典性质，第四至第十九篇具有小百科词典的雏形，而且它首创的这种编纂法今天仍然采用，例如我国新版《辞海》曾两次发行分册本，第一分册为词语，以下为小百科。这种编排既是现代辞书编纂工作中的一道重要工序，又产生颇为切合实用的成品，有时它比定稿的依部首排列的《辞海》还更便于查阅。饮水思源，《尔雅》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贡献确实不小。

关于《尔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学者们已经讲过许多，兹不赘述。

前人曾对《尔雅》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他们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字义的的注释与考证，二是训诂方法的研究，三是音义关系的探讨。给《尔雅》全书及郭注作疏证的，最重要也是最常见到的是邢昺、邵晋涵、郝懿行三家的注释本。各有千秋，均有贡献。

旧日注释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由于时代较早，前贤不可能看到甲骨文，没有利用甲骨文、金文探求古义的机会。那时还没有现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现代词汇学理论，无法运用它去观察分析《尔雅》复杂的词汇词义现象。前贤所认识到的音义关系，还比较笼统。如此种种，毫不足怪。可是我们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仍然墨守旧日疏证，就是故步自封，不求进取了。

旧日疏证有个缺点，就是烦琐。当年戴段二王都反对烦琐，他们的著作内容朴实精粹，行文简洁清新。《尔雅》邢邵郝三家注释未能臻此境界。

时代在前进，应该给旧日疏证结帐，取其精华，去其烦琐，写出今注，使人耳目一新，轻装上阵，才好迈开步伐，开展新的科学研究。

所谓今注，不是改用大白话来做注释就算，更重要的是形式新，语言新，方法新，内容既精又新。给尔雅做个今注，实在是当前迫切需要的。但是作今注难，为《尔雅》作今注更难。

朝华一向朴实勤奋，基础广博而扎实。学成之后，致力于汉语发展史词汇部分的研究，又专攻训诂。酝酿日久，遂发奋作《尔雅今注》。五六年来数易其稿。

朝华此书，博采众家之长，并吸取最新科研成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指明《尔雅》得失，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唯于平淡中见功力，而且处处为青年读者着想，文字浅显，要言不烦，头绪清爽，引人入胜。并编制索引，以利于翻检和进行科研。优点甚多，是一部好书。

我对于《尔雅》只是初学。读朝华此书，受益不小，所以乐于向读者推荐，希望《尔雅》之学出现新气象。

（原载 1989 年 4 月 22 日《天津书讯》）

《尔雅今注》评述

杨端志

徐朝华先生《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以下简称《今注》)总结了近两千年《尔雅》研究的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又移植了现代科学许多部门研究的结晶,寓作于述,包含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且言简意赅,头绪清爽。著者“前言”称此书是“为文科大学生和青年读者们提供一个便于阅读的注本”,其实,此书在学术上也有它独特的贡献。

第一,释义较细,理清了有关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义同义近的语义场关系。《尔雅》中有很多直训,担任解释的词往往是多义词,如“邮,过也”(《释言》)，“过”有经过、超越、探望等意义;“庶,幸也”(《释言》)，“幸”有幸运、侥幸、希望、宠爱等意义。这样的释义比较笼统,释词与被释词是在哪个意义上构成同义语义场的,也就很不清楚。《今注》一般是注明被释词的确切涵义,用这个意义进而限定释词的意义。如上例“邮,过也”,于“过”字无注,于“邮”字注为“通‘尤’。过错,罪过。”(2.178—《今注》为条目作的编码,下同)。有时是直接注明训释词的涵义,如“庶,幸也”,于“庶”字无注,于“幸”字注为“幸运,侥幸。引申为希望。”(2.113)如果被训释词、训释词皆难于理解,则同时作注,如:虹,溃也。

“溃”,水冲破堤坝。引申为离散,混乱。

“虹”,通“诇(hòng)”。争吵、扰乱。(2.183)

使“虹”(诇)与“溃”在扰乱、混乱的意义上形成一目了然的语义场。

《尔雅》中还有很多条目是同训。同训各词的意义与训释词的意义之间,往往不是同一层次的,其中有用本义的,有用引申义的,有用通假义的。对这种情况,《今注》就分别认真分析其本义、引申义或通假义,使同训各词的意义与训释词的意义呈现在同一层面上,形成醒目的同义语义场。如:

允、孚、亶、展、谏、诚、亮、询,信也。

“信”,语言真实。引申为诚实,讲信用,实在。

“允”,诚实,真实。

“孚”,信用。

“亶(dǎn)”,忠诚。引申为诚然,实在。

“展”,诚实。

“谏(chén),通“訖(chén)。诚实,讲信用。

“亮”,通“谅”。诚实。

“询”,通“恂(xún)。”相信,诚实。(1.18)

经过细腻的爬梳,用诚实、讲信用义把被释词“允、孚、亶、展、谏(訖)、诚、亮(谅)、询(恂)”与训释词“信”统一了起来。

如果整理爬梳后,被释词与训释词之间,词义只是相通或相关,《今注》则明确指出,如:

、厯,有也。

“(h)”,大。引申为有。

“厯(máng)”,大。引申为丰、厚。大、丰、厚与有义相通。(1.4)

第二,释义有独到之处。《今注》注意吸收旧注中的优秀成果,但并不盲从,它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及手段对《尔雅》有新的研究,释义有独运匠心,超迈前人之处。如“悦、恻、愉、释、宾、协,服也。”(《释诂》)

我们试把《今注》对这一条中“释”字的注解同郭璞、邢昺、郝懿行三家名注比较一下：

皆谓喜而服从。（郭注）

释者，释去怨恨而服也。（邢疏）

释者，《说文》云：“解也。”解散与输写义近。释训服者，梅《书·大禹谟》及《左氏》襄公二十一年传并云“释兹在兹”，释宜训服，与“念兹”义近……。（郝疏）

“释（yì），通“悻”。喜而心服。（1.11）

郭氏统而释之，意义准确，但只叙其然，不叙其所以然。解“释”为“释去怨恨而服从”，迂曲穿凿。郝氏认为“释”有二义，一为解散，一为服。解散是本义，见于《说文》，这没问题。但据“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对文得出服义是错误的。“念兹在兹，释兹在兹”首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是臧武仲驳季武子引《夏书》的话，目的是要证明在上者的言行体现社会道德规范，是分承上文“上之所为”、“上之不为”的，意思是在上者想要干的是人民行为的标准，在上者舍而不干的也是人民行为的标准。所以，杜注“释，除也”，是对的。《今注》解上文“悻”为“喜悦。引申为喜而心服”后，于“释”字则斩钉截铁地解作“通‘悻’。喜而心服。”简捷明快，于理顺，于文合。也符合《尔雅》本借同条的体例。从文献上看，《尚书·顾命》：“王不悻。”《释文》：“马本作不释。”《庄子·齐物论》：“南面而不释然。”成玄英注：“释然，怡悦貌也。”以本字之义为训，证“释然”即“悻然”。足见《今注》所释确凿可信。郑玄《诗·北风·静女》“说悻女美”笺：“说悻当作说释。”段玉裁《说文》“说，说释也”注：“说释即悦悻，说悦、释悻皆古今字。”一般来说，古今字出现于文献有个先后，是历时的，而“悻”“释”皆见于先秦文献，是共时的。显然，把“释”“悻”解为通假关系要比解为古今字关系更符合语言实际。

《今注》站在当代文化学、自然科学角度解释文化词、动植物词，更是旧注所不及。如《释鱼》：“蝾螈，蜥蜴。蜥蜴，蝮蛇。蝮蛇，守宫也。”郭注：“转相解，博异语，别四名也。”邢疏：修螈、蜥蜴、蝮蛇、守宫一物，形状相类而四名也。”郝疏：“此皆同类，故《尔雅》通名矣。”都认为是“一物”“同类”。《今注》分别介绍了蝾螈、蜥蜴、蝮蛇、守宫的种属、形状、生活习性后，加案语说：“根据现代动物学分类，蝾螈为两栖动物，蝮蛇和蜥蜴（包括守宫）为爬行动物。蝮蛇属石龙子科，守宫属壁虎科。……”

第三，指出词语在古代的使用情况。《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自有典册到汉初，至少有一千几百年。《尔雅》所收是这段漫长时间内的词语。为《尔雅》作注，指出某些词语在古籍中使用的时限、地域、使用习惯及主要意义，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今注》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如：

厥，其也。

今注：“厥（jué）”，他的，那个。“厥”在甲骨、金文中常见，《尚书》和《诗经》的早期作品中用得也较多，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古籍中，除仿古者外，一般不用……（2.187）

勿念，勿忘也。

今注：“勿念”的“勿”，助词，没有否定的意思。“勿念”即“念”。

这种用法的“勿”，有时也写作“无”，“毋”，主要出现在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3.18）

上二例解释了词语出现和使用的时限。

蜉蝣，渠略。

今注：“蜉蝣（fúyóu）”，一种寿命短促的小虫。又名渠略。体细狭有长角，甲下有翅能飞。《诗经·曹风·蜉蝣》……孔疏：“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阳以东曰蜉蝣，梁宋之间曰渠略。’”（15.9）

未成鸡，健。

今注：“健（lián）”，雏鸡。郭注：“江东呼鸡少者曰健。”（19.40）上二例引前人说，解释了蜉蝣、渠略、槩使用的地域。

鷩，凤。其雌皇。

今注：……[案]在古籍中，一般不分雌雄统称之为凤凰，或简称凤。（17.27）

鸡三尺为鷩。

今注：“鷩（k n）”，或作“鷩”。大鸡。在古籍中，“鷩”、“鷩”常用来称一种形似鹤的鸟……。（19.47）

上二例解释了凤、凰、鷩（鷩）在古籍中的使用习惯。

餲，饴也。

今注：……“餲（hú）”，粥。在古籍中，“餲”常表示以薄粥维持生活的意思……。（2.251）

……豕生三，從。……

今注：“從（z ng）”，猪一胎生三子，猪仔称從。……從在古籍中常作小猪的泛称……（18.6）

上二例解释了餲、饴在古籍中的常见义。

第四，讲清了一些词义的来源及发展脉络。《尔雅》所释包含一些特别古老的词语。对这些词义的来源及发展，《今注》除在理顺被释词与训释词意义时作了些说明外（见前），其他地方也往往结合这些词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汉字汉语发展的规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如：

……后……，君也。

今注：在甲骨文中，“后”和“毓”实际上是一个字……，象一倒子在人下而有水液，是一个妇女正在生孩子的形状。……“后”本指远古母系社会氏族部落的首领，是女性。发展到父系社会，“后”成为对男性统治者的称呼。……周代以后，男性最高统治者称王，于是“后”便用来称呼君王的正妻。（1.2）

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

今注：[案]“禽”的本义是猎获物，包括鸟类和兽类。引申为鸟兽的总名。……禽只有在和四足而毛的兽类相对而言时，才专指二足而羽的鸟类。后来词义缩小，“禽”便只指鸟类了。（17.77）

第五，辨析了一些同义词、近义词的词义。对《尔雅》所收在意义上相同、相近的词语，《今注》一是明其同（或通），一是明其异。明其同（或通），是借助于引申假借使被释词与训释词的意义联系起来，这在前面已经述及。明其异则是辨析它们各自的使用特点，比较它们在意义上的细微区别。如：

谑、笑、敖、戏谑也。

今注：“谑浪笑敖”可译为戏谑，但“谑”、“浪”、“笑”、“敖”四词单独使用时，词义有区别。“谑”，开玩笑。“浪”，放荡。“笑”，讥笑。“敖(ào)”，通“傲”，傲慢。(1.20)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今注：“宫”和“室”在先秦时是同义词，都是房屋、住宅的意思。……秦汉以后，“宫”专指帝王的宫殿，和“室”的意义有所区分。(5.1) 有时，《今注》也指出某些词浑言则同，析言有别。如：

未成毫，狗。

今注：“狗”，没有长毛的小狗。[案]古代犬和狗相对而言，大狗称犬，小狗称狗。但在一般情况下，“犬”和“狗”可通用……。(19.35)

狼：牡，獾；牝，狼……。

今注：“獾(hu n)”，公狼。[案]在古籍中，狼一般不分公母，统称之为狼。……公狼称獾，可能是方言词。(18.4)

第六，用案语形式说明《尔雅》在编排、释义、及旧注等方面的情况。由于《尔雅》距今时代久远，在编排、释义及旧注方面存在着相当复杂情况。《今注》对这些复杂情况，在适当的地方用“案”语的形式给了说明。案语共107条，大体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说明《尔雅》编排上的问题，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注案：“这种释义方法旧称‘二义同条’……这种释词方法容易造成误解，是不科学的。”(1.2)。类似的还有1.130条、1.145条等。其次是纠正《尔雅》释义之误，如“怒，饥也”注案：“‘怒’没有饥饿的意思。……毛传：‘怒，饥意也。’‘饥意’是一种比喻，本条释‘怒’为‘饥’不妥。”(2.218)类似的还有6.17条、9.16条等。其三是纠正旧注之误，如“庸庸、悻悻、劳也”注案：“前一‘庸’字为动词，表示酬劳、任用；后一‘庸’字为名词，表示有功劳的人。‘庸庸’连用意为酬报有功劳的人……旧注按重言进行解释都是欠妥的。”(3.29)类似的还有13.28条、16.33条等。其四是对于向来异说纷纭的疑难条目进行了科学的说明。有时提出自己倾向性的意见，如“薇，垂水”注案：“黄(侃)说可从。”(13、155)”蜉，何”注案：“(刘师培)说似乎较为合理。”(15、33)难以提出自己倾向性意见的，就注明“可作参考”、“存疑”等，如1.67条、9.20条、13.158条等。

《今注》体例也好。《释亲》《释天》《释地》《释丘》《释水》《释兽》《释畜》等篇，原类名在所属词条之后，为了适合现代的习惯，《今注》将类名移到所属词条之前。为了便于检索，词条以篇为单位编了数码。为了便于理解词义，每个词释义之后，一般都列有例句。例句主要从先秦两汉古籍中选出。为了方便青年读者，正文僻字有注音，例句难词有简释。

《今注》努力吸收前贤的有关研究成果，引征丰富。引征书文约120种，2700余条。除《尔雅》各种注本及研究专论外，今人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果也有所引用。还参用了新出土的秦简、汉简等。

(原载《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3期)

《尔雅今注》受到社会关注

萧秉群

徐朝华先生注释的我国古代第一部小百科词书《尔雅》—《尔雅今注》，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都给以高度评价，认为自清季以来，“还找不到一本对《尔雅》今注的书，这本书可说是填补了空白。”

辽宁教育学院一位读者反映：“《尔雅》一书古奥难懂，青年人不易看懂，就是老一辈的专业工作者也不一定人人能说清楚，盼望有人能为《尔雅》做一番现代化的工作，让现代人和现代人的后代比较容易读懂此书。”《尔雅今注》的作者“完成了这项任务。”“《尔雅今注》用精炼的语言，准确而明晰地转传出古人有关人世各种知识的信息，意繁而文不繁，一洗旧注琐碎冗余的积弊，为《尔雅》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语言研究者认为“旧注旧疏已不适应今天读者的阅读。郭氏（指晋代郭璞）约而不备，郝氏（清代郝懿行）备而不约，且俱用传统注疏的体例，《今注》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针，对《尔雅》进行总体的研究（不是就词论词式的研究），并给以疏解，无论对今后词汇学的研究、词典学的研究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等都将大有裨益！”四川大学的一位专家认为“这是训诂学中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应当大书一笔。”

陕西师范大学一位读者来信说：“这本书运用了不少的古文字学知识和出土资料，旁证博引了文献上及当代学者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内容十分丰富。”

山东大学一位研究生正在从事中国雅学史的研究。他来信说：先生之《今注》，大有功于雅学矣。原拟雅学史至黄季刚及其弟子殷（孟伦）、徐（复）、骆（鸿凯）诸先生而告一段，今以先生之书观之，彼时非敢止笔也。”

杭州一位研究专家说：《尔雅今注》为一简明扼要而文富有科学性与实用性之新注。”几位大学教师认为《今注》“既可供学人参考，又可供初学入门之阶，既可做教材，又可作参考书。”“对普及专著极有作用，尤其所附《〈尔雅〉词语笔画索引》，无论是对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训诂学者、教学者都是有帮助的。”

许多读者对《尔雅今注》的封面设计给以很高评价。他们说：“《今注》的封面设计极佳，文物的选择很有意义，仿佛使人看到了文明的起跑点产生了一种古今如旦暮的时空意识。当代艺术大师范曾题字，为此书大增光彩。”一些读者认为“张清常先生的序是一篇好文章，对《尔雅》一书性质的揭示及其评价，介绍前人对它的研究，对旧注的评说，对《今注》及其作者的褒扬与推荐，均做到恰如其分，言简意深。”

许多读者呼吁：“我国有几千年文明史，不少经典注疏，卷帙浩繁，语言陈旧，使人难于卒读，熔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炉，给古书作出适合于今人阅读需要的新注，便历史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做这项工作。

（原载 1990 年 4 月 14 日《天津书讯》）

今人几部《尔雅》专著述评（节录）

宛志文

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不分卷，篇第悉依通行郭注本。

徐朝华，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致力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徐氏在教学中有感于“同学们屡次反映《尔雅》一书有些词语很生僻，不会念，也看不懂，旧注有的过于简略，有的过于烦琐，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希望能有一个今人的注本”（见本书《前言》），便发奋作《尔雅今注》，五六年数易其稿。

张清常谓：“所谓今注，不是改用大白话来做注释就算，更重要的是形式新，语言新，方法新，内容既精又新。”（《尔雅今注序》）《尔雅今注》大体上达到了这些要求。该书前有凡例，后有索引。阅读、翻检甚便。于每篇篇题下设有题解，介绍每篇的基本内容，要言不繁。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释义不事繁琐考证，以简明扼要为务，于绝大多数词语释义之后又设有例句，于例句中一些较难懂的词语还在括号中加简释。《释亲》之后，设有《宗族称谓表》，《释宫》之后，附有《古代宫室示意图》。凡此种种，处处为青年着想，便于初学。

《今注》在疏释中，于《尔雅》古注既注意广泛吸取，又注意悉心择别，特别注意运用近人的研究成果解说词义，刘师培、黄侃的考释吸收不少。《今注》能注意自觉引进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晓明词义的源流，如《释诂》中“才”、“元”、“后”，《释鱼》中“丁”、“乙”、“丙”等例即是。能运用新的词汇学知识说明词语意义范围的变化（如《释诂》“朕，我也”条）和同义词间适用对象的不同（如鏖、刻、切、磋、琢、磨等），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名物词语，去陈言，破谬说，《释草》以下诸篇其例尤多。

《今注》说解审慎，于未详未闻的条目，不强作解释；于疑而未决之处，或提出问题存疑（如《释乐》中宫、商、角、徵、羽的异名问题），或具列材料存参（如《释诂》“谧，静也”条），或仅作出推测而不率尔论定（如《释木》中“狄臧”，根据《集韵》推测“可能是乌臼树的别名”）。

《今注》在注音、释义、句读诸方面尚有若干疵病，如《释诂》“猕”，音 xi n。当音 xi n，《广韵》作“息浅切”。又《释言》：剂、翦，齐也。”

《今注》释曰：“齐，整齐。引申为整治。”当释为“断也”，可参郝疏。又《释诂》：“妥，安坐也。”《今注》句读作“妥、安、坐也。”释曰：“妥，安坐。《礼记·士相见礼》：‘妥而后传言。’郑注：‘妥，安坐也。’传言，犹出言也。”其于经文句读不当，从所引书证郑注中即可窥见。其所引例证，《礼记》当作《仪礼》，盖误信通行部注本而又失检之故。诸如此类，不必赘举。但总的说来，《尔雅今注》不失为现今最好的一部《尔雅》普及读本。

（原载《辞书研究》1990 年第 1 期）

《战国策笺注》前言

张清常

战国（公元前 481 年—公元前 221 年）曾被古人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也是最丑恶的时代之一；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光辉夺目的时代之一，也是茫昧愚蠢的时代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经济学说、自然科学理论及技术（尤其在冶炼、水利、农业、武器、战备、医学等方面）突飞猛进，文化昌盛的光明季节，也是统治者对人民施加残暴镇压的黑暗季节；它是人类对未来满怀着美好希望，人才辈出的春天，也是二百六十年战祸连绵，千千万万人民遭到屠杀的冬天；它是国王大臣等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肆意霸占一切，无恶不作，飞扬跋扈，荒淫奢侈，视人命如草芥，过着人间天堂生活的日子，也是劳动人民备受欺侮压迫，挨饿受冻，生命毫无保障，贫困到一无所有，过着人间地狱生活的日子。使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时代伟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希望仍然鼓舞着现代中国和世界，那时代的污泥浊水至今仍未涤荡干净。

这二百六十年真是个奇特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产物《战国策》也是先秦的奇书之一。

《战国策》是古代按国别来排列的史料汇编之一种。编辑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以及一般智谋之士的游说，出谋画策之辞和诡诈权变故事，也有若干重要的战国人物、史实的记载。这类书原有许多种名目和本子：《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时代有的下延到楚汉之际。西汉末年刘向（公元前 79 年—公元前 8 年）加以整理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可能刘向把下限放宽，兼收了蒯通、邹阳、主父偃等的材料？也可能是后人顾名思义而把战国以后的蒯通等人的材料剔出去？阙疑。

《战国策》的“策”，据《说文》本义是赶马所用工具，近似马鞭一类的东西，被借为竹片木片简册之“册”。古代的策（册）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一百个字的材料就使用它来写（见伪孔安国《尚书·序》疏）。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特别提到《战国策》的问题：“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曰《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刘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其名曰《战国策》，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王氏之说是正确的。“策”作为计谋来使用，已见于《吕氏春秋·简选》“此胜之一策也”。所以后代才会产生：策略、策划、国策、政策、对策、决策、划策、画策、出谋画策、计策、献计献策、献策、良策、妙策、上策中策下策、失策、群策群力等等。

《战国策》在历代图书目录中，有两种安排：一种是把它放在史部杂史类，一种是放在子部的纵横家。《汉书·艺文志》在春秋家。唐代修《隋书·经籍志》认为《战国策》“其属辞比事，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备而存之，谓之杂史”。五代《唐书·经籍志》、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南宋《通志·艺文略》、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如此。另一种安排始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记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宋元间《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于纵横家，元代《宋史·艺

文志》、明代《百川书志》同。

在过去，《战国策》一直是既被称赞“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鲍彪《战国策注·序》），又被痛加诋毁的。刘向说《战国策》的内容均非正道，但“亦可喜，皆可观”刘向（《校战国策书录》）。北宋曾巩（1019年—1083年）痛斥战国游说之士，对于《战国策》这种充斥了邪说的书采取了“放而绝之”的态度（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元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中评论说：“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按：《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又《楚一·江乙说于安陵君》章“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就事论事，前章的描写和后章的评论，没有多大的问题。）明朝王廷相抨击《战国策》所记的是：“摄权变以钩利，蓄狙诈以交外，悻近小以为得，便苟偷以为安。其心隐忍，其事欺谩，其术鄙陋委琐，畔于正道远矣！而时君劣，慑于祸患，一切倾心听之。由是兵戈遍于九域，生民涂其肝脑，古昔圣人休静天下之泽，斩然无存。嗟乎，世变至此极矣！”（王廷相《校战国策序》）。清朝陆陇其说：“《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战国策》去毒）跋》）。总之，《战国策》在正统思想的笼罩下，它是难以抬头的。今天，我们应该还给它一个比较切实的评价。

《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国君与执政者，或者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相互倾轧的阴谋诡计等等。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所以《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司马迁《史记》就曾采用了它。

《战国策》大量收录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这里面包括了后来纵横家追求前辈的游说之辞，或者假托前辈的名义而编造出一些书信与故事传说等。这些不但未必能够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所述人物和事迹本身就混乱矛盾，当然也还有若干浮夸之辞，难以置信。例如苏秦，年代弄不清楚，说辞所举历史地理情况与实际多有出入，事迹或与苏代、苏厉搅在一起，《齐三》记载苏秦封武贞君，《燕一》记载苏秦封武安君……。诸如此类，令人怀疑。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也指出：“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现代的历史学家们爬梳史籍，又借助于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帛书，基本上弄清了苏秦的主要情况。可见《战国策》虽有一些虚拟的东西不能信以为真，有待鉴别，但绝大部份的策文是符合史实的，不可以因噎废食。许慎《说文》，我们对它也会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幸亏有了它，我们才比较有些基础来认识甲骨金文。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战国策》的《中山》策文，那么1974年11月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虽被发掘出来，我们恐怕就要白手起家了。

从史料研究的角度来看，《战国策》可利用的还很多。例如：

一、《战国策》确实写了人世间许多不便于说出口的卑鄙肮脏的事情，尤其是诸侯国政治舞台上面的丑恶现象，极其不堪入目。却写得那么逼真，洗练，甚至使人惊心动魄，看穿了这一群衣冠禽兽，这引起了人们的愤慨。

但卫道之士却抨击此书“坏人心术”，犹如攻击《水浒》《红楼梦》等诲盗诲淫一样。试想如果没有《战国策》这样比较集中描述的翔实史料合盘托出当时的历史，我们对于伟大诗人屈原的激愤，对于先秦诸子光辉思想的产生，虽能理解但体会不会这么切实深刻。

二、《战国策》中写了几个太后：《齐四》有赵威后，《齐六》有君王后，《赵四》有赵太后（是否与赵威后为一人，有争议），《秦二》《韩二》等有秦宣太后，每个人都活跃于纸上，确是一国之尊。赵威后和君王后的见识魄力远胜男子，却没有受到应得的赞扬。赵太后大权在手，如果不识大体顾大局，触訾虽有三寸不烂之舌，亦无可奈何。可是一说起此事，便把触訾捧了又捧，夸了又夸，把赵太后降为昏庸老太太；一说到唐太宗发怒而终于纳谏，却不住地称赞唐太宗，为何独薄于女而偏厚于男？秦宣太后是最倒霉的，两件事情都被人们用后代压迫束缚女子的眼光讥笑得极为不堪。殊不知战国距离古代母系社会时期毕竟比宋元近一些，战国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比后代略胜一筹，对于男女间的禁忌也略少一些。《战国策》所写秦宣太后的骄横与坦率在当时是不大忌讳的。战国时期这几个掌权的太后也正是汉吕后和唐朝武则天的先导。

三、战国二百六十年间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激烈的。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外交战线的斗智。《战国策》保留了这方面史料很多，有许多是非常精采的。例如《齐一》里面有《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南梁之难》两章，齐国君臣商讨对于前来请求援助的赵与韩如何应付，救与不救；救则须讲求策略，救的目的是什么，救到什么程度，何时救，如何救，如何出兵，走的路线及攻击点，如何等待时机，如何作战等等，非常细致周密。又如东周、西周、宋、卫、中山诸策所载小国如何与强国周旋，不但自保平安，有时还敢从大国方面捞到便宜。这些很能给弱小国家增长志气。西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所说的“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主要就是诸侯国的外交策略问题。宋代以来，提到《战国策》就把智谋一概骂倒，都算谲诈，这未免太过份了，似宜区别对待。外交策略上面的智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怎么能够痛诋之为诡计呢？而上文所引王廷相的话“蓄狙诈以交外”，恰好正是这种论调。孙武及孙臆的兵法，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不但用于军事，而且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企业管理，人人尽知其为中国光辉的文化遗产，人人尽知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之愚蠢可笑。为什么？因为战略战术的得失能够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那么，《战国策》这些讨论外交策略的史料在今天恐怕仍有可以总结，可以借鉴，可以启发思考的地方吧。

从刘向起，历代有识之士都欣赏《战国策》的文采。就是在今天，若干选篇，例如《触訾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鲁仲连义不帝秦》《庄辛说楚襄王》等等也早已广泛流传鉴赏，还进入学校的课堂。至于把《战国策》的许多故事改写为儿童读物，收入成语典故的各种工具书，影响深远，更不必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战国策》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篇章也参差不齐，而在总体上，文章思路宽广活泼，细致周密，逻辑性较强，针对性更强，犹如磁铁，吸住对方不放，以言辞打动对方，使对方听信。古希腊罗马讲究在公共场所演讲抓住听众的艺术，古代中国，在《尚书》里面留下一些演讲的篇章，数量不多，中国讲究的是使用对话形式游说的艺术。这在周朝的历史文献中已经显示出来，著名人物，尤其是先秦诸子，无一不是能说会道的，或成本大套，或零金碎玉，精辟深刻，引人

入胜。《战国策》所记的纵横家游说之士也是如此，差异只在于思想内容往往品格不高而已。由于战乱连绵，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再也不是《左传》《国语》那种温文儒雅，含蓄悠闲的风格，而是简捷爽朗，口语化的，带有煽惑意图的说辞、通常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即使迂回婉转，用意仍是吸引对方，使自己的游说成功。许多优秀篇章，叙事生动形象，文字简练，篇幅不长，却是结构紧严完整，寓意深刻又富于情趣的故事。注重文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各人有各自的鲜明性格。在典型环境中，人物的处境，身份，性格特点，活动意图，言行等等都腾跃于纸上。人物写活了，至于善恶美丑，是非得失，功绩成败，都留与后人评说去吧。游说之辞则铺张扬厉，洋洋洒洒，犹如不押韵的楚辞汉赋。历史叙事则惜墨如金，点到即止，确是史家笔法，绝不拖泥带水。《战国策》与先秦诸子一样，善用比喻、夸张、排比、骈偶等等修辞手法。常借助于故事寓言来映衬话题，而它们早已成为童叟皆知的谈助，如：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鹬蚌相争，南辕北辙等。今日俯拾皆是精炼的词语，许多也出于《战国策》，如：争论，满意，中立，虚名；四分五裂，百发百中，趾高气扬，前功尽弃等。《战国策》引用了一些战国人物的警句，《战国策》自身也有一些至理名言，例如：“事有必至，理有必然”。“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之中，有一件希奇而又被人们忽略了创造，借用今日曲艺表演的说法，叫它“一赶二”。《中山·中山与燕赵为王》章，张登与蓝诸君的对话既是二人问答，又让蓝诸君扮演齐王来听张登的说辞、非常活泼，又比较复杂。话里套着话，现代标点必须使用到第三层的引号。本书《燕二·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章也是如此。远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有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难得。在古典戏曲中偶一为之，不易精采。京剧老戏《开山府》（亦名《打严嵩》）为著名演员马连良、裘盛戎珠联璧合的拿手好戏而后继乏人，这出戏的语言艺术采用类似《战国策》这个手法而又更加扩展，而且在戏里同一套对话能够连着表演三次（其他的戏多为两次），台词照旧而表演效果越来越精彩，成为京剧独放异彩的一绝。而这手法的嫩芽却保留在《战国策》之中。

《战国策》对于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楚汉之际有蒯通，西汉初年有邹阳、主父偃等，虽然擅长纵横之术，无所用之。天下已归一统，游说雄辩主要是采用策论及奏议疏表之类的形式，上奏皇帝。于是贾谊、晁错等应运而生，其文采直承纵横家，而思想与品质迥乎不同于游说之士。汉赋之铺陈夸饰，固然出于屈宋，也带有游说的色彩。司马迁《刺客列传》记荆轲事迹，笔锋饱含感情，为名家名篇之一。后人去其首尾，补入《战国策·燕三》，竟然水乳交融。再晚的文学家继承古典散文传统，显然受了《战国策》较大影响的，北宋有苏氏父子，南宋有陈亮（陈亮还受到贾谊的感染）。尤其是苏轼，若干篇散文雄辩滔滔，锋芒毕露，既有纵横家的声势，也有《孟子》“吾岂好辩”的影响。后人所辑《东坡志林》的史论，既有较高的见解，又有敏锐洗炼的文笔，潇洒豁达，也显示出他把《战国策》升华了之后的神采。

把《战国策》作为战国重要史料，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今天是没有人再反对了。可是，这部书的价值到底如何？

刘向是儒家的忠实信奉者，他编写《列女传》所用的精力，所表现的热忱，远远超过他为《战国策》所付出的。他从圣贤“教化”的标准出发，否

定了《战国策》而肯定了《列女传》，因为《战国策》是“不可以临‘教化’”的（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曾巩整理几乎散失的《战国策》，目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刘向、曾巩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历代士大夫的矛盾心理状态，对于《战国策》既欣赏其文采，又害怕这一“邪说”，既想扑灭这非正道的野火，又知道这书是毁不掉的。

《战国策》暴露诸侯国的统治者之昏庸愚昧，荒淫无耻，残忍暴虐，骄横自负，种种丑恶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国王太后中的比较英明者只是凤毛麟。诸侯的后妃男宠亲戚佞信大臣豪门，相互倾轧，不择手段，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种种丑恶比比皆是。这些事例在《战国策》中是不胜枚举的。每个诸侯国里，上上下下，一片黑暗，污秽不堪。《战国策》还揭露当时社会的庸俗心理，羡慕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借苏秦与嫂之问答，慨叹世态炎凉。也描写了若干事例，为了钱，什么伤天害理出卖国家的事都干得出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秦用金钱买动赵王的宠臣做内奸使赵王杀死李牧以亡赵国的事（《赵三·秦使王翦攻赵》章与《秦五·文信侯出走》章，后者写得极为冷酷）。商人吕不韦认为：耕田获利不过十倍，贩卖珠宝获利百倍，“定主立国”这宗买卖所获之利是无法计算的。吕不韦就做这笔大生意而获无穷之利（《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章）。当然，在战国人欲横流时期也有逆流而动者，例如鲁仲连就认为“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战国策》着实用力宣传“士”之可贵，也描写了若干“士”的骨头是硬的，品德是高的。游说之士多次指斥国王的儿子、亲戚、男宠、亲信等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连赵威后也认识到“民”（那时的涵义与今天有区别）的重要地位。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战国策》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部书能够把这样复杂的历史事实记载得清清楚楚，活灵活现，它的价值当然很高，不容怀疑。过去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把《战国策》骂倒，并不是不知道《战国策》里也有类似儒家“士不可不弘毅”“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但仍然要骂倒《战国策》，因为《战国策》所揭露的统治阶级的丑恶现象太多也太深刻了。因而一面骂它，另一面又欣赏它，这是很奇特的。近代曾有人说《战国策》“大半是小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算《战国策》是小说吧，所写的场面之大，格局之复杂，笔墨之生动活泼、简练、深刻，非谴责小说所能望其项背。所以《战国策》这书，无论把它当做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来看，或是把它当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来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

《战国策》的流传也曾遭噩运。

刘向在皇宫里的书库看到战国时期到楚汉之际纵横家书若干种编本，认为它们“错乱相糅莠”，于是综合各本，编为三十三篇，分别归到十二国；每国之中的材料又“略以时次之”；校定文字脱误，把这个新编本定名为《战国策》。这就是最早的定本。

由于这些材料错乱复杂，刘向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免有疏忽的地方。例如《韩一》里《王曰向也子曰天下无道》《或谓魏王王傲四疆之内》《观鞅谓春申》三章均应归到《楚策》。还有一些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互有详略，这可能是刘向兼收并蓄的结果，也许是刘向校录《战国策》时所谓“去复重”的工作搞得不够彻底。此外，纵横家搞权变谋诈的轶事与

说辞，其中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刘向去战国不算太远，或许了解得更多一些。可惜他不以为怪，未置一辞。当然，从具体工作来讲，刘向确实很不容易，例如《赵二》所载赵威灵王胡服骑射的辩论言辞，有许多就与《商君书·更法》相同或近似；《秦一·张仪说秦王》章与《韩非子·初见秦》基本上一样。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收录《战国策》三十三篇，就是刘向校录编定的本子。

东汉末年，延笃（？—167年）字叔坚，给《战国策》作注释，还写了一卷评论，均已亡佚。南宋姚宏《战国策续注》引用过。

东汉末年，高诱（生卒年未详）在给《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释之外，也注过《战国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刘向校录和高诱注释的《战国策》就散失了。

在刘向编辑《战国策》所淘汰的当时流传的战国纵横家书若干种的若干篇章，后代曾有人引用。刘向定本《战国策》曾经散失，后代也有人引用。因此徐广、司马贞注《史记》，李善注《昭明文选》，还有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及其他书籍所引用的《战国策》，或与今日流传的本子字句有差异，或为今本所无。清代王仁俊曾辑录《战国策佚文》一卷，收入所辑《经籍佚文》之中。诸祖耿于1940修订旧作成《战国策逸文考》（收入所著《战国策集注汇考》，1985年），辑得逸文七十二条，又附一条，论证甚详。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中有十六章全然不见于今传本《战国策》。

《战国策》在《隋书·经籍志》及以后的正史与私家书目中均著录，但篇数有出入。可以看出原书已有散失。据《崇文总目》所载，正文原三十三篇那时已缺少了十一篇，高诱注原二十篇那时只剩下八篇。

经过北宋曾巩的努力搜求，才得恢复到刘向三十三篇的数目，恐怕不见得能够搜求到已遗失的十一篇全部。显而易见的便是《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是后人在《战国策》残缺之后，抄《史记·刺客列传·荆柯》来补的。曾巩搜求高诱注得十篇，即第二至四，第六至十，第三十二、三十三卷的注释。

曾巩所编的本子比较完备，流传下来。

在北宋时还有：集贤院本、刘敞（字原父）本、钱藻本、（苏）东坡本、苏颂本、李格（字文叔）本、孙朴（字元中）本、孙固本、孙觉本等。这些本子以及后来的晁以道本等早已亡佚，只知道曾本、钱本、刘本、集（贤院）本的文字互有异同，刘本缺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卷、钱本缺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卷，集贤院本第二十一卷与众完全不同，东坡本与曾本基本相同。

南宋初年，《战国策》有一些刻本，都不甚精。绍兴十六年（1147年）浙江剡川人姚宏访求善本加以校定，重刻《战国策》。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刊本。它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宋钦宗赵恒的“桓”字、宋高宗赵构的“构”字、孔丘的“丘”字，确为宋高宗时的刊本。这书的骑缝处都刻上工匠的姓名，这是记载古代木刻艺术家的资料。

姚宏还把高诱注的二十三篇，即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三十一，重新做了补注，在注文的前面加个“续”或“续云”以示区别于高诱旧注。姚宏校勘曾、刘、钱、集、东坡等本的文字差异做了一些校记。可见姚宏比较严

谨。但是明朝毛晋汲古阁翻刻姚本，竟然在每卷开头都题“高诱注”，这样一来就混淆了高诱注与姚宏补注，会使读者搞错，这是很不严肃的。

一年之后，南宋鲍彪刊出他的《战国策注》十卷，调整策文次序，并改定本文，或改字，或增或删。

两来名家的本子有共同的一点，即用力于校勘《战国策》各种抄本刻本，而罗列其文字异同，以供采择，不加按断。姚宏则已开始注意到运用《史记》等书与《战国策》作比较，而且提出遗佚的策文问题。同乡会稽姚宽也注意到这些方面。

元朝至正乙巳（1365年）吴师道刊《战国策校注》十卷，重校此书，补正鲍彪注本。吴已认真地利用《史记》等书来研究《战国策》，他不赞成鲍彪的擅自增删改动。

清朝嘉庆八年癸亥（1803年），江苏吴县黄丕烈根据姚宏本重刻，并写了《战国策札记》三卷，详列鲍彪本、吴师道补正本之异同，参考《史记》等书，以校订姚本本文，加以判断，还采录了同时代的段玉裁、顾广圻等人的某些说法。

王念孙（1744年—1832年）参考与《战国策》有关的资料，运用古文字音韵训诂知识，加以校勘，撰《战国策杂志》三卷，收在他的《读书杂志》中。对于今本《战国策》文字讹误之处多所匡正。精列三处，超过前人。例如“訾”字，罕见，不知其正确音读，也不知其来历。只因《战国策·赵四》用了它，没有人提过疑问。王念孙指出它是“龙言”两个字误写到一起。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出土，证明王念孙的判断正确。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别的古籍也往往引用《战国策》而一同校正，这也附带解决了《战国策》文字讹误的问题。

《战国策》有不少地方历来难读。它的难读，有时是由于我们对于当时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等情况不够熟悉，对于古代汉语的语言结构某些方面未能掌握，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把《战国策》里的古国名东周、西周误解为通常用的历史朝代名，又如“乃效煮枣”，效是奉献，煮枣是魏国古邑名，魏国还有个地名叫酸枣。

《战国策》难读，更主要的原因是此书曾经散失，历代传抄刊刻往往出错。

或者写错了字，旧称“讹”“误”。或者抄漏了字，旧称“缺”“脱文”；有时像是文章的省略，其实是抄漏掉若干字。或者抄写颠倒了字，旧称“误倒”。或者抄写误增而重复了字甚至多出了不相干的字，旧称“衍文”“衍”、或者出现“错简”，古代抄书用竹简，竹简每简写若干字，竹简必须按次序编捆在一起，不能散乱。否则这篇文章就会有若干字的“缺”“脱”“衍”和前言不搭后语的现象。

黄丕烈《战国策札记》指出《战国策》上述的在文字上的讹误有一千几百条，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定《战国策》文字讹误的论证就有三卷，还不包括王氏校定别的古籍文字讹误而涉及《战国策》的部分。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不但提供了战国的久已失传的一些史实，也为校勘今本《战国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战国策》本文讹误脱衍等等需要校勘补正之处如此之多，所以此书历来难读。汉朝刘向早就说它“错乱糅莠”。北宋李格非说它“舛错不可疾读”。曾巩说它难读，因而他曾“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孙朴说“此书舛误

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南宋姚宏说它“舛误尤不可读”。姚宏给它作注，遇到实在无法下笔时只好说，这里“盖讹谬，当用《史记》全篇观之”。元朝吴师道说：“此章多难通，此类尤难知。”“语不可晓，有缺误。”“语不可解，疑有舛误。”“未详。”清朝黄丕烈也常说：“此策文有误字”。

不但《战国策》正文如此，就是汉朝高诱注、南宋姚宏续注、清朝黄丕烈《札记》，也有文字讹误和费解的地方，未经校正。注家还有一些过于求简的省略说法，例如“韩炉炭”，意思是说：这两个字在《韩非子》里面写作“炉炭”。

旧时注释本的《战国策》确实不易读。

近百年来，历史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人才辈出，考古发掘亦多所发现，《战国策》之研究整理就走上了新阶段。这方面的进展，这里从略。

可以预见，《战国策》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其特殊光彩。

我们搞这本笺注的念头，开始于1974年。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学小组全体教师和1972级语言组学生就重刊宋本《战国策》原书进行标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影印刊行。我承乏其间，写了一篇说明，发表在《语言研究论丛》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当时我们在标点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例如：《楚四·天下合从》章谈到惊弓之鸟，“然则射可至此乎”出现两次，我们给第一次的这句话加疑问号，表示魏王不信。给第二次的这句话加感叹号，表示魏王惊奇赞赏。又如《秦三·范雎至》章，我们体会范雎是“远交近攻”策略的首创者，绝不会对近邻妥协，所以标点为：“卑辞重币以市之？不可；削地以赂之？不可；举兵而伐之！”两个问号表示思考，两个分号（不用句号）表示语气紧迫，感叹号表示神情慷慨，坚决不允许多变的近邻魏国张牙舞爪。这样回答秦王，才能打动秦王。我们现在这部笺注对于正文的标点，就是在1974年打定基础的。

关于注释古籍，我自己是比较谨慎的。读《战国策》虽也有一些体会，还很肤浅，拿不出手。若干年后，酝酿成熟，再以札记形式向专家求教吧。目前只是随时提醒自己以下几件事：

第一，上古音韵关系不是万能的，音义通转的处理，不可不慎！

例如《楚四·虞卿谓春申君》章有“于安思危”。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三章、《逸周书·程典》《吕氏春秋·慎大》又《直谏》均用“于安思危”。《左传·襄公十一年》用“居安思危”。如果说“于安思危”“居安思危”意思基本上一样，可以。说“于安”是介宾结构，“居安”是动宾结构；说介词多由动词虚化而来，说“居安”是居于安……都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论从语音、词义、语法哪一方面看，“于”“居”是有区别的。人的语言表达同一思想、同一事物、同一行动，可以使用多种表达方式，多种结构，不必强求只能使用一种。如果以“于”“居”的上古音韵关系比较密切，“于”就是“居”，这就不妥。

第二，虚词所起的作用十分细致微妙，务必认真分析掂量。不宜只凭借上下文，就主观地搭桥过河，捷径通幽。

例如《楚一·张仪相秦》章：“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之事，故逐之，则楚无谋臣矣。今君能用楚之众，故亦逐之，则楚众不用矣。”这里面的两个“故”，都是说因此之故，所以。文字本来是通畅的。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人们所谓“意合法”，不必尽用虚词，借助于文章各句中的结构，分句的先

后次序等等手段，达到使读者理解。因此这里实际上给读者理解到的是：“如果因为这种原故所以”，但这“如果”是不出现的。倘若不这样去理解，而认为“故”犹“若”也，这是不妥的。

第三，文艺性的笔墨，重在生动简练，有时闪转腾挪，避免平铺直叙，与训诂考证之文有所不同。

例如《东周·温人之周》章，同时有几种本子：“周不纳，问曰‘客邪？’，对曰‘主人也’”。此本最通顺。还有“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及“周不纳，对曰‘主人也’”和“周不纳，即对曰‘主人也’”等其他抄本之差异。争论其是非，太过则如同焚琴煮鹤了。

我们这部笺注的做法，见于本书《凡例》，这里不赘述。

我们才学有限，《战国策》也确实难读，只有借重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择善而从。原著具在，不烦详细征引，概括诸说，力求简明扼要。一得之见，则在于取舍之间。偶有体会，不敢自以为是，敬求教于专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串通。一俟笺注问世，得到批评指教，纠正错误与缺点，我们将着手修订《战国策》的今译，以方便广大读者。

（原载《南开学报》1993年第3期）

一片启迪智慧的桑叶
——《作文训练教程》
路禹

最近，有幸读到了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及树楠刘德铭同志编著的《作文训练教程》一书。它填补了作文教学领域中的空白，给我们提供了翘盼已久的关于作文训练的科学指导，犹如给久旱的禾苗送来及时的甘霖。

提高写作水平，实质就是将学生的基础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由阅读者借鉴能力转化为表达创造能力的过程。如何使这一转化过程完成得迅速、可靠、科学，则需要掌握一整套简洁实用、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作文训练教程》向我们介绍了一整套由简单到复杂、由片断到完篇、由局部到整体的写作训练教程，应该说是计划周密、目的明确、程序分明、方法科学，完全符合认识规律。

该书采用的按基本文体组元，其优点是重点突出，对比鲜明，使读者在比较鉴别中便于认识、把握记叙、说明、议论等各类文体的特点和规律。讲、读、练、写各环节的有机结合，做到讲有规律、读有范例、练有重点、写有章法。从而使学生对提高作文水平有了较为切实具体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可循，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学生对作文感到难以驾驭的神秘感和望而生畏的恐惧感。

本书封面设计造型简朴，而含意深邃，作为本书象征的一片桑叶，舒展自如地在冠顶上展现着，似乎在预示，它被饥饿的蚕儿贪婪地吞食下去，即将神奇地化为缕缕银丝，从而显示出自己的作用和价值。而本书——这片启迪智慧的桑叶——一旦被渴求知识的学生阅读消化之后，也必将产生同样神奇的效果——化作通往智慧之泉的无限文思，随着生花妙笔的笔端，滔滔不绝地喷涌、倾泻……

（原载《天津书讯》1987年10月15日）

自学古代汉语的良友
——推荐《古代汉语读本练习参考答案》
秉群

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写的《古代汉语读本》(下称《读本》)是帮助爱好阅读古书的自学青年自学古文的一本好教材,但是自己做了书中所附的练习,无法检查是否正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原书的一些编者在近几年的教学中编写了《古代汉语练习参考答案》,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编者就原《读本》十二课的近二百四十道练习题按照题目的要求逐一做了答案。此外,还结合《读本》各课讲授内容及学习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作了必要的补充、分析和说明,并将《读本》上的练习题与参考答案一同印扶。它既可供《读本》的使用者参考,也可作为一个单独的习题集,供自学古代汉语者及参加高教自学考试和高考的青年系统地复习古代汉语时参考使用。

(原载 1984 年 3 月 3 日《天津青年报》)

谈症状论病因给药方——《高考作文失误例谈》

· 福元 ·

未进过高考考场的中学生，大都不清楚高考作文易生些什么毛病。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家善编著的《高考作文失误例谈》就是一本结合高考作文中的具体问题，同准备应考者谈高考失误作文的症状、病因，并开出疗救“药方”的很有实用价值的书。

《高考作文失误例谈》是作者积多年高考作文阅卷的体验，在收集、分析大量高考失误作文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它可以同以往各家出版社出版的高考优秀作文选之类互相补充，达到从正反两个方面接受经验的目的。

《高考作文失误例谈》从审题、立意、选赌、构思、表达等多方面，列举了大量高考作文失误的毛病，并从多方面提出了避免产生这些毛病的方法。

要防病、治病，首先就要明了病情。《高考作文失误例谈》正是根据这种逻辑关系，为读者摆出了一批不同类型的高考失误作文实例。有些作文的毛病，在平常的写作练习中并不太严重，但在高考作文中却多有出现。这是因为高考作文从根本上来说同日常作文虽没有什么两样，但它毕竟是根据特定的要求，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气氛下的作文，因此，考生在心理、情绪等方面就难免出现某些异样的情况。由此看来，就更应引起注意。

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多学多练的过程，平时的写作基础打得牢，高考作文的成功率就会高。此处所开的疗治作文失误的“药方”，为“患者”提供了必要的“常备良药”。

总之，《高考作文失误例谈》是一本开创性的实用图书。从高考作文失误的教训中总结写作经验，此前是不多见的。

（原载 1989 年 1 月 28 日《天津书讯》）

《全国高考优秀作文选评》
——这本书已发行八十三万册
丁介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夏家善和王淑贵合编的《全国高考优秀作文选评》截止去年已累计发行了八十三万册，目前仍然畅销不衰。该书何以如此受欢迎呢？很简单：因为它选文精当，实用价值高。

《全国高考优秀作文选评》于一九八三年第一次印行，选文自一九七九年始。当时的文章选自全国几十家报刊，都是经严格挑选，反复比较，并照顾到不同方面而选定的。以后连年修订，连年印行，反复筛选，逐步充实。这次再版，选文包括一九七九——一九八八年十年来的高考优秀作文。每年的选文虽不多，但比较精。读过此书，可以对恢复全国统一考试以来的高考作文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准备应考的中学生以及中学语文教师必能从中吸取一定的经验。如能细心总结，还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高考作文关键在于是否能认真注意收集和学习他人的经验。《全国高考优秀作文选评》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很好的范本。

（原载 1989 年 1 月 28 日《天津书讯》）

童光脱弃陈骸自标灵采——《文章学》评介 童光

最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学》一书，已和全国读者见面。这是天津写作学会在1985年所取得的一项科研成果。该书是在学会的领导和支持下，由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师范专科学校、天津技师范学院等四所大专院校的8名会员共同切磋编写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近年来，写作学科适应社会的需要日益繁荣，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写作知识普及读物、写作教材，也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这部《文章学》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理论和写作规律的学术专著之一。它的出现，无疑将对写作教学质量的提高、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部书在同类学术专著中是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它的突出特点是体例新、见解新、材料新，反映了我市写作学科在教学及科研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

《文章学》一书共分十二章，对构成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多种因素作了系列的解析和深入的研讨。第一章文资，第二章文意，第三章文情，是构成文章内容的诸因素；第四章文序，第六章文色，第七章文声，第九章文采，第十一章文体，第十二章文病，是构成文章表现形式的诸因素；第五章文境，第八章文势，第十章文品，则是内容与形式相融合而形成的因素。其中，文情、文境、文色、文声、文势、文品，是其他写作教材或写作专著尚未涉及或虽有涉及而未做深入、系统探讨的。对此《文章学》分章加以专题论述，这是很大胆、很有益的尝试。这部书以上述体例展现于读者面前，确实使人耳目一新。

以上所列十二章，虽然阐述的理论深度参差不齐，但通观全书则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那就是要有所探索、有所突破。“文章最忌百家衣”，这是写作的一条基本原则，研究写作的文章和专著也不能例外。当然，求新并非脱离研究对象的固有规律去标新立异，但既然是探讨规律，就应当向人们尚未认识或虽有认识而未得真知、全知、新知的范围和层次有所突破、有所掘进。如《文境》一章，笔者在探讨文境与诗境的异同时指出：“文境中的客观成分重一些，而诗境的主观成分重一些”，“文境创造的是实在美，而诗境创造的是空灵美。文境给人以‘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美感，诗境则给人‘水中月，镜中之花’的美感……这些都是笔者见识的独到之处。

《文章学》一书不仅见解新，而且材料也新。所谓材料新，就是笔者对于范文、例文的引用和分析，不是“老调重弹”，文例多数较新，而分析又多有“自得之见”，这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这在该书是不乏其例的。如“文情”一章，在谈到“委婉含蓄，这是我国文章表现感情的特点之一”这个问题时，笔者引述了鲁迅的散文《死火》并加以分析。写道：“《死火》把旧社会喻为冰谷，‘我’堕入冰谷中，见到了‘死火’，‘我’拾起死火，装入衣袋，死火猛烈燃烧起来，暗喻革命者宁愿在战斗中牺牲，也不在冰谷中冻灭，含蓄地抒发了誓与腐朽、黑暗势力奋战到底之情。可以说‘味在酸咸之外’，读者如嚼橄榄。”若说这样的文字是“到前人之不到，道前人之不道”，恐怕是不过分的。

据我所知，《文章学》的成书是“高速度”的，没来得及做更精细的探

索。我想，若能引进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文章现象，并使之与传统经验长短相济、水乳交融，还将会给读者以更多更新的启迪。

（原载 1986 年第 1 期《天津社联学刊》）

又一部吸取传统文论之长的广义文章学专著

· 曹祥芹 ·

· 洪珉 ·

现代文章学，作为古代文章学的历史的发展，由于对文章概念理解的不同，研究文章的角度和方法不同，自然产生了狭义和广义两类不同的文章学体系。蔺羨璧、徐江、李振起等同志编著的《文章学》是一部包容文学理论在内的广义文章学著作。全书分文资、文意、文情、文序、文境、文色、文声、文势、文术、文品、文体、文病，共十二章，不但概念新鲜凝炼，而且体系别开生面，富有民族特色。

笔者是赞成狭义文章学的，主张尽快改变文章理论落后于文学理论的反常局面。但是，我们并不反对广义文章学研究，而且认为广义文章学自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能充分借鉴文学理论来发展文章理论，能充分利用二者的共性来发挥文学对文章渗透作用。《文章学》一书广泛地吸收了诗论、词论、画论、乐论、小说论、戏剧论。如《文情》一章根据“文章不是无情物”的原理，专论情感在文章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地表述了文章与情感的相互关系：从写作看，文生于情；从阅读看，文须生情；进而从实践上阐述了文情表达的手段和方法，写得丰实，为一般文章学著作所罕见。又如《文境》一章根据诗境和文境的相通处引出新论：“境界不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所专有的美学概念。实际上，凡涉及到形象和情感的作品，不管其体裁如何，均有一个境界问题。”著者深入辨析了诗境与文境的差异，指出诗歌“不微实”，“以意胜”，追求“空灵美”；文章要“微实”，“以境胜”，追求“实在美”；进而说明创造优美文境的奥妙，这为文章和文学的分野提供了论据，这个“文章境界说”乃是文章美学赖以建立的柱石。

本书吸取传统文论之长颇为突出。传统的文章概念是广义的，著者继承晚清学者刘咸忻在《文学述林·正名》中提出的文章学体系：文章“内实”可分“事、理、情”，文章“外形”可分“次、声、色、势”，据此展开《文资》《文意》《文情》《文序》《文声》《文色》《文势》等章。《文声》《文色》两章是个独特的建树，为其他文章学著作所没有。《文势》一章把文情、文声、文色贯通一气。《文品》一章又运用了文势、文色、文术、文意、文情、文声各章的理论，使人感到全书的内在联系。《文病》一章仿章学诚的《古文十弊》来了个“今文十弊”；全书十分重视举反而例文。这表明：文章学不能限于研究好文章，还要研究病文章和坏文章。文病研究既揭示了文章写作的曲折过程，又提出了文章阅读的鉴赏任务——品高下，识优劣，这是建立文章评改学和文章批评学的一项奠基的工作。

（摘自《当代崛起的文章建筑群》一文，原载《殷都》学刊1987年第4期）

可贵的开拓与建树
——《中国文体比较学》序言
冯中一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视野的日趋开阔，研究方法的日趋多维化，有关文章学、写作学的研究，也呈现繁荣兴盛局面。继中国文章学、现代写作学的总体研究之后，又陆续涌现出文章美学、写作系统学、写作工程学、写作心理学以及文体思维论、写作文化论、写作分形论等等，都本着“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宗旨，纷纷展开理论探索，逐步进行体系建构。正是在这种加快开放与深化研究的现代文章新潮中，《中国文体比较学》应运而生了。如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它要把先进的比较方法，运用到文体规律的全方位把握与科学解释上，显然这是很有开拓、建树意义的。

刘传夫、李慧志二同志，在教坛上既是勤恳的园丁，又是善于钻研的有心人。他俩从1987年根据教学实践中的深刻体验和资料积累，就开始构思钻研文体比较学的框架和内容了。经过三、四年的反复捉摸锤炼，写成了这部关于文体研究的拾遗补缺的新著。我作为知情者和赞助者，始终关注着研究的进程，并不时读到著作中的一些章节。现在纵观全貌，寻绎机理，深感喜不自胜，愿指出以下特点，与大家共赏析：

一、着眼于理论思维，落脚于读写效应

全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系统论的整合方法，上升到理论思维层次，进行文体的纵向发展与横向渗透的动态观照。但是通读全书，没有为理论而理论的旁征博引，没有为比较而比较的牵强附会，处处扣紧应用目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抓住文章读写需要分辨清楚的主要环节，作差异和类同的具体论证。而且为了增强对文章有机整体的感知效果，精心选用了许多典型例文，经过画龙点睛式的简要提示，即可让文体的“活标本”现身说法，不用絮烦说教，却让读者获得由感觉到理解的更多颖悟。尽管史、论、评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可是读来并不玄虚费解，易收切实可信之效。

二、坚持比较的客观性与辩证性

“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真理发展规律的精辟概括，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一切事物相因相成的矛盾运动法则。本书在掌握“可比性”的原则和尺度上，即认真贯彻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方面从严掌握客观的比较，尊重历史渊源和事实联系，注重抓比较对象的本质方面和主要矛盾；一方面又努力进行辩证的比较，深入到各种文体的构思特征和运行的内在规律，仔细辨别比较对象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由于这样坚持客观性与辩证性的统一，促使宏观研究的综合概括力与微观辨析的灵活透视力，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形成文体比较理论的活的灵魂，保证了作为新学科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健旺生命力。

三、追求新型完备的体系结构

每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基于正确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经过对复杂现象的梳理概括，逐步建立起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用以解决有关学术领域内的认识问题与实践问题。本书即按照这样的目标，对文体的形成、发展和分类，进行历时性对应关系的考察；同时又对文学体裁

与非文学体裁之间的多层次区别与联系，进行共时性交融机制的赏析。通过这样较大规模的集纳组合，呈现出包罗万象、井然有序而又运动着的文体大观世界，可以提高我们掌握文体模式与写作规律的自觉性。而且拿早已成熟的学科“比较文学”来参照，本书营建的体系结构，与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释研究”所合成的优化互补倾向，有某些相似的轨迹和意图。可见这文体研究具有实事求是的功力，与先进的研究范型不谋而合，是具备达到“新型完备”标准的基础的。

以上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三方面的研究特点，说明刘传夫、李慧志同志是选择了难度较大的课题，一同来奋力攻关的；也证明为建立《中国文体比较学》所作的开拓与建树，实属难能可贵，可是也不应忘记，真理再多跨跃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著作中容或有一些地方思考欠周密，显露机械割裂的弊端。就著作整体而言，离开了多学科竞进的文化背景和新技术的复合功能，仅在文体的某些形式因素上给予凝固化、模式化的界定，企图过早地一锤定音，也是值得警惕的非科学倾向。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说：“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在研究学问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是经常的；问题涉及面越广、越复杂，就越需要多方面的专家协同攻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怎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载《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版第 10 页）这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恳切劝勉。切望本书著者和更多有志之士，为文体学研究质量的提高，为写作学科的现代化发展，虚心求教，团结协作，锐意创新！
（原载《写作》1992 年第 4 期）

在比较中把握文体发展规律 ——读《中国文体比较学》 曹洪顺

长期从事“写作”教学的刘传夫、李慧志二同志，最近出版了他们的力作——《中国文体比较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应当说，这是我国写作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一项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这里就本书内容，作一简要评介。

一、在文体的分类比较中创建了新的文体分类体系。作者首先论述了我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发展概况，同时指出了古代文体分类中的问题，接着，又分别介绍了现、当代文体分类的六种类型。这些分类法，各有长短。在这样分析比照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他们的文体分类五条原则，即：第一，既要确定分类的标准，又要选择分类的角度；第二，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体理论的分类特点，又要吸收西方文体研究中的先进成果；第三，既要看到文体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又要体现文体发展变化的特点；第四，既要看到文体之间具有相对的差别性，又要防止文体分类过细过繁；第五，既要精心选择文体的名称，又要对文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严格限定。根据这些原则，作者提出了他们的文体分类体系，即两大类十种体别的分类法。两大类是非文学类和文学类。其中非文学类有记叙、议论、说明、说记四种文体，文学类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影视、说唱六种文体。这种文体分类体系，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表现了作者独具特色的一家之说。

二、在文体的纵向比较中把握文体发展的规律。作者通过各种文体历史发展轨迹的比较，从而揭示了每一种文体的内在的规律性。限于篇幅，我们只以说记体为例来说明。

说记体是作者命名的一种文体，指的是习惯上称作应用文的那种文体。这种文体最早见于甲骨文。后来逐渐出现了“诰”“誓”“盟约文书”“书”等品式。到了春秋战国，又出现了“玺书”“移书”“上书”等品式。秦之后，说记体进一步发展。单以其中的公文分类来说，便有了上行文与下行文的区别。下行文体有制、诏、策、戒等，上行文体有章、表、奏、议等。魏晋南北朝，书信体得到发展，对说记的理论研究也开始了，出现了文论家，说记体品式大大增加。《文心雕龙》中就记载了44类说记体。隋以后至清，说记体不断发展并成熟，内容形式达到较完美的统一。这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到了近现代，说记体发展到了崭新的阶段。现今说记体，约可以分为十类一百多个品式，它广泛应用于人们处理公务和日常事务，成为一种无处不用的文章本裁。可见，社会生活的需要，是说记体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本身的提高和完善。

三、在文体的横向比较中把握各种文体的特点。通过比较，使每一种文体的特征更为突出。这里有非文学文体品式之间的比较，有文学文体各品式间的比较，还有非文学文体和文学文体之间的比较。这不但挑明了各类文体特点，而且对写作有着明显的实用的价值。

《中国文体比较学》在写作理论领域是带有开创性的，但这只是一家之说。如果他们的观点能引起写作界的讨论，尤其是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对于推动我国的写作科学的发展，将是非常有好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的面世，也是值得庆贺的。

（原载《语文函授》1992年第3期）

《六用成语词典》简介一部独具特色的成语词典

· 世甲 ·

成语，是汉语言中一枝璀灿的奇葩，也是汉语言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它的形成一般都有一个历史过程，是那些精彩的历史典故，寓意深刻的寓言，或是名人名言，经过千锤百炼逐步形成的。因此成语不仅包容着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无论写文章和说话恰当地使用成语都会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历来为人们所喜爱。

近年来有多种版本的成语词典问世，既有规模恢宏的“大全”，也有小巧玲珑的袖珍本，五光十色，不一而足。它们对于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语言学的学习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百万字的中型成语词典——《六用成语词典》，是专门为中小学生学习编纂的一部多功能、普及型成语词典，它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首先，该词典在条目的选择上突出为中小学生学习服务的宗旨。因此，凡是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成语都选收其中，同时又从浩瀚的成语海洋中，选择那些常用的，便于中小学生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成语作条目。这样既能巩固学生课堂上学过的知识，又能丰富他们的词汇，并能把课堂的学习和课下自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下学到知识和驾驭语言的本领。

其次，功能齐全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六用成语词典》是目前汉语成语词典中功能最多的一部。它除逐条加以注音外，一般又设“释义”、“源出”、“例句”、“同义（近义）”、“反义”和“辨误”六个义项。可以说每条成语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讲解和注释，以便读者从字音、字义、字形以及正反、对错等不同方面去理解该条成语的意义和掌握其正确的用法，所以它非常适合中小学生学习使用。

第三，词典的功能之一就是它的规范作用。《六用成语词典》除了对各条成语作出正确的解释外，还对成语中容易引起误读，误写或误解的字词加以辨别对比，这也是根据读者对象设计的。汉语言是极为丰富的，同时也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有多音字，还有多义字；不仅有字形、字义的不同，还有字的结构、笔顺、写法的差异。为避免误读、误写、误解的出现。该成语词典特设“辨误”一项加以强调。容易读错的字词加以比较辨别，从区别对比中加深理解和记忆。如成语“截长补短”的“长”字，笔顺容易写错，在该成语的“辨误”中则注明：“长”第一笔为撇，第二笔为横，第三笔为竖，第四笔为捺。由此可见《六用成语词典》不单是教会人们一些成语，而且确实具备多种功能，其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因此，它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小学师生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了。

（原载10月10日《天津书讯》）

请看《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阅读书目》
你知道中文系学生应该读哪些书吗？
马辑林

做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学期间，应尽可能多地吸收知识、储存学术信息，并学会用新的观点、新的治学方法去研讨问题。但古今中外的著作浩如烟海，新的知识不断涌现，这就形成大量的书籍与有限的阅读时间的矛盾，大量的新知识与原有的理解能力不适应的矛盾，于是有的学生迷惘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针对这一问题，结合学生的基础、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以及学生的科研能力，经过几年的研究，编撰了这本阅读书目。它有助于学生了解哪些是重点阅读的书籍，哪些是可以一般浏览的，哪些书籍的哪些部分是必读的，哪些可以到工作岗位后再读；了解这些，有利于学生安排学习计划以及有目的地购置图书；有利于学生初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

这本学生阅读书目，共分语言学、文学理论和美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六类。全书共列书目五百余种，对每种书的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影响作了简要介绍，有的还提醒阅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有的还指出应参看的书目。如：介绍杨伯峻的《文言语法》内容时，特别指出该书对“小品词”的论述“有别于其它语法著作”；充分肯定了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纤细和雄迈相结合的风格特征、激发人民反帝爱国精神的同时，也指出其结构较松散的缺点；对朱熹亲注的《诗集传》，客观地介绍了它对研读《诗经》的贡献和参考价值，但也提到“本书多以儒家教义解诗，宣扬‘天理人欲’说、‘天人合一’说、‘贞烈观’，把情歌斥为‘淫诗’等方面的问题；关于左拉的名作《萌芽》，介绍了这是“法国第一部以真正的产业工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突出地塑造了产业工人形象”，也指出“作品中仍流露出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介绍《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代表作时，除提到征引繁复、补充了大量史料的梁刘孝标注本外，还指出“今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和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是两种很好的校注本”。

这本工具书所列书目是经集体研究精选出来的，所作的介绍具有知识性、评析性特点；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为此书写了序，从历史经验论述了善于读书问题。它不仅对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中文专业的自学者具有指导入门的意义，对于中文系的研究生、想取得双学位的其他文科学生、中学语文教师也都有参考价值。

（原载 1986 年 11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编后记

王达津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我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历代文论选，除编有历代文论选注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讲稿外。也写了一些有关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文章。一九七七年拨乱反正之后，重新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一九七九年全国成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八二年又成立《文心雕龙》研究学会，百家争鸣，友朋切磋，不觉撰写有关古代文论文章远多于往日。由于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长达二十余年，文章又散在报刊杂志，不便研究者参考指正，因此哀集成集，略加整理，付印出版，沧海不弃涓流，想不至见笑于大方之家。

论文凡十余篇，以《文心雕龙》的研究为主，其中《试谈刘勰论风骨》等文，是迄今争论的问题。《文心雕龙的美学观》则试从美学角度去作新的探索。有些文章或被研究者引用过，或是可供争鸣，因此也都收入。八三年周振甫先生曾在他赠我的《文心雕龙注释》一书扉页上写：“读尊著论《文心》文，剖析入微，殊多卓见。……”则是长者的谦虚，愧不敢当；今天也记在这后记中，聊当鞭策，并资留念。

其它如论刘克庄、严羽的诗论、方苞的“义法”等，均为日后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工作作基础，其中也有涉及小说理论及小说评点的两篇。而《古代文论中有关形象思维的一些概念》二文，力求追源溯流，探求古代文论的概念实际含意及其发展变化，有利于探索中国文论的民族特点和古为今用，似不失为一种创举，今后仍将继续写。

有些是考据文章，如《钟嵘生卒年代考》，刘大杰先生曾有文称许，也在此提及，以表仰慕之怀。

《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根据》一文，则写作时间稍早，有不尽惬人意的地方。

论文集本拟请师友，弁以前言，指摘瑕疵，但因编辑时间匆促，只作后记，说明大旨，还请读者见谅。文章的写作，均力图取得古为今用的效果，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和学识水平的不足，便难以如愿，只能说：“虽不能及，心向往之。”

社会不断前进，学术不断更新，今后仍当继续努力古代文论研究，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出版社马光琅同志大力协助整理拙稿，在此特表谢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原载 1986 年 3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剖析入微 殊多卓见
——推荐《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
· 马辑林 ·

由于一般古文论爱好者对古文论中一些重要的概念了解得不大准确，而我国古文论的模糊性又影响到一般读者对其精神实质的把握，所以在引用古人的看法对作品进行评论、赏析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阴差阳错的现象，有的还闹出了笑话。王达津教授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有助于读者了解古文论中常见的一些术语概念、把握一些重要文学论著的基本特征。

王达津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和研究，又长于写旧体诗，对书法亦颇有研究，他写的文艺欣赏性的短文常常有新的火花迸发出来。他的这部论文集，论述的是古代的文论，而其中却潜含着教学、创作的体会，所以读来颇有亲切感。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三部分。一是对古代文论中有关形象思维的一些概念的解释，结合具体作品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二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刘勰的这部文学理论著作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著作，对我国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王达津先生对它的研究也最有工力，周振甫先生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剖析入微，殊多卓见”。这本论文集中，从《文心雕龙》中的美学观点、论如何描写自然景物、论构思、论文体等多方面进行剖析。三是对其它一些重要的诗论、词论、文论、小说论的评述，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

我国古代的文论象古代抒情诗歌一样有一种含蓄的特质，其深奥的道理是潜藏在朦胧美后面的，所以对其理解也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达津先生的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定会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原载 1985 年 10 月 15 日《天津书讯》）

介绍《意境纵横探》

· 马辑林 ·

我国古典诗、词、曲以及抒情散文、戏曲，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这种使你读后越体会越有妙趣、越看越有种说不出的美的享受的艺术力量，是西方文学所没有的。这种艺术魅力的形成，主要得之于作品的意境美。

什么是意境？意境是怎样产生的，意境和情、景是怎样的关系？意境的美学特征是什么？意境、境界、意象这些美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彼此间有无关联？……这些大家所极为感兴趣的问题，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意境纵横探》中都有深入浅出的论述，并为想进一步深入研究“意境”问题的同志，提供了信息和参考资料。

我国的文学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意境美？我国古代文艺批评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研究“意境”有关问题的？从唐代王昌龄《诗格》提出“物境”、“情境”、“意境”，司空图《诗品》提出意境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美学内涵，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强调“兴趣”，再到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境界”问题，……众多的古代诗文论者对“意境”的研究各有何贡献？《意境纵横探》中都有具体评介。

《意境纵横探》是结合着众多的具体作品对意境进行研究的，读来不但饶有趣味，而且对理解体味作品多有启发。象对李白的五绝《独坐敬亭山》的研究，就从诗的通体协调的心理环境、空间感、意味蕴藉等方面分析了全诗所传达出的情绪（九分孤高，一分惆怅），揭示了“诗人用意志克服情感，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的心理过程”，使读者“产生某种微妙的感受。”读了《意境纵横探》，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使我们的联想力活跃起来，使我们的审美感受力增强。

我国古典诗、词、曲的意境美，我国古代文艺批评家对“意境”的研究，引起了外国一些文艺批评家的浓厚兴趣。《意境纵横探》收了日本横山伊势雄的《严羽的兴趣论及其他》和美国刘若愚的《李商隐诗境面面观》两文，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意境”的理解和研究的角度。

《意境纵横探》共收十四位作者的十五篇文章，其中有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看法也不是都能被读者接受的，这正好促使读者去思考，去探索。

（原载《天津书讯》1987年第18期）

读《国风诗旨纂解》

王延海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杰作。但是，这部闪烁着绚丽光彩的文学瑰宝，自其诞生之日起，特别是汉代以后，就常常被曲解，甚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前人所谓“两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诗经原始·伐檀》），“六经皆厄于传疏，《诗》为甚”（林希逸《诗辑序》），“《诗序》害《诗》……乱《诗》本意”（朱熹《朱子语类》），说的正是此意。因此，后人读《诗经》颇有难感，清人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列举了八项读《诗》之“难明者”。其实我们今天读《诗经》感到困难的地方何止八项，在这些困难中，除了文字艰深难明，音韵异代不同之外，最难把握者当属诸诗之旨，异说纷呈，真假混淆，不唯令初学者无所适从，就是学已成者也难下定论。这是因为两千余年来，治《诗经》者写下大量论说《诗》旨的文章，今天多数读者很难较齐备地占有这些资料，特别是青年人尤难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对《诗经》这部古典名著就很难正确地做些去伪存真的工作，难以深入地开展《诗经》的综合研究，以使当前的《诗经》研究有更大的起色。郝志达主编的《国风诗旨纂解》（以下简称《纂解》）一书，在此背景下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无疑将对目前的《诗经》研究产生很好的影响，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显示出此书颇高的学术水平。

这部书的体例是先按《诗经》的原顺序排列原诗，在每首诗后面先选列历代重要的评释，然后再加“按”语，阐述编者对此诗的评断意见。此书的辑评与“按”语起着不同作用，也显示出不同特点。

一、辑评的资料很丰富，选择精严，使《纂解》具有《诗经》（主要是《国风》部分）研究史的作用和价值。

《诗经》研究虽肇始于春秋时代孔丘等的《诗》评，但真正的《诗经》研究当起于汉代。文、景之世出现了所谓今文经学的《齐诗》、《鲁诗》与《韩诗》；西汉末年又出现了古文经学的《毛诗》（秦汉间人毛亨作传，汉人毛萇传授），与三家《诗》分庭抗礼。四家注《诗》皆重《诗》的社会作用，借以发挥孔、孟思想。于是把一部纯文学的《诗经》，变成了儒家经学的附庸。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著《毛诗传笺》，以“宗《毛（传）》为主”（郑玄《六艺论》），发挥《毛诗序》的《风》、《雅》正变与“美刺”之旨，“间杂《鲁诗》”（陈奂《诗毛氏传疏序》），集汉代《诗经》研究之大成。唐初孔颖达著《毛诗正义》，严守毛、郑成说而发挥之，形成了《诗经》研究的汉学体系，使其成为官方的教科书，强化了《毛诗》的独尊地位，增强了《诗经》研究的儒家经学的色彩。因而“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代某些学者长于思辨，勇于疑古，欧阳修首先著《毛诗本义》，以攻《毛序》之误及毛、郑之失，破旧立新，开《诗经》研究之新风。于是郑樵著《诗辨妄》，猛烈抨击《诗序》；王质著《诗总闻》，力倡“去序言诗”，“别出新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柏著《诗疑》，大胆怀疑前人的《诗经》研究；朱熹著《诗集传》、《诗序辨说》等，批驳《诗序》，释《诗》杂采毛、郑，间取“三家”，于《诗》旨多有新解，虽每有“盲人扞象”（袁仁《毛诗或问》）之讥，但“阔意眇指”，仍“卓然千载之上”（王应麟《诗

考序》)，与笃守《诗序》之吕祖谦、严粲、范处义殊异，且首开以文学观点研究《诗经》之新风，集宋代《诗经》研究之大成，形成了《诗经》研究的宋学体系。元、明两代，学术空疏，虽有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朱谋玮《诗故》等少数可取之作外，其余释《诗》之作，多谨依朱《传》为说，殊少创见。唯王守仁、李贽（清代有钱谦益、周拱辰、章学诚、范家相等）等以《诗》为史，戴君恩、孙鑛和钟惺等以诗艺评《诗》，值得重视。前者有助于将《诗经》研究从经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后者继承朱熹以文学观点研究《诗经》的方法，启示后人，有助于恢复《诗经》的文学面貌。清代的《诗经》研究，在考据与训诂盛行的氛围中，表现出汉学与宋学的抗争。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编》，申毛、郑而难朱《传》；马端辰著《毛诗传笺通释》，标榜毛、郑，以《序》为宗；陈奂著《诗毛氏传疏》，详申《毛诗》本义，为清代治《毛诗》之集大成者。唯胡承珙著《毛诗后笺》，申毛而驳郑，兼取宋学之可取者，然《诗经》宋学之颓势已成。此时王夫之《诗绎》、牛运震《诗志》、姚际恒《诗经通论》与方玉润《诗经原始》及许多诗评家，皆能从诗艺的角度发掘《诗经》之微旨，以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实为《诗经》研究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皆能跳出汉、宋门户之见，指出“汉人（说《诗》）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姚际恒《诗经通论序》），因而他们“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指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方玉润《诗经原始序》），就诗论诗，独立思考，自由论说，因而新见迭出，为清代《诗经》研究之佼佼者。在“三家诗”寂寞了千余年后，清人掀起了“三家诗”的研究之风，魏源《诗古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实为集大成之作。民国以来，《诗经》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和全新的观点。林义光、黄焯、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顾颉刚、高亨、陈子展、郭沫若、余冠英等等，成就卓著。

由此可见，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始终贯穿着汉学与宋学、尊《序》与废《序》、文学与经学、文学与史学等的矛盾与斗争，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化，《诗》旨由明而暗，又由暗而明。《纂解》正是在浩瀚如海的资料之中，谨慎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选择历代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其清晰地显现出《诗经》（主要是《国风》部分）研究史的轮廓。如《关雎》一诗，《纂解》选取《毛序》、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所谓“后妃之德”说，来反映《毛序》派的汉学观点；再选录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所谓“刺康王宴起”说，来反映“三家诗”的观点。接下来选录欧阳修《毛诗本义》、王质《诗总闻》、朱熹《诗集传》、《诗序辨说》的材料，既反映了宋人怀颖《毛序》，斥《毛序》“已失其（《诗经》）旨”（《诗序辨说》）的观点，又把《毛序》之“后妃”坐实为“太姒”、“文王”，真所谓“阳违序而阴从之”，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姚际恒《诗经通论》），反映了《诗经》之宋学体系的礼义教化的本质。《纂解》又选录姚际恒《诗经通论》的观点，批驳《毛序》“后妃之德”说的“不可通”，批评《诗集传》指实“太姒”的作法，提出此诗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的观点。再录崔述《读风偶识》一段：“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此较姚说又前进一步。接着又引牛运震《诗志》一段：“只‘窈窕淑女’二语已足，便极大蕴藉，不必更加奉神灵、正纲纪等语。”此较姚、崔之说再进一步。又引方玉润《诗经原始》之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此

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真是自由论诗，几乎脱尽汉、宋学之思想藩篱，显示出清人《诗经》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后引今人所谓民间情歌说以终篇，恢复了《关雎》诗的本来面目。《纂解》的多数诗篇，如《氓》、《鸛羽》、《月出》、《七月》、《东山》、《鸛鸣》等皆能如此。

编者将这些极有代表性的论点材料编录一处，为欣赏和研究《诗》旨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省却了诸多的翻检之劳和难以找到材料的苦恼。编者所展示的《诗经》研究史的轮廓，更为那些面对纷然无序的大量材料的研究者们，提供了《诗经》研究的清晰线索，为其进一步独立研究开启了门户，指示了方向。我们从这些材料的精选与显示学术水平的安排上，完全可看出编者的良苦之心，反映了编者在《诗经》研究方面的渊博学识和独到的见解。

二、“按”语中求实的治学态度及富有创见的新成果。

《纂解》中每首诗的“按”语是显示编者学术观点的重要部分。综观全书“按”语，首先可看到编者的治学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他们面对真假难辨，良莠杂糅，纷然迷濛的前人资料，不是主观武断地下结论，也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欲求新而哗众取宠，而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与体味”（《纂解·小戎》按语）原诗，对历代评论家的观点和《诗经》原诗“作具体分析”（同上），发掘诗旨，恢复其本来面貌，众所周知，在《诗经》研究中，无论汉学体系，抑或宋学体系，常犯的错误就是违背诗歌艺术的规律，而“以诗附史”，强作“美刺”之说，歪曲《诗》旨，把《诗经》研究纳入宣扬封建礼教的政治轨道。如在《郑风》中的十六、七首情诗中，《毛传》用以“附史”的就有《将仲子》等七首之多，而《毛诗序》与《郑笺》进一步发挥这一“附史”的恶作剧，把《毛传》“仲子，祭仲也”的话，坐实到“《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痘忍以致大乱焉。”（《毛诗序》）《郑笺》则说：“祭仲骤谏，庄公不能用其言。故请固距之。‘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这就给这首轻快的民间情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宣传与礼教的色彩。《纂解》编者视“这种倾向是读《诗》的一大障碍”，是“解诗之大忌”，其本质是“以诗证史，并不把《诗》作为诗来读”（《纂解·唐风·采芣》按语，因而必然要“落入封建伦常教化的窠臼”（《纂解·将仲子》按语），“固不足取”（《纂解·扬之水》按语）。所以在每首诗的“按”语中，编者皆极为“辨白”这种与“史实绝无关系”的附会，坚决反对这种随心所欲的“臆想”，辨驳精辟，说服力极强。但是，编者本着求实的精神，又不笼统地反对“以史证诗”，且说：“对《国风》诗旨的理解与认识，不能一概排斥‘以史证诗’的观点，有些诗确实包含诗人对某些历史人物与史实的美刺观，但这种美刺观必须是诗歌提供了某些史实的线索，此点应该成为理解诗旨的一条重要原则。”（《纂解·唐风·无衣》按语）在解释具体诗篇时，编者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来评断诗旨的。如释《硕人》诗，前人（如何楷、姚际恒、方玉润）据诗中“齐侯之子”数语，及《左传·隐公三年》的记载，定此诗为“卫人颂庄姜美而能贤”（方玉润《诗经原始》）之作。编者认为这种“以史证诗”的结论正确，便肯定其说“至为精当”（《纂解·硕人》按语）。释《猗嗟》诗时，编者赞成今人“赞美鲁庄公”的说法，且引《左传》以证其是，直接“以史证诗”，因为这诗里确实提供了某些史实的线索。至于释《陈风·株林》、《齐风·南山》、《载驱》、《敝笱》等诗，皆如此。编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做法，是一种对待和整理文学遗产的科学态度，是合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值得充分肯定。

在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时，编者也采取了严格的求实态度，对任何作者及其著述皆不抱成见，不先入为是，而是积极充分地吸取其正确或近是的成绩，剔除其糟粕。就是对人们早已猛烈攻击的《毛传》、《毛诗序》及朱熹《诗集传》的观点，编者照样取其所长，扬其所短，并不一概抛弃。如释《陈风·东门之池》、《月出》等诗，编者赞成朱熹所谓“男女会遇”及“男女相悦”之词。而释《邶风·柏舟》则疑朱说；释《邶风·日月》、《终风》则批驳朱说。释《邶风·简兮》、《曹风·蜉蝣》则采取部分肯定朱说，又部分否定朱说的作法。对于今人的说法，无论著者在学术界的地位如何，一概采取是者从而非者正之的态度。有时无法明确地指明诗旨，则采取“阙如”或“存疑”的作法，或者两说（有时多种说法）并存，令读者自行判断是非。如释《王风·兔爰》则两存其说；释《唐风·无衣》则说：“《无衣》似诗人倾诉友情之深的一首诗。今人解此诗大都不囿于古人附会史实之说，那是对的。但对这样短的，意思不甚明了的诗过于坐实，恐怕也有主观臆断之嫌。它究竟是‘因物思人’，怀念故人的诗，还是‘感谢别人赠衣的答谢辞’，或者‘青年男女恋爱期中亲昵之词’，实难确解，所以诸说可并存。”这种尊重事实和真理，愿意“给读者一点欣赏的空间和余地”（《纂解·晨风》按语）的态度，真是难能可贵的。

《诗经》的内容“博大宏远”（张表臣《珊瑚沟诗话》），“牢笼天地，囊括古今”（陈第《读诗拙言》）。它是商周社会（主要是周代）的一部形象史，生动地反映了彼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的历史演变；也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俗民情。因此要真正发掘《诗》旨，必须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与文化史、以及诗学与美学等的不同角度，对《诗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在“按”语中，编者就十分注意用这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剖析诗旨，力复《诗经》之原貌，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诗经》的年轻同志，指明了欣赏的原则和正确的研究方向。如编者喜用民俗学解诗，特别在评论一些情诗（如《褰裳》、《溱洧》、《绸缪》和《宛丘》、《东门之枌》、《山有扶苏》）时，总是非常注意这些诗同当时民风民俗的关系，同当时婚制的关系，把诗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民俗环境中去把握和认识它。在释《山有扶苏》时，编者力驳“刺忽”、“刺郑庄公”之附会史实的谬误，同时以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汉书·地理志》）的民俗背景为依据，分析此诗的内容，得出这诗是“郑国青年男女，在山歌互答之时，女子对男子的俏骂戏谑之歌”的结论，并具体分析道：“吟诵此诗，可以想见一个（或一群）热情泼辣的少女站在山这边，对着山那边的一个（或一群）调皮的小伙子脆声笑骂。从骂语看，很可能是小伙子先出言不逊，惹怒了姑娘，姑娘才以‘狂’、‘佼’还报之。每章前两句是触目起兴，无甚深意，表现了山歌自然活泼，即兴创作的特点。”这一民俗与山歌的结论颇为新颖，而且分析入情合理，又很带文学色彩，显示了编者欣赏古诗的深邃目光与独特的审美情趣，亦说明运用民俗学观点释《诗》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编者能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运用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坚持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原则，对《诗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因而常能发前人未发之高论，给《诗经》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显示出编者高深的学术造诣。如释《式微》诗，前人多袭《毛诗序》所谓大臣劝黎侯归来之说，

表现出附会史实之谬；今人多释为小官吏倾吐不平的怨歌，或释为奴隶的怨诗，皆不无道理。但《纂解》编者却另辟蹊径，就诗言诗，“细味全诗”，着重体会诗的意境，不作“索然无味”的坐实之解，得出了“这是一首情怨诗”的全新结论。编者以同样的方法释《旄丘》为“女子思恋情人”之诗，一反前人与今人之说。释《二子乘舟》为“父母挂念乘舟远行之子”的怀人诗，解《蟋蟀》为“士大夫想要寻乐，又不敢过于放怀的一首诗”，“此诗表现了统治阶级下层官吏安分守礼，不敢越轨的思想”，驳斥了以往学者的诸多论点。总之，《纂解》按语中的此类新见颇多，且分析中肯，言之成理，又很有些诗人解诗的味道。虽然有的新解尚可以商榷，但编者的求新求是的作法和可喜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称赞。

综观《纂解》一书，成绩赫然可观。它既是一部精选前贤成果的翔实的资料之书，具有古籍专题整理的重要价值；又是一部综合研究《诗经》，新意迭出，具有特色的学术专著。它既能为读者提供大量宝贵的研究资料，又能为读者拨除迷雾，指示正确的研究方向，很值得一读。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一部红学研究的最新资料
《红楼梦资料汇编》出版
马辑林

《红楼梦》是一部影响极为深远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的出现不仅使“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也使戏剧、曲艺、舞蹈、音乐的题材得到了新的开拓。清代京都流传的竹枝词就讲“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它的艺术价值，它所包含的巨大社会意义，两百年来一直被学者们研究着。研究《红楼梦》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为“红学”。

为了给中外“红学”家的研究提供方便，为了减少新涉足“红学”者寻觅资料之劳苦，朱一玄先生将其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红楼梦》的资料，经过细核原文，悉心精选，整理成册交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贡献给学术界。

本书共计七十七万字，所收资料丰富翔实。较之已见同类的性质的资料集，多有新增者，如收入了清宫档案中的有关材料，收入了甲戌、乙卯、庚辰、戚序本四种脂砚斋评本的评语及王希廉、姚燮、陈其泰、哈斯宝等四种评本的回评。所收资料，主要是康熙年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也收入部分今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书后还附有周汝昌先生的《荣国府院宇示意图》和徐恭时先生的《红楼梦大观园平面示意新图》。

为了便于研究者查找翻检，本书资料均按“作者”、“版本”、“评论”、“影响”分类编辑。“作者编”，辑录了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并附有高鹗生平资料三十九条。“版本编”，辑录了《红楼梦》版本方面的资料，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节录引用了孙楷第、一粟二先生的研究成果。《评论篇》，辑录了《红楼梦》问世以来诸如戚蓼生、梦觉主人、张新之、鸳湖月痴子、俞樾、梁启超、王国维、刘鹗、林纾、蔡元培、胡适、鲁迅等近六十家的评论。“影响编”辑录了《红楼梦》对小说、戏曲影响的资料，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节录引用了孙楷第、一粟、陶君起三先生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后红楼梦》《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红楼残梦》《林黛玉笔记》《红楼二尤》等几十部受《红楼梦》影响的小说；介绍了《葬花》《十二钗传奇》《乞梅》《刘姥姥探亲》《宝玉探晴雯》《宝玉哭灵》等昆曲、子弟书清代的一种曲艺）、大鼓、马头调、坠子、秦腔，扬州调、越剧、四川清音、京剧等几十种戏曲曲艺艺术受《红楼梦》影响产生的剧目、段子的资料。

为了便于研究者查核原文，本书对每条资料都注明了作者、卷数以及所根据的版本。另外，对原资料中的错字或衍文，编者均一一加以指出；有的资料，需注释的，编者亦在该条资料之后加了按语。

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将对《红楼梦》的研究、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原载 1986 年 6 月 15 日《天津书讯》）

《金瓶梅资料汇编》问世

· 马辑林 ·

朱一玄先生，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有关我国古代小说的资料。现已出版了《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水浒传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以上与刘毓忱合编）和《红楼梦资料汇编》。即将出版的有《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朱先生新编就的《金瓶梅资料汇编》最近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到一个转变期的标志。”这部在小说发展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品，由于尚有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更引起了小说史家、文艺理论家、作家们的重视。它的题材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但有没有受其他作品如一些宋元话本的影响？作者究竟是谁（有兰陵笑笑生、李开先、王世贞、李贽、赵南星、贾三近等十数种说法）？小说中多有秽笔，这又产生了它是不是一部淫书之争，又引出描写上是不是自然主义的问题。它对后来的章回小说，特别是对《红楼梦》的影响，仍值得深入研究；它的艺术成就和缺陷仍需进一步总结。朱一玄先生正是为了给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们提供丰富的资料而编了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金瓶梅资料汇编》。

本书所辑资料分为五编。“本事”，辑录有《金瓶梅》从过去小说中采取和借鉴的资料，其中有洪迈《夷坚志》中的故事节录，有话本小说、《水浒传》的有关故事情节等。“作者编”辑录了有关探讨《金瓶梅》作者问题的资料，如清人王晁的《金瓶梅考证》，今人朱星的《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吴晓玲的《金瓶梅作者新考——试解四百年一个谜》等。“版本编”辑录了有关版本方面的资料，如明人袁宏道的《与董思白书》、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清人蒋敦良的《绘图真本金瓶梅序》、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评论编”，辑录了《金瓶梅》问世以后各家的评论，诸如明人欣欣子为《金瓶梅词话》写的序、季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清人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江顺怡的《读红楼梦杂记》等。“影响编”，辑录了对小说的影响（《金瓶梅》续书的产生和对《红楼梦》等小说的影响）、对戏曲影响方面的资料。“附录编”，收有朱一玄先生的《金瓶梅词话人物表》、《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以及清人张竹坡所列的西门庆房屋布局等。

《金瓶梅资料汇编》除资料丰富，分类编辑，容易查找外，还有以下特点：每条资料，均查对过原书，并注明著者、卷数和所依据的版本；所收资料，以“五四”以前者为主，当代考证文章，亦兼选入；有的资料后，附有朱一玄先生简明的注释评析。

郑振铎先生曾说：“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们都是经过了“摸索”的境界，吃尽了苦的，故对于“版本”、“目录”的编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正是为了减少他人摸索之苦，使研究者免于搜寻资料奔波之劳，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朱一玄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在浩如烟海的著作、笔记、书信、日记中，寻觅有关资料，钩沉辑佚，校核原文，精心编录，默默地做出贡献。

（原载 1986 年 7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小说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推荐《唐前志怪小说史》

· 晋沈人 ·

我国古代的文言小说，是和白话小说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一个小说谱系。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到六朝小说到唐宋传奇再到明清文言小说，这种主要由文人写作的小说门类，以其历时之久、数量之巨、内容之富、色彩之丽而为世人所瞩目，在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

六朝小说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和繁荣。其品种大致可分为志怪、志人和历史小说三类，其中志怪小说最为重要。这类以记载神鬼怪异之事为特征的小说充满丰富的幻想和想象，形象感强，情节生动，读来最富意趣。其中大量的神话、传说广泛流行于民间，思想性和现实感较强，是志怪小说的精华。六朝志怪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唐代传奇，至清又出现了《聊斋志异》那样的杰作，其影响是深远巨大的。而且白话小说诸如宋元话本、明清的神魔小说，乃至戏曲等，也不断从志怪和传奇中汲取幻想形式、幻想情节、幻想题材和素材。因此研究志怪小说，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和演变，有极重要的意义。

古人对志怪小说的研究只限于对个别作品的考证、整理，作过一些支离破碎的评论。在现代，第一个给以重视的是鲁迅先生。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有关章节和《古小说钩沉》，对六朝小说的研究和整理，起着拓荒的重要作用，至今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解放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得不多，专著和论文很少，可称者只有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近几年较有进展，出了好几种普及性的作品选注和学术性较强的校注本，以及一两书书目。但对六朝小说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门研究，似乎涉足者还很少。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著），可以说弥补了小说史研究中的这一不足。这本书以唐前志怪小说为研究对象，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深入探讨了志怪小说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轨迹，探讨了它和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的关系，对它的发展阶段和品种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划分，在充分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对现存和大量的散佚作品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中肯的评论。著者的看法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不拘泥于旧说，自出机杼而多有新见。总之，著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比较准确清晰地概括和反映出唐前志怪的发展面貌，建立起自己关于唐前志怪的完整体系。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价值的成果。

一些著名小说研究专家曾看过这部书的原稿，他们的看法是资料丰富，自张一军，是一部杰作。刘叶秋先生欣然为它作序。因此，我们把它推荐给小说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及中国古代小说爱好者。

（原载 1985 年 5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唐前志怪小说史》评介

· 王国良 ·

一

南开大学李剑国先生,前后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写成《唐前志怪小说史》,并於一九八四年五月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印行问世。该书除了前言——《志怪叙略》之外,共分:《志怪小说的起源》、《战国志怪小说和准志怪小说》、《两汉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志怪繁荣和进步的原因及此期志怪的时代蕴含》、《魏晋志怪小说》、《南朝志怪小说》、《北朝志怪小说》、《朝代不明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等八章,末附主要引用與参考书目。全书厚达四百八十七页,三十余万言,洋洋大观,诚为目前讨论唐代以前志怪小说有关问题的钜著,值得吾人重视。另外,李氏编有《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配合《小说史》并行,也颇有参考价值。

二

李氏书将唐代以前志怪小说的发展,区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并把作品概括成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杂记体三种类型。经过这样分期并归类处理,以两条主线纵横交错,提纲挈领,条理分明,不但显示了志怪小说形成的过程,也使纷纭复杂的作品,各成系统。这是著者在整体结构上用心安排之处。

做为一部《史》书,在探源方面,当然不可忽略。因此,李氏用了两章又一节的篇幅,探讨志怪小说的起源及形成、两汉志怪和魏晋南北朝志怪发展的背景。在析流方面,则按时代先后顺序,再配合各类代表作品,夹叙夹议交代出来。全书在研究方法上,也许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但唐前志怪小说的发展史,经由著者原原本本道来,显然系统分明,而且详实可读,实在难得。

三

《小说史》除开系统分明、有条不紊的特色不谈,至少还有以下几个优点。

1. 资料丰富

首先,著者所探讨的作品,大约超过一百一十种。其中,有不少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学者不太注意的。譬如:《汲冢琐语》、《括地图》、《外国图》、《穷怪录》之类,或者有辑本,或者资料散见各书。著者都仔细加以考订分析,成绩颇为可观。又如:《徐偃王志》、《夏鼎志》、《怪异志》、《异记》、《神鬼传》、《异类传》等,或史传著录,或旧籍转载,或类书引用,著者都一一勾稽,列入讨论,用功之勤,令人赞佩。

至於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著者则表现出博览兼采而不浮滥的正确态度。昔人之善谈志怪书者,首推明代胡应麟。其《少室山房笔丛》,虽未能全面而有系统地讨论历朝志怪小说,但断篇零章,每多胜义。李氏均经仔细辨析,再加以援引发挥。其他,像罗烨《醉翁谈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徐显《稗史集传》、陶宗义《辍耕录》、杨慎《丹铅总录》、俞正燮《癸巳类稿》、俞樾《茶香室丛抄》等笔记杂考之类，以及《西阳杂俎》、《类说》、《夷坚志》、《说郛》、《古今说海》、《古今小说》、《重校说郛》、《汉唐地理书钞》等书的序文，也都尽量采择利用。近代学者的著作，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论学杂著》、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袁珂《山海经校注》、《古神话选释》、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小说》、“历代笔记概述”、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范宁“博物志校证”、汪绍楹《搜神记》校注、《搜神后记》校注、齐治平《拾遗记》校注等专书，左益寰《阴阳五行学的先驱者伯阳父》、闻一多《神仙考》、朱芳圃《西王母考》、葛兆光《干宝事迹材料稽录》、范宁《八卷本搜神记考辨》、《关于搜神记》、赵景深《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沈》等论文，李氏或申或驳，也都能取精用宏，增益论证的说服力。

2. 考释详悉

(1)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介绍古今纪异之祖——《汲冢琐语》，著者引颜之推《家训》，证明隋代流传的《琐语》有秦朝事属入；继引隋、唐《经籍志》、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说明《琐语》一书由唐到宋逐渐散佚的过程，清楚明白。

(2) 第三章第二节，讨论《括地图》编撰的年代，著者利用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序》、张华《博物志》引文，考定该书乃汉人所撰，证据坚强。

(3) 第三章第四节，考证西王母传说的演化，李氏采用了《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庄子》、《荀子》、《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灵患》、《易林》、《博物志》、《大人赋》、《甘泉赋》及纬书《尚书帝命验》、《春秋纬》、《黄帝出军决》等二十余种文献资料，旁征博引，有考有释，为先秦到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传说，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

(4) 第五章第一节，探讨《列异传》所载的《鹄奔亭》公案故事，著者根据应劭《风俗通义》、谢承《后汉书》、《搜神记》、《水经注》、《冤魂志》等书所载材料，考述案中人物及故事流传的情况，颇为详明。

(5) 第五章第二节，考论于宝《搜神记》，从页三四到页三八，分别探索盘弧与虫马神话，也是广泛征引各种相关资料，叙述简要而精到。

(6) 第六章第五节，讨论吴均《续齐谐记》，顺便将古代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做了比较完整的考察。

(7) 第七章第二节，谈颜之推《冤魂志》，著者将该书的卷本、名称改易、通行版本等问题，详加考证说明，平实可取。

3. 立论精到

(1) 原书第四章第二节，探讨魏晋南北朝志怪繁荣进步的原因，特别标举《谈风的盛行》一项。李氏谓文人剧谈风气的流行，使得各种传说和故事快速传播，同时也造成它们在某一范围内的集中，然后被结集成书。著者并引了《魏略》、《抱朴子》、《世说新语》、《启颜录》等做为印证，意见新鲜可喜。

(2) 第四章第四节，考订《拾遗记》中所提到的西施其人其事，多方面征引各种古籍资料，证明了西施乃古来传说中的美女，并非真实人物。

(3) 第七章第三节，详细讨论《穷怪录》的名称，并分析其内容及艺术

特色，肯定它是志怪小说日趋成熟，过渡到唐传奇的一部作品，发掘隐微，道前人所未道，值得喝采！

四

在这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本完美无缺点的学术著作。李氏书牵涉到的范围甚广，涵盖的时间又长，当然不可能面面周到。以下仅就个人所见，对某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以供著者及同好参考。

1. 标准问题

所谓标准，系指列为志怪小说的原则而言。

(1) 李氏将所有的唐前仙传，如：《列仙传》、《神仙传》、《仙异传》、《晋仙传》、《说仙传》、《集仙传》、《洞仙传》、《桂阳列仙传》等，一概视为志怪小说，既与历代学者的看法有出入，也与近代研究古小说的大多数学者观点不同。特别像无名氏《洞仙传》，主要在叙述成仙的方法、成仙的品级，以及一些法术修练和法术变化的传说，而小说的成份甚低（参考严一萍辑《道教研究资料》第一辑，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六年；李丰树撰《洞仙传之著成及其内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一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八月），特别值得重新考虑。

(2) 一些仅见古籍、类书偶然提到，不能确定其名称者，如：无名氏《神仙传》、《祥异记》、《异类传》、《物异志》、《虚异志》、《祀应记》、《异苑拾遗》、《后幽明录》等，也应存疑。李书页一九七考订无名氏《神仙传》，主要的根据是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佚文引《神仙传》片断，还有张华《博物志》也引用数条。其实沃焦、帛和是三国时代人，东陵圣母则师事西晋上虞令刘纲。应劭卒于汉献帝建安年间，如何预先引用这些？相信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所辑的佚文有问题。而且从《太平御览》、郑樵《通志》《氏族略》的引文，以及通行本《神仙传》，都可以证明三人皆见于葛洪《神仙传》。至於张华《博物志》卷四所引《松柏脂入地》一则，《太平御览》卷九八九引，乃出自《仙传》；《博物志》卷九《说上据辰尾为宿》一则，出自曹植《辩道论》，所谓《神仙传》云云，恐怕是泛称而非专名。李书页四二 考证《祥异记》，既为《太平广记》书前的引用书目所惑，又误信鲁迅《古小说钩沈》根据《太平广记》所辑佚文，遂不敢相信《法苑珠林》。然而《广记》卷一九《释慧进》一则，依严一萍《太平广记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一年）叶四八，引孙潜校宋本作《出 冥祥记》，卷一三一《元稚宗》，《出 祥异记》照理来说，恐怕也是《冥祥记》之误。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南朝时期，并没有《祥异记》这本书存在。

2. 时代问题

这是指历来有争论的某些志怪小说的定位，也指可能是后人巧立名目的作品被误收。

(1) 《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书，宋代以后的学者大抵主张系两晋南北朝人所伪托，现代学者也有详细的考证，例如：拙撰《神异经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李丰树撰《十洲传说的形成及其衍变》（《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六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汉武内传的著成及其流传》（《幼狮学志》十七卷二期，一九八二年），小南一郎撰《《汉武帝内传》

の成立》（上）、（下）（京都《东方学报》第四十八册，一九七五年，第五十三册，一九八一年），确定这批题为汉代东方朔、郭宪、班固等人所撰书籍，都是六朝人伪托。

（2）有些作品乃明代人杂凑，巧立名目者，如：《西王母传》、《太清记》之类，皆后人伪托，李氏已有考证，惜断制不严，依违其间，令人不解。

3. 资料引证问题

（1）李书页六十、七十六、一五，引用《周体》，说明周代中央政府设六官，其下有负责地理、历史档案资料的专门机构。《周体》经近代学者研究，乃战国时人据当时及前代之职官，再加上个人之理想，撰成一部政府组织法，不宜轻信。

（2）页二五二，讨论《列异传》《蒋济亡儿》一事，谓《搜神记》亦采之，页三五二提到《陶渊明集》有《桃花源记》，而《搜神后记》也有这个故事。李氏乃根据通行本而言，不确。详见汪绍楹《搜神记》校注页一九一，《搜神后记》校注页五的考证。

（3）页二八二，谈《搜神记》的流传。李氏云：明世《文渊阁书目》道书类著录《搜神记》一部一册，嘉靖时高儒《百川书志》神仙类著录二卷，称干实编；周弘祖《古今书刻》杂书类亦有目，隆、万间《赵定宇书目》有《搜神记》一本，当均为残卷。明《续道藏》罗懋登《引搜神记首》云干实《搜神记》善本已毁，虽闽刻间有之，而存什一于千百。说明了明世传都残缺不全。按：自明《文渊阁书目》以下，各家所著录的《搜神记》，大抵归入神仙类，颇疑即元、明时期民间盛行的宗教通俗书籍《搜神广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搜神记》（《续道藏》本）之类。因此，从书志的资料，实在无法证明干氏书在明代仍有残本流传。

4. 推论问题

（1）李书页二八八，讨论明刻干实《搜神记》的辑录过程。著者谓今本四百六十条，不见诸书征引者多达一百五十七条。其中一部分系误辑他书，但若说全都系误辑，无论如何讲不通，若说是滥取他文来冒充本书，也不近情理。胡应麟一代文坛巨子，不会做这种傻事。合理的解释是胡氏手中有《搜神记》残本。按：胡氏辑《搜神记》事，见其所撰《甲乙剩言》及姚士粦《见只编》，都说是从《法苑珠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类书中抄出，绝未提及《搜神记》残本。又胡震亨等人辑刻《秘册汇函》，开始於万历三十一年，而胡应麟卒于三十年夏天，他所辑成的《搜神记》，会不会被出版界的朋友动了手脚，实在不敢说。当然，问题的症结还是上文讨论过的，明代真有干宝《搜神记》残本传世吗？

（2）页三二二，著者谓《西王母传》语及《穆天子传》和《汉武内传》，又述茅盈、王褒、张道陵事而未涉及魏晋神仙道徒，似去晋初未远。王嘉《拾遗记》卷一《少昊篇》云：“少昊以主西方，一号金天氏，亦曰金穷氏，……未代为龙丘氏，出班固《艺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异传》。”疑此《西王母神异传》即《西王母传》，但传中无蛇丘氏，或有阙耳。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则《西王母传》出于晋世无疑。按：“西王母传”的名称，乃明末陶珽重编《说郭》所题，原来就采自《太平广记》卷五十六所引杜光庭《集仙录》不必与《西王母神异传》相提并论。至于杜氏《墉城集仙录》所采旧籍，究竟出自何代？以目前文献残阙的情况而论，实在不宜妄下断语。

（3）页三七二，著者云《隋志》著录《异苑》十卷，《唐志》以下宋元

书目均无著录，仅《御览》、《广记》、《事类赋注》、《岁时广记》等书有引。南宋《类说》、元末《说郛》收书极多，然均无《异苑》。明万历《赵定宇书目》中《稗统续编》却有《异苑》之目。《稗统》是一部《类说》、《说郛》性质的笔记丛书，书已失传，编者与成书年代不详。据此，《异苑》并未失传，只是极少流传，为世人罕见耳。按：《稗统续编》既是摘录性质的笔记丛书，自可以从古注、类书里摘抄《异苑》材料再予以标目，如陶宗仪《说郛》的编辑方式，这样实在无法证明原书具在。

5. 考证问题

(1) 页一七二，著者谓“汉武故事”始见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未言撰人为谁。《三辅黄图》卷五始有征引，称班固《汉武故事》。《三辅黄图》乃东汉《黄图》之增订本，最早见于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六朝人又有所增益，可知至迟在六朝已有班固作《汉武故事》的说法。按：《三辅黄图》一书的增补流传情况颇复杂，近人陈直著有《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推定今本为中唐以后人所作，注文更在稍后。因此，六朝时期是否已有班固撰《汉武故事》的说法，恐怕要重新考虑。

(2) 页一七三，李氏以为传世本《汉武故事》明谓：“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有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元延乃汉成帝年号，既称“今上”，则为成帝时人作，不得出自班固及王俭手。按：举出“今上”一条证据，推定《汉武故事》乃成帝时人作，颇具说服力。但《故事》又记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中流作《秋风辞》，并且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云云。徐震堃编《汉魏六朝小说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页二四，《汉武故事》注八五云：“当涂高，指魏。‘魏’字的意义是关门（宫门），阙门当着大路，很高的。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魏、晋以后人写的。”又刘文忠《汉武故事写作时代新考》（《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四年第二辑），专从《六七之厄》及《代汉者当涂高》两句讖语着手，推测《汉武故事》一书乃汉献帝建安末年，由亲曹派文人撰成。以上两种相矛盾抵触的看法，似乎说明了《汉武故事》的成书年代应再做更细密的考察才行。

(3) 页二六三，《中兴馆阁书目》云《博物志》有周日用、卢氏注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皆著录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和卢氏注六卷，而《崇文总目》无此著录，说明周、卢可能是南北宋之间人。按：《太平御览》卷九四九第八叶卷九五第四叶并引《博物志》及卢氏注，则卢氏应是北宋初叶以前人才对。

五

经过以上大略的考察，我们发现要写一部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史，实在并不简单。首先，由於要讨论的作品数量太多，文献资料又有所欠缺，任何人在短期内都无法一一加以仔细考证，并获致令人满意的结果。“点”的工作既不够坚实，线、面的联结必定会产生问题。因此，目前所建立的体系，都只能算是暂时性的。若有新的研究成果，系统也许会随时跟着修正。急着拿暂时性的体系去诠释个别的作品，有时实在不大妥当。其次，国内外的学者对志怪小说有兴趣的不在少数，研究成果散见各处出版的书刊杂志，想要

全盘掌握资讯，做到滴水不漏，实非易事。但是偶然的疏忽，往往会造成事倍功半的后果。譬如李氏在中国大陆，因为看不到日本牧田谛亮教授所撰《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の研究》（京都平乐书店，一九七一年），所以对谢敷《观世音应验》、傅亮《观世音应验记》、张演《绩观世音应验记》、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等书的探索，就显得吃力不讨好，十分可惜。因此，尽量搜集相关研究论著，对个别作品加以详尽考订，再重新排列组合，写成一部完整的古代志怪小说史，实在是必经之路。截至目前为止，李氏《唐前志怪小说史》，是最具参考价值的著述之一，能否进一步的突破，端在个人日后的努力。我们愿拭目以待，并乐观其成。

（选自 1988 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小说戏曲研究第一辑》；收入本书时编者有删改）

披沙拣金探珠拾贝
——读《中国古小说艺术论发微》
· 罗德荣 ·

陈洪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以下简称《发微》），最近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剖析中国小说评点中有关艺术论命题的专著。在小说理论尚待深入发掘的情况下，该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选题精当，是《发微》的显著特色。全书分绪论、内编、外编三部分。内编为全书主体，选小说评点中有关艺术论命题凡二十二条。数量虽不算多，但却涉及小说艺术特征、作家创作心理、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情节结构布局等诸多方面的理论问题。这些选题，就总体而言，已构成古代小说艺术论较为完整的体系；就部分言，亦可显示历代有影响的评点家对小说艺术的理论贡献。绪论部分爬罗剔抉，梳理中国小说评点的盛衰流变，评述历代评点家的建树与地位。这两个部分，一横向展开管窥蠡测，一纵向伸展探源逐流，合为一体，便就是中国小说艺术理论的历史状况，勾画出较为清晰的面貌。外编部分，收录作者论文两篇，也为全书增色不少。

胸有全豹，宏观把握，微观入手，是《发微》的又一重要特色。小说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有形式，主要以圈点、眉批、夹批、回评、总评等方式见诸原著，因而议论比较零散。受这一限制，该书结构，也主要采取对有代表性的命题进行阐发的形式。为了避免支离之感，全书除绪论部分做总体评述外，每论一题，也大都能在阐明本题内涵的基础上，进而探寻此一命题与传统诗文论的联系、对其后评点家的影响以及小说理论与创作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同步关系。如此，凡所论之评点家，他们的建树何在、地位及影响如何，便自然一目了然了；同时，有关命题的论述，也因此而出理论的深度与广度。

《发微》的第三个重要特色，是立论准确新颖，为文视野开阔。我国古代小说评点，受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其理论范畴，也积淀着传统审美意识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问题的表述，重了悟而不重论证，评论方式也喜用形象的语言。如化工有物、囫囵不鲜、背面敷粉、弄引獭尾、鸾胶续弦等等。这种对对象作概括性形象化的把握方式，与西方文论重思辨、重逻辑、重精确描述，恰成鲜明的对比，这就给理论上的阐发带来很大困难。《发微》的作者，显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论述中，一般不用西方文论概念术语简单套用，而是从材料出发，进行恰如其分的科学概括；必须使用时，则取审慎态度，严格把握其分寸与差异，如“典型人物”、“圆形人物”、“象征”等语，即如是。同时，另一方面，《发微》又十分注意吸收和运用近现代新的理论和方法去剖析古代艺术论的命题，如大量采用心理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样，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开放式研究的创新精神结合起来，便自然形成该书立论准确、新颖，为文视野开阔的突出特点。

此外，《发微》一书，语言平易流畅，议论深入浅出，选题既看重有关小说创作基本规律的纲领性论述，亦不忽略有关技法技巧的具体分析；研究问题既着力于思辨性的理论阐发，又擅长于结合具体而微的艺术分析说明事理，因而可以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

(原载 1987 年 12 月 16 日《天津日报》)

深衷浅貌 以古为新
——介绍《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
· 秋华 ·

公元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国小说有过辉煌的历程，而小说理论，特别是对艺术规律的探索，同时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近年来，对这个时期小说的研究及鉴赏渐趋深入，相比之下，对小说艺术论的整理、挖掘便显得冷清了一些。因此，当我们读到陈洪同志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的时候，久违乍逢的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中国古代的小说艺术理论在作家的创作心理与读者的审美心理方面，在作品的真实性，虚构性及性格、情节、结构等方面，均有相当深入的阐发。但这些论述大多数散见于评点之中，而且使用的术语迥异当代，如金圣叹从佛经援引的“因缘生法”，从儒学中援引的“忠恕”，“格物”，以及李卓吾的“化工肖物”，脂砚斋的“囫囵语”等，都使初学者如坠五里雾中。《发微》就这些命题的思想渊源、语义流变一一追溯梳理。同时又在小说发展史及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挖掘艺术论诸命题的理论意义，因而很多观点颇具深度。如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论中提出了“囫囵语”之说，认为是刻画贾宝玉形象的重要手法。《发微》作者从贾宝玉特殊的心理状态入手。结合《石头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承嬗关系，指出“囫囵语”乃是通过模糊的言语方式刻画微妙心理活动的艺术手法，是中国小说由传统艺术方式走向近现代艺术方式的表现。这种提法是富有启发性的。

《发微》虽然阐发的是深奥的古典文论问题，但很容易读。作者行文比较活泼，经常把复杂的理论问题融于具体作品的赏鉴分析之中，然后从中引伸出对艺术规律，写作技巧的看法。所以《发微》一书既有学术价值，也对一般文学艺术爱好者有吸引力。

《发微》的研究态度，方法也值得注意。就研究对象看，该书属古典文论范围，或大而言之，属于古代文化的范围。因而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历史主义的，即从材料出发，从历史环境出发，不望文生义强加于古人。同时，作者又不停留于此，而是立足于当代的理论视角，居高临下审视前人的遗产，抉妙搜微，对古人隐而未彰之处多有阐明发挥。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小说象征传统、小说文学性情节与故事性情节的关系等问题的阐发都是推陈出新，发前人所未发的，对于文学史研究与小说评论与创作不无参考价值。

从全书结构看，绪论纵向勾画中国小说理论流变，内编横向展开挖掘理论奥旨，外编集中讨论相关专题，也是很灵活，与内容相合的。不足之处古代小说艺术论的精华尚未全部网罗在内，人们熟知的“草蛇灰线”等命题是应该收入阐发一番的。另外，书中个别提法也还可商榷。我们期待作者再下功夫，以更充实的增订本来和小说艺术爱好者见面。

(原载《美育》1988年第5期)

《戏剧意象》序

葛一虹

“意象”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在西方美学中，均提到过，是个揭示艺术规律的重要概念。写戏、导戏、演戏，也都离不开意象的创造。通过剧作和舞台的意象表现，往往能看出作家艺术家的构思和匠心，这是创作心理学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但这在过去我们的戏剧研究中似乎还未受到应有的注意。作者的这本书却以此立论，旁征博引，写成十多万言的专著，筚路蓝缕，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说：“在文化坐标上，‘意象论’提出了把话剧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统一起来的一种美学理想。”无疑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国话剧已有约百年的历史，成就很大，但理论探索却是它薄弱的一环。作者学有专长，多年从事艺术研究，是一位态度严肃的中年学者，曾参予我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工作，特为之介绍。

是为序。

（原载 1991 年 12 月 25 日《天津书讯》）

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开拓
《录鬼簿 中历史剧探源》评介（节录）

朱一玄

《录鬼簿》为元代戏曲家钟嗣成所作，是记叙元杂剧的重要文献。嗣后，贾仲明作了《续编》，也是研究元末明初北曲杂剧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史料。然而此二书仅罗列了作家简略生平和剧目，未作详细陈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新文同志不畏艰难，广取博采，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写成《录鬼簿 中历史剧探源》一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大体上分作者介绍、剧情评介、源流演变、史实与虚构的剖析、思想艺术评介、版本载目、本事资料几部分。书后有附录，剧目选自《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元曲选》及《也是园书目》，可算作《录鬼簿》的补编，其作用不在正编之下。

读过全书，我觉得它是对《录鬼簿》的重要补充，具有开创性。原书简略，刘著博采众家之说，还以求实精神，对元杂剧历史剧目皆作了溯本求源工作，并剖析了它产生及演变的历史背景、思想艺术特色及人物形象。如对王昭君如何死的问题，此书引证《汉书》、《后汉书》，证明并非如剧中所写投河而死，指出所以改动正史，“是为了增加昭君的动人光彩，表彰她的节义，也即是表彰热爱故土，不受人辱的崇高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再如《赵氏孤儿》，此书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论述了情节的源流演变，史实与剧情的异同及主题思想随社会的需要的不断变异。

其次，作者在研究工作中，针对旧说中有误处，能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详细有力的论证，表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独到的见解，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再次，此书资料丰富，编排精当。如本事资料采自正史、野史、笔记小说、传奇、话本等各类书籍。资料中情节相同者，一般只录其一。本书名为《历史剧探源》，凡不属历史剧或虽属历史剧而本事无可查考者，不收。编著者在几年辛勤工作中，翻阅了大量书籍，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又做了细致的考辨工作，终于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不仅有益于历史剧的创作，而且对戏曲的教学科研，以及一般文艺爱好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原载 1989 年第 1124 号《团结报》）

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开拓
评《录鬼簿 中历史剧探源》
田吟宁 宗一

元代戏曲家钟嗣成所作的《录鬼簿》，是现存元代人记叙元杂剧的重要文献，全书上下两卷，世传曹栋亭本共记述了一百五十二位杂剧及散曲作家，著录剧目共四百余种，整个元代戏曲家的情况，都赖以传世，其后明初戏曲家贾仲明又作了增补，一般认为《录鬼簿续编》即贾氏所作。《续编》中共记七十一位作家的七十八种剧目，后附无名氏杂剧剧目七十八种。《录鬼簿》及其续编，以其丰富的史料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戏曲与金元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然而，由於《录鬼簿》及其续编对所列作家及剧目往往过于简略，对当今读者带来很大不便。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刘新文先生不慕时尚，不畏艰巨，用了几年的时间，埋头书海，广采博取，沉潜往复，孜孜矻矻，终于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著作《录鬼簿 中历史剧探源》。这部书大体上分为作者介绍、剧情评介、源流演变、版本载目、本事资料几个方面，可说是介绍评析与本事资料参半。有些地方著者经过反覆认真的查证，对前人的说法进行修正，有独到见解。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的历史剧传统的国度。自从中国戏剧成熟以来，历史题材的剧目即成为每一个时期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份丰厚的遗产中，有着大量值得分析研究的课题。比如古人是从哪些角度选取历史题材的？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剧存在很多母题与“家族系统”？例如江山与美人冲突的母题，例如《水浒》戏，杨家将戏等家族系统。同一题材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剧作？例如王昭君的题材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夜月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陈与郊《昭君出塞》以及明清时传奇《和戎记》和《青塚记》等，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有元杂剧白樸《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庚天锡《杨太真霓裳怨》、岳伯川《罗公远梦断杨贵妃》以及清代洪昇的著各传奇《长生殿》等等。那么同一题材在不同的剧目之中有何异同？它们在不同的剧目中是如何发展、怎样改编和被如何表现的？我想，这些课题都会对今天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以上问题的研究有赖于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算做中国第一部戏曲史的《录鬼簿》，无疑是钟嗣成成为元代杂剧树立的一座丰碑。但它的碑文又过于简略，它只简单记载了元代戏剧作家的一些生平资料和剧目。在钟嗣成的时代，那些剧目还未失传，所以观看这些杂剧的演出或阅读剧本并不是件难事。可是时至今日，《录鬼簿》所载的剧目多数亡佚已久，要想对它们进行考察研究，了解剧情就已十分麻烦困难了。刘新文先生不畏艰苦，做出了这方面的开垦工作，他大量翻阅古籍文献，钩稽爬梳、探微发隐，将《录鬼簿》中所载的历史剧，一一考订其本事、整理推测其剧情原貌，介绍其源流演变，编著成一册《录鬼簿 中历史剧探源》，与《曲海总目提要》、《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以及《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工具书一起，相辅相成，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其功不可没。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著者还以宏观的眼光，指出元杂剧的世界影响。如介绍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有如下说明：“《赵氏孤儿》是我国戏曲第一个被译成外文的剧作。一七三五年被译成法文，由普雷马雷（汉名马若瑟）翻译，

在巴黎出版。一七六二年有英译本。德罗莫尔主教 T·珀西编译的英文《中国杂剧》，收有《赵氏孤儿》（据马若瑟本转译），由伦敦多兹利出版社出版。意大利作家 P·梅塔斯塔齐奥改编的《赵氏孤儿》题为《中国英雄》，一七四八年出版。以后还有德文版、俄文版，又出现了英、法等文的其他版本。”看了这一段介绍，谁能不为中国古代戏曲的辉煌历史、对世界戏剧宝库的贡献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原载 1990 年 9 月 4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周作人年谱》序言

· 李何林 ·

应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之约，我阅读了张菊香同志主编的《周作人年谱》。这是搜集相当完备的有关周作人一生的生活和著作的编年记录，是中国第一部《周作人年谱》。这里有周作人一生的生活状况及其背景，有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活动、文学艺术思想及活动，以及他一生的著作和文章。对于他的著作和文章，凡稍有意义者都作了“提要”、“题解”或“摘录”，供读者参考、研究。这个工作，编者是不花了不少力气的。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有过好的和坏的影响的作家。“五四时代”（1918—1921）是他的黄金时代，当时他以一个反封建的战士形象出现于文坛，可以说和鲁迅并驾齐驱，被誉为“周氏兄弟”闻名于当时。到二十年代中期，周作人有时还发表一些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文章，但在思想感情上已经逐渐显露出赶不上进步思想界的形势了。到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思想的输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和讨论，周作人原有的那一点点软弱的“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是远远落在进步思想界的后面了，被抛在马列主义思想潮流的两岸沙滩。

到三十年代，他就越向下坡路滑下去；“七·七”抗战后更越滑越远了，终于做了汉奸。所以周作人之终于做了汉奸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生思想的逐渐蜕化变质，他的日本妻子和环境的逼迫是次要的。这一切都可以从《周作人年谱》中找到答案：他一生的文章内容和社会政治活动实践向我们提供了答案。

其实，作为他的“黄金时代”的思想也不如鲁迅思想进步，姑不论除了一九一八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种思想他没有以外，即使在对待文艺和人生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也远远不如鲁迅。鲁迅强调文学要“为人生”而区要“改良这人生”，周作人怎么说的呢？他说：

“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分离呢？……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自己的园地》）

他说得很明白：被称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的代表思想家的周作人，他是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因为这两者都是“把艺术分离”。艺术是“独立的”，有它的“终极”目的；这“终极目的”不言而喻是艺术本身之美。这就和当时的创造社诸公的“为艺术而艺术”，说艺术的目的只在表现它本身的美，没有什么区别了。鲁迅则斩钉截铁地坚定地说：文艺应该“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并且付之一生的创作实践。

从“五四时代”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这将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主流”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其帮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但也有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影响之外，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和影响的文学，它们在

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上也反封建反帝，但往往反得不彻底，或者昙花一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支流”。还有一些文人，在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十九世纪末没落的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现代派文艺思想、法西斯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遗毒等等的影响下，他们反苏反共，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遗毒、粉饰或歌颂帝国主义、模仿逃避现实和反现实主义的现代派，写象征派的朦胧诗，提倡唯美主义，描写色情肉感等等，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逆流”。周作人一生主要的还是属于支流，但“七·七”抗战以后他就逐步地走向逆流中去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各种思想不断斗争中发展的，主流内部也有斗争。主流和支流和逆流，都曾用它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以及它们的创作，进行过斗争，周作人也不例外。他不止一次地反对左翼文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就是斗争。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有过好的和坏的影响的作家，他一生走过的文学道路，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周作人年谱》现在提供了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完备，但能够查到的东西都查到了的一份资料。我翻阅了一遍这部《年谱》原稿后，真是大开眼界；它所介绍的周作人的千篇上下（未准确统计）的作品，竟有十分之九是我未见过的；因而从《年谱》中我才对周作人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一般读者也会是这样的吧？至于用《年谱》作为线索进一步进行“周作人研究”，也会省去许多力量吧？因此特为介绍，写了这篇序。

1985年3月于北京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真实的人生轨迹
读《周作人年谱》
宋宝珍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好坏影响都较大的作家。早在风雷激荡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一度以反封建的战士的形象出现于新文坛，以至与鲁迅并驾齐驱，被称为“周氏兄弟”；但历史的递进并来给周作人增添更多的光彩，相反，三十年代以后，处于种种矛盾之中的周作人思想，越来越向消极颓唐的泥沼滑下去，到抗战爆发不久，终于演出了出任伪职的丑陋的一幕。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著译浩繁，功过昭著的作家，我们绝不能予以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应运用正确的观点，详细全面地占有资料，考查他一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准确地把握其功过是非，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周作人的“全貌”，正确总结历史的教训。正是在这一点上，张菊香同志主编的《周作人年谱》，显示出了坚实的基础与深厚的功力。

这是一部完整的周作人生平资料汇编，编者采用编年体例，把周作人放在广阔的中西文化相撞击的大背景中来考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实的周作人，处于大时代冲击圈内，由动摇，飘浮、超脱，以至于走向堕落的周作人，这不是一部零零散散的周作人一生事件的简单汇编，而是一部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带有研究性的著作，编者把宏观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的缜密考查结合起来，使人感到这部书资料丰富，内容厚实，有说服力。

周作人是一个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复杂人物，在当时充满矛盾的时代，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考证，”他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见《自己的园地》中的《山中杂记》）。斑杂的思想常常使周作人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和鲁迅在前进中的彷徨不一样，周作人则常常是在倒退中踟蹰，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苦闷，但周作人的苦闷却明显的只停留在自我情绪感受的表层，缺乏鲁迅式的思想反思的深度和力度。他自己就曾在《谈虎集》中一篇题为《两个鬼》的文中指出：“在我的心头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有时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它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思想里斗争性与妥协性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对于周作人的思想在漫长的一生中所经过的复杂变迁，年谱的编者并不满足于堆砌和杂陈历史资料，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编写过程中，既客观地记录了他一生所走过的真实的历史足迹，也剖析了他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周作人以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转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不是件偶然的事，年谱正是从这段似偶然而实属必然的变异中，以大量不可置疑的史实为依据，系统地总结出了存在于这个人物身上的历史教训。

周作人一生的活动显示出光怪陆离的色彩，这正是他思想动摇不定的结果，然而任何结果都不是没有原因，周作人思想复杂性的实质在于，他所依托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五四”时期尚发挥过它的积极影响，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就不断地暴露出了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和落后

性，年谱的编者紧紧抓住周作人思想这一出发点，循着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系统地考察他的历史。以年谱所提供的大量资料为佐证，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人的文学》里，也轰鸣着不协调的两种音响：一面是对“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古代礼法”的抗争，一面却又是甜腻腻的爱的说教，在这里，穷人与富人，被吃者与吃者的对立完全取消，只剩下成为“完全的人”的共同利益。这可以说，即使在思想革命的高涨时期，他的思想里已埋下了落后性的端倪。随着他新的理想的破灭和大革命的失败，他的人的思想越来越显得空虚，只好无可奈何躲入十字路口的塔里去，早在学潮中，他也曾痛斥过反动军阀政府的暴行，但人的思想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只得逃入苦雨斋中独自吟味人生的卑琐无聊，但做为一个处于社会急剧变化之中的人，他想逃避现实，现实却未必肯放过他，在三十年代，他终于出任伪职，充当了汉奸，这是他一生行为当中最大的丑剧，也是他人的思想沦落的终极。

纵览整部年谱，我们可以看出其编者的良苦用心，她的笔力决没有停留在为周作人一生的历史记流水帐的层次，年谱对周作人一生的大量繁杂的活动，事无巨细，都有详略得当的摘要记叙，对他一生所译所著的浩繁书目，也有详尽的记载，凡稍有意义者，都做了“摘录”，“题解”，“提示”，其目的在于，透过这些繁茂芜杂的事实和现象的表面，不仅要让读者见出周作人全部的真实，而且要见出其思想变化和著述发展的历史。

年谱在编写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历史，坚持科学研究中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在客观事实的记叙中，力求真实地凸现出周作人的“全貌”，书中往往引用周作人自己的经历、活动及其著述文字，说明他的生活道路、思想状况和创作情形，既不抹杀他在“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的积极影响，也不忽略在这积极影响背后所隐含的消极因素，既真实地记录了他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所作过的一些有益于人的事件，也实录了他最终走向堕落，出卖灵魂的事实。为了显示周作人的成长过程和写作全貌，对其早期学生时代的习作，虽然原文已佚，但也据日记谱人：“×年×月×日，作诗一首，作议二篇”等等，对于周作人的全部著译，凡编入年谱者，都做了严格的考证，并注明出处，而对于没有文字根据的材料，则一律舍而不用。年谱对于历史事实，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决不做主观的附会和臆测，而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保证了年谱资料的准确性和记述的翔实性，也为今后的周作人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年谱不仅通过大量的史实材料，向我们展现了周作人的种种复杂心态及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为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提供了充足的事实依据。比如，对于周作人的汉奸问题，历来众说纷坛，前一个时期，甚至还有人对此一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公开置疑，其实，年谱早已对这个问题做过严密的分析和考证，它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以事实为据，它客观地揭示了沦陷时期，周作人在北平生活的全部真实，这里有他文章中所表露的对日本侵华的糊涂认识，也有其行为上出任伪职的丑剧，有他为日寇侵华伤兵募捐数额，也有他配合日寇强化治安宣传所作的献媚文字。事实胜于雄辩，年谱让历史在这里作证，周作人的汉奸罪名不容置疑。

任何学术研究，无论研究范围是大是小，研究方法是新是旧，研究角度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必须要详尽地

占有有关的资料。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过，审察过，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马恩选集》二卷第122页）。年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对于资料的挖掘，力图做到全面、丰富、准确、详尽。长期以来，周作人的研究基本处于未被开垦的生荒地，象这样一个既有过一定影响，最后又沦为汉奸的作家，研究界和评论界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冷漠，这不仅在于这是个棘手的课题，也在于现成资料的短缺。拨乱反正之后，周作人的研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在年谱编写过程中，仍然必须从搜集整理最原始的报刊资料做起，而周作人之作品又散落在全国各地图书馆，一时也难以凑齐，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菊香等同志白手起家，跑了许多地方，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不少资料还是通过年谱第一次披露于世的。所以说，仅就年谱中资料的丰富性和翔实性来说，做为中国的第一部《周作人年谱》，它也是完满的完成了自身的使命的。

当然，拓荒的工作是艰难的，第一个步入荒野的人不可能一下子拾尽地上的野果。《周作人年谱》的编者，虽然力求做到资料的完备与详尽，但仍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疏漏之处，留给今后的研究者们去填补；此外，由于周作人一生跨越的年代较长，其辞世的时间已距今二十年了，好多与其交往密切的同代人都已相继去世，因此大量活的调查线索和调查材料便失去了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年谱编写中的一大遗憾。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出版）

《林纾评传》序

郑朝宗

四年前，张俊才同志和他的导师薛绶之先生合编一册《林纾研究资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曾在《福建论坛》上发表一文，题作《评〈林纾研究资料〉兼论林纾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文末说：

林纾是福建人，他对我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既然有了这样一些贡献，我们福建人决不应该忘记他。像《林纾研究资料》之类的书本应由我省学人负责主编，而今已被外省热心的同志“越俎代庖”了。我恳切希望今后我省文学研究者迎头赶上，把继续深入研究林纾的职贵担负起来。这就是我写这篇小文的一点微意。非常遗憾，由于体羸多病，我自己是“提倡有余，实行无力”，四年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关于林纾，而省内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的学者，虽经我的大力敦促，也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下手。现在薛先生不幸病逝，出生于山西省的张俊才同志挺身而出把深入研究林纾的担子单独挑下去。这本字数近二十万的《林纾评传》，到目前为止，是我所见的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关于林纾的专著了，其中不仅把林纾自幼而老的一生经历毫无遗漏地叙述出来，而且把他的所有精神产品——诗、文、小说、翻译等——加以精细的评介，使读者对这位曾经雄视一代的文坛巨子的人品和才情有了较深刻的印象。应该着重指出，作者虽对林纾怀着深厚的感情，但在作评价时始终采取公正不阿的态度，该肯定的便肯定，该批判的便批判，绝不故意回护，也不哗众取宠把诬蔑不实之辞强加在林纾的身上。

这里，我想趁便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附带说下一下。我在念小学时，林纾已迁居北京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名字和事迹仍常挂在福州人的口头上。他们称赞他才华出众，每逢文士集会赋诗，他总是首先完卷，他的一枝笔靠在福州南门城墙上简直无人搬得动。他们更钦佩他乐善好施，乐于助人，他的两位挚友王灼三和林述庵皆不幸早逝，遗下孤儿，无依无靠，林纾毅然把他们收养在家里十多年，亲自教诲。灼三的儿子名元龙在后来有点名气，我曾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看过他写的笔力矫健的一副对联：“座上岂容凉血辈，此间大有热心人”，这口气似乎是在歌颂他的恩师。我还曾从林纾的堂妹口里听到一件事：他长期开设私塾，以课徒为生，当地有个著名的恶霸也慕名把儿子送来就学。那孩子既蠢又顽，常常闹事，一天林纾狠狠地教训了他。翌日恶霸登门问罪，意欲动武，林纾二话不说，端起顽童的书桌摔到院子里，然后用福州方言对恶霸进行了最尖锐的“国骂”。一向横行无忌的恶霸竟然被这位懂得拳术的举人老夫子所慑服，乖乖地背着书桌牵着儿子狼狈退却。关于林纾的事，我从父亲口里听得最多。父亲一生敬仰“琴南先生”，常向我们宣扬他的学问和人品。本世纪初北京创办一所中等学校，叫“五城学堂”，那校长（当时称“监督”）是福州人，教职员多数来自福建，林纾被聘为“总教习”。我父亲因无功名，只得当个职员。他为人勤劳谨慎，林纾很快就看上了他，常请他帮助抄写译稿，给予厚酬，以资养家。父亲因此常得出入林府，眼见林老“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译书情况。他非常佩服林纾思想敏捷，文字雅畅，往往口译者声尚未止，而笔述者笔已放下，没有这样的捷才是无法达到每小时译千字的速度的。正因为译得快，所以字迹异常潦草，且常出现误字，这就需要像我父亲那样心细的人为他一一校正誊清，然后送交出版社。记得小时在我家厨房楼上的书箱里看到几册林

纾的译稿和他写给我父亲的一包书信，当时不知宝爱，以后久别故土，“文革”后回福州重寻旧物，不仅译稿化为乌有，连书箱也不见了，真是“在劫难逃”啊！林纾一生勤劳，每日译书、作文、绘画，在那间被陈衍唤作“造币厂”的工作室里忙个没完没了，但他身后萧条，逝世没几年，便举家迁往北京城外南下洼的福州会馆。据父亲说，林纾收入甚丰，一半用以救助穷苦无告的人，另一半则被几个不成才的后代挥霍精光。

从人品看，林纾是无可指摘的。他出身寒微，从不忘本，中了举人后，不肯当官，一辈子自食其力；他热爱祖国，痛恨外国侵略者，也曾倾向维新，醉心改革；清帝逊位后，虽怀恋主之情，却无企图复辟的罪行，这一点是高出于康有为、严复等之上的。因此我同意本书作者的论断，林纾晚节较差主要是由于思想僵化，而与政治野心无关。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攻击白话发展到对所有的新思想、新道德都不满，变成了十足背时的堂吉诃德。然而仅凭这一点便否定他的整个历史，也不公道，因为正如本书所说，他又是“新文学的‘不桃之祖’”，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过间接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这作用来自他的翻译事业。林纾不识一字外文，却凭口译笔述的方式译出了将近二百种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对后来的新文学巨子给予了启蒙教育，使他们以此为典范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数典不应忘祖，也许是有鉴于此，“五四”时期曾经猛烈攻击过林纾的那些进步作家，后来又一个个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受过林纾的影响，林纾并不是不可救药的顽固派。

林纾是个多方面的人才，他的诗、文、绘画都有相当造诣，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多都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唯有他的翻译至今仍受到人们宝爱。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不止钱先生一人。问题在于“漏译误译随处都是”的译本何以还具有如许魔力？钱先生明确告诉我们：“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而是因为“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林纾是个天分极高的人，虽然不懂外文，但在做了一些“笔述”之后，竟然“比直接读外文的助手更能领会原作的文笔”，更进而悟到“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转引自钱文），于是便“把《左传》、《史记》等和造更司、森彼得的叙事来比拟”，企图以我之长济彼之短，浑不管翻译和创作的区别。这样做的结果是从翻译的领域跨入比较文学的园地。林纾当然不会梦想到世间有所谓“比较文学”这门学问，但通过翻译实践他结结实实地给中西比较文学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实例和不无可取的见解，他终于成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开山之祖。

我很抱歉，这篇浅陋的序文介绍林纾本人远比论述《林纾评传》为多，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但这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张俊才同志确实费了很大力气，从各方面广搜资料，精研细磨，把与林纾有关的所有问题都挖掘得了无剩义，不给别人以插嘴的余地。单凭这点，我认为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因此我谨掬诚把它推荐给读者。

1987年9月23日于厦门

(原载《读书》1991年第5期)

新文学的“不祧之祖”，旧文学的“押阵大奖”
写在《林纾评传》出版之前
张世甲

河北师大张俊才同志的力作——《林纾评传》，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二十余万言的著作不仅是林纾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认识林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启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还丰富和拓展了整个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著名现代文学专家、学者郑朝宗先生在为此书撰写的序文中称之为‘到目前为止，是我所见到的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关于林纾的专著’，‘是很值得一读的’。

林纾，字畏庐，清末壬午举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和翻译家。早在三十年代以前对他的研究和争论就颇多了，曾有《林纾传》等多种著作问世。然而建国后这种研究停滞了下来。现代文学史上基本没有了他的位子，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此中原因不难解释。林纾是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生活在从近代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的时代，新旧并存的时代和社会造就了他亦新亦旧，功过掺和二重性状态。他的无人企及的丰厚译著，曾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他又是旧文学的‘押阵大将’，是传统古文的殿军，攻击白话，‘力延古文之一线’；他是维新运动的实践者，又是卫道的‘封建余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人物，多年来，人们或者举足无措，知难而退，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未敢涉足，使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长期处于搁浅的状态。

新时期以来，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冲破了许多禁区，林纾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十多年前，张俊才同志就在他的导师薛绥之先生的指导下，参加了《林绿资料研究》的编写工作，并发表了二十余篇研究林纾的论文。在搜集整理大量的、翔实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学术思想不断升华，终于完成了这部有份量、有特色的《林纾评传》。该书不仅把林纾的一生毫无遗漏地传述了出来，而且把他的所有精神产品——诗、文、小说、翻译等——加以精当评介，使读者对这位曾经雄视一代的文坛巨子的人品和才情有了深刻的了解。

较之诸多，不尽如人意的评传来说，这部《林纾评传》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它不是传与评的生硬拼接，也不是仅系传而非评传，而是又传又评，评传融合。作者注意以传为骨架，加强评的色彩。全书努力从人物的家庭出身，个性特征，时代环境，中西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说清林纾每个阶段的思想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史的演进背景上对人物的功过作出判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始终取刚正不阿的态度，实事求是，该肯定的便肯定，该批判的便批判，决不故意回护，也不哗众取宠地把不实之辞强加在林纾身上。既旗帜鲜明，又有理有据，从而对林纾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一个“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人物”，一个“功大于过”的作家。

其次，重点突出，脉络清晰，文字优美，文笔畅达，也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色。林纾在世73年，不仅亲身经历过维新运动，清王朝灭亡和复辟活动，以及“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是天分极高、才华出众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画家。他一生著述甚丰，仅翻译一项即达200种。给这样一位人物评传，必须突出重点。作者以高屋建瓴的气魄将林纾一生概括，归

纳为“寒门子弟”、“壬午举人”、“宦情扫地”、“步入文坛”、“评界泰斗”等十章，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既重点突出，又条理分明，成功地使人物立了起来，活了起来，给人以清晰、完整的印象。

此外，《林纾评传》在尊重事实和加强感情介入上，在追求评传的科学性与文学性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统观全书，作者行文求实，不尚雕琢，然而文字优美、文笔畅达，大大增强了该书的文学色彩和可读性，的确是“很值得一读”的。

（原载 1981 年 6 月 10 日《天津书讯》）

《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出版 张学正

腾云主编的《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一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编写者从粉碎“四人帮”后八年来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中、短篇小说作品中，精选出一百篇（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评论。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获奖的优秀作品，也有少量失误的或有争议的作品。总览全书，可了解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和发展脉络。

该书对作品的评析不局限于一般的作品赏析，而是将作品放在一定的时代和文学思潮的背景之下，力求把微观的分析与宏观的评述结合起来，把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同阐述这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及其创作风格结合起来，因而使评析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本书还带有一定的资料性，虽不附原作，但仍列出作品作者的生年、籍贯、作品出处、获奖情况等资料；同时介绍作者的生平创作简况，作品发表的背景及发表后的反响。有争议的作品还要介绍有关争议的情况及分歧点，为读者提供阅读和学习的方便。

参加编写的有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新港》编辑部、百花文艺出版社、文学研究所、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师大中文系等单位的数十位同志，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天津市文学研究、评论、教学和编辑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约四十余万字，是目前国内第一本选目较多、规模较大、内容较系统的小说评论集，它既可作为大学文科的教材，又可作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和青年的文学辅导读物，同时，也可作为青年作者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读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原载 1985 年 2 月 28 日《天津书讯》）

通向诗歌艺术之宫的桥
——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
马德俊

最近，喜读李丽中编著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一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以下简称《百首点评》），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少见的一本好读物。常听说当前诗坛很寂寞，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可是，这本《百首点评》初版3万册一个月之内销售一空，出版社又赶印5万册，以供读者的渴求。事实说明，不是读者不喜欢读诗，而是需要有水平的诗歌鉴赏家作些沟通和诱导的工作。

我认为《百首点评》有下述优点：

一、将十年内两次诗歌浪潮的精彩之作集萃为一本进行点评，在国内当为首家。

为佳作进行评点，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唐诗三百首》、《千家诗》那精萃的点评文字与诗作一起流传于世。现代人往往愿意写长篇评论文章，而忽略了“点评”这种方式。新诗发展近70年来，各家选本与评析本虽屡有出现，然而，象《百首点评》这样，将一个时期的诗歌精选集纳，不落旧套，画龙点睛地首首进行点评的选本，可以说是当前难得之著。

二、选诗有代表性。

新时期“朦胧诗”、“新生代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契合在整个中国社会经历过动荡走向变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之中的。点评者以审慎的目光，精心采撷新时期两次诗歌浪潮的精华。其中，既包括从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朦胧派”诗人的佳作，如北岛的《回答》、《红帆船》，舒婷的《雨别》、《也许》，顾城的《生命幻想曲》、《一代人》，徐敬亚的《既然》，李小雨的《红纱巾》等；也有在改革开放时代走上诗坛的“新生代诗人”的代表作，如李钢的《舰长的传说》，王小龙的《纪念》，宋琳的《旭日旅店》，车前子的《日常生活》，岛子的《风景画》，孙桂贞的《蓝色血》等。也包括有争议的诗作，如《诺日朗》、《太阳和他的反光》、《弧线》、《第二人称》等。3000余字的序言，综述两次诗潮发展概貌并比较其异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点评文字精当，对待作思想内容与艺术的把握是精湛的。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属新潮诗歌，诗人们在作品中注入了新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一般读者往往难以把握其内蕴和艺术美，点评者从这一现状出发，从每一首诗的实际出发，既能深入诗人的心灵，又能从更高的视角进行点拨剖析。如舒婷《神女峰》的点评文字中有这样两段：“题为《神女峰》，却把镜头对准了积淀数千年的民族潜意识。诗人从生活的‘老君炉’里炼出一双慧眼，透过神女峰——这一在神话色彩笼罩下，被当作妇女贞节牌的石头，看到了民族潜意识里那已成为惰性的部分，还看到了神的面纱下遮盖的并非石头的心。主题仍然是呼唤人性的复归，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诗人把笔触伸向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收尾的引爆，如金石掷地，动人心魄，它摧毁了‘美丽的梦’留下的那个‘美丽的忧伤’，它揭掉了神的面纱，将‘神’还原成为大写的‘人’，它有力地回答了‘心/真能变成石头吗’的疑问。”读这样的点评不仅有助于了解诗情，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四、点评者善于将中国传统诗话与西方诗论结合起来运用。

李丽中点评的基点在于选取两种评诗方式的衔接，她在《序》中说：“中国传统诗论文字多是悟性表达，容易传达出对审美对象的整体把握，和欣赏者原始状态的真实感受。”而西方诗歌评论则“多是理性分析，析理甚为精辟”，李丽中取两者之长，从感觉入手，领悟其内蕴，然后从理性上加以点拨，从诗歌美学层次上显示其特色。这种点评方式，可帮助读者发现诗歌创造的真谛。

该书封面也颇有诱惑力，丛林中透出一束玫瑰紫色的朦胧晨曦，雪地上数行深深的脚印……这幅画面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享受，且有一种与点评本暗合的韵味。

（原载 1988 年 8 月上海《书讯报》）

点评：给你诗的眼睛
——评介《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
刘宗武

曾几何时，新诗危机论，在诗坛和一些读者中成为热门话题，引起许多争议（尽管迄今争议依然存在），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代新诗潮“在不足十年之内，走完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对现代派诗歌的体验和选择”，并且出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阔景象。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文学浪潮，任何力量都不能遏止的。不过，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嬗变的新诗，由于其面貌“新”，加之“洋”和“怪”，不说迄今尚对这种新诗持有成见的人，纵使喜爱这种新诗的读者，在接受上恐怕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一般读者更是一时还难以摸到它的心音，不大适应“诗歌艺术大幅度、快节奏的发展”因此，“如何缩短诗与读者的距离，吸引更多的读者关心诗歌创作，共同来完成符合时代要求的诗美创造，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也是诗歌史上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诗歌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有其独特的个性，一向是要有学者，评论家做一些引导、启诱的工作，以加深理解和领悟。新诗自然也不例外。正当新诗潮汹涌澎湃、奔腾前进的时刻，《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下称《点评》）应运而生是适时的，极其有益的，编著者李丽中同志的创造性劳动，对新诗来说，可谓具有启蒙的作用和开创的意义。在序文中，她用粗线条勾勒了新诗潮产生、发展的轮廓，可帮助读者俯瞰新诗潮的概貌，同时阐述了点评的方法和指导思想，这都是很有必要的。她的点评，有疏导，有阐释，有评析，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悟性表达”和“理性分析”熔于一炉，自然和谐，耐人寻味。点评文字洒脱，流畅、清新隽永，更令读者倍感亲切，易于接受。

诗永远走在生活的前面，尤其是处于开放改革时期，诗最早地表现了现代意识（甚至超前意识）。然而，由于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诗歌迥异，往往用“远折射”手法罩上一层朦胧的面纱。因此，怎样把握住它的精髓和内核，如波德莱尔说的，是需要有“诗的眼睛”的。《点评》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给了读者“诗的眼睛”，透过纷乱迷离的意象（或意象组合、重迭）、无序的时空、流向莫测的意识流、神秘的象征……以体味出诗人内心深处的人生感悟和生活体验，例如舒婷的《墙》，诗人运用了令人目眩的外在表现形式，写的却是一个极深刻的主题，如果不作点评，许多读者不容易看得透的。而《点评》仅寥寥数语，切中肯綮：“‘墙’是什么？既是‘我渐渐老化的皮肤’，又是‘挤压我、勒索我，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墙’既是自我’的一部分，又是‘自我’的对立物。人的生存悲剧往往来自两方面因素：一是民族潜意识中的因袭重负带来的外部压力，一是自身惰性在精神上结成的硬痂，它使人感觉麻木，意志衰颓，习惯于世俗的平庸。舒婷的敏感的现代意识的触角发现了这阻碍变革的隐形魔鬼，用‘墙’这个象征性意象使其具象化，似乎有些荒诞，然而揭示的却是生活的本质。‘墙’的人格化，‘墙’的变形，正是意识深层的微妙感受。”这样一点，读者的心中自然而然地“荡起振波”，豁然开朗了，诗人的“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也就不难理解了。其他，如北岛、顾城、杨炼和梁小斌等人的诗篇，《点评》都有极为独到精辟的评析，随处可见，毋

庸赘述。

《点评》的独到之处，是在点评方法上，有下列特点：

首先，“循其文而申其意”。紧紧地把握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而加以引申释义，而绝不脱离开诗借题发挥，或谈的与诗本身毫不相干，这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论诗态度。这不仅使读者学会正确的读诗的方法，而且也会使诗作者心悦诚服，甚至感到评论给他的诗插上了翅膀，飞进了众多读者的心中，找到了知音。例如顾城的《小巷》：“小巷 / 又弯又长 / 我用一把钥匙 / 敲着厚厚的墙”。乍一看来，似乎不大好懂，或者看不出什么。《点评》没有节外生枝，强加于人，只是依据这几行文字，合乎情理地联想：“被历史抛入黑暗中的一代青年，一旦站在阳光下，自然会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顾城没有叹息，也没有去寻找钥匙，而是拿起钥匙寻找自己的房间，寻找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小巷’是‘又弯又长’的，‘墙’是‘厚厚的’，要寻找，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也可能要走很长的路；然而抒情主人公是坚定的，那个‘我’在顽强地敲着，边走边敲。”从时代背景入手，并与同代人相比较而凸出顾城在这样时刻的思考和行动，这样就真正触摸到诗人的心音。因此，《点评》又说：“……画面中那个敲墙的主人公，并非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青年，不，也包括中年、老年。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人不是终生都在寻找吗？”这有力的反问是那样震撼人心，那样令人深思。读者对这一反问是不会感到突然的，只会更加深入地体会诗人从精神上所传达出来的意念和信息。

其次，通过具体分析诗的表现形式，引领读者深入把握诗的思想内容，或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点评》对所选诗篇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运用得相当熟练自如，例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仅有两行 18 个字，《点评》却用了约四百字做了透彻的分析，它指出这首诗“在审美原则上是全新的。它避开了情感的直抒，弃置了景象的实叙，它没有着意建构完整的意境，只是用意象，用隐喻，在浓重的黑色背景上凸现了一双不同寻常的‘黑色的眼睛’（一代人觉醒的象征），在眼睛的前方，似乎可以看到从乌云的缝隙中射出的一束白光。整首诗，宛如一幅有立体感的版画。‘黑夜’与‘光明’形成暗色与亮光的鲜明反差，‘黑色的眼睛’是经过变形的意象，渗透出强烈的感情色彩。这种艺术表现触发了读者的想象，于是，在想象的屏幕上出现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那在荒谬现实中扭曲着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那埋藏在心底的潜能所爆发出的顽强求索的精神……。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雕像。”这样细致入微而精辟的剖析，无疑使读者能很好地从形式到内容准确地把握住这首诗的涵义，并在一个高的层次上理解它、体味它。《点评》还指出“‘黑夜—眼睛—光明’一个简单的意象群构成了一个开放时空—历史转折关头特有的社会景象和人的心理结构。有限中表现出无限，单纯中包孕着深厚，这是诗的特有规律”。从一首小诗，又引导读者认识了“诗的特有规律”，这对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也是大有神益的。当然，这里有必要提一句，对有些诗的点评，过多地用力于表现手法上，而且运用了较多的新概念，新名词、而忽略了内容的开掘，这是不足取的。

再次，点评的关键在“点”上，即不能一览无余，包罗万象，而要恰如其分，点到为止，达到引而不发的效果，这样就能比较多的留有余地，让读者充分思考，以进行独立的再创造的审美活动。可以说，《点评》在这方面

做的也是很出色的，例如雁北的《缝隙》，《点评》这样写着：“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诗人却略加点化，以醉语‘条条缝隙通罗马’作结，使人哑然失笑。笑过之后却感到有些难以说出的苦涩滋味。”滋味是什么，没有再说，却愈发加深了诗的感染力的启悟作用，使读者受到心灵的冲击。再如吕贵品的《大地》，内容是很单纯的，意蕴却极丰富。《点评》略加阐释，随即指出，“诗人从‘我’和‘土地’的关系中悟出了生活中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不能只是用‘目光’去‘播种希望’，而要用全部感情。用感情去播种美好的希望，才能期待收获”。语言简洁鲜明，富有哲理意味，点评和诗，珠连璧合，相互映衬，迸发出一股强劲的力量，启迪着读者沉入思索之中。

最后，对诗的评析和欣赏比较好的结合起来，“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辨情”与“绳理”在《点评》中是互为表里，浑然一体的，例如王小龙的《纪念》，《点评》一方面指出“不直接写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只写日常生活中的细物琐事，……通过这些平庸琐细的生活细节，表现出父亲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操守，以及儿子对父亲的深沉怀念”，又指出：“诗中沒有直言，而我们可以想，这位父亲是一个宁肯在贫寒中别扭地生活，宁肯被别人视作‘无能’，也不愿改变操守的人。父亲去世后，儿子最深刻的感觉是‘我就是你’。一切的悲哀、一切的艰难、一切的不愉快都来源于此；然而，卑微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正在于此。”这样，不仅使读者感受到诗人对父亲那种怀念、悲痛、骄傲、执著“兼而有之”的感情，而且也认识到诗人正是以继承父亲的精神财富而感到自豪，而“最末一节点出‘总之出太阳的中午下雨是正常的’，‘因此什么事情都不必太计较，这是我对生活的彻悟，是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审视有缺憾的生活’，同样使读者从一个高的层次来鉴赏这首诗的内涵，获得更大的审美享受和思想启迪。

我国历史上一向有选诗（文）评诗（文）的传统。好的选本对繁荣创作，以及推动文学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句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就生动地说明了选本《唐诗三百首》的巨大社会影响。为便于读者，于选中又略加评点，虽蠡测之见，亦大有益于后学，但是对于新诗，自诞生来多是选本，可谓不胜枚举，至于选评本却极为罕见，据有关资料介绍，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1919年》，“时有评语案语”，1936年上海中央书店出版的《现代创作新诗选》是淑娟选评的，1983年长城出版社出版的《新诗选读三首》有周良沛的“短评”等等，有限的几种。此外大多是只选不评，或以长序作概括的分析评论。象《点评》本这样截取一个阶段，选出若干表现手法相同或接近的诗篇，分别地加以评点，的确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的。特别是它继承了我国评诗的传统，并有所创新，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评诗的样式，肯定会促进新诗的繁荣与健康成长。

新时期以来的所谓“朦胧诗”，从七十年代末至今，已近十个年头，一方面是诗作浩如烟海，良莠不齐，一方面是评家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在这种形势下，选和评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难能可贵的是，李丽中同志在自己多年教学积累的基础上吸收众家之长，不仅选了而且评了，对这些人们难以接受的新诗，她或阐发精义，穷究妙理，或略加点评，情理自见，无不凝聚着她潜心钻研、兼收并蓄的劳动成果，尤其是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她敢于力排众议，发表独立的见解，这是很需要一些胆识的。例如顾城的《弧线》，有人指责为“不知所云”有人问道：“仅仅写出‘弧线’，思想岂不浅薄？”

甚至斥之为“故弄玄虚的无病呻吟”。而《点评》却从其中看出：“诗的朦胧性带来多种暗示：畸形社会中人的价值的贬值，社会不良风气对天真心灵的污染，自然界弧线的和谐美与人为弧线不和谐的对比，对社会走过一段弯路的暗喻等等，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不必求其固定答案。诗不是为着解答什么，只是启示。”这样的评析是否完全吻合诗作原意，自然还可以讨论，但至少是一家之言，批评《弧线》的人不会不从中受到某些启发，年青的诗人亦可受到一定的鼓舞。

在点评过程中，李丽中同志能够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或从理论上探索，或从比照中印证，皆深得评诗之三昧。以自己的渊博学识，精明的论述，为读者阅读时触类旁通、广泛联想，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这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点评语言，精巧简明，自然流丽，常常和诗相互辉映，愈发增加阅读兴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说这个点评本有所不足的话，其一是入选的个别篇目，不仅形式上太朦胧了，而且内容很隐晦，或比较单薄。这样的诗，说它是文学游戏并不为过，虽然这样说为时尚早，不过历史迟早会做出严正的汰选。其二是，有些篇章点评的说服力不够强，或者说还没“点”得准。如《古寺》，淤积于诗人心怀极度愤懑的情绪，《点评》并未做更深的开掘和揭示，没有点出诗人感物所言之“志”，仍是给人以朦胧的概念，不甚了了。至于上列所说内容单薄的诗，没有什么可点评的，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8年第8期）

关于《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的通信

晚南同志：

来函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转交给我。

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惜花费几个晚上的时间阅读了《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这本小书，并在信中谈了自己一些见解，您的这种精神和对我的热情鼓励，使我深为感动。近来相继听到本市和外地一些读者的反映，和您的看法大致相似。看来，并非读者不喜欢新潮诗歌，而是需要有人作些引导工作，在诗人与读者间搭起一座新桥。您的信更加启示我认识到这一点。这本小书销路很好，据出版社说，四月份印出 30000 册供不应求，于五月份又印 50000 册，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读者的渴求。

您在信中最后提及对傅阅川《海的三部曲》一诗点评内容的看法。傅阅川（1972 年生）原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他从九岁就开始写诗，大多写在练习本上，后被推荐发表。他的诗曾得到不少诗人和诗评家的赞赏，北岛、严文井、谢冕、万之等同志都评价过他的诗，《诗刊》主编和《中国作家》的诗歌编辑对他的诗都给予较高评价，青年诗人马高明去荷兰参加国际诗歌节也推荐过他的诗。他从九岁至十四岁几年中写过许多诗，我读过其中一部分，从中选取了一首编入《百首点评》。他写的诗大都有哲理性，例如，他的：“我是我永不背离的朋友，也是我无法摆脱的仇敌。”“雨点掉到地上，叫道：‘这是我跟大地亲吻，也是大地吞食我。’”这样的诗句不是也带有哲理性吗！傅阅川是个早熟孩子，天赋超过同龄者，喜欢看书、思考问题，中外名家诗集、哲学著作他都读过一些，平时常向家人提一些有关哲理性的问题，正因为考虑了他本人的这些情况，我才写出书中那样的点评文字，在此将有关情况简要补述给您。对您的热心，我是很感激的，并希望您继续提出宝贵见解。

祝

工作顺利

李丽中

李丽中同志：

您好！

我是在书店里偶然购到您编著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一书的。现在朦胧诗变化万端，作为诗爱者，常陷入困境，您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而这又是某些诗评家、诗人们不会做或不敢做的），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珍视您的大作。

您用点睛之笔将 100 首诗进行短评，我觉得比那些洋洋万言于一首诗的诗评好百倍。有些诗评其实只用一句话就足够了，非常感谢您为此而付出的辛勤劳动！

关于傅阅川的《海的三部曲》一诗之评论我感觉有些远了，一个九岁小孩的诗作，我想是不会包含那么深刻的哲理的。作为您的理解我是完全相信的，但对作者来说太超越了他的年龄，我想若换一种解释会自然些，恰如其分些。

这是读后的一点想法，也许欠妥，特提出，向您讨教。不当处请谅。

欢迎您继续花些时间从事这一有意义的劳动！

晚南

(原载 1988 年 8 月 27 日《天津书讯》)

诗的生命意识与语言意识的觉醒
——读《中国先锋诗选》
张世甲

南开大学版《中国先锋诗选》（李丽中等编著）精选了韩东、于坚、柯平、王小龙、开愚、车前子、宋琳、伊甸、曹剑、杨黎、丁当、翟永明、唐亚平等 40 余位先锋诗人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近百篇诗歌作品，每首诗均附有极其精要的点评。

先锋诗即新生代诗。其先锋性主要体现在诗的生命意识与语言意识的觉醒。先锋诗一反朦胧诗的英雄化、崇高化，而追求生活化、平民化。诗中写普通人的个体生命体验，揭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七情六欲。先锋诗不象朦胧诗那样热衷于意象和修辞，而追求来自生命本体的语言自身的语感，认为诗美存在于与生命同节奏的语感中，先锋诗的语言似口语又不是日常口语，似随便又不随便，在平易、自然、亲切的语言中蕴含着作者的生命体验，流动着一种内在的情绪。

先锋诗崛起于 1984 年之后的朦胧诗落潮时期，它率先冲破了朦胧诗及其大批追随者在诗坛形成的统一格局，推进新诗出现了多元化流向。尽管先锋诗尚不成熟，也不完美，然而，比朦胧诗阵营更大，声势更大的一批先锋诗作者的探索，对推动新诗发展毕竟是有意义的。有探索就有创新，有创新就有存在价值。《中国先锋诗选》的出版，定会受到广大青年读者、诗歌爱好者及研究者的欢迎。

（原载 1988 年 11 月 12 日《天津书讯》）

《龙泉寺诗画》序

解青林

这本《龙泉寺诗画》展示出山川秀丽、景色优美之貌，造型古朴、装饰素雅之容。披览耽思，犹如身入其境、人在诗画之中。使我见物生情，诚为感慨。略述浅识，权作赠言。

龙泉寺位于石家庄市获鹿县境内，历史悠久的古邑获鹿，可溯于尧舜之前。炎黄子孙居此繁衍生息，世代相传。创业遗风延续，伟烈丰功长存。其文化遗产素有著名八大景之说，龙泉山下的龙泉寺则居八景之首。这里峰峦层叠、崔巍峥嵘，丘壑起伏、纵横绵延，林果树木参差披拂，野花芳草覆盖山川。到处风景如画，四季景色宜人。

龙泉寺始建于金朝正隆二年，已有八百三十年的历史。龙泉院东接翠屏，西连五寨，南披封龙，北带滹沱。游览面积万亩之多。堪称石邑首胜之区。金、元、明、清历代均曾修葺续建，形成了寺殿、庙、亭遥相呼应，井、泉、池、碑完整奇特的古建筑群。龙泉池内可见倒映五条彩龙，恰似翩翩起舞；夜静更深可听龙泉飞吐妙音，犹如淅淅雨声，因此，古诗留存“更有龙泉施夜雨”之佳句；龙井之水晶莹透亮，清冽见底，历经数百年不枯不竭，持续平衡。洪涝之年满而不溢，干旱之岁伸手可触。据碑文记载：“岩阿飞泉，冬夏异色，其味甘冽，可以疗疾”。经南开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单位水质化验，证实含有十六种元素，对咳嗽喘和肠胃病大有裨益，尤其微量元素“硒”，具抗癌，抗克山病之功；攀上龙泉山的顶峰，四处景致尽收眼底，大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之情趣。顶上还有一段长达千米的断壁残垣，据说是“古长城”，翻过峰顶可看到三条各长达百米呈紫红色壁虎石，与山色殊异，伏地潜卧，形态逼真，每逢天空晴朗，登上望府亭远眺，可看到正定大佛寺、大悲阁楼顶。相传龙泉寺与大佛寺本是一脉相承，情谊甚笃，为解相思之苦，僧入建碑于此；鸳鸯亭则记载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奇妙的风景，美丽的传说，自然与历史相映生辉，构成了灿烂而神妙的气象。金朝著名诗人元好问曾作诗颂之“登高都说龙山好，以此龙泉是胜游。”

动乱年代，龙泉寺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石家庄市政协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考察论证，并提出龙泉寺修复方案，市政府拨出专款，当地人民义务出工，使龙泉寺重现原貌，建成以龙泉寺为中心的山林公园，现已成为石家庄市引人注目的旅游胜地。

山川之美，当在人物装点而多娇；名胜之幽，应以诗文描绘而多姿。历代文人墨客汇集龙泉寺观光，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真可谓无处不有景，无景不有奇，无奇不有典，无典不有诗。

《龙泉寺诗画》的编者从龙泉寺三百多首题诗中精选出七十首，并选配影画三十三幅，诗图并茂，有助于对龙泉寺的了解和认识。它使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古典名胜重放异彩并得以保护和流传。引起我思古人之怆然，惜今人之怡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对编者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相信这本《龙泉寺诗画》一定会受到世人的赞赏。

（原载 1990 年 6 月 23 日《天津书讯》）

《中国电影艺术史纲》序

· 荒煤 ·

正当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之际，读罢《中国电影艺术史纲》，不禁感慨万千！

电影艺术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自“杂耍”开始到现在被称之为艺术，尽管受到电视的严重冲击，仍然是国际文艺领域中群众性很广，艺术魅力较强，特别是为广大青年所乐意接受的一种娱乐。

不幸的是，电影艺术终究是个“怪胎”，它的诞生到现在，不过是一个世纪，就其生长的环境来讲，在西方世界，电影“杂耍”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因为它始终不能摆脱受财团、制片人谋求利润的“商品”地位，电影艺术也就始终不能消灭它身上“金钱”的胎记。

然而国际影坛上也终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有见识、有良心的电影艺术家，他们关心人类的命运，思考人的价值，探索人生的意义，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得不面对现实，通过人的性格和遭遇去揭示一些社会的矛盾，尽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拍摄出一些优秀的影片来，终于使电影成为一种艺术。

只有在世界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列宁宣称：“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之后，苏联电影为世界电影开辟了一条新路。随着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国有一批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的崛起，电影艺术才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才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任务；为无产阶级服务，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世界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总之，电影艺术被认为是对革命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我们党在三十年代所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以及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基本上以这种理论和思想作为主导的。建国以来大量优秀的反映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毋庸讳言，我们有时也片面地强调电影的思想教育的作用，而忽视电影的特性及其文化娱乐的作用，导致许多影片题材狭窄，样式、风格的单一，走向公式化和概念化，成为枯燥无味的说教，既无法真实地反映丰富多彩的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也缺乏艺术的生命力，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文化生活的需求。到了“文革”时期，电影阵地一片荒芜的悲剧也证明，在那种极“左”的思潮中，实际上是扼杀了电影的生命力。

其实，早在1953年12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中，就已经明确提出：

“电影艺术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性，具有对群众的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要作用。”

1961年周恩来在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又异常明确指出：

“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的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这都是为了纠正片面理解电影艺术思想教育作用，而忽视艺术规律和电影特性，否认电影的文化娱乐的作用。

所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电影事业的发展，如果说有一条基本的经验，那就是坚决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贯彻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必须充分重视电影艺术的群众性、重视其潜移默化的功能对广大群众所起的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又必须注意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愈加发挥电影艺术的特性，才能更好地去反映丰富多彩的历史与现实；去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建国四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艺术的基本经验。

前几年有一阵“新潮”泛滥，提倡“娱乐主体”，否认文艺的教育功能，要承认电影就是“商品”，要宣泄什么潜意识，见不得人的情感、性感、感官刺激等等，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电影商业化的理论的渣滓粉饰一下，折腾一通，终未造成了电影战线上一场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混乱和沦落。

这又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育，否认作品的思想性，否认影片的思想教育作用，片面地强调什么电影的本性，提倡什么娱乐主体，让社会主义电影走商业化的道路，同样是行不通的。

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导，一个日本记者在东欧旅游的杂记，他感叹他到电影院看到有的国家放映的色情电影，“自始至终充斥着淫秽的镜头”。

还看到一个消息，东欧有的国家一年都未上映过本国一部影片。

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前一阵有过一种议论，当电视、录像已经深入家庭之后，电影必将日趋没落。

现在我国电影观众也的确是在逐年下降。究竟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在这里当然是无法展开讨论和研究了。

然而，经过一个世纪发展起来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电影，断言它不久即将在人间消逝，终未免有些荒唐吧。

任何一种艺术的存在和发展，关键还在于它是否适合人民的需要，这种文化生活的需求又是随时与人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和丰富相适应的。只要这种艺术符合、适应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能够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现实和历史，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给人以艺术的美的享受，它就必然获得发展。

问题在于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怎样去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艺术创作？！

这必须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面对现实、面对未来，以免受到历史的惩罚，再重复历史的错误。

《中国电影艺术史纲》把 90 年来中国电影发展的道路作了简要的、真实的回顾，主要是通过作品的剖析，对各个革命时期的优秀影片创作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综合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理论探索、创作的倾向及现象，电影艺术特性的发挥等进行小结，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了解，脉络清晰，立论明确。从整体来看，可以说，中国电影历史的全貌，的确被鲜明地勾画出来了。

尤其是新中国电影历史的一些重要经验有了明确的总结，这对加深理解中国电影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自己的道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电影事业，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之际，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不否认在电影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付出过沉痛的血的代价。然而我们又须清醒地看到历史已经证明，历史也在召唤，我们要继续发展我国电影事业，繁荣创作，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应该善于吸收国际电影

事业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不能抄袭任何的模式，也不能不加具体分析，不联系我国的实际硬搬各种理论。

在电影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加强电影理论建设，促进电影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重要的任务，这还有待于更多年轻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努力。

所以，我为这三位中年电影理论研究人员所撰写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纲》的出版感到高兴，除了向他们表示真诚的祝贺外，也愿意向广大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艺术的爱好者推荐这本著作！

1991年9月

（原载1992年3月28日《文艺报》）

观影者学点电影艺术史大有必要 ——《中国电影艺术史纲》读后 世甲

有些人看过一场电影后，往往要对剧情、对导演和摄影或褒或贬，对演员演技评头论足。自然，这些议论不乏有见地的评说，但其中大多数议论则是“跟着感觉走”，甚至是人云亦云的，显然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比较鉴别。诚然，每一部电影都是对某种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都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但是要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则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置于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比较才能鉴别。所谓比较，一是作横的比较，就是将同一历史时期的相同题材和相同风格的影片进行比较，也和那些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影片进行比较。为此，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电影艺术的历史，吸收、借鉴其中的一些介绍和评论，补充自己的观影空白，那是会有裨益的。要对各历史时期摄制的影片进行比较，这对普通观众来说难度更大。因为每一个观影者所能观赏的电影毕竟是有限的。能学点电影艺术史，就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缺憾。《中国电影艺术史纲》就给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它不但介绍了中国有影以来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故事影片的摄制情况和故事梗概，而且结合各部影片的摄制背景分别作了简略分析，还对摄影艺术剪辑技巧和表演特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其次，学习电影艺术史可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文化传统，掌握民族审美心理；以利于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中国电影是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能象镜子一样再现中国的社会情况，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翻一翻电影艺术史，从无声到有声，从商业片到政治片……这各式各样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影片，片片都是一个小社会，有时甚至一首电影插曲，就可能牵动万人之心，传之久远；一个影坛人物，有时会引起万民效仿。电影艺术史上的一部部影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和民情，而那些从外国传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影片是不能在中国立足的；国民党反动派为自己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少数影片，也很快便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总之，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一国民众自然也有国民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中国的电影艺术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学点电影艺术史对于正确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是很必要的。

（原载 1991 年 6 月 10 日《天津书讯》）

《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序

曹禺

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以来，一直在学业之余，为改进社会风气，也为教育自己，演普通话的戏。老师和学生编话剧、导话剧、演话剧，并且公开举行演出，受到京津观众热烈欢迎，当时还没有“话剧”这个名称，大家称这种戏为“新剧”，以别于旧的戏曲。

不久，这个组织定名为“南开新剧团”

南开新剧团于一九一九年开始编自己的新剧，也介绍国内外的话剧。这个专演话剧的团体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历经晚清、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当政，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它从没中断过自己的活动。是一个业余话剧团体。中国的话剧，可能先是从业戏剧爱好者草创的。后来，有了专业团体，话剧运动便更正规化，更为广大观众接受了。业余话剧工作者，在为富有意义的话剧摸索、探寻的道路上，用尽心力，终于起了一些作用，是有不少功绩的。

我小时在南开学校就学。约十四岁（1924年），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我离开南开大学，始终是新剧团的一个积极分子。在这短短的，对我又似很长、很长的六年里，新剧团扩大我的眼界，我决定一生从事话剧。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排戏的热烈、认真、亲切的气氛。我的青年时间可以说在这个极可爱的团体里度过。在有学识、有才能的导演张彭春教授十分严格的指导下，我跟同学们和比我大一二十岁的老师们，演了相当多的话剧。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演戏，怎样演戏，甚至于如何写戏的种种学问。这一点一滴的艺术知识是经过年复一年的舞台实践理解的。

彭春老师通过导演、演出，不断地指导，教给我们认识国内外许多戏剧大师。我时常怀念在南开中学礼堂后台和校长会议室排戏的情景。在那几间宽大、亮堂的房间里，我们专心排练，好像面对人生的战场，那样认真，那样充满战斗的气息。

我听说许多前辈和学长，其中，如周恩来同志也在这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写过关于话剧发展指导思想的文章。解放后，我才读到他的论述，以及他组织剧团，参加演戏，并亲自设计，制作布景的事迹。但更早关于南开学校如何开展话剧事业，我是茫然的。

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印了《南开话剧运动史料》。这部专辑确实把南开学校早期话剧活动，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的翔实可信的材料搜罗得相当完整。这部书是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同志，用了多年的功夫，辛辛苦苦，从各方面采访、征集、搜罗、甄别大量的材料编成的。他们把南开新剧团的话剧理论、剧团组织、演剧史实、活动记事、剧目汇览、部份剧目演员饰角色一览，以及一些评论文章和失传的剧本蒐集成书。

使我感到特别亲切的、并且给我很大启发的文章是周恩来同志写的《吾校新剧观》。这篇文章不只阐述南开新剧团为什么活动的旨趣，也是剧团的总结。它奠定南开新剧团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南开新剧团仅仅活动到解放前为止。但在我心中，它仍然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年年不断地演着新的话剧。当然，这只是我的幻想。实实在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这本《南开话剧运动史料》。

我希望它能引起爱戏剧的读者们的兴趣，把它看作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

书。

1984年9月11日于上海
(原载198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我国话剧史研究的新收获
——简介《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
崔国良

周恩来总理在世的时候，曾多次谈到天津和北方话剧运动的问题。他曾对曹禺同志说：写中国话剧史，“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又对戏剧家凤子谈过：“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运动一点都不谈呢？”我们遵循周总理这个遗愿，着手进行搜集整理南开学校（包括中学部和大学部）编演话剧的史料。经过几年的努力，《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以下简称《史料》）一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曹禺同志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我希望它能引起爱戏剧的读者们的兴趣，把它看作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这部书收录了南开学校话剧团一九〇九——一九二二年间的详尽资料。分为南开话剧理论、南开新剧团的组织、南开话剧史话、南开演剧活动纪事、南开演出剧目汇览、南开话剧部分剧目演员饰演角色一览、南开早期话剧剧本选、南开早期话剧部分幕表、详志、评南开话剧以及南开早期话剧剧照等部分，涉及到我国话剧的产生，早期剧团的组织建设，早期话剧理论的倡导和研究，最早的话剧剧本和导演等问题。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天津是我国话剧的发祥地之一，南开新剧团是天津开展话剧活动历史最早、时间最长久的一个话剧团体。一九〇八年，南开学校校长、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去欧美考察。他从欧美近代戏剧艺术中得到启发，回国后立即着手编写新剧，并组织师生在课余演剧。一九〇九年，南开学校演出了由张伯苓自编、自导、自演的我国第一个按照西洋话剧的编演程式、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三幕话剧《用非所学》。一九一〇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赴美留学。他虽然攻读哲学和教育，但却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钻研欧美的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一九一六年秋，张彭春带着他在美国创作的写实剧《醒》回到南开，立即投身到南开新剧团，并负责导演南开话剧。这样，南开新剧团从一九一六年开始，就有了精通西洋戏剧专业知识，并且富有才华的导演。一九一三年，周恩来同志考入南开学校，积极投入了学校的话剧活动，并倡导组织新剧团，成为南开话剧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一九一四年五月，周恩来同志等发起组织并建立了学生业余活动组织——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南开新剧团便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正式成立，此后一直坚持编演新剧达数十年之久。

新剧团以张伯苓倡导的“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为其宗旨，把编演新剧作为培养人才、改良社会的工具。它以富有戏剧才能的爱国师生为骨干，采用招考的方式吸收新团员。新剧团有象周恩来、时子周、伉儷如、陈钢等一批擅编擅演的师生从事新剧活动，使得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团结向上的战斗集体。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南开新剧受到了京津等地广大观众的欢迎，也引起了文化界名流、学者的关注。鲁迅、梅兰芳、胡适、陈大悲、宋春舫等人，都看过南开新剧的演出或剧本。在南开新剧的影响下，京津一带一些大中学校和专业剧团纷纷改变和演出南开新剧。并且编演其他新剧。一时间，以天津为中心的话剧活动，波及到华北、东北，从而推动了北方的新剧运动。

收入书中的有关南开话剧理论研究的文章有十余篇。这些文章是师生在

编演新剧的同时，进行话剧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南开话剧活动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也同理论建设的显著成就密不可分。这些文章对话剧的社会功效、戏剧改革、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表演艺术、戏剧发展潮流以及剧本创作方法、编写原则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就学时，不但是话剧活动的出色组织者和实践者，也是话剧理论建设的杰出代表。他于一九一六年撰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高度集中和概括了南开话剧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从“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神圣使命出发，阐述了新剧对“贫极矣，智陋矣”的中国人民进行通俗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新剧的社会功效在于“感昏愤”、“化愚顽”、“开民智”、“进民德”。这篇文章不仅奠定了南开新剧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话剧理论的开篇之作。

剧本创作是剧团活动的中心环节，南开新剧团一直重视剧本创作，因而保证了新剧团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根据本书收录的资料，南开新剧团从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这一阶段，单是有记载的上演剧目就有近五十个，保留下来的幕表、详志有十余个，完整的演出脚本有四个。这些全都是师生自己编撰的。其中，最好的是一九一八年完稿的《新村正》。这个剧本描写以吴绅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如何与外国公司相勾结，把关帝庙一带的房地产出卖给外国人，自己谋得新村正的职位，以及具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李壮图与农民群众对吴绅的阴谋反抗斗争的故事。《新村正》出现在“五四”运动前夕，揭示了我国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走在时代前边，呼唤着“五四”运动风暴的到来，并有力地配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还要特别一提的是，《史料》一书收录的六十余幅南开早期话剧剧照，其中有六套完整的剧照。在这些剧照中，最早的一套是一九一二年演出时摄制的《华娥传》（共八幕八幅）。最晚的一套是一九一八年演出时摄制的《新村正》（共五幕五幅）。从这些保留至今的完整剧照可以看出，南开话剧从一开始演出，就采用西方话剧分幕分场的形式；它的布景设计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仅有出色的服装、道具，而且有灯光等现代化装置。

胡适在《新青年》上曾经写道：“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所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意味。……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胡适的这段话，较真实地评价了南开新剧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所应占的地位。

（原载 1985 年 1 月 14 日《天津日报》）

《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又续新编
—介绍《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23—1949）》
世甲

世甲《南开话剧运动史料》，是专门研究艺术和话剧发展史的史料书。该书“1909—1922年”部分，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其续编“1923—1949”部分，也已由该社出版。

该书“1909—1922年”部分出版后，曾引起话剧界和话剧史家的高度重视，它所提供的珍贵、翔实的史料，使话剧史家在写话剧发展史时，修改了以往人们公认的一些结论。诸如现存我国话剧史上最早的白话剧本不是胡适写于1919年的《终身大事》，而南开新剧团1918年已经编演了《新村正》，中国最早的话剧导演，应该是曾经在美国进修过话剧编导艺术的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张彭春教授，而不是张彭春回国后才出国进修的洪深先生；中国话剧理论的开山之作，应当首推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周恩来于1916年撰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

进入二、三十年代之后，南开话剧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其资料也更为丰富。该书续编收录了南开话剧运动1923—1949年间的全部史料，其内容包括：戏剧理论、演剧史话、活动纪事、编演剧目、编译剧本、剧团的组织与发展，以及部分珍贵的剧照。初编与续编合在一起，就将世界话剧史上极为罕见的——一个话剧团体近半个世纪的全部活动资料收集齐备。

本书续编，向读者提供了著名戏剧家曹禺走上戏剧道路的早期史料；发表了新发现的曹禺创作《雷雨》之前改译的三个剧本——《争强》（与张彭春合译）、《冬夜》、《太太》；全部披露了三十年代轰动华北地区的南开话剧团公演《财狂》的资料；系统介绍了抗战以后南开迁校四川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后的演剧活动的资料；同时，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学校剧团在革命战争年代利用话剧作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真实感人的材料……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曹禺的戏剧创作和戏剧道路，对于研究抗战前后中国话剧的发展，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都是极为难得的。

（原载1991年6月10日《天津书讯》）

漫游外国文学艺林的导游图——推荐《外国文学人物画廊》 福原

人们都喜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因为在广阔的外国文学艺林中，蕴含着一个人完整而形象的人类世界。但是，外国文学，包括东、西、古、今各国的文学作品，真是浩如烟海，其中不少名篇佳作，往往又是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巨制，要浏览一遍所有的重要作品，已非易事，更不要说精读和研究了。为此，就需要提供一幅漫游外国文学艺林的“导游图”，借以使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首先用最俭省的时间一览外国文学全貌，然后取其精华，并根据个人的研究需要和阅读爱好，制定好阅读计划。南开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外国文学人物画廊》，就是这样一幅阅读“导游图”。

《外国文学人物画廊》的编者，选择了外国文学名著中的一百个主要人物形象，将他们用精炼的语言文字描绘下来，列成一个琳琅满目、千姿百态的人像长廊。文学创作，自来都是以“人”为描写中心的；文学研究一向也都是以“人”为思维中心的。那末，阅读文学作品，也必然要以“人”为中心，就是说，读者要时刻把握住作品的主要人物的踪迹。这样，人物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也就一一在你目下，整个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本质思想也就不难把握，不难理解了。

《外国文学人物画廊》的编者，对其中选介的一百个人物形象，就其在作品中的主要活动、基本性格及其特征典型及意义都作了简要的评述。我们可以借此对“美与爱的象征”阿佛罗狄忒（维纳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到“与命运角斗的奴隶英雄”斯巴达克思的舍身精神。这里还展示了诸如“名垂千古的‘疯子’”堂吉诃德、“过早凋谢的报春花”朱丽叶、“孤独而忧郁的漂泊者”恰尔德·哈洛尔德、“典型的伪君子”达尔杜弗、“自强不息的真理探索者”浮士德、“‘多余人’的末代子孙”奥勃洛摩夫、“被社会压变了形的人”格里高尔、“真善美融于一体的女性”沙恭达罗以及“贾宝玉式的日本贵族”光源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群像。这一大批典型人物不但可以引导我们经历从神话时代到社会主义时代的漫长岁月、游历欧美及东方整个世界，而且可以引导我们去寻觅那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之美。

（原载 1987 年 4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文学视野的拓展——读《异乡异客》

史中兴

研究英美现当代文学，隔洋相望与登堂入室，感受是不同的。青年学者赵启光的文学评论集《异乡异客》（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一本登堂入室之作。他在美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并为美一所大学开创中国语言文学部，称得上是深入异乡，自然带来了考察的深入；仍为异客，则又表明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水土不同，花果殊异。如果以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评论模式想当然地推测理解西方文学现象，则难免一厢情愿，文不对题。作者在异乡生活10年，耳濡目染，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心理冲击有强烈体验，这无疑有助于他接近他的研究对象。西方现当代文学现象庞杂，现代派异象纷陈，现实主义也仍有它宽广的生存空间。这里重要的是，研究者不能作茧自缚。即使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也未必是我们习见的理想模式。可能他的艺术方法是很出色的，但思想却很平庸，不能超越流行观念，提出关于人生、社会和宇宙的任何独到的见解。作者瞩目的有当代“美国的契诃夫”之称的契弗，就是这样的作家。在他的描写中产阶级平淡无奇生活的画卷中，没有提供任何济世良方，如作者所说，他的人生观与在美国市郊能碰上的随便哪一位白领人士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凭了一种微妙的力量，成为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这个力量就是他的写作技巧。与传统的个性化的方法不同，他的技巧之一是反个性化。如果我们只把艺术方法定于个性化一尊，那么这种研究在没有起步以前就停步了。契弗小说中的人物，差异的似乎只是机会不同。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所有的主人公都成了一个人——一个中产阶级男人的化身（女子是作为男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存在的）。结果人们没有固定的独立性格。你要从中找寻哈姆雷特、高老头、维特这种有典型性格的人物，无异于缘木求鱼。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综合体。而每一个综合体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和自己同类一致性地位的丧失是他们唯一害怕的东西。人物的无个性化，却把美国中产阶级栩栩心态和在美国生活方式下的苦苦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契弗风格是很难被熟悉现代派风格的读者所赏识的，他耐心地等待了几十年，直到晚年才被列入名作家的行列。他用朴实的新技巧充实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为当代美国文学开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领域。

就象认为现实主义过时不符合西方文学现实那样，肯定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同样不能无视现代派在西方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任何一条文学溪流的出现，都有现实土壤为它提供河床。即使溪流污浊，那不也是反映了环境的污染？哈哈镜照出的人物固然滑稽可笑，却不是无中生有，那不过是现实人的放大扭曲变形而已。现代派的某些艺术方法尽管荒诞不经，但它采取放大扭曲变形的手法对资本主义环境下的“自我”及其无法摆脱的生存条件的表现，却具有震撼性的力量。在研究美国曾盛极一时的文学流派——黑色幽默时，作者对其艺术特色所作的剖析，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个不具备独创性思想、没有跳出美国当代文学“性和暴力”窠臼的文学流派，能够驰骋美国文坛十余年，独到的艺术手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西方现当代文学研究上，有人强调的是作品本身的所谓“内在研究”，有人则把作家的思想及其社会生活实践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二者可以各有侧

重，其实很难截然分家。作品不能离开作家，作家不能离开作品。作品有了影响，自然引起人们对作家的了解兴趣；对作家有了了解，反过来又会加深对作品的认识。作者的研究，没有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异。对于我国读者所熟知的海明威的研究，作者努力发掘的是他的独特经历和他所创造的人物之间的精神联系。海明威因创造一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子”形象而被西方论者称作“一头老狮子”。作者却把自己的论题定为《海明威的伤痕》。海明威一生受过无数次伤，他塑造的主人公也没有一个未曾受过伤。这当然不是巧合，作者在探索了战争、经济危机等因素给海明威身心带来的伤害后，特别提出海明威遇到的敌人里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对“美国之梦”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海明威，并没有从群众中发现力量的源泉。他象一个摇摇欲坠的走钢丝演员，拒绝扶住身旁的任何支撑物，认为取得别人的帮助是耻辱。给他安慰的是奋斗的过程本身，而不是奋斗的目的和结局。困兽犹斗式的悲壮气氛充满他的著作。于是作者以“海明威是一头受伤的老狮子”的论断显出自己的见地。对待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而长期来被西方评论家争论不休的英国作家康拉德，作者的研究则是作家与作品并行，思想与艺术同步。他逐一拉开康拉德六部重要作品的帷幕，同时检视着他生活实践的脚步。他作品中的悲凉、雄伟、壮阔、深沉境界跟他以全世界为舞台、在世界几个不同民族文化区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交相掩映，读者能够感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如何扩充了他的眼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和他的作品尖锐的内在预先矛盾及其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已经不是现实或浪漫一词所能简单加以概括了。

研究西方现当代文学，既在了解他人，也在发现自己。不具备中国文化的丰富素养，这种研究就难免会“失去自我”。这本论集中的有些篇章，由于作者调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积累而熠熠闪光。这本集子末篇是论述中国传统意识在避暑山庄中的体现的长文。文章阐述避暑山庄所体现的儒、道、佛、皇舆、诗的境界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显示了作者的中国哲学、宗教、文学的扎实功底。作者把此文的写作看作是80年代初开始研究西方文学以后再次回到中国文化的象征。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的根底，使作者的西方文学研究立足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集的后半部分，收进所译的被论述作家的代表作，评论和原著相互印证，增加阅读兴趣，也为读者的赏鉴留下了余地。

（原载1991年10月30日《文汇报》；《新华文摘》1992年第1期）

融文史为一体的英文版《英国文学教程》
白莉

该书以国家教委最新颁发的“教学大纲”为指导，同时充分考虑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培养对象的特点。教程内容体例独特，改变了以往教材文史分家的传统手法，融文史为一体，以史带文。叙述文学史的部分从宏观着眼，首先勾勒出英国文学史上的各个历史时期，然后在介绍各个时期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背景知识的基础上，概述英国文学的发展成就，对若干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及作品予以详细介绍，并选编一至两篇代表作供学生阅读。所选作家及其作品均为举世公认的著名作家及经典作品。

这本教程以英文编写，注重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体裁的丰富。文字水平适合师范学院及自学考试的英语专业学生。文选部分配以详细注释。

（原载 1992 年 1 月 10 日《天津书讯》）

《莫里哀传》译者前言

臧传真 孔延庚

本书是苏联作家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所写关于莫里哀的一部文学传记。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导演和优秀的演员。他一生共创作喜剧约三十七部，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的创作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旧框框，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整个欧洲戏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在我国早就翻译出版，并在舞台上演出，如：《悭吝人》（一译《吝啬鬼》）、《达尔杜弗》（一译《伪君子》）等。

作者以生动而富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这位喜剧大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展示了他从事戏剧活动和创作的艰辛历程。全书共三十三章，翻阅这部传记，一个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尽管作者利用的个别材料可能有失实之处，某些细节的描写上有艺术的虚构（原注中已作说明），但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佳作，值得译介给我国读者。本书可供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参考。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5年6月

（原载1986年1月30日《天津书讯》）

《古希腊戏剧史》序

朱维之

古希腊的戏剧繁荣，是人类戏剧艺术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古希腊人在戏剧艺术发展的历程中，为后来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希腊神话曾是希腊文艺的武库和土壤。由于希腊神话得到了充分发展，并为后人保留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精华，使希腊的史诗、雕塑和戏剧艺术很早就达到难以企及的地步。不仅西方近代史诗诗人、雕塑家和戏剧艺术家要向古希腊学习，把它做为主要的必修课，就是东方各国也是朱维之如此。

我国古代也曾产生过美丽、雄壮的神话传说，也曾以神话传说为题材产生过戏剧的雏形，象华夏的《大武》、楚的《九歌》都粗具大型歌舞剧的规模，具有古希腊那样发展戏剧的好条件。可惜我们的神话过早地转移为历史了，被保留下来的不多了。因此，我们的戏剧也就缺乏肥沃的土壤，中止了进一步的发展，直到宋元之际才重新兴起真正的戏剧艺术，从“温州杂剧”开始，南北的戏文和杂剧得到蓬勃发展。到了“五·四”前后，从“春柳社”开始，接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我们才有了新剧——话剧的崛起。几十年来，我国话剧的成就虽然还不够理想，但在“五·四”、“一二·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了其他剧种所未能起的重要作用，也产生了欧阳予倩、田汉、洪深、曹禺、郭沫若、夏衍、老舍、焦菊隐、黄佐临等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影响远及国外。

话剧作为一个剧种，永远有它的特点和魅力。要使一个剧种有进一步的发展，向前人学习是必要的，而人类第一个戏剧黄金时代的经验，更是我们学习的必修课。我们的话剧界和其他兄弟剧种的同志都应当虚心研究古希腊戏剧发生、发展和繁荣的经验而吸取其精华。有关古希腊戏剧的知识又是研究西方后来各时代戏剧的基础知识，因为他们谈论到新的戏剧理论时，往往要引证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例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数典不忘祖，一方面也因为古剧中有说不完的东西，有挖掘不尽的丰富宝藏。

我国目前还缺少关于希腊古剧研究的好书，还只能移译外国的名著。莫斯科大学希腊文学史专家拉齐克教授的辉煌著作——《古希腊文学史》是这方面最好的参考书之一。本书是拉齐克《文学史》中重要的部分，也是精采的部分，对古希腊的悲剧、喜剧和新喜剧作了系统而详实的考察和叙述，对三大悲剧作家和两大喜剧作家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剧作分析，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的特点，都作了详尽细致的考查，对于每个作品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尤其可贵的是书中详述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例如最后一章中关于新喜剧作家米南德的许多新的材料，使我们扩大了眼界，也使剧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

（原载 1989 年 10 月 28 日《天津书讯》）

日本江户时代的名著
《南总里见八犬传》
丁介

《南总里见八犬传》（以下简称《八犬传》）是日本江户时代一部文学名著，曾被日本学者比作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江户小说之冠。《八犬传》自行世以来，在日本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1983年出版的依田百川的《谭海》中赞誉此书“文辞绝妙，引证精博。海内无不读马琴之书，而尤以《八犬传》为著。”在叙至其出版发行之盛况时则写道：“书贾雕工日踵其门，待成一纸刻一纸；成一篇刻一篇。万册立售，远迩争睹（据目睹者云：当时发行之盛况是彻夜张灯）。三都七道，边陲僻邑，公侯贵富，士女农商，提到小说必称《八犬传》为巨擘”。可见《八犬传》在日本社会影响之大。

《八犬传》的作者曲亭马琴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小说家。他本姓泷泽，曲亭马琴是他的笔名。他一生创作颇丰，仅读本类小说就有四十多部，其中《八犬传》则是他的代表作。

《南总里见八犬传》这个书中的“南总”是地名，指今日房总半岛的南部；“里见”是诸侯的姓氏；“八犬”指姓中有个“犬”字的八个武士。其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十五世纪中叶，正是日本室町幕府的末期，其间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嘉吉之乱”。当时，结城氏朝手下名将里见季基之子义实从结城突围逃至房总半岛的安房，在那里开始重新开疆立国。然而他在安房尚未站稳脚跟，邻国的安西景连便想乘其疲惫之机而灭之。就在安房城即将陷灭之时，义实对他的爱犬八房说了句戏言：“汝若能将景连之首级衔来，吾便将女儿伏姬许配给汝。”没想到八房果然衔来景连的首级，从而使局势化险为夷。为履行诺言，便让八房驮着伏姬进入富山。不久，伏姬因受大气而怀孕，她深以为耻。当她用短剑剖腹时，从伤口冒出一团白气，席卷了她颈上的念珠，珠串上一百颗小珠落地，而带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字样的八颗大珠却随同白气冲上天空，散向八方。于是以这段故事为开端，展开了八犬士一系列曲折离奇和充满血泪的惊险故事。在八犬士与各种邪恶斗争的艰难历程中，每当生死关头，都得到伏姬的神灵和宝珠的保护；在他们解逅的过程中，通过曾与伏姬有过姻缘关系的点大法师的指点，使他们悟到了前生和今世的因果关系。他们每人都保有一颗神授的带字的宝珠，各人身上都长有一块似牡丹的痣。这便是八犬士能够相认识并结交的标志。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使他们终于得以相聚，共同侍奉里见仁君。后来，在里见氏与镰仓两统领的联军大会战中，八犬士为里见家立下了显赫战功，因而都被封为一城之主，并迎娶了里见养育的八个女儿。最后，八犬士隐入伏姬死难的富山，化作仙人而不知所归。

《八犬传》是一部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巨制。在思想内容上，它一方面歌颂了正义、勇武、廉洁和奋斗精神，鞭撻了各种邪恶势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本书产生在十九世纪之初，所以作品中表现了严重的因果报应和劝惩思想，宣扬了某些怪诞、迷信等封建糟粕。这些都是应该历史地予以评价和批判的。在写作方法上，《八犬传》随处都可以看到《水浒传》的痕迹，但却毫无生搬硬端之感，真正达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足见作者之匠心。

（原载1991年9月25日《天津书讯》）

建立有中国气派的比较文学
——写在《中外比较文学》出版之时
· 张世甲 ·

自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以来，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讨论的热点。朱维之教授等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应当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学者应当在吸收、借鉴外国比较文学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编写该书的指导和所遵循的原则，而且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本书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具体阐述了马克思的比较文学思想、介绍了法国、美国、原苏联等各学派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自清末民初至八十年代大陆及港台地区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第二部分用较多的篇幅论述古希腊文学和古希腊伯莱文学的世界影响，并对中外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文论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比较研究。既注意了自古至今的历史线索，也兼顾了西方与东方两大地域，同时突出了中外文学类型的比较。

《中外比较文学》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比较文学教材。正如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等五位专家学者在为该书写的“评议意见”中的指出的那样，它的最大特色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全书内容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而且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这对比较文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增加了大量的比较文学实例更便于大学本科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了解与实际运用。三，重视中国文学与东西方文学的具体事实比较，这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扩大其国际影响具有实际意义。它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原载 1992 年 6 月 25 日《天津书讯》）

简介《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他》 书萱

当前，西方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大量涌进中国的图书市场，有些香风习习，不乏病毒杂陈。引起我国读者很大兴趣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就是如此。

陈慧同志的《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仍旧属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与无产阶级文学有本质上的差别。它仅仅是资产阶级文学内部的反传统流派，而不是同剥削制度和观念彻底决裂的新型文学。作者就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新时期的先锋”、“现代化的文学”是超脱于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学发展方向等说法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否定。

作者分别从哲学或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史、创作论等角度，专门剖析了“象征派”“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诸流派的本质特征，以及作为现代派文学思想论基础的“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

该书曾被《书林》评为畅销书，并受到多方好评，为满足图书市场需要，此书现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以饗读者。

（原载 1988 年 11 月 26 日《天津书讯》）

推荐一本嘉惠后学的史学专著
——读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陆申

杨翼骧先生的近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以编年体的方式汇总了从先秦至五代有关中国史学史的重要资料，从时间上看贯穿千余年，从范围上看，网罗上万卷，全书内容翔实，史料宏富。这是编者将自己多年的精心积累，向学术界作出的无私奉献。

研治史学的关键处在于尽量全面地掌握有关史料，特别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原始资料。然而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极费勾沉梳理之功，这是历史研究的难点。解放后虽然出版了一些中国通史、历史专题、断代史等方面的资料汇编，但长久以来缺乏一部专门的中国史学史资料汇编，这部书的问世，填补了史学界的空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大快事。

细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以下简称《资料编年》），感到本书的特点可以用真、朴、精、博四个字来概括：

第一，《资料编年》具有史料上真切的特点。全书源源本本，客观如实地辑录有关中国史学史确凿的原始资料，正如书前例言所称：“引录的文字，以原始资料 and 最早记载为主，后人的论述，除对于考证史学事迹确有必要者外，都不具录”。因此，本书向读者提供的是真切的史学史资料，保持了引文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决不做有伤原意的删节。对于一条史料不足以说明的问题，编者往往收集较早的其他记载，使之互相补充、互相比照，遇有记载歧异的内容，或兼收并存，或以简要的案语予以辨正，表现了编者传信存疑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资料编年》在史料上的存真精神，提高了本书资料的可信性。

第二，《资料编年》具有编纂上朴实的特点。本书完全采用编年体。首创公元纪年，次列各朝帝王的年号及年数。对于分裂割据时期的资料，于公元纪年之后，列出与本年史学事迹相关的帝王年号及年数，显得简明得体，无枝蔓冗杂之患。编年体是一种古朴的历史记载方式，它反映了史料和史事的天然的存在形态，有着线索简洁明晰、结构朴实、容易反映各种史事相互联系的优点。以编年方法汇总史学史资料，除了编年体的一般优点外，还避免了那种分类纂集在归类上难以确当、反而造成史料不便查阅的弊病。

第三，《资料编年》具有考订精审的特点，熔铸了编者深厚的史学功力。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汇总史学史资料，要比有些资料汇编采取的分类纂集方法困难得多，最突出的就是史学事迹所发生的具体年代问题。由于历史记载的缺略和大量史籍的佚失，致使许多史学事件发生的时间很难考订。《资料编年》已将先秦至五代所有值得一书的史学事迹都进行适当的编次，编者这种精研极思、辛勤工作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本书所加文字有两项，一是标题，二是案语，案语的主要内容，是对史学事迹发生时间的辨别、考订和说明，其中有许多精辟的推断。写法精炼，不事渲染。例如：公元 222 年“谢承约于本年前后著《后汉书》”条案语，引述《三国志》三篇列传的史料，层层勾索，推算出谢承著成《后汉书》的大致时间；公元 285 年“陈寿约于本年或稍后著成《三国志》”条案语，是通过研究《三国志》全书，才推算出该书完成必在公元 285 年或稍后；公元 373 年案语对孙盛卒年的推断，公元 493 年案语考证《南齐书》所载“袁炳”（曾著《晋书》）与《南史》

所载“袁仲明”应为一入，公元603年案语对《梁后略》著者姚最卒年的考证，公元809年对裴坦哪一年言史馆、史官改名一事的考证等等，都表现了编者融汇历史记载、娴于勾稽考索的功力。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史学活动的确切年代已是不可能考出的，本书编者对一些史事虽经缜密研究，仍然只可推算其发生的大致时间，这些情况在本书的标题、案语中都有所说明。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这样依约略年限编排的史学史资料是不是有失精核呢？不然！不仅不是有失精核，而且更表明了编者治学严谨和高度负责的编撰态度。考订史事年代是编年体的最大难题，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十分精核，但不能不采用国附叙法弥补许多史事年代无考的缺憾，有些史事年代，因难以确定，不得不一并删削。这部《资料编年》吸取了《资治通鉴》的优良方法，在每个王朝末年附叙本朝发生的一些年代无考的史学事迹。但是根据本书的特点，不能在王朝末年堆积过多的史学史资料，也不能因年代不明而加以删削，因而创用了依大略年限编次的方法，既可避免漏略，又能展示史学事迹的前后顺序及其联系，满足史学史研究的实际需要。这种经过大量的、细致的考证仅可推断大致年限的工作，是一般历史考据家所不愿承担的工作，而杨翼骧先生自任其劳，为同行和后学开辟榛芜，这是十分令人钦敬的。

除了编者自己的考订之外，本书也较多地汲取了钱大昕、王国维、钱穆等古今著名学者的研究结论，并在案语中一一注明，既不掠美，又给读者提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第四，《资料编年》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是收录的史料极为广博，基本囊括了从先秦至五代的所有史学史原始资料，征引的古籍除了历代纪传体正史外，还有各类史书、史注、文集、类书、地方史志，目录学著述、子部论著等等，共110多种，如果算上近现代人的历史考据著述，则有120多种。其内容除史家的史学活动及历史著述外，还特别注意到历代官方史学活动，史官制度，重要历史观点和史学见解的提出。如公元前338年，前240年，前233年商鞅、邹衍、韩非阐述的历史观，公元290年“晋朝议定以秦始皇元年为晋史之起元”，公元437年“北凉与宋互赠史书”，公元480年“齐初置史官……并立条例”，公元544年“柳虬曾阐述对于修史之见解，公元571年“魏收与阳休之、李德林等论修北齐史限断”，公元814年“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等等，皆是中国史学史上比较重要，而又未被一般史学史专著提及的史学事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本书对于影响小、成就低或史德低劣的史家及著述，已佚的史籍，亦收录有关资料，尽量勾画中国史学史的全貌，这种资料丰博而全面的特点，决定了本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

《资料编年》真，朴，精，博的特点，使本书兼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凡是研治中国史学史的学者，皆可将之作为一种兼能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书，这从各年代下的标题可以看出，公元282年题曰：“薛莹卒。薛莹除参撰吴史外，又著《后汉纪》。”这就将薛莹的两项主要史学活动开列于此，前后照应，弥补编年体将一人事迹割开的缺陷。这样的例子极多，表现了编者的深切用意。因此，《资料编年》是史学史学科中一部嘉惠后学的佳作。

由于本书编定工作十分繁重，也偶有欠妥或疏忽之处，如本书的题名，似不如改为《中国史学事迹编年》更为确切，公元708年载刘知几求免史任一事，引录《旧唐书》，《唐会要》的史料，似不如引录《史通·忤时》为

好。此外，在校对方面也存在若干问题，有些脱文、误字、倒字并未改正。当然，这类疏忽之处也无妨本书的学术价值。我们殷切盼望《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后续各册尽快出版发行，它必将对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原载《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

蓝天海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

蓝天海

中国史学史专著，目前已出版了多种，但为研究工作者提供的资料，还不曾多见。解放初，出版过《史记书录》一类的书，是就一部史学名著汇集资料，只能作专题研究参考，未能在整个史学史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系统地把先秦以来的史学事迹按年编录，为研究工作者提供的资料书，杨翼骧先生编的这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还属于首创。俗语说：万事起头难。对于这种首创性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作为同行，应当表示热烈欢迎。阅读以后，觉得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应予肯定：

第一，按年编录史学事迹，做到了巨细毕收。本书既录有历史上史学名家名著的事迹，也收录了次要的史家史著及其他与史学有关的事迹，收罗相当丰富。如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收录有“陈正卿著《续尚书》”一条。此条如与刘知几撰《史通》、杜佑撰《通典》比，是微不足道之事，但是它毕竟也是唐代的史学事迹，收录下来，既能衬托出唐代史学之盛的情况，并且在研究“尚书家”或“记言体”史书的发展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又如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收录“庾传美搜访史籍”、“史馆收集史料，以备修史”、“史馆请修本朝史”等三条，接着又在明宗长兴二年、三年，连续收录“崔悦建议购求唐宣宗时史料”、“史馆搜求唐宣宗至唐昭宗时史料”二条，这既能说明政治分裂时期的后唐，不仅重视当代史的修纂，并且还在筹备修纂前代史。像这里所举的史学事迹，在一般史学史著作中是很少会提到的，但是它们毕竟是中国史学史长河中的微波与涟漪，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

第二，体例严整，恪守书前的八条“例言”。编书必须有凡例，并且要恪守凡例，才能不流于杂乱。在本书例言中规定，书中收录的史著，排除了过去的目录书中曾列入史部而如今不应属于史学范围的著作，如神仙传之类；所收录的史家生平事迹，也排除了与史学无关的其他事迹，如政治、军事活动等。这样做的好处是：编者对资料已做了一番去粗取精的严格选择功夫，给参考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种去粗取精的严格选择，是编资料见功力的所在，是很重要但很难做到的一步。近年所见的某些资料书，选材往往十分粗疏，鸡毛与鸡肉杂烩一锅，使用起来颇为不便，给人以宁读旧著，怠窥新录的感受。本书则避免了这种缺点。

第三，案语精炼，恰到好处。本书所列史学事迹的年代，如引录的资料中没有明文记载。则编者加案语以说明编于这一年的理由，如史学界尚有争论，则再加案语介绍不同说法。全书案语不多，都写得颇为精炼，恰到好处。如将《国语》著成系于周贞定王十六年晋出公二十二年之后，加案语曰：“《国语》成书年代不可确知，因其记事止于本年晋知伯被灭，则其著成当在本年以后也。”这个案语如从考据学的角度看，似嫌简单，但本书为中国史学史资料，《国语》成书的具体年代，与书的价值关系不算太大，指出其成书上限也就够了。又如把《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年系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先加案语说明编者如此安排的理由，再加案语介绍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指出那是迄今未解决的悬案。这样，既表明了编者的倾向性，但亦不以此强加于人，任凭读者选择。

第四，编排眉目清楚，便于阅读。本书文字用了四种字体编排，公元年

代用黑体字，帝王纪年用仿宋体字，史学事迹用楷体字，引录资料用老宋体字。如有案语，用仿宋体字。这样，阅读起来能一目了然，颇为方便。同一条史学事迹，引录多种资料时，每一种资料都分行另起，既标出资料所在原书的卷数，亦标明资料的篇名，便于读者查对原书。凡是新出古籍已有标点者，编者并不盲从，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标点。这些都说明编者的编纂时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自然，诚如上面所说，万事起头难。初创的工作，取得成绩很不容易，而缺点或不足则在所难免。通读全书，觉得本书的不足之处有如下三点：

1. 资料有重复引录之处，有的重复有必要，有的重复没有必要，或可作技术性处理。如第7页在《国语》成书条后，引录《后汉书·班彪传》中的一段话，重复见于第42页班彪作《后传》以续《史记》并评论以前史书之得失条后；第23页在汉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条后，引录《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中的《移太常博士书》），重复见于第37页刘歆请立《古文尚书》于学官条后。这种重复都没有必要，后面应录而前面可省。因为后面所引与系年有关，且多为大段引录，能够说明问题，而前面所引既与系年无关，且往往只引三言两语，在当时来说又无关紧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又如第31—32页在褚少孙等补续《史记》条后，引录《史通》的《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中语，重复见于第39—40页杨雄曾续司马迁《史记》条后。这种重复虽有必要，但也可以采用“互见法”的技术性处理，于后面这一条注曰：“见前褚少孙补续《史记》条”（或“见××年条”），让读者自己前后对照即可。

2. 个别条目的资料删节或分割略有不妥，或把有关史学的语句删掉了，或把不必要分割的资料分割了，前一种情况如第111页《后汉纪》作者袁宏卒条后，引录《晋书·袁宏传》，删掉了传中原有的“后为《三国名臣颂》”一句。《三国名臣颂》具载于《袁宏传》，虽然不是一部书而是一篇论赞式的文章，但毕竟能代表袁宏的史学思想，传中全文具载，可见《晋书》作者已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删削似不妥，应一并引录才是。后一种情况如第119页和第125页把《晋安帝阳秋》作者王韶之的事迹分割成了两段，前段的条目为“王韶之约于本年前著成《晋安帝阳秋》”，后段的条目为“《晋安帝阳秋》作者王韶之卒”。两条引录的资料都是《宋书·王韶之传》，把仅有二百来字的本传资料分割成了两段。前一条既是难以断定的猜测，似可合并于后一条。因为《晋安帝阳秋》既非完书（记事只迄于义熙九年）而又非巨著，系于作者卒年也就可以了，分割成为两条似嫌烦琐（如前一条有可靠的年代是应当分割的）。

3. 校对工作过于疏忽，排印错误未校出者不少，虽然印了勘误表，而勘误表本身也出现了错误（387页误印为87页）。有几条资料排印错误是较严重的，影响了对资料的理解，现举几例如下：

第4页第19行漏排“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二句。同页第27行“适齐闻《韶》，漏半个书名号。

第10页第12行“不得用椁”，“不”前漏一“死”字。同页第24行“凡仁者以爱利为务”，“爱”字后多排一“利”字。

第16页第15行“号曰有巢氏”，“号”字后漏一“之”字。同页第16行“钻木取火”，“木”应为“燧”。同页第19行“夏后之世”，“之”字前漏一“氏”字。

第 23 页第 12 行“逸《礼》有三十九篇”，“逸《礼》”，应为“《逸礼》”，“九”字之后多一“篇”字。

第 205 页第 9 行的“……”不应有，因引录的《隋书·辛德源传》此处是连接的，引录时并未删去一字一句。

第 367 页第 21 行“文浚仕吴为中书舍人”，“文”字系“父”字之误。

通常认为著书不易，其实编书也并非易事。杨翼骧先生编纂这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花了许多年心血。其中魏晋南北朝部分早在“文革”前已发表过，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获得好评。这次第一册出版，必将引起更多的读者欢迎，并迫切地盼望五代以后的分册能尽早出版。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

莫建来

南开大学版《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详细叙述了中国从 1898 年戊戌维新至 1988 年间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并对各种政治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际运行与产生的社会效果、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读者既可从领略近百年来中国在探索、追求近代化民主政治过程中的艰辛与坎坷，还能从各种政治制度演进的斑斓画面中明了中国社会对不同政治改革方案的反应与选择。

本书史论结合，寓论于史，奉献给读者的，不仅有翔实、具体的历史知识，更有作者对于各种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及结局进行综合考察后的深刻反思。

（原载 1991 年 3 月 10 日《天津书讯》）

伦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伦理化

读《先秦政治思想史》断想

张光

在世界古代各国中，大概没有哪个国家象封建中国那样把伦理和政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是伦理化的政治，伦理是政治化的伦理。这是我读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掩卷之余的感觉。从这感觉中又生发出下列问题：为什么中国封建政治离不开封建道德？这种伦理化的政治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它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或许有人会诘问，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不也有公然只讲政治、不论道德的思想派别和统治者吗？如先秦法家和秦始皇。但是，秦朝的短命表明，偏执一端的法家政治思想是不足以治国安邦的。大体说来，封建政治的伦理化，在思想上是由儒家提供的；在政治上为绝大多数统治者所采用，尤其在秦亡汉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几乎没有例外。

伦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伦理化，是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的现象。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是一种最典型的君主家天下的人治主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认为，执政者，主要是君主，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对此，刘泽华先生写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毫无疑问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过分扩大了执政者的作用、但在君主专断的时代，这种说法也还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君主的一念之差常常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刘著 346 页）因此，古代思想家纷纷到执政者主要是君主身上寻找治乱的根源。与法家把国家的兴亡依托于君王玩弄法、术、势功夫之深浅不同，儒家把社稷之安危系附在君王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对君王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孔子把“政”解作“正”，“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就把统治和被统治、服从和被服从的权力压迫和制约的政治关系，偷换成上行下效的道德感染关系（参见刘著 347 页）。《大学》更明确地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把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作为政治之本，这“犹如石投水中引起环形水波一样，个人是政治的波源和中心，从而把个人的作用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刘著 356 页）《大学》、《中庸》的出现，标志着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成熟，此后不断有皇帝臣子、文人学者（如宋朝大儒朱嘉）重复之、发挥之、丰富之，使它深深地嵌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层。

儒家倡导伦理政治的目的和作用主要有二。其一，为了规劝和告诫执政者特别是君主，企图把他们的行为纳入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根本长远利益的轨道上来。儒家有鉴于祭纣之类昏主暴君胡作非为误国亡朝的史实，想给统治阶级开一剂使国运久长的良方。在儒家中，甚至也不乏有象范仲淹那样由忧国忧民而忧君的仁人志士。但是，在君主专制主义条件下，儒家除了从道德上规劝告诫君王，还能做些什么呢？而且，即便只是如此，也往往要冒着身首异处、九族株连的风险。在对君主没有任何制度的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儒家的道德说教只不过是一席软弱无力的空谈。历史告诉人们，除了极少数如唐太宗那样的“明君英主”，在很有限的程度内履行了儒家的君王道德之外，绝大多数皇帝都是荒淫无度的无耻之徒。

更重要的是，其二，儒家把封建政治伦理化，给血腥的专制统治抹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保护色。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浓厚的宗法特征，又为这层保护色提供了适宜的背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统治和被统治，服从和被服从的政治关系被比附为家庭的父子关系。“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这就是说，应当象对父亲尽孝那样对统治者效忠。显然对于被统治者和服从者的伦理政治规范，都带有强制的特性。至于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历来大都奉行“阳儒阴法”之道，深宫弄权术，朝廷讲仁义，集刽子手和牧师于一身。而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正是为刽子手披上一身庄严的道袍。对于他们来说，用儒家的伦理政治说来匡正自己的行为是虚，用它来欺世盗名才是实。应当承认，儒家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历史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这套欺骗把戏一直屡试不爽，叫座得很；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两千年来不绝如缕的盼望“好皇上”、“大青天”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固然体现了劳动人民求生存的愿望，但更说明他们的麻木，受骗上当而不自觉的麻木。儒家的伦理政治说对于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鸦片大麻；但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维持，确实不失为一剂良方。它仿佛从道德上制约了君主的专制统治，但实际上它的政治效果是强化了这一统治。正因为如此，儒家才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垂青。圣人词内，非儒莫入。而敢于无情揭露君臣、君民利害关系的法家，却没有一人捞到圣人的牌位。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虚伪比真实更有用，更着帝王的喜欢”（刘著 312 页）。

当然，执政者或政治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就当有相应的职业道德——政治的道德。而且，由于执政者比一般百姓担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使用着更多的权力，社会对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想，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人们，不会反对、反而强调作为一种职业道德的政治的道德，但应当坚决摒弃把政治伦理化了的伦理的政治；因为后者必然意味着：“撇开制度、政策而突出人，特别是把道德品质作为（政治的）首要条件，既不切实际，又常流于欺骗。”（刘著 347 页）值得人们深省和警惕的是，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和建设的涤荡，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存在的依据，而是一遇适合的条件（最主要的条件是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被破坏），就借尸还魂，卷土重来。“文革”期间狂热的领袖个人崇拜就是明证。

不了解中国封建道德，就无法撕破遮盖在中国封建政治上的面纱，也就无法了解中国封建政治的残忍；而不了解中国封建政治，就无法透视到中国封建道德的底蕴，也就无法了解中国封建道德的虚伪。两者互为表里。人们不可能撇开其中一端，而求得对另一端的深刻认识。同理，人们也不应当抛弃其中一端，而保留另一端。然而，现在却有人在对中国封建政治深恶痛绝、毫不留情的同时，却对中国封建道德恋恋不舍，赞赏有加。例如有人在总结中国近代史时，虽然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亦明显不如西方近代民主制，但却津津乐道于中国封建传统道德大大优于西方近代社会道德，甚至大有把它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之势。这无异于是捣烂了蛇窝，却把毒蛇引进自己的心窝，而毒蛇一逢适当的气候，就会从僵眠中醒来伤人害命。事实上，中国人在“文革”中不是曾被这毒蛇咬过吗？至今伤痕犹存，难道却已忘了疼吗？！

（原载《书林》1986年第8期；《读书》1986年第8期）

写在《清史史料学初稿》出版之时 佳火

清代的历史，由清朝入关建立全国性的统治政权始，至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止，历经二百六十八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是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同时也是思想文化方面有所成就的时期，而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清史相对其他专史来说仍尚属较新的领域。因此，研究清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状况和特点，总结清代历史上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经验及失败的教训，了解清代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对我们的今天的四化建设大有裨益，所以清代历史在史学界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正愈渐提高。历史研究必须掌握学术信息并详细地占有资料。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的史料学正可为您提供这种有实用价值的服务。清代迄今，有关清史的著述卷帙浩繁，其中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史料价值如何？如何入手查阅，整理与利用？针对这些问题冯尔康著的《清史史料学初稿》为广大师生和研究者提供了参考书。本书主要按清史史料的体裁进行分类叙述，共十二章，包括编年体、纪传体清代道史、政书、档案、方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纪事本末体、丛书及类书等诸类典籍、资料，同时还介绍了有关清史的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及外国人关于清史的著述。本书是冯尔康同志长期从事清史研究工作的成果之一，是迄今国内全面系统介绍清史史料的第一本著述。其中提供的大量学术信息，对于初学者可以一窥有清以来清史研究的全貌，对于专业研究者可以从中分析目前研究的趋势与动态。全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为了方便查阅，作者还精心编制了《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清代档案资料书刊目录》、《书名、人名索引》附于书后，以资利用。

（原载 1986 年 1 月《天津书讯》）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莫建来

南开大学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分二十二章，五十余万言，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这部书体系完备。先秦设八章，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政治认识的发生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形成；秦至清设十四章，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状况作了详尽的介绍。从总体上看，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分成四个层次进行论述；

其一、政治思想家的思想；

其二、政治家的思想；

其三、社会政治思潮；

其四、部分地论述了政治思想的政治实践。贯穿全书的一条基线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对于专制主义的制约、限制和批判思想。由于采用了新的视角，因而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前人之作。此外，在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本书也有所创新。一些其他政治思想史著作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的课题，在本书中均设专门章节予以详尽论述。

（原载 1991 年 3 月 10 日《天津书讯》）

集八十年研究成果
括国内外学术动态
《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问世
佳火

中国会党运动源远流长，上溯可到战国的游侠，下至辛亥革命以后。明清以来更是流派各异，组织繁杂。其活动地域之广，几乎遍布全国各省；会员之众，难以数计；声势之大，震天撼地。中国会党运动至近代渐成高潮，至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斗争，会党几乎“无役不从”，其中不少次且以会党为主体，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使其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实达到中国会党运动的最高峰。因此，全面开展会党史研究，深入分析会党的性质作用、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全面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当前史学工作者和有关社科研究人员的一项迫切而又重大的任务。然而，尽管会党史的研究早在解放前即已开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纵观中国史界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会党史的研究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许多重大问题尚未深入探讨，浩繁的资料尚未搜集整理，甚至连一部可供参考的会党简史也未曾问世，而相对海外一些学者和有关人士的研究看来，不能不说已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为了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一部综括八十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资料性工具书——《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由多年从事会党史研究的魏建猷先生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诸同志参加。搜罗了截至一九八三年底以前发表的包括台湾省学者及海外学者撰述在内的会党史论文八百余篇、专著七十余种（包括资料在内），其中很多已属国内外稀见的宝贵资料，逐一作了提要，并注明篇名（或书名）、作者、版本，使读者对八十年来国内外有关会党史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亦可按图索骥，以得其详。为了方便读者利用，书后还附有：（一）篇目；（二）篇名（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三）笔画顺序检字。

（原载 1986 年 7 月 15 日《天津书讯》）

《中国民主党派史》出版 莫建来

《中国民主党派史》一书，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现有八个民主党派产生及发展的历史，作了详尽系统的叙述。书中不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了各个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实际活动，而且还就它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经验教训等进行了科学总结。其特点是：

1. 采用按党派分类的体例编写。全书共设八章，一个民主党派就是一章，脉络清晰可稽，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对它们的产生、发展史有完整的认识。

2. 为突出历史的阶段性，书中对各民主党派产生及各时期活动的背景作了适当的分析和介绍，但作者极注意避免主要史实的重要、就是某些共同的背景材料需要交待，也能从各个民主党派的不同角度加以处理。

3. 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既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失误之处也不隐讳。

（原载 1991 年 9 月 10 日《天津书讯》）

《紫禁城》序 来新夏

五年前，我曾应莱茵之请为她的《故宫旧闻轶话》写过一篇小序。那时，我正六十岁，所以曾在序的结尾处写道：“我以花甲初度之辰，喜读莱茵的《故宫旧闻轶话》，很想提笔在书名后增题‘初集’二字，并自诩能在古稀之年夜读她的二集、三集……，并为她写新序。”

这本是我的一种祝愿，想不到莱茵只争朝夕，在时隔五年，我尚未到古稀之际，就拿出她和伯霖合写的《紫禁城》一书，并仍由我为之写序。这不仅莱茵的勤奋，也是我们之间一种难得的机缘。

紫禁城是明清二代象征政治中心的宫阙。辛亥革命前的几百年中，它是维系亿万生民的精神支柱；改朝换代也以谁主宫禁浮沉而定，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王朝倾复，但逊帝仍留居禁中，因此又翻云复雨地不断卷动政治旋涡，引起多少遗老遗少的眷恋和遐思。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离开宫阙，紫禁城失去了固有的禁区神秘色彩，宫阙和珍藏逐步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对巍峨的宫阙和耀目的瑰宝叹为观止；但是，宫阙的兴建沿革、藏品的艺术价值却知之甚少或知之不详，所以非常需要有一些历史、文物、考古专家来从事整理、研究、撰述和论定，使人们不致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之憾。

莱茵是历史专业的科班出身。她没有跻身侈谈高论，也没有沉浸咄咄征考，而是倾精力于旧宫历史的研究。三十年的岁月，她由文献钻研到实地考察终于使这座曾居住过二十四位皇帝，迄今犹存世界上仅有的大建筑群及其珍藏被完整而系统地历数其沧桑风雨。这正是一位长期没没的学者辛勤劳动的真正价值。

莱茵的这本书以明清两代历史发展为主线，融合了五百多年间的旧闻掌故和轶事琐语，她没有板起面孔说兴衰，而是娓娓动听谈往事。这本书是《故宫旧闻轶话》的增订和续篇。书凡十章，以宫殿立章，并围绕一宫一殿记史事、掌故、器物、建筑，兼及人物活动，致使一编在扼则宫史诸端均历历如绘，加以书端附图精妙，益得图文并茂之趣。

也许有人认为这本书只是杂录掌故之属，不是什么学术性的专著。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史文体裁，自古有多种形色，设仅拘一体，则史著将日趋苍白，为识者所不取。莱茵勇于自辟蹊径，独具匠心，则于学之外，更有识焉，我故乐为之序。

1988年中秋于南开大学北村邃谷
(原载1988年10月15日《天津书讯》)

悲歌慷慨八十年 沈嘉荣

《悲歌慷慨八十年》这本小册子简要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的历史。

这八十年，是中国人民血泪史、国耻史。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用炮舰和鸦片烟打开中国大门之后，许多外国侵略者都远涉重洋，来到我们国土，作了一番穷凶极恶的表演：侵占我领土，杀戮我同胞，吸尽我人民的膏血，掠夺或焚毁我大批古代文物典籍，还强加于我数以百计的精神枷锁——不平等条约。从而把独立的中国拖进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侵略者们用灭绝人性的罪恶行为彻底撕下了自我标榜的“人道”、“文明”、“正义”的面纱。

这八十年，又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爱国主义战歌。自从外国侵略者打进中国大门的一天起，中国人民从未停顿过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鸦片战争时期有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太平天国时期有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玕、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中法战争时期有冯子材、刘永福；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斗争的还有左宗棠、曾纪泽；中日战争时期有邓世昌、林永升；戊戌变法时期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辛亥革命时期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五四时期则有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代表人物。他们为了振兴中华，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或捐躯疆场；或鞠躬尽瘁。他们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他们留下的可歌可泣的诗篇词章，将传颂万代。

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回顾这八十年艰难曲折的历程，非常必要，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更应该熟悉祖国近代的历史。从这八十年，人们看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杀人、放火、抢劫、敲诈，其用心之狠毒，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从而启示我们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从这八十年，人们又看到先烈们前赴后继，英勇献身，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来侵略的顽强反抗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酷爱自由和平等的高贵品格。从这八十年，人们还看到：农民起义军倡导的平均主义，维新派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都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没有使旧中国从危机中获得解救。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生产技术的极端落后是造成近百年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历史的实践证明了，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这八十年，是令人沉痛悲歌的八十年，也是激励我们慨然奋起的八十年。让我们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继承先烈遗志，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华之腾飞而奋斗！

（原载1986年11月15日《天津书讯》）

既侧重资料性又有学术价值
评介《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
田桂林

最近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一书，刚一问世就引起了史学界人士的注意。我想，这是因为这部书既侧重资料性，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缘故。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长达十七年（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乱中，总统（或相当于总统）变换了七个，而总理则变换了三十多个。这种走马灯式的政治角逐，造成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而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和政权更替，也给后人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多年来，一些搞史的人希望能出一部专门讲北洋政府总统和总理的书。杨大辛主编的《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的出版，可以满足一些史学工作者的需要。

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象明确，不枝不蔓，如书名所示，就是专门讲北洋统治时期的总统和总理的，汇编了他们的传记资料，不仅评述了这些人物的生平和历史功过，同时也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概貌，书末又附录总统、总理及历届内阁成员更迭纪要及起迄年表，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

该书不仅资料性强，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撰稿人来自全国各地主要省市的高等院校、历史研究机构和政协文史部门，而且多数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人物客观地进行具体分析，褒贬兼容，这是很可贵的治学态度。北洋政府的首脑人物，从总体上说，大都是该遭贬伐的人物，但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对待，未囿于以往的定论，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人物虽应否定，但在他的一生中也做过某些值得一提的好事，有些人则保持了晚节。所有这些，作者们都注意到了并有所反映。因此，这部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有些观点也可能会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部书还有一点特别令读者感兴趣的是，对书中所选人物均有照片，而且多数是近几十年来很少在公开出版物上披露过的。据了解，有些照片找起来相当困难，犹如大海捞针，但编辑们以为读者负责的精神，千方百计地寻觅，终于把三十六个人物的照片搜集齐全，使读者得识“庐山真面目”。

（原载 1989 年 8 月 15 日《人民政协报》）

——读《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 来新夏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曾出现了一个由北洋军阀集团连续统治达十六年之久的北洋政府。这一变动连锁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最重要的明显变化是：封建专制一变而为民主共和，皇帝大臣一变而为总统总理。名目虽变，衣冠也易，但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却多是似曾相识的旧面孔；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是清末内阁总理大臣；第一任正式国务总理唐绍仪则是前朝尚书巡抚，遗老遗少成为民国新贵，走马灯式地在民国舞台上旋转。十六年间总统（含与总统权势相当者）七人，总理易乎四十六次（包括代阁）二十九人。除政事堂国务卿外，任事多者年余，短者数月，甚至有数日即夭者。人物有昙花一现，瞬息消逝者，也有死灰复燃，蹶而再起者。光怪陆离，热闹非常，这就是民国史上的所谓“阁潮”。

“阁潮”的起伏变幻，人物的生张熟李，大名鼎鼎的巨公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之辈自有传谱，人尽可知；而朱启铃、龚心湛、贾德耀、胡惟德之流则过眼烟云，素昧生平，鲜知其经历，尤其是汇聚总统总理袞袞诸公于一册，尚未见专书。

不久以前，曾读到张模民著《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列传》（台商务版）一书，文笔固有所取，史料实难凭信，加以未入总统，终嫌欠缺。杨大辛先生等有鉴及此，乃多方邀约，分头撰述，未经年而众擎易举，书稿终汇一手；复经主编诸君商约文字，审定成稿，题为《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计收总统七人，总理二十九人，都三十六人，人各为传，以任事踪迹而定篇幅长短，多则数万，少也数千，叙事力求详备，引据总归翔实，论断多属叙事，实为前所未有之作。

民国元首、阁撰的其人其事既备，而庐山真面犹未遍识。袁、段、冯、张的图象所在多有，不难寻求。其它多人则实不易一索可得，主编者为此复多方收求，悉心辨认，使读其传者复见其人。影像搜集之全备也为前此诸作所罕见。

《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一书的主编杨大辛先生从事文史编研工作数十年，社会联系广泛，旧闻轶说知之甚伙，文笔复细腻流畅，虽稿源不同，但一经通贯，大体尚趋一致；史料征引也无堆砌叠出之赘；附表多种尤利翻检。通读全书，既资科研教学，又饶有谈助兴味。

当然，一项补缺工作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一书也尚有可议者，如各传安排，稍失平衡，篇幅长短基本上视作者掌握材料多寡而定，史源发掘尚欠深广，致使生疏人物之传似嫌单薄，熟识人物之传又感繁复。各传评论人物多就事论事，而于所处时代缺乏足够分析；但各传分立，时间跨度不大，每篇皆论背景，又将重叠。设主编者于通读全稿后，为民国十六年间“阁潮”撰一概述，冠诸书首，则不仅可补诸传不足，尤可作读全书之锁钥。类此各端，可待改进，以使此书日臻完善，这可能也是编写者的初衷吧！

（原载 1989 年 7 月 8《天津书讯》；
《书林》1990 年 3 月）

谈《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的得失

张可荣

备课之际，得《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一书，甚为欣喜。它将北洋军阀时代历届总统与总理的生平事迹和上台下台的具体原因用较为详实的史料加以描述，并有简约的评论，从而理清了此一时期历届总统与内阁总理承接和更替的基本线索，勾画出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概貌。既是一部北洋首脑人物的传记资料汇编，也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北洋政坛变迁史，正如彭明教授所评“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书后附录的北洋政府《总统总理更迭纪要》、《历届总统、副总统简表》、《历届总理简表》、《历届内阁简表》，方便了使用者检索。不仅如此，全书各篇篇幅份量适中，人物评论褒贬兼有，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当然，欣喜之余、我也并不认为本书已经完美无缺。首先，中国近代史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对中国内政的插手干涉是北洋军阀出现和军阀混战与权争的根源，也是北洋军阀上层统治频繁更迭的主要原因之一，北洋军阀得以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这两个方面是撰写这个时期历史不能不说明和反映的事实，但本书对此交待略欠不足，对这两方面的史实介绍也较少。其次，本书的有些评论也不尽确切。如在肯定唐绍仪对维护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完整方面的功绩时说“一改过去清朝旧官僚在对外交涉中“一味求和”的态度”一句就不准确，其实，在唐绍仪之前的清末外交家中如唐绍仪者或比唐更具好名声的也不乏人在，譬如：左宗棠、曾纪泽、杨儒等就不能说他们在对外交涉中是‘一味求和’。最后，如编者所言，因为有些人物的史料缺乏而没有得到全面反映，这一点也是需在再版时补充的。尽管如此，本书价值不容低估，其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段历史研究的现状。

（原载 1991 年 3 月 10 日《天津书讯》）

《天津近代史》前言 来新夏

天津是我国北方的重镇，首都的门户。如果仅从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还不足以称为历史悠久；但从它进入近代社会后的急速变化来考察，近代天津无疑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因为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在天津近代史中有所反映，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所以研究和编写天津近代史不仅有益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而且还将提供一部信而可征的乡土教材。这正是我们愿意在过去许多同志所进行的资料纂集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通力合作，编写这部《天津近代史》的出发点。

—

凡是编写一部史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断限和划分阶段。这是史学界饶有兴味地进行争论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和划分阶段问题也有过几次争论，但迄今未能完全定论。具体到地方史，更具有某些特殊性。它既要考虑全国，又要结合地方，因而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的意见。这部书的开端采取了1840年的传统说法；有的意见认为1860年的被迫开埠，才使天津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其意当以此为开端、这就忽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大沽口的重要史实。至于下限断于1919年或1949年都有一定的理由。本书只是为了编写便利和有较多同志的分段习惯而以1919年为下限。

天津近代史的划分阶段问题，过去有些同志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提出过见解。“两个过程”的论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不过在具体划分时还有某些出入，如有的同志将天津近代史划分为1840—1860年、1861—1894年、1895—1901年、1902—1919年等四段。我们同意四分法，但对第三、四段却略有异议。我们划分为以下四段：

（一）1840—1860年：在此期间，天津屡遭英法等侵略军的进犯；太平军的兵锋直指畿辅、逼临天津；天津原来沉静而凝固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冲击。处于封建末期的清王朝遇到了内外压力而开始发生变化。天津和全国形势一样同步进入了近代。

（二）1861—1894年：这是天津各方面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相继侵入——划分租界、设立洋行、银行、商品输入和资源外流等等，天津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人民不甘忍受欺凌，奋起反抗，出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天津近代史上最早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天津教案”。与此同时，天津还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举办了多种军事和民用工业，使天津的城市获得发展，民族经济开始起步，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

（三）1895—1911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我国更沉重地遭受各帝国主义的欺凌，但是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不甘屈辱、力求富强的意愿。尽管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强化，仍无法阻止民族经济的振兴和人民大众的奋进，终而引发了结束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极关重要的历史标志，天津同全国一样应当在此划

一阶段。

(四) 1912 — 1919 年：北洋军阀篡夺辛亥革命成果所建立的北洋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给天津带来了灾难，特别是以天津为巢穴策划复辟活动的翻云复雨，遭到了天津人民针锋相对的抵制。“老西开事件”的反法帝国主义斗争，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兴作了一次重要的表演；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起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把天津近代历史推向另一个新的阶段。

这样的四段分法既突出地反映了天津近代史的历史真貌，也大体上沿着中国近代史发展轨道进行。本书编写时虽然没有按段明确标出篇章，但基本上是依照这四个阶段的层次来描述天津近代这一历史时期的。

二

本书的编写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天津近代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来写的。但是，这个“缩影”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摘编或缩写，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近代天津的历史真实。我们从研究天津近代史实入手，它所展现的历史画卷对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重大事件几乎都有所反应，只不过层次有高低、时间有先后、规模有大小而已。所以天津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缩影的说法是对天津近代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

在编写这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在掌握较丰富的资料和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仅只是一种再编纂，而是进行了历史的反思。我们认为历史的反思是要重新认识历史，并尽最大努力体现历史的真貌。本书采取了不少已为史学界较多人所同意的观点。有些则由于我们根据发掘和掌握了信而可征的资料，经过考辨、分析与研究提出了某些见解和看法，这里只举例说明，如：

(一) 关于天津近代史上反侵略反帝斗争问题：过去往往不论时代背景，仅作共性认识而忽视特性分析，以致不易看到斗争的发展。天津近代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侵略反帝斗争，即“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和“老西开事件”。它们的斗争性质基本一样，但其斗争规模、斗争艺术和本身的弱点又各有不同。“天津教案”是近代早期的反侵略斗争。它以城市居民为主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则支持和推动了斗争。这次斗争由于时代局限带来了因东西方观念冲突而产生的若干反教排外行动；但它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揭露了清政府的媚外，显示了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同意把这次斗争认作是城市游民一哄而起的盲动行为的说法。义和团运动比“天津教案”的纯自发性斗争有所发展。它是粗具组织，抱有共同信念的一次反抗斗争。它虽在策略上有些不明智，采取了盲目仇教排外，甚至一概排斥西方物质文明的行动，使斗争蒙上了某些愚昧色彩，但它确是一次重大的反帝运动，制止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我们不赞成片面强调义和团愚昧、落后的说法。“老西开事件”则大异于前，因为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天津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天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它充当了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的领导者，在政治舞台上作了重要的表演。它远远超出“天津教案”和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斗争水平。它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群众，恰当地运用斗争策略，终于取得了胜利，为天津近代的反帝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们改变了未能充分估价天津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

由于对同一性质事物进行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不仅加深了对事物本身

的理解，同时也从发展趋势中给人们以鼓舞，激励人们的前进斗志。

（二）“洋务”事业的评价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是北方的“洋务”中心，举办了为数不少的军事和民用企事业。举办这些企事业的目的，当然主要是清王朝为加强镇压人民的力量以维护其封建统治；那些办“洋务”的人还夹杂着和顽固守旧势力争权夺势的动机。这是无需置论的一个方面；但又不能不同时看到，他们在“富国强兵”的愿望方面也具有希图与外国侵略者争衡的因素，因而这又是一场封建政权“自强”、“求富”的自救运动，而举办“洋务”所建立的若干工矿企业在客观上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产生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改变了近代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且还为近代工业培植了技术骨干力量。

（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侵入的问题：它们的侵入给天津近代历史带来了灾难。它们的侵略罪行应引起我们的痛恨而予以揭露和指斥；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文化诸方面所造成的客观影响究应如何估计？却又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例如设立学校、医院和办报等，它们主观上是含有侵略目的；但在传播西方文明和先进技术方面，对我国封建传统观念所起的某些冲击作用，并曾对近代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过的思想影响等客观效果都应加以分析。不过，对这些客观效果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因为这些是我们“挨打”的副产品，不足为训。

（四）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天津近代史上有不少见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他们有些已有所谓定评，但若从他们在天津的具体活动来观察，其评价却又有歧异之处。如袁世凯是历来被贬责的人物；但他于二十世纪初在天津推行的“新政”是有一定成效的。袁世凯的“新政”主要包括有变革军制、兴办巡警、考核吏治和创建实业等等。它们都对天津近代社会发展有利而难以一概抹煞的。即以在天津练新军而言，这是我国近代化军事制度的开端，在当时全国编练的新军中，它以装备精良、训练严格和饷械充裕而首屈一指。它不仅使封建统治者耳目一新，还引起帝国主义的注视。“北洋实业”在倡兴工艺、发展经济和扶助国货等方面也都有积极成效。虽然，这些“新政”还包含着不利于人民的另一面；但总的看来，它的客观上对稳定社会秩序、改革旧制、发展社会经济诸方面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应给袁世凯以恰当的论定。但也不因此掩盖他的秕政。他如李鸿章、聂士成、范旭东……等人物，本书在有关章节中，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

本书中还有其他一些见解和看法，不一定成熟，只是我们一得之愚，希望借此与读者共同商榷和研讨。

三

详细占有资料是本书编写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要求。我们主观上想尽力接触已刊未刊的资料，但间或由于见闻所囿，涉猎不广及某些具体窒碍，必然会有不少缺漏。综括全书引用的图书资料近二百种。其中以文献为主。文献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专著，包括天津地方志书、前人诗文专集和政书，近人专著以及外国人著作译本等；第二类是论文，除了解放前一些零篇短章外，近年来许多天津史专业研究人员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包括已刊未刊者，也有一定数量；第三类是资料汇编和丛刊，它以原始文字或加工后的表式提供采用。所有这些图书资料都是编写本书的坚实基础，我们对于征引的

资料尽量注明出处，并于书后附一《参考书要目》，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我们使用文献资料时尽量寻求原始记载，有些则通过第二手资料去追根溯源，如果不得已而使用第二手资料也大都注明转见以便读者翻检核查。我们更注意发掘新资料以订补史实，如采用定州知府金永墓志铭以补义和团领袖曹福田最后死难于定州的重要史实。对于一件史实、一个问题在不同文献中各有异说或一事多说时，在没有确证前，不鲁莽地定是非而采取附注异说、多说以存疑的态度，如天津租界被侵占地亩数即是一例。对于外人著述也不偏信其所谓“目击”和“亲历”而慎重考辨，如英人雷穆森所著《天津——插图本史纲》一书是天津史中的有名著作。他曾引述马哥孛罗的话，说天津在元朝已被誉为“天城”，这是一种误解，马哥孛罗所说“天城”实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而言。我们对外国人著述中的这类不确切史料就摒而不采。

我们还在资料处理上体现观点，如对历史人物除了以史笔加以褒贬外，更多地是以资料安排的史体来显示这个人物的资料多寡和历史地位。有些重要人物或有功绩贡献，或有较多资料者便在正文中根据资料写入小传，如李鸿章、袁世凯、聂士成、严复、周学熙、孙洪伊、白雅雨、严修、侯德榜等人均在正文列专传。有些人物因资料不足难以立传，则用附注尽量保留已搜求到的资料，如太平军的开山王、王小勇和义和团的刘十九、韩以礼等。有的则以附注来表示贬意，如张锦文、孟振生等。

除了图书文献外，为了更好地发挥乡土教材的作用，我们还考求遗址作为今地的注释，如原三岔河口黑炮台是当时内河御敌的重要炮台，经考求后说明为今河北区人民政府旧址。他如机器局东局、西局的旧址今释均能有助于读者按图索骥。

为了灵活并尽量完备地使用资料，本书分别采用记、表、图、传等不同体例。如书后附一《大事记》，既可贯串全书内容、又能补充书内难以涉及者。附表横行斜上，即便检阅，又可综括多种资料。图则左图右史、由来已久，所选诸帧可备形象观览，至于传例则已如上述。总之，诸体并用，不论对编者或读者，都是一种较好的史书编纂方法。

《天津近代史》在篇目设计上，以编年为经，以纪事为纬，政治、经济熔为一体，而立文化为专章，使一书在手，可得天津近代的概貌。它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天津近代历史的乡土教材。上述对天津近代史的划分阶段、对若干史实和人物的看法以及如何采集与运用资料等问题，只是我们一些远不够深入的探索性意见，希望勾画一个轮廓，供读者阅读全书时参考。这些探索究竟是否准确，则尚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原载 1987 年 2 月 28 日《天津书讯》）

《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出版

· 马代史 ·

这一“密录”，是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材料译编的，分“目录”和“文件录”两部分。这是一部研究孙中山、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日本外交史以及日本警务侦察工作不可不参阅的资料性图书。此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两部分，有内在联系，查检翻阅时，应前后参阅。“目录”部分，从孙中山先生 1913 年秘密前往日本至 1916 年回国，日本方面逐日密录的情况。所有记载，均以孙中山为中心，既有他的活动，也有与他有联系的中国革命者的情况，还有与他有来往的日本朝野人士的情况。这部分记录，相当具体，枝节不漏，时间、地点、活动内容、有关人士职业住所都有清楚的记载和说明。如 1914 年 7 月的一次中华革命党党员聚会，不仅有开会时间、人数的记录，而且记有为什么会址由当初的“民国社”改在“精养轩”、谁负责接待、谁先发言、孙中山演讲内容以及某人举动可疑有关人“商议后准备让他退场”。“文件录”收有当时孙中山的演讲、谈话内容，革命团体的文件章程，日本政府有关机关的函电指示，袁世凯政府的公文函件。如日本牧野外务大臣致兵库县知事电“让孙逸仙尽快赴美，不要停在日本”，为“日本国内安宁及东洋和平，不得不加以干涉，乃至高压手段”；日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要求外务省电告上海领事团将住在日人经营的旅馆之“携带炸弹”的革命党人李烈钧等“予以逮捕”并引渡给袁世凯政府，都是第一手资料。

孙中山在日本是在怎样的困难条件下联络同志、筹办款项、努力解决革命党缺乏战斗力的？是怎样在日本友人协助下与日本财界、军界、政界建立关系的？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是以怎样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领导革命运动的？日本政府为什么由开始的反对孙中山留在日本的态度后改为“保护”与“监视”相结合的政策？日本又是怎样从“扶袁渡过难关以加强对他的控制”转为利用中国反袁情绪支持反袁政策的？这本“密录”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然，像“目录”中的情况，多是日本“监视侦察”、“便衣巡查”者或负有特殊使命的情报人员报告的，其中难免有假有誤，研究这些材料时，自应分析甄别。

（原载 1989 年 3 月 18 日《天津书讯》）

《愿后死者长毋忘》序言

李瑞环

震惊全国的“三一八”爱国反帝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央北方区委的发动和领导下，北京爱国学生与民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和声讨反动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当爱国学生到执政府请愿时，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当场有四十一人遇难，二百余人受伤，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天津籍燕京大学女学生魏士毅亦在惨案中为国捐躯。

魏士毅一九二四年出生于天津，十五岁时参加五四运动，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九二三年入燕京大学学习，积极参加示威游行，高举校旗走在队伍最前列，在反动军警镇压中英勇敢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血沃中原肥劲草”，一个人革命倒下去，千百万人跟上来。“三一八”运动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深深地教育了人民，唤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东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中国人民受欺辱、受奴役、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英雄史诗，以及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种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育和激励。

在纪念“三一八”爱国反帝运动，缅怀先烈的日子里，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了纪念死难烈士魏士毅专辑。这对于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很有意义，对于推动我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很好的作用。希望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年同志，一定要学习魏士毅等先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原载 1986 年 9 月 15 日《天津书讯》）

研究日本近代外交史的意义

米庆余

日本近代外交史，是其近代史的重要侧面，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对邻近国家的方针与政策。仅此而论，深入研究它的实质与目的，以期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无论对日本人民还是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讲，都是必要的。

其次，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是近代以来却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因而在历史上也便留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特别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大陆政策”，就更是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我们研究它的根源、探索它的演变、揭示它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正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克思说过，“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使世界各国真正建立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也是本书的最大希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吴廷璆、俞辛焯教授和出版社同志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该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 1988 年 11 月 12 日《天津书讯》）

《结网录》自序

· 来新夏 ·

《结网录》是我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间所写文章和札记的选录。它主要反映我近年来学习清代历史并作些研讨工作的情况。我从八十年代始就立志想在学术工作中有点成绩。但事与愿违，四年一瞬而过，我并未达到预想的目标。如果恰如其分地自我评论一下，充其量只不过读了点杂书，写了点札记；或者为了加深认识，作了点缀辑资料、归纳问题的工作而已！按时髦术语说，只是进行了一点二次文献工作。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做了点开拓笔记杂著这一史源的尝试，对有些问题作了点描述性说明。因此，这本集子只能名之曰《结网录》。

“结网”的出处见于《汉书·董仲舒传》所引古人的格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句格言包含着一种教人循序渐进，网成自得鱼的寓意。正因为这句格言很合乎我这个才拙学疏者的口味，所以早在中年时期就曾以“结网”的态度沉浸于典籍杂著，随手札录，乃成四册，自题为《结网录》。不意后竟被毁于丙丁，所余笺笺，多涉及近代史事，遂甄选十一则入于拙著《中国近代史述丛》（齐鲁书社一九八三年出版），别署《结网小录》，借识依恋之情。现又裒辑八十年代以来所撰著文，仍题《结网录》，其意在说明诸文不过如网之成目。至于网之良窳与否，有待质之高明。自己能网得鱼固佳，设他人能借此得鱼尤感跃然而心喜。但从这些拙文看来，我这四年的结网工作并未织成一幅好网，甚或容有失扣的地方，出现了“漏网”；也许我所织的仅是一面小网，尚未足撒向江海。但我将一如既往，不计其功地结网、织网……以弥补前此的不足并纠正错结。至若师友教正，实企翘之！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南开大学北村邃谷

（原载 1984 年 5 月 15 日《天津书讯》）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

国良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一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分五个部分，其中回忆录部分有，姚依林写的《抗战前后我在天津的工作》，杨秀峰写的《回忆在天津所做的上层统战工作》以及程宏毅、姜思毅等回忆“一二·九”时期天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的情况。

（原载 1985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

《青州市志》拾萃

梁滨久

《青州市志》的出版，是青州市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我做为山东老乡、得以拜读，实乃幸事。读后感觉不错，认为可入佳志之林。由此产生了评论一番的想法。但鸿篇巨制，就笔者识力所及，难以全面品评，仅能摭取精萃，聊谈学习之心得体会。

一、总体设计。《青州市志》的总体设计科学合理，有其独到之处。全书以志为主体；首以概述领起；继以大事记纵贯；后以人物的活动联通各项事业，并藉人明史；附录拾遗补阙。整体结构谨严有序，浑然一体。而人物不入序列，免去了设章立节的不伦不类与不设章立节又与他志不相协调的弊病，是一个创造。

志的部分采用中篇结构，也是兼取大篇和小篇模式之长而弃其短的办法，使得各篇内容适中，层次相宜，保证了总体结构的和谐。

二、宏观记述。《青州市志》的宏观记述写得精彩。全志的概述和有些篇前的无题引言，语言准确、凝炼，起到了梗概全貌，沟通联系，揭示特点，说明义旨的作用。特别是人物部分的无题引言与众不同。许多志书的人物篇前没有无题引言，个别的有也只是说明记载了多少人物，而《青》志指明了除“生不立传”之外人物立传的三条原则：本籍与客籍兼收，但必须是出生或活动于今市境内者；善恶兼收，以善为主；统合古今，详今略古。这对阐明义例，从而指导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物传所体现的精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果把这些编写原则拿到“凡例”中去说，一来与人物部分相隔太远，二来受“凡例”内容含量的限制，不能说得这么具体。所以这样安排是合理的。

在宏观记述方面，除运用“述”类（概述、无题引言）外，在经济类一些专篇前设了记述宏观、共性内容的章、节，如工业篇的“发展概况”章，农业篇的“综合农业区划”和“生产条件”章，烟草篇的“传入与发展”节，商业篇的“商业经营体制”章等，这也是体例上的创新，免去了将这些宏观、共性内容拿到各章从而造成屡屡提及的麻烦。

《青州市志》在宏观经济的编写上也创出了新的路子。现在省、市、县志对宏观经济篇目的安排有两种形式：一是将经济诸志中的宏观内容，如国民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或者还有经济条件、人民生活、经济效益等，集中设篇，多以“经济综述”名之，也有的叫“经济综合志”、“国民经济志”、“经济总志”、“宏观经济志”、“经济综合管理志”等。二是设“经济管理志”，分计划管理、统计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标准计量管理、审计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章。这种篇目设置，有的全书不写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经济结构等其他宏观经济的内容。有的将其他宏观经济的内容分到总述（概述），或在有关经济专志里去记述，如工业志中记工业布局，农业志中记产业结构，商业志中记行业结构、商业布局等。

这两种办法都有不理想的地方。第一种办法将宏观经济的所有内容都集中起来，可以体现宏观经济内容的整体性，较好地发挥对经济诸志的统率作用。但国民经济发展综合指标、经济结构等的内容和写法与经济管理的內容和写法不相协调。同为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做为国民经济的调节杠杆，对国民经济的全局及各经济门类之间的关系协调是宏观施控手段，从这方面来说，它属于宏观经济方面的内容。但是，它又有着做为管理职能部门的具

体工作，如计划管理含计划部门的计划编制、实施与考核工作，统计管理含有统计部门的统计调查、统计服务、统计监督等工作，物资管理含有物资部门对物资的采购、仓储、供应及物资回收的工作，物价管理含有物价部门对物价的控制与调节工作，工商行政管理包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集市贸易的管理、对工商企业登记、对合同、商标、广告等管理的一些具体工作。从这方面说，它又是微观的。如果将两部分内容写在一篇，是不协调的。而且经济管理的内容含量很大，容易造成各章内容上的偏沉现象。第二种办法，集中写经济管理，而将宏观经济的其他内容“乱安”或不写，也是不合理的。

《青州市志》独辟蹊径，设《经济总述》和《经济管理》两篇，较好解决了经济综述内容与经济管理内容放在一起不相协调的问题。而且，一般经济诸志都是把管理问题置后，目的是突出生产力发展和业务工作内容，使之做为专志立体。《青》志把经济管理置于经济诸志之后，和各专志管理的摆法统一起来了，应该说这是恰当的位置。《青》志的安排是对新志如何安排宏观经济的内容提供的新思路，对新志体例的创新是一个贡献。

三、地方特点。《青州市志》的地方特点是鲜明突出的。而突出地方特点的一个主要方法采用了“升格法”。如将烟草升格立为专篇。这是很有道理的。青州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成为山东最大的烤烟市场，交易量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以上。1979 年被国家确定为优质烟的外贸出口基地县。卷烟生产在青州市工业中成为重要行业，青州卷烟厂是全省三大卷烟生产企业之一，1987 年实现产值 27840 万元，利税 23549 万元，分别占全市工业产值、利税的 35.4% 和 77.1%，而在农业中，黄烟是青州市的主要经济作物，面积、产量、产值历年居经济作物之首。市内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承担着全国烟草农业科研的任务，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中等专业学校是全国烟草系统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可见，青州市已形成了烟草种植、加工、经营和科研体系完整的烟草基地。所以，从烟草在青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来提高其层次，是完全应该的。但不赞成“升格法”的同志有一个担心，就是怕升格之后，会使原归属篇章的内容造成空缺。而《青》志用编写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青》志将烟草立篇之后，工业、农业、商业、科技等篇中也没有忽略其位置，而是用总体提及和互见的方法处理。这样，既突出了地方特点，又不致造成内容上的逻辑欠缺。这也是《青》志为升格法创造的完整经验，证明这种方法还是切实可行的。

四、著述水平。《青州市志》的著述功夫是精到干练的。这首先是由于编纂者有较强的著述意识，象梁启超评谢启昆所说，“认修志为著述大业”。全志对资料不是简单地汇集拢来，更不是记编年流水帐，而是将立场、观点和爱憎感情融入编写中，对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和筛选，在此基础上加工提炼、归纳概括。其加工提炼之精，归纳概括之准，表述之朴实干练，在已出版的志书中都属上乘。

如古代人物的传记，或纠谬，或补缺，或藉人明史，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重新审查旧有资料，进行了新的加工创作，使旧史志人物焕发出新的光彩。

再如古建筑章真教寺节百字赞碑亭一目，在介绍了碑亭的形制之后，写“‘文化大革命’中碑亭毁，1985 年重立。”仅十几个字，却蕴含着鲜明的思想观点和丰富内容。

还有自然灾害章，不少县志都是将各种灾害捆在一起，依编年顺序记每

次灾害的发生和造成的后果；或先分类再依时记述每次灾害的情况，这种写法可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但对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读后难以寻出自然灾害的规律与特点，因而实用性受到限制。而《青》志使用的是经过归纳和概括的资料。如记干旱：“干旱是青州市（特别是西南山区）的主要灾害。全年干旱虽极少，而季节性干旱和连季干旱却经常发生。春旱最为常见，一般1~2年一遇，往往导致小麦减产和贻误春播。夏季虽少长期干旱，但短期的伏旱一般3~5年一遇，此季节作物大量需水，因而影响较大。秋旱2~3年一遇，影响大秋作物成熟及小麦播种，极易成灾，连季干旱，威胁更大。冬季连旱、春夏连旱、夏秋连旱、秋冬连旱及三季连旱都有先例。其中以春夏连旱较多，危害最大。”在做了概括叙述之后，《青》志又举出明崇祯十三年（1640）冬春夏连旱和1942、1972年春夏连旱造成大灾的证。这样既有一般情况的概述，又有典型例证，把旱灾的发生规律、特点及危害都说清楚了，对广大干部群众的直接利用来说，更为有利，免去了读者在一堆编年情况面前不得要领之虞。《青州市志》融汇资料，自铸新辞的例子是很多的。不一一例举。

（原载《青州市志评介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青州市志
一部国情教育的好教材
杨静琦

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教育，特别是国情教育的问题。他说：“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等等。”更于1987年5月26日，在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和第二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青州市志》正是一部这样的好教材。

我翻阅了《青州市志》后，闭目深思，浮想联翩。一个青翠碧绿、富绕美丽的青州市的画卷展现在眼前；一幕幕威武雄壮、凛凛冽冽的历史活剧的剧情在胸中激荡；一组组历史名人、起义英雄、革命烈士和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做出无私奉献的人物群像在脑海中掠过，令人肃然起敬；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数字、图表历历在目，令人振奋鼓舞。市志写出了青州是我们伟大祖国锦绣河山中的一个美好单元；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精彩缩影；是我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典型代表；是创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优异成绩的佼佼者之一。我深信，生于斯，长于斯，创造青州历史、建设青州的人们，读了《青州市志》会倍感自豪，会更加热爱青州，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没有到过青州的人，读了《青州市志》，会向往青州，渴望去一览她那青翠碧绿的的风采和诱人的文物、名胜古迹。为此，我认为《青州市志》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但同时是一部进行国情教育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

首先，《青州市志》从概述、大事记、建置、党派社团、军事、文物名胜、人物、附录等的有关章节中，以浓彩重墨，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述了青州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史，反映了青州历史上在全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地位。青州以在中华大地的东方，按古代五行学说“东方为木，其色为青”而得名。青州市历史上长期属于齐鲁大地沿海一带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曾为州、郡、府、路、行省的治所。明初始置山东行省时，青州是第一个省会，直至明洪武九年（1376）山东省会移治历城（今属济南市）。因此，青州从汉晋以来，直至明初济南兴起之前，长期是齐鲁大地上的名城重镇，地位显赫。尤其是青州的军事地位重要，它“东西扼中原大地于胶东半岛的通道，南北控沂蒙山区到鲁北平原的走廊”，历来兵家要控制山东沿海一带，必争青州，因此，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战争发生在青州，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成吉思汗、兀术、徐达等都曾率大军血战青州。因为青州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重要，历史上又是名人荟萃之处。寇准、范仲淹、宗泽等朝廷重臣，李邕、欧阳修、王世贞等文坛巨匠，都曾居官青州；郦道元、黄庭坚、李清照等蜚声文坛的一代名流亦曾寓居青州，更有王曾、王文统、刘国杰、邢玠、钟羽正、冯溥等一代名臣和燕肃、于钦等学术巨擘诞生在青州。青州人民创造历史的足迹，包括历代名人的活动踪迹，又

为青州留下了广布的文物名胜古迹，迄今青州境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址 291 处，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文物 12792 件，内有国家一级文物 6 件。青州有古城址 5 处，古墓葬数 10 处，其中有齐国国君墓葬 5 处 8 王，如有齐桓公、齐景公的二王冢，还有田齐国君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的四王冢。古建筑，石刻碑碣造像更是以实物反映了青州的歷史，其中范公井亭、三贤祠（范仲淹、欧阳修、富弼）尤为引人注目，今辟为公园、园内唐楸宋槐，古木蒙密，融人文、自然景观于一体；仿建的李清照故居，院内幽静，室内展出了这位闻名中外的女词人在青州生活、创作的情景。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又深受教育。《青州市志》记述了数千年青州发展史，是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其次，《青州市志》还在概述、大事记、军事、文物名胜、人物等编中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记述了青州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青州人民不堪忍受封建的残酷压迫与剥削，革命斗争连续不断。汉时，青州城郊曾飘扬过赤眉、黄巾军的义旗。金末，青州大地上曾呼啸过红袄军抗金的呐喊声。特别是以青州为根据地的杨安儿、杨妙真（女）兄妹与李全、李璫父子辗转于金、元、南宋三大势力之间，坚持斗争达 50 余年，势力达山东东部 12 州，后为 40 余城。明初又有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唐赛儿在益都（即青州，下同）的卸石棚寨率众起义，义军队伍最多时达数万人，席卷山东东部青州、莱州、莒州、胶州等 9 个州县。震动了京师，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明末，李自成率义军进驻青州城。清末，捻军，义和团在青州活动。

青州人民不仅有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传统，而且也是掀起反帝斗争较早的地区之一。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青州旗兵奉调出兵镇江，抗击英帝国主义入侵军。光绪二十六年（1890）青州旗兵再次奉调出兵北京，抗击八国联军，英勇作战，威震联军。民国三年（1914）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强占胶济铁路，10 月 5 日，日军侵占益都火车站，并开设“铃木洋行”和“小林洋行”，贩卖毒品、枪支、铜元等，毒化人民，掠夺财物。民国五年（1916）二月，葛家口村村民抗拒日军拦截日商抢购的制钱四车（手推车），日军掳去村民葛中信，葛被砍去双臂，不屈而死。民国六年（1917），益都火车站华工为保护工人利益，全站华工对日军开展罢工斗争，取得胜利。至民国八年（1919），北京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后，青州各界上万人集会，声援北京。青州学生杨同照登台演讲，当场断指，写血书：“赤心报国，身死志存”八字，使群情激奋，会后广泛开展爱国宣传，抵制日货。7 月 17 日，驻益都火车站日军拘捕爱国学生马忠怀，各界数千人示威游行四天四夜，对日军进行抗议声讨，迫使日军释放爱国学生。1922 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派王翔干、王尽美等来青州宣传马列主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6 年在青州建立中共党支部。之后，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逐步扩大。至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州境内分铁路南北建立益北、益南两块抗日根据地，青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青州人民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总之，为谋求解放，青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此而献身的烈士 1529 人之多。其中刘旭东一家一门九烈士。

纵观青州人民数千年来革命斗争史，虽然连绵不断，此起彼伏，有时亦曾威震一方，赫赫有名于一时，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人民的斗争都

是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才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了主人。一部《青州市志》记述了当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全过程。它生动地、雄辩地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再次，《青州市志》从概述、大事记、自然环境、居民、经济总述、城市建设、工业、农业、烟草、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经济管理、党派社团、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风情习俗、人物、附录等篇章的有关章节，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记述了青州的自然环境、资源优势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青州的迅速发展。青州居山东省腹地，胶济铁路中段，总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80多万人口。其“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负海之饶”。南部层峦叠嶂，绵亘百里；北部膏壤沃野，广袤万顷，全市山区平原参半。环城有云门山、驼山、玲珑山、仰天山、尧王山等，为青州的风景名胜区。青州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降水量中等，有弥河、淄河、塌河等三个河系十几条河流。青州地下地上资源丰富，有石灰石、铁矿石、红丝石、“太湖石”等矿产，并有山楂、柿饼、烟叶、药材等特产。

青州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及之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人民在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下，却不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的优势，发展生产。仅大事记上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上重大自然灾害。如“连年饥荒”、“僵尸满道”、“饥民食石粉”等达50多次，加之兵灾战乱，人民生命难保，怎能扩大再生产？因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仅为4430万元，到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发展到14亿多元，38年中增长30.6倍，每年平均增长8.8%，其中工业产值，1949年为525.2万元，到1987年发展到7.855亿多元，38年中增长118.4倍，每年平均增长13.4%；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占11%发展到1987年占56%。青州市已成为一个拥有49个（市属以上）工业企业，以轻工业为基础，机械工业为主导，行业较多，结构合理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品有500多个系列，5000多个品种，其中59种产品获国家、省、部级优质产品称号。青州市已发展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兴工业旅游小城市。与工业生产的增长相适应，青州城市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市政建设从桥梁、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供热、照明、房产建设、绿化美化、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取得很大成绩，尤其是青州市的城建突出了个“青”字，城周环绕是青山，全市区315条路、巷、胡同，路旁植绿树、绿篱，建绿地花坛。1987年绿化覆盖率达28.8%，并逐步向立体绿化发展，范公亭路和云门山路已基本上实现一年四季青，春、夏、秋三季有花，青州已从解放初期城区瓦砾遍地、街巷破旧不堪的旧貌换了新颜，已建设成为一座青翠碧绿美丽富饶的社会主义新城市。

青州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1949年农业产值为3905万元，至1987年发展到6.163亿多元。38年增长11.2倍，年平均增长6.8%。农业产值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49年占88%，到1987年降为44%。青州的农业生产条件在建国后38年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业机械从无到有，并大有发展，机械拥有量，1987年为45.31万马力，1949年农业机械是空白，1956年始有第一台匈牙利GS—35型拖拉机。1957年农业机械拥有量增至636.4

马力。1987年是1957年农机拥有量的712倍。水利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8年来，大兴水利建设，建有小（一）、（二）型水库26座，扬水站11座，加上水池水窖、塘坝等水利工程，1987年全市有效灌溉面积70.21万多亩，比1950年的18.3万亩增长近3倍。1978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大发展，1986年全市乡镇办、村办、联办、个体企业共9364处，各种专业户29764户。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离土、半离土务工经商的劳力占农业劳动力的37.3%。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工养农，增加了农业发展资金。加之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土壤改良、合理施肥、增大化肥使用量等多方面措施，青州的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均有很大发展，种植业以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为例，1986年平均亩产537斤，总产3.54多亿斤，人均498斤。比1949年分别增加4.4倍、7.6倍和4.7倍。林业生产的发展，使全市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0.5%，发展到1987年的18.9%，活立木蓄积量为42.05万立方米。尤其是本市的传统名产种植大幅度增加。如1949年全市有山楂树27.7万株，年产山楂200多万斤。1986年达到245.9万株，产量332万斤。1987年产果688.8万斤，比1949年增加2倍多。牧业生产，大家畜存养量由于农业机械的发展有下降趋势，但小家畜和家畜的饲养量大幅度增长。猪、鸡、鸭鹅的饲养头（只）数，1987年比1949年分别增加4倍、3倍、250多倍。1987年鸡蛋产7340.4吨，鸭蛋产342吨，鹅蛋产1117.8吨。桑蚕生产在青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商周以前已有萌芽，至秦汉而大盛。”但1937年日军入侵后，桑树多被砍伐，养蚕业毁于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发展桑蚕业，至1987年蚕茧产量达100万斤以上，比1956年增长2倍。尤其是青州的烟草生产历史悠久。1987年全市烤烟总产4288万斤，产值4507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5.8%，农业人口人均62.4元。青州的卷烟厂为山东省三大卷烟生产企业之一，1987年实现产值2.78亿多元，利税2.35亿多元，产值比1949年增长88.6倍。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州市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猛前进。工业、农业、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商业等等，1987年比1949年均成倍、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长。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亦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对国家也做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职工工资年均1235元，农民人均收入547元，城乡储蓄余额2.6亿多元，分别为1978年的2.3倍、8.3倍和18.5倍。1987年上交国家税利2.59亿多元，属山东省县级单位的第一名。《青州市志》记录下的这一系列反映青州发展变化的数字说明了什么？它生动地雄辩地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青州的“天、青州的“地、青州的“山、青州的“水，自古有之，但在旧中国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束缚了青州人民的手脚，禁锢了青州人民的头脑，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青州市志》以事实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谬论。

从1989年秋至1990年春，我曾两次粗读了《青州市志》，仅是粗读，有些部分只是翻阅。但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青州市志》从资料的丰富、观点的鲜明、体例的完备、文风的朴实、印刷装帧的精良等方面都是优等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与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样，《青州市

志》也还有其待改进之处，如某些资料、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对照核实，以提高资料的准确性，数据还有待于充实，以提高志书的实用性；某些章节的文字还需要进一步精炼，以求得更简明。这些是我吹毛求疵，或说是过苛之言，我总的认为《青州市志》是成功之作，是一部进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

（原载《青州市志评介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一部有特色的市志——评《青州市志》

刘伯伦

我有幸拜读了山东省的《青州市志》。一气读完，印象颇深。我没有读过业已问世的其它市志，故无从相作比较，但就从我已读过的几部新编县志来看，《青州市志》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青州市志办的同志仅用七年时间，就完成了洋洋上百万字的巨著，这里凝聚着默默奉献者的多少心血！

愚意以为《青州市志》有三大特色，这就是一新二可。所谓一新，是指其整体设计和体例上颇有独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谓二可，是指其可信，可读，故可流传于世。

先言其一新。一部著作（史志当不例外），如果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它著陈陈相因，没有什么新意，那么，这部著作可以说是虽坠地而未哇哇哭叫的婴儿，生而已逝。《青州市志》在篇目设置上独具匠心，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可见编纂者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全志之首为概述与大事记，中设建置、自然环境、居民、经济总述、城市建设、工业、农业、烟草、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经济管理、党派社团、政权政协、政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文物名胜、卫生体育、风情习俗等二十二篇，又独设人物，未设附录，显得结构匀称，大小适中，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设“居民”、“城市建设”、“经济总述”和“经济管理”篇。“居民”篇设得好。地方志作为地情资料书，必述一地的自然与人事。而人事之主体就是人即居民。我们知道，一地的人口总量、分布与密度，人口的民族、性别、年龄、行业等构成以及人口素质，对一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常见的志书多设“人口”，而《青州市志》独出心裁设为“居民”，“居民”显然比“人口”有更大的容量，能够包括“婚姻家庭”和“居民经济生活”。即此二字之差，足见立意之妙。“经济总述”篇也有独到之处。其下设“经济制度变革”、“国民经济综合指标”和“经济结构”三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总体概述了当地的经济状况，既醒目，又简炼，还全面，较常见的志书的“经济综述”显得紧凑、得体。“城市建设”是城市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篇目。《青州市志》在此篇下又设“城市建设规划”、“市政建设”、“建筑业”、“房产管理”和“环境保护”五章。可谓详而尽致，体现了市志特色。“经济管理”篇的设置也有独到之处，它囊括了“计划管理”、“劳动管理”、“物价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标准计量管理”、“审计监督”、“统计管理”和“物资管理”八章。综合概括为之高，实在非凡。其中，将“计划管理”列目，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常见志书所罕见的內容；将一般志书属政治或政府职能的“劳动”（常与人事合类）置入此篇，独具慧眼。“物资管理”归入此篇也显得与众不同。第二十篇的“文物名胜”立题也颇费斟酌。它既包括了人工的文物古迹，又包括了天生的自然风景（如云门山、驼山、玲珑山、仰天山、尧王山等）。对发展青州的旅游业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比自然风景归“自然资源”与文物古迹分门另设要显得集中，实用得多。符合方志“非示观美，以求实用”的宗旨。再说，《青州市志》在“农业”篇中设“生产条件”（内分农业劳动力，生产工具、农田水利、水土治理和肥料等五节）也概括得法，处理至当。其立目的功力，由此又可见一斑。

再谈其二可。一曰可信。真实性是地方志的生命。资料翔实，信息准确

是衡量一部志书质量高低的一条重要标准。与其空话连篇、假话充斥、倒不如不写一字。不写反能不浪费国家财金，不误人时间，更不误人决策。《青州市志》的述地记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继承我国“秉笔直书”的史风，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真实地记述了青州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可称为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一部信史。我们从其《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到编纂者的胆识。写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的大办公食堂和“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都如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写“1960年2月26日至3月4日，县错误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出‘反对老中农当道’的口号，先后拘捕2048人，其中错捕的占96%，死在狱中56人，后平反。”和当年“年内，由于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的影响，农业严重歉收，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全县营养不良而患水肿的达7万余人，出现饿死人现象。政府组织力量抢救，发放救济款99万元。”又如：“1975年11月29日，益都县委召开誓师大会，提出苦干两年，建成大寨县的违背实际的错误口号等。编纂者敢于写当年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足见其善良的用心，足见其对党和人民热爱之深。他们这样写，无非为的是今人和后人认真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不至重蹈覆辙。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志德！这是多么值得欣赏的志风！在该志“土地改革”一节中，写出了“由于当时战争频繁，支前任务繁重，斗争形式尖锐复杂，土改出现了一些偏差，存在着错划成份，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少数干部多占、贪污土改果实等问题。发现后很快进行了制止和纠正。”这也是“不虚美、不隐恶”之笔法。在该志“人物”中，我没有发现编纂者人为地滥插标签、强下定论的倾向。譬如，写杨妙真、杨安儿、李全、李璫的合传，就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他们的归从去就，而无有意灌输这种归从去就何是何非的迹象。在《概述》第一部分中写道“全市人均占有水资源861立方米，为山东省人均占有量的1.65倍，仅是全国人均数的18%。20世纪70年代后，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春冬季节河水断流……但境内除铁矿、石灰石外，尚未发现大宗为现代工业所需的矿藏资源。”这种以资治为宗旨持客观态度的写法，是十分可取的。这正是这部志书足以取信于人之处。

二曰可读、一部志书有无可读性，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语言的简洁，生动和准确。《青州市志》编纂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概述》就写得酣畅流畅，恣肆奔放。足见主编手笔不凡，底功深厚。首句“青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她以重要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发达的经济、灿烂的文化和众多的风景名胜彪炳汗青，更为绰约崭新的丰姿引人注目，扬名中外。”以高度的概括力点明了青州市的闪光之处，可谓画龙点睛，探骊夺珠之笔。在其第二大段写道：“青州又是历史名人荟萃之处，寇准、范仲淹、宗泽、张叔夜等朝廷重臣，郑道昭、李邕、欧阳修、王世贞等文坛巨匠，都曾居官青州；王曾、王文统、刘国杰、邢玠、刘珣、钟羽正、冯溥等一代名臣，燕肃、于钦等学术巨擘，都诞生在青州这片土地上；这里还哺育过酆道元、黄庭坚、李清照、冯惟敏、赵执信等蜚声文坛的一代名流。”仅120余字就写得富于变化、文采飞扬。至于第六大段写青州的风景名胜、更系妙笔。当笔者读到“在云门山上，置身云雾缭绕的‘仙境’，观览历代题刻，鉴赏隋唐造像，饶有风味；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驼山石窟前，可一睹栩栩如生的石窟造像的神韵；登临玲珑山，可观赏北魏青州刺史郑道昭的白驹谷题名；攀上仰天山，昼可看红叶如丹，夜能观秋月玉

盘；泛舟湖面，可欣赏山区的自然风光，领略渔舟唱晚的意境；置身当年悲壮广漠的古战场，可凭吊青州英雄儿女的英灵……”时，对青州的向往之心油然而生，以一睹青州名胜为快。方志的语言功夫还特别表现在人物传的撰写上。《青州市志》的人物传写得不俗。编纂者在重点人物上下了功夫，写出了水平。象杨妙真、杨安儿、李全、李瓊的合传就写得合有度，唐赛儿的巾帼英雄形象也写得生气虎虎、跃然纸上，至于著名清代学者李文藻、民国学界名流赵太侔、抗日英雄马功臣和杀人不眨眼的汉奸徐振中的传记，都写得个性突出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深刻印象。

古往今来，世界上从未有完美无缺的事物。更何况我国传统的方志面临着现代化的选择，有一个痛苦的嬗变过程。社会主义方志编纂刚刚起步，许多地方都在作着限难的尝试和探索，期望一下子冒出惊人的成功之作显然是天真的幻想。《青州市志》作为目前市志的佼佼者，自不能白璧无瑕。愚意以为，其主要欠缺之处在于科学性上。主要表现一是立例上有欠严谨。二是一些篇目设置和事物分类有逻辑上的疏忽和常识上的失误，三是一些章节详略失当。

先谈立例有欠严谨。1.《青州市志》在体现地方特色上作了不懈的努力。在二十二大篇中特设“烟草”一篇，在“工业”和“农业”编又特设“名优产品”和“土特产”专章。这种用心本无可非议。但从系统论看来，事物是有层次性和有序性的，若不同层次的事物列为一处，必然导致信息的误递和功能的紊乱。突出地方特色的愿望不能以违背逻辑和破坏层次性的高昂代价去实现。难道在“工业”篇中，首列烟草并以足够的篇幅去记述还不够份量吗？“工业”篇的“名优产品”是与“轻工业”与“重工业”章平列的，难道它们不分别属于“轻工业”和“重工业”吗，将它们单独立章，势必要与“轻工业”与“重工业”章中的记述重复，何必如此呢？难道非设专章不足以体现地方特色吗？当然，我们不应反对这种尝试，有些事物在无碍逻辑失误的大题下，独立篇章是应予首肯的，象《如东县志》特设“围垦”与《萧山县志》专设“能源”，《青州市志》独设“文物名胜”就无可非议。就“文物名胜”而言，可与“文化艺术”平列，因为“文化”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没有严格的定义；就“名胜”而言有自然山水，不在“文化”之内。2.“凡例”对某些细节考虑得不够周全，造成操作上的无章可循，“附”和“附录”的问题均由此而生。如日伪的事物“附”入，表示无形之贬。但“城市建设”中设附“乡村建设”，“中国国民党青州地方组织”附“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州地方组织”又是何因而附呢？“附录”附些什么，“凡例”也应作出明文规定，应附与青州有关的文献，象明赵秉忠的《殿试状元卷》与吴永昶的《赵秉忠状元卷试探（节选）》的文章本身就与青州无关，李清照的词《小重山》与《凤凰台上忆吹箫》虽系其在青州所作，但皆属男女相思之情词，亦与青州无涉。这些诗文选入附录，对了解青州并没有什么史料价值。

再谈逻辑上的疏忽和常识上的失误。如在“水文”章下设“河流”和“地下水”，“河流”就不如“地表水”严密。地表包括河流，但不全等于河流。“烟草”篇中设“卷烟”章，“工业”篇中“轻工业”章下设“卷烟”节，在目录中出现两次“卷烟”，是应避免的重复。在“农业”篇的“生产条件”章下设“农田水利”节与同篇“种植业”章下的“农田灌溉”节也有节目互相包容之嫌。

未谈详略失当。《青州市志》的《大事记》由于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方法，又想在“大事记”中记述志内无法涉及的一些“政治运动”，故在记中难免繁简处理失控。象一些组织、政府机构的产生，只写其什么时候成立就可，但又写了其领导人是谁。愚意以为领导人是谁并不属于大事的本身，应从略。再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等每届大会的召开，可写入大事记，但每届中的每次全委会不见得全部入“记”。除非有特殊影响的全会；象工会、妇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代表会只记其第一届代表大会即可，其它届是否要入“记”就要看其影响大小了。《青州市志》把上述每次大会的召开都入“记”，似觉多余。还有，将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到青州视察赠市委书记的一首诗也写入“大事记”，大无必要。此外，“人物”中对本籍人物和客籍人物（如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的立传处理也欠繁简有别。客籍人物传理应详其在青州的事迹，略其在域外的生平，或者干脆不写。客籍人物与本籍人物同一方式的立传，似有掠誉夺美之嫌。

上述小疵无损于《青州市志》的大醇。笔者以疏才浅学妄加评论，实在自觉汗颜，偏颇之处，还请编者与读者见谅。

（原载《青州市志评介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藏书建设论文集》简介 佳火

当前，世界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人类所需要的知识财富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长，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关键性作用。目前，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那么，作为贮存人类知识的宝库——图书馆应如何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便成为迫在眉捷的问题。为此，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四年秋在大连召开了“藏书建设研讨会”，专门就高等院校图书馆如何搞好藏书建设，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藏书建设论文集》便是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汇编。此书论文 24 篇，论文文摘 29 篇，涉及文献的资源布局、藏书结构、藏书的复审剔除、复本问题、藏书建设人员的素质、藏书的组织、藏书建设的总体要求、核心期刊的确定方法等八个方面的问题，既有理论性的探讨，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论证严谨，内容翔实。不仅将对高校图书馆的藏书建设给予科学的指导和帮助，而且对地方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也有同样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原载 1985 年 4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出版

佚名

由来新夏教授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已经出版两种：《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其余多种将陆续问世。

这套丛书的出版，为高校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教材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大了阵地。

已出版的两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如《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一书，是根据一九八四年二月原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由作者来新夏、惠世荣、王荣授撰写讲稿并于同年暑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系合办的社科文献检索师资培训班作了试讲，在征求学员意见，不断充实的基础上正式定稿。《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一书则由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北大分校十一所院校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中青年教师，集思广益，合力编写，出版后即作为这些院校的正式教材，边实践边提高，以期臻于进一步完善。

（二）结构体系上力求有新的突破。长期以来，若干图书馆学教材具有传统的模式。‘系列教程’两书的作者试图对此加以突破。以《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为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准则，将图书馆学纳入信息体系之中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俾使读者对图书馆学问题能深入地了解、剖析与探讨，纵观其精髓。

（三）能吸收与反映国内外科研新成果、新动态。《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在‘信息、知识与文献’、‘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比较图书馆学’等章中，参考与吸取国内外书籍报刊上所载的学术新论点、新见解与新动向，同时，作者又立足于国情，不照搬国外模式、而是适当介绍与分析，开阔读者眼界。《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一书还专辟‘电子计算机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简介’、‘社会科学机读数据库简介’等篇章。

（四）注意引导读者纵深学习知识、积极思考问题，提高学习兴趣。‘系列教程’的作者不仅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传播知识，而且努力诱导读者掌握学习要领，向高层次进军。如《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专辟‘积累资料、读书治学’一章，介绍读书方法、指导如何科学地积累材料、如何撰写毕业论文及学术论文，均为作者多年的治学经验，对青年学生大有裨益。

（原载 1987 年 6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深广·简明·严谨·便捷
——评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
罗德运

图书馆学辞典之作，50年代有卢震京先生的《图书馆学辞典》。虽皇皇百万言，但与现今图书馆学的发展相去甚远，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自然难以适应现今的需要。图书馆学在中国的真正发展，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80年代初开始的。而且，与图书馆学紧密联系的情报学和档案学，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之呼声的日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整合已成为这三门学科当今发展的必然趋势，尤以三门学科的知识整合更为令人瞩目，但至80年代末期还未见一部融贯三门学科的辞典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来新夏教授主编，南开大学、湘潭大学等12所大学合力编纂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以下简称《三学辞典》）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它的出版，也是8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和档案学界研究成果的总结。

要编纂一部融及三门学科而又言明“简明”的辞书，其实并非易事。首先是要确定收词范围，以保证辞典的质量，因质量是辞典的生命；其次是要照顾读者的经济能力，以读者易于承受力度。这就要求编纂者要达到的目标是：词目选取深广允当，词义阐释简明精当。实现此目标，殊非易也。我忝为《三学辞典》编委，参加了从酝酿撰写，到初审，直到终审的全过程，个中甘苦，自有体味。1986年1月，《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会间议及编纂一部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辞典是三门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会中乃成立编委会，公推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来新夏教授为主编。是年7月，来新夏主编主持在承德召开首次编委会。编委们开始酝酿选题，确定体例，设计框架，拟定规范，划分专题，筛选词条。并按地区由各编委分别承担专题，落实词条撰写工作，经过编委们和近百位撰写人近1年的努力《三学辞典》遂成雏形。翌年5月，第二次编委会，即初审会在湘潭大学召开。会上提出，一定要保证辞典的质量，以准确度、规范化、语言精练、查检方便为质量要求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和前提下，对词条内容再次进行删补，并要求全力以赴，加快编写速度。旋至7月在兰州大学召开第三次编委会，即终审会，按专题对词条逐条审核，历时半月，遂告初成。之后，又几经反复，于1989年交付南开大学出版社付梓，迨至1991年才与读者见面。从动议、酝酿到出版、发行，历经5个寒暑，《三学辞典》乃告大成。它是集体合作的结晶，凝聚着百余人的心力。作为一部工具书，它至少具备如下几个优点。

第一，内容深广。衡量一部辞书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当然首先是其所包容的信息量的大小的程度。毋庸置疑，在一定的篇幅中能够容纳至深至广的内容，应是一部高质量的辞书的必备条件之一。全书收录三门学科的名词术语、人物、著作、事件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条目共4222条，包括“专著一览表”、“刊物一览表”、“专业设置一览表”、“常见机构术语缩略语一览表”、“各国标准化组织一览表”和“ISO各技术委员会（ISO/TC）名称及其创立年代一览表”等6个附录在内，凡89万字。为全面反映和揭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各自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及其三者之间互相渗透、互

相整合的情况，编委会将三门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分为 23 个专题：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2. 图书馆管理；3. 藏书建设；4. 读者工作与研究；5. 图书馆事业建设；6. 图书馆事业史；7. 图书馆学思想；8. 文献分类与主题；9. 文献编目；10. 中文工具书；11. 外文工具书；12. 目录学；13. 目录学史；14. 古籍与版本；15. 中国书史；16. 情报学；17. 文献检索；18. 情报分析和研究；19. 情报编译报导；20. 图书情报现代技术；21. 图书馆建筑与设备；22.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23. 档案学。于此，我们不难看出，它涵盖了三门学科内容的方方面面。编纂者们力求多方面、全方位地向读者提供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信息、实际工作经验和各种资料，注意了理论性、学术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三学辞典》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理论研究者、从事图书情报档案实际工作人员和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情报学专业、档案学专业学生的案头必备工具书，是编纂者刻意努力的目标的实现，而决非自诩之词。

第二，阐释简明。本书名之曰“简明辞典”，“简明”是其最鲜明的特色。为便于撰写者准确地把握每一具体词目在其所属专题及全书中的地位，编委会决定对词目释文字数实行分级严格控制，以实现“简明”的目标。这就是：将词目按其在所属专题和全书中的地位，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三个级别；一级、二级、三级词目一般分别不超过 500 字、300 字、200 字；一级、二级词目分别不超过本专题词目数量的 $1/5$ 和 $2/5$ ，三级词目不少于 $2/5$ ；释文超过 500 字者，则必须控制在在本专题词目总数的 1% 以内。释文简明而释义精深，这应该是专科辞典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要求。编纂者正是通过对词目释文字数实行分级控制的办法，使《三学辞典》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简明”不是“简单”的同义词，它与“简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编辞典，固然有能够取巧省力的地方，那就是照抄专业教科书上的定义，照搬百科全书上的现成术语。但是，来新夏主编规定：不说现成话。并着力强调：对某一词目的义项，即使是《辞海》这类权威的辞书上的解释，也不能照抄照搬！照抄照搬的结果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30 位编委，大都是副教授、副研究馆员，其中也不乏教授、研究馆员。97 名撰写人，对专业也都颇有研究。如此专业化的阵容，给编撰工作注入了得天独厚条件。他们都是以其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又通过查检大量资料，翻阅三门学科的理论著作和经验著述，再三斟酌而写成的，就连我这样的迷信大家学者、信赖权威书刊的人，也不敢取巧省力走“捷径”。因此，除“简明”这一鲜明的特色外，“新颖”也是其显著的特色。虽然编纂者们力图奉献给读者一部较好专业辞书的种种努力，在书中并未有公诸文字的表白，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三学辞典》就是明证。

第三，立目严谨。立目严谨是高质量辞书所不可缺少的要求。《三学辞典》在这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三门学科，内容庞杂：概念、术语浩繁、涉及的人物、事物、著述众多。一部囊括三门学科的辞典，如果倾其所有，抖其全部，定会使人有只见枝叶不见根干之感。为避免庞大、繁杂，需要审慎地甄别筛选，删繁剔冗。这一点，始终为编委们所重视。所有词目均按 23 个专题排列，并要求准确地把握住每一个具体词目与其所属部分的种属关系及其全书词目的整体性。全书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为线，选词立目的原则是：凡是有关三门学科的名词，术语，重要概念、命题、公式；凡能反映三门学科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人物、事件、典籍，包括对三门学科的发生、

发展和演变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古今中外著名人物及其重要著作（国内在世人物及其著作一般不收），以及反映三门学科研究成果的有重大影响的著述；国内外重要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和图书情报档案工作的组织机构，等等，均尽可能地收入。凡具有上述各项原则中的“重要”、“重大”、“著名”等条件者，就具有入选的资格。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庞大、繁杂，保证了基本和重要。制定立目原则，便于统一认识。当然，由于学识的差异、认识问题的角度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对或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有时难免会出现认识上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对选词立目原则的掌握。不同意见的交锋，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识，也未尝不是好事。这也是书出众手的一大优越性吧。譬如，要不要以“列宁”为条目，就曾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列宁对人类图书馆学思想和苏联图书馆事业的不朽贡献举世共知，他论述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文献多达 250 余篇（件），已成为人类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瑰宝。把有关内容概括在条目“列宁与图书馆事业”（苏联出版的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文集）中，似比以列宁的名字来立目好，它给人以严肃、庄重之感。

第四，查检便捷。精心编排，方便读者查检是本书的又一个特色。它的正文词目按汉语拼音的音序排序，同音同调者则以汉字笔画数为序。每页天头分别标注有词目首字汉语拼音和汉字。正文前编列有两种索引：“汉语拼音索引”和“笔画索引”。它是为适应读者从不同的方面查找的需要而编制的，颇便查检。

无庸讳言，《三学辞典》也有不少不足之处。作为简明辞典，收录 4222 条词目不能算少了。但是，对于这种集三门学科于一体的专科辞典来说，则不能算多了。还有一些应该收录的词目却未能收入，如“图书分类学”、“文献集合”、“分类标引”、“引文率”、“年谱”、“科技档案”等等。三门学科所收入的词目，以图书馆学为最多，情报学次之，档案学最少。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三门学科发展之不平衡，但另一方面，是否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呢？凡熟悉我国图书馆学界和图书馆界情况的人，只要一看了书名页后列到的编纂者名单，自然就会感到，这与编纂者多少有点偏爱图书馆学是不无关系的。其一，在前所列及的 23 个专题中，档案学只有 1 个，这与本辞典中作为一门学科而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处于同等地位的档案学，似乎是不太相称的；其二，因为这种偏爱而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疏忽处，例如，管理员、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和研究馆员共同是图书情报资料工作和档案工作的不同职级的专业技术职务名称，书中在上述 5 个词目的释文中，均未提及档案工作而只言图书情报资料工作，因而削弱了释文的准确性和严密性。此外，有些词目的释文过于简略，如“离散率(F)”条。释文不长，不妨照录如后：“评价一检索系统检索效果的指标之一，表示不该检出而被检出的文献量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F=b/b+d$ 。它为正确拒绝率(R_s)的补数。”行文至此，倏然而止，b 是什么，d 是何物，不予阐明，未免略而失当。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近年来出现的部分利用率较高、生命力较强的新词目为《三学辞典》所缺乏；某些词目未及增加新内容。前者如“中国标准刊号”等，后者如“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条等。它们并不是编纂者主观疏忽所致，那是由于本书终稿于 1987 年 7 月，中经 3 年又 6 个月之后才出版的客观原因所造成（当然，严格说来也是一种疏忽）。辞书作为求知、解惑、答疑的工具书，最可怕的是以讹传讹，因此最忌排印错误。书刊排印错误现已成

一大公害，《三学辞典》也未能幸免。如“布拉德福”条（第31页）“Samnl”系“Samnel”之误；“布拉德福定律”条（第31页）“B·C·Bradford”系“S·C·Bradford”之误；“韦棣华”条（第490页）“武昌县华林”系“武昌县华林”之误，等等。虽然为数不多，但这是必须苛求的。所有这些，均可望在今后再版时予以改正，以臻更为完善。

（原载《津图学刊》1991年第4期）

《台湾事典》序

林丽韞

《台湾事典》的编写者热情地约我为该书作序，我欣然同意了。作为一个离别家乡多年的台湾人，读了这部详尽介绍家乡情况的辞书，心中倍感亲切，思亲之情，怀乡之意不禁油然而生。

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近四十年来，台湾同祖国大陆人为的分隔，实在是民族的不幸、历史的不幸，这种分隔完全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炎黄子孙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便使得象我一样从台湾到大陆居住几十年的台湾人和成千上万留居台湾的大陆同胞饱受隔岸思亲之苦！所幸的是，自1979年以来，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以及有关政策的逐步完善，海峡两岸的关系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即：由过去激烈的武装对抗，逐步演变为和平对峙，近年来又进一步出现了松动祥和的气氛。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并在经济贸易和学术、新闻、出版等方面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从此，海峡两岸关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双方的经贸往来和科技、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这种变化，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海峡两岸人民要求开展各种交流，增进共识的共同愿望，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不过，目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平衡，这表现在台湾当局在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and 进行各种交流的同时，对于大陆同胞赴台探亲 and 开展各种交流却规定了种种限制。我希望这些限制能逐步放宽直至取消，以真正实现两岸同胞有来有往，来去自由，使各方面的交流更广泛地开展，互相取长补短。因为这种交流如同联结两岸的桥梁和纽带，有助于两岸同胞增进共识，摒弃歧见，进而结束分离的历史，完成统一之大业。在此，我呼吁台湾当局，顺应时代潮流，尊重人民的意愿，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使众望所期的祖国统一局面早日到来。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台湾与大陆虽同属中华，仅一海之隔，而这四十年的分离隔绝使两岸同胞相互缺乏了解。由此可见，迅速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台湾事典》的及时编写和出版在这方面富有积极意义。这部事典收入2000多个词条，70余万言，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仅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的秀丽山川和历史概况，而且着重反映了当代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等方面的情况，不失为一部小型的台湾百科全书。在写作过程中，编者整理研究了大量资料，并力求体现准确、客观的原则，以使读者对台湾诸方面的发展、变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目前，大陆学者关于台湾的研究论著还不多见，因此这部《台湾事典》的编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编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大陆同胞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加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将发挥良好的作用。

1989年6月19日于北京
(原1990年5月5日《天津书讯》)

《大学生知识丛书》总序 来新夏

当前，我国正处在“大腾飞”的光辉时代，无涯的知识正在蜂涌而至，知识结构在日益繁密，那些求纯单一的陈旧观念将障碍着人类智能的发挥，知识“杂处”和交叉渗透将是这一时代的新要求。大学生是知识的继承、深化与增殖者。扩大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培养他们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都将有助于造就合格的“四化”建设人才。为此，南开大学出版社不惜以微薄之力，独承其任，决定出版一套《大学生知识丛书》，向大学生贡献自己的赤忱。

《大学生知识丛书》主要面向大学本科生，兼及各种办学形式的大专生、中学教师和广大自学青年。我们希望借助这套丛书使他们在所攻的专业之外，再从其他专业知识中吮吸养料，加深对本专业的触类旁通，也许相互融合会产生出人们始料所未及的新领域，那将是这套丛书所引以自豪的。

《大学生知识丛书》的作者不拘一格：欢迎学有造诣的老年、风华正茂的中年和脱颖而出的青年，能以这套丛书作为自己的园地辛勤耕耘，公开自己所积存的精神财富。尤其欢迎有一批研究生和大学生能为自己的伙伴写书。

《大学生知识丛书》的内容注重知识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注意介绍新学科、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有关知识，特别要求能通过接受知识而熟悉如何掌握与运用知识的方法。《大学生知识丛书》不排序列，不分学科，兼收并蓄、诸体并存。成长固属可喜，但成长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则正企待作者与读者的支持与批评。

（原载 1987 年 1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元素世界》序言

杨石先

自然界中各式各样、千变万化的物质，都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基本上由 90 多种元素构成；人的身体也是由 30 多种元素构成的。现在人类已经发现了 109 种化学元素。了解化学元素，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认识物质世界的窗户。元素世界是极富魅力的广阔天地。

有人说，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的时代，但是，科学技术无论怎样进步，都一步也离不开化学的发展。尤其在探索生命世界的奥秘、利用蛋白质资源、开发新材料和能源等方面，化学将起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吃、穿、用离不开化学，新技术更离不开化学。化学的主角是元素。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科技组编的这本《元素世界》，对普及化学元素知识，帮助热爱科学的青少年增进学习化学的兴趣、学好化学，是十分有益的。天津电台发动和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在教学、科研之余积极撰写科学普及稿件，很有意义、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大专院校、中小学和研究所的教师、工程师们大有可为的事业。

（原载 1984 年 10 月 15 日《天津书讯》）

为《光学信息处理》中译本写的序

· 杨振寰 ·

我十分高兴地获悉我著的《光学信息处理》一书将译成中文并由我任客座教授的南开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我希望本书能对中国在光学信息处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光学信息处理是光学中一门新兴的前沿科学，是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光学的核心，它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引起普遍的重视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编写本书旨在将这一领域内的一些最新材料加以系统的阐述，并力图反映出光学信息处理方面的最新进展，因此本书不仅可为有关科、系的高年级大学生和一、二年级的研究生所用，同时也希望能为在这一领域或相近领域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一本较新、较全面的参考书。

本书的十四章内容可概括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五章主要是关于衍射、相干理论和记录介质等属于这个领域内的基础理论；第六和第七章是关于光学系统的傅里叶性质及相干光学处理；第八和第九章是非相干光学处理及白光图象处理；第十到第十四章是关于全息术及彩虹全息的理论和应用。全书采用线性系统理论来进行阐述，这比较容易为读者理解且计算方便。

我曾四次访问中国，在南开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工业学院曾作过一些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

本书的译者母国光、羊国光、庄松林三位先生，在1980年到1983年期间先后都曾与我在美合作，并共同发表过论文，现在又承蒙他们三位将我著的《光学信息处理》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再度合作，在此我对他们三位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深表感谢。同时，愿意借此机会对我历次访问中国时热情接待我的王大珩教授等中国科学界的同事表示感谢。

本书中的内容难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望海内外专家、同行予以指正。

1984年1月

(原载1986年11月15日《天津书讯》)

《随机极限引论》简介

郑仲三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独立随机变数列、马尔柯夫过程、平衡序列、二级矩有限等几类主要随机过程的 $0 \sim 1$ 律,以及求和形式的强收敛与强稳定性规律等强极限理论,进而也介绍了独立随机系列和的弱极限问题和某些泛函的弱极限问题。概率论是研究大量随机现象所呈现的规律性,它在认识论上的价值只有通过极限定理而显示出来。因此,随机极限理论一直是概率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而成为与此有关的其他领域(诸如数理统计、随机过程论、随机决策规划论、信息论等)所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读者只要掌握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就能直接深入到有关方面的前沿阵地,独立地开展科研工作。本书还有如下特点:

一、既加强基础理论又结合近代发展。本书一方面重点阐述了关于独立条件下的极限理论,同时又吸收国内外近代发展起来的非独立情况下的内容,诸如马尔柯夫、平稳、二级矩有限等条件下的极限理论。特别是本书关于 $0 \sim 1$ 律的阐述在国内外都具有特色。

二、紧密结合教学。本书既是专著又是教材。它是作者 20 多年教学的结晶,科研的硕果,南开大学数学系概率统计与信息论专业,自 60 年代初期至今,一直把随机极限理论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课进行讲授。首先是胡国定教授讲了两届,而且留给作者一本可贵的讲授笔记,后来作者一直讲授此课,根据教学长期实践和近代有关理论不断发展,反复修改,补充其讲义,三易其稿最后才写成此书。为了加深理解与巩固所学知识,每章备有适量的习题,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本书为教学用书的特点。

三、思路清晰,深入浅出。由于本书是作者多年教学的产物,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取历届学生和进修教师的意见,力求叙理清楚,好学易懂。

(原载 1987 年《天津书讯》)

经济数学模型和方法

佚名

《经济数学模型和方法》是苏联经济学博士克鲁契夫斯基的杰作。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城市改革蓬蓬勃勃兴起。改革的内涵之一就是管理现代化，管理科学化。这样，只是定性的分析和说明已经不够了。必须对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等各个企业和部门，建立数学模型，以便把我国的管理水平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这部书集中地介绍了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运输业和商业各种情况下的数学经济模型和国民经济、经济指标的预测模型。最后一章还集中地介绍了所用的数学方法。由于本书重点在于应用，不拘泥于数学的推导，因此阅读本书只要具备基本的代数知识即可。本书适应面宽，对于国民经济各部分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各类高、中等院校的师生均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原载 1984 年 12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杨振宁演讲集》代序 我与杨家两代的因缘

陈省身

中文大学杨振宁图书室开幕，不可无祝。记与武之先生、振宁两代半世纪的关系，以代贺辞。

我于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投考入清华研究院。九月去报到，才知因只有我一个学生，数学系决定缓办一年，聘我为助教。那时数学系最活跃的两教授，是孙光远和杨武之先生。我从孙先生习几何，比较相熟。杨先生专长代数，有时在办公室谈天，觉得他为人正直，通达情理。那时数学系教员连我在内共七人，曾多次到杨家吃饭，振宁才八岁。

杨、孙二先生都是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后来聘请的胡坤升先生也是芝加哥大学博士。振宁就是芝大出身，而我则于1949年到1960年在芝大教了十一年。我们同芝大真是有缘了。

我入研究院后曾选读武之先生的《群论》课。那时搞代数的年轻人有华罗庚和柯召，在同一班上。武之先生有时同我们谈到振宁的早慧。往事历历，不禁沧桑之感。

我同杨先生接触较多的一年是1934年。那年他代理系主任。我则从研究院毕业，准备去德国留学。我因论文导师孙先生去了中央大学，成了“孤儿”，办理毕业与留学，不全顺利，杨先生是我在学校里最可靠的朋友。

我同土宁的婚姻是杨先生促成的，1937年我们在长沙订婚，他是介绍人之一。1938年起在昆明西南联大，杨先生是清华的系主任，振宁则是物理系的学生。振宁曾选读过我的好几门课，包括为研究院开设的法国大数学家嘉当(Cartan)的偏微分方程组的理论。联大的学生优秀。那时我的班上数学系有王宪钟、严志达、吴光磊等，物理系除振宁外还有张守廉、黄昆等，这些人后来都有独特的贡献，成为各方领袖。“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一生的幸运。尤其幸运的是这群好学生对我的要求和督促，使我对课材有更深入的了解。振宁在班上是一个活跃的学生。那时中外隔断，设备奇缺。但是我们的学术生活并不十分贫乏。

事后想来，我们必曾注意到嘉当在1923年、1924年关于相对论的两篇重要论文。他的处理方法可用到任意纤维丛的连络。这也是物理上规范场论的几何基础。40年来这些都发展为数学上的基本概念。

1945年振宁来美国留学。在他去芝加哥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相见。

等到我1949年夏去芝加哥任教，振宁在物理系任教员，时常相会。1954年至55年我从芝加哥休假，去普林顿一年，振宁在彼。我们见面时常谈学问。很奇怪的，杨米尔斯场论发表于1954年，我的示性类论文发表于1946年，而我于1949年初在普林斯顿讲了一学期的连络论，后来印成笔记，我们竟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有如此密切的关系。20年后两者的重要性渐为人所了解，我们才恍然，我们所碰到的是同一大象的两个不同部分。

矢量丛的连络已成为数学的基本概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高等微积分课程的课材。它的观念其实很简单自然。它有局部的和整体的性质。两者的关系便成为微分几何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个观念同物理学的场论自然符合。数学家得到现在的认识，花了几十年的功夫。譬如沙漠求泉，得来不易；海底探宝，获珠为难。科学家献身而辛勤，非常人所可了解。他的酬报是得宝后的快乐。

在物理上重要的一个特别情形，振宁与米尔斯能独立看出这些深刻的数学性质，这是十分惊人的。许多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家不必读太多数学，因为他们应该能发现所需要的数学。这是一个例子。1954年杨·米尔斯的非阿贝尔 (Non - Abelian) 规范场论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大家公认，物理上的一切场都是规范场。

振宁在基本粒子论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同李政道关于宇称可能不守恒 (Non - Conservation of Parity) 的建议。他们因此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都富有独立性与创造性。在理论物理学家中，他以超人的数学能力见长。

我同杨氏父子的关系，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第一武之先生促成我的婚姻，使我有一幸福的家庭。第二，振宁在规范场的工作同我在纤维丛的工作，有一共同出发点。我们走了不同的方向，在物理和在数学上都成为一项重要的发展。这在历史上当是佳话。第三，他们每人送我一首诗。社会对我的认识，这两首诗的作用很大。1962年夏天武之先生及杨师母在瑞士日内瓦小住，我专程去看他们，相聚数日。杨先生送我以下的诗：

冲破乌烟阔壮 游果然捷足占鳌头
昔贤今对遑多 浪独步遥登百丈楼
汉堡巴黎访大 师艺林学海植深基
蒲城身手传高 奇畴史新添一健儿

振宁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作了下诗：

天衣岂无缝 匠心剪接成
浑然归一体 广邃妙绝伦
造化爱几何 四力纤维能
千古寸心事 欧高黎嘉陈

最后一句不敢当，姑妄听之而已。

1986年春，天津南开大学授予振宁名誉教授名义。他来南开，并参观南开数学研究所。我们决定在所中成立理论物理组，由他指导。先后50年，从联大到南开（南开是联大的一员），造物待我们厚矣。

《普通微生物遗传学》出版

丁友昉 陈宁

微生物遗传学是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迅速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微生物遗传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者在编写这本书时，既系统地介绍了微生物遗传学经典的基础知识，又重点介绍了国内外目前分子遗传学发展的概貌及新的科研方法和实验手段。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教学及科研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最新出版的大学教科书及科技资料编写而成的。涉及面较宽，并有一定的深度。除按照不同微生物遗传学的特点分别叙述外，还重点介绍微生物育种和遗传工程。目的是使从事教育学、科研和生产的同仁便于应用，还可用为综合性大学、轻工业和农林院校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材。

(原载 1991 年 7 月 25 日《天津书讯》)

《杨振宁演讲集》编辑心得

王家骅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演讲集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有幸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编辑加工书稿的过程中，我反复阅读了杨先生的每篇演讲，杨先生演讲的内容涉及到了科学、教育、社会和物理诸多方面，篇篇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先生不仅是个物理学家，更是一个爱国者。虽然他于1945年就去了美国，1964年加入美国籍，但是他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的多篇演讲中都盼望着祖国繁荣富强，要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贡献。例如，1971年春，当杨先生获悉美国国务院已经解除了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禁令后，他写道：“我认识到重见我的故乡，重见我的家人、亲戚、老师和朋友们的机会来了。我迫不及待，因为我怕刚刚打开一条小缝的门……又会被重新紧闭起来，我于是……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中国一个月。”“……到了1972年夏天作第二次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征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杨先生在答香港《明报月刊》记者问时说：“我对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今后尽力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国的发展！”1986年，杨先生又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发表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等问题的建议”的演讲，此外，杨先生还做过“为中国科技发展做贡献”、“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发展经济与鼓励学术研究的关系”等文章和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我仿佛看到了炎黄子孙的一颗赤诚、火热的爱国之心，并深深为之感动。

杨先生热爱中国、更热爱领导中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革命领袖，他为毛主席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激动不已，还学习《毛泽东选集》，非常赞赏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一段话。在美国东海岸各界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杨先生说：“周总理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是世界所有维护正义的人的巨大损失。……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无私、坚强的、始终不渝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精神将滋长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里，是这个民族的永恒的榜样。”

我很喜欢读《杨振宁演讲集》中的“读书教学四十年”、“谈学习方法”、“创造与灵感”、“谈我的读书方法”以及“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等文章，从中我不仅可以了解杨先生走上成功之路的历程，也可以学习到许多读书、教学和搞科研的方法，而且看到了杨先生对东西方民族在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社会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差异的深刻分析。例如在“谈谈学习方法”的谈话中，杨先生说：“美国的教育方法与中国的教育方法不一样。……中国的教育方法是一步步地教、一步步地学……这有好处有坏处，最大的一点好处是，比较有耐心，比较了解要学好一样东西，需要努力……是不是这种做法对做研究工作有妨碍呢？……过去的学习方法是被人指出来的路你去走，……忽然一下子要自己去找路，就有点觉得茫茫然。”在“谈人才培养”的谈话中，杨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使学生向专的方向发展，有好处，也有不足之处。太专了，不容易鼓励学生向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中活跃的领域去发展。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谈谈物理学研

究和教学”的谈话中，杨先生说：“我感到中国学生读书型的太多了，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就远不及中国人那样重视读书。在中国，家长往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能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如果有更高学位那一定还希望读更高学位。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孩子本身都是不利的，因为这不是每个孩子的能力都达得到的。”很显然，杨先生的这些话语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是很有意义的。

《杨振宁演讲集》中收入的杨先生关于物理学的演讲涉及范围很广，包含了关于宇称和宇称守恒问题，现代物理中的对称性原理，高能物理，统计力学中的多体问题，纤维丛、磁单极和规范场……杨先生对其中一些深奥难懂的问题，做了精辟的、深入浅出的阐述。徐迟同志到美国石溪访问杨振宁教授时向杨先生提出“你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那个科研成果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一句话一句话地用几句话、五句、十句或十来句话，用比较容易了解的话给我、给大家说得简明明了呢？”杨先生回答：“可以的。”接着他就从自然界里面有四种基本力量讲起，果真只用了十句话就把问题给徐迟同志说明白了。在《演讲集》物理学部分中，还收入了杨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一次报告“几位物理学家的故事”，这里面讲到了费米、泰勒、爱因斯坦、狄喇克等这些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的情况，都是他与这些科学家直接接触中的感受。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些科学家各自的特点，例如“费米对具体的事懂得很多，对于大的规律又有很直觉的了解，所以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泰勒的见解非常之多，而且总是要讲出来的。不过如果你指出他是错的，他就立刻接受，立刻向正确的方向走”，“狄喇克是一个话讲得不多的人。你问他三句，他回答你一句话”。……杨先生说：“我学会了欣赏爱因斯坦、狄喇克和费米的工作。当然，他们各自有迥然不同的风格。但是，他们却具有把一个物理概念，一种理论结构，或一个物理现象的本质提炼出来的能力，并且都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其精髓。”我想这正是杨先生在讲故事中想要告诉大家的中心思想。作为《演讲》的责任编辑，我想说：杨先生聪敏过人，教诲不倦，治学严谨，他蓬勃进取的精神，是我，也是广大读者学习的榜样。

（原载《博览群书》1990年第6期）

《IBM - PC 及长城 0520 (INTEL8088/8086)
宏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出版
王家骅

《IBM - PC 及长城 0520 (INTEL8088/8086) 宏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针对 IBM-PC 及长城 0520，详细论述了 8088 微处理器宏汇编程序设计方法，既注重基本方法的训练，又强调上机调试手段。主要内容包括 8088/8086 指令系统，程序设计基本方法，DOS 及 BIOS 内部功能的调用方法，端口编程方法，典型中断处理程序的编程技巧以及在 DEBUG 和 ASM、MASM 下运行、调试手段等，可作为学习汇编语言的入门书，也可做专业人员的工具书，具有大量的应用实例可供参考。

(原载 1990 年 10 月 24 日《计算机世界》)

热爱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杨振宁
——《杨振宁演讲集》读后
崔国良

《杨振宁演讲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读了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有关社会和教育的文章，给了我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长期身居美国的华裔物理学家，对中华民族一直怀有这般深厚的感情，这不能不使我感动。因而，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这方面的文章。这本《演讲集》是确实也可以用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书出版时所说的“从纪录我的想法的真实性讲来，也许比现在写的自传更有自传性”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他热爱中华民族的真实写照。

—

杨振宁教授在中国生活了26年，而后又在美国生活了40年，所以说他既受到了东方文化传统，也接受了西方文化传统的薰陶，他在对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做了长久的比较以后，得出了结论说：“中国传统是非常优秀的”。他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做的一次演讲里这样高度地赞扬了中国的传统，他说：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他之所以赞扬中国文化传统，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对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从小就讲先天下之忧而忧，相反地西方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观点是非常之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他对西方鄙薄社会责任的思想传统是不欣赏的：“中国具备一种美国所缺少的精神和纪律。”

他还很推崇中国孝顺的美德。他说：“孝顺美德是华人传统，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孕育的道德观念。”他还多次用自己的事例来加以说明“我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作风，是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因为我是在中国社会长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薰陶，对他一生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而且也是不知不觉的。我在美国已住了四十多年，对西方的做人方法也有了了解并受到影响。但是我处世做人，仍旧是从我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观念出发。”

他热爱并珍重中华民族优秀的教育传统。他认为“中国学生比一般非中国学生来得守规矩。中国学生比一般非中国学生对于念书来得比较认真。”“中国教育传统训练出来的人，着重稳扎稳打，着重一步一步走”，他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条件。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众多的杰出人物都是如此。中国现代的许多科学家也毫无例外，他《在颁发诺贝尔奖贺宴上的演讲》里非常自豪地说：“我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他注意珍惜和维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认为：“一个传统建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把它毁灭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举例说：“德国在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所建立的深厚的物理学和数学的传统在二、三年之内就烟消云散了。”因此，他对损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针对《河殇》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曾经尖锐地指出：

这个电视剧里特别提出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化；一个是长城；一个

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的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掉的话，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他的这个论断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他说：“万里长城之所以成为自太空接近地球的访客最先能辨认的人类建筑物，绝不是偶然的……长城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概念……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

当然，他对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弱点也揭示出来；同时，主张吸收西方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力量。”他历数许多中国传统中的这些弱点，如他说：“中国传统的制度对个人的约束使得中国人缺少大胆进取的精神”“中国人受了传统的影响，有一个观念就是‘算了，何必要找事呢？’这是一个万分错误的观念。”

他对中国的传统的礼教也做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礼教把个人只当做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渺小的一黍。”他对中国的家族制度中束缚个人的方面也进行了批评：“传统的中国把每一个人都放在这家族的制度里，这正是约束个人的一个表现。”

他对西方的优秀的或者好的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也认为应该吸收。如西方的科学的传统等。而对西方的不良传统、习惯或生活方式则应该扬弃。他说：“如何吸收传统和现代两方面的精华，对过去优秀的文化传统加以发扬光大，这需要社会全体共同努力。”

杨振宁还致力于弘扬中国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中华民族在古代本来就有先进的科学文化，在世界上长期站在前列。只是在近百年才落后了。但是，尽管如此也决不是一无可述及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科学家多有成就，而鲜为人知。杨振宁说：“曾经有人问是否中国人的头脑未能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但是新中国和海外华人，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使这个问题不再困扰中国人。而外国人也不再持以往那种讲法了。”为此，他出于对中华民族的挚爱，曾经多次著文在外国或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介绍现代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他在为美国《自然》杂志写的一篇《悼念马仕俊博士》文章中介绍了中国科学家马仕俊博士的成就。他写道：“1946年马先生来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其时海森伯（Heisenberg）的S-矩阵理论就是马先生在普林斯顿期间发现的。”又指出：马先生在“指出费米（Fermi）处理量子电动力学方法的一个困难，导致一年后古塔—布劳勒（Gupta - Bleuler）方法的产生”。在给中国《物理》杂志写的一篇《一个真的故事》中介绍了本世纪30年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成就，这就是50年代在我国半导体事业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先生。谢玉铭先生30年代在美国与豪斯顿（Houston）合作进行了重整化的极其准确的实验。这个实验被人推崇为“是惊人的提议”。而兰姆（Lamb）和库什（Kusch）在1946—1947年所做的同一方向的实验，以及稍后1947—1948年的朝永（Tomonaga）施温格（Schwinger）与费曼（Feynman）的理论工作先后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杨振宁还于1983年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一首诗高度赞扬了当今世界数学大师、中国血统的美籍教授陈省身先生：

天衣岂无缝
匠心剪接成

浑然归一体
广邃妙绝伦
造化爱几何
四力纤维能
千古寸心事
欧高黎嘉陈

当代几何学中纤维丛理论是陈省身教授 1944 年的一篇论文中推导出来的。而纤维丛理论又因当今物理学家概括自然界四种力及其能都是规范场的理论，又是极其一致的。

杨振宁还高度评价了我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中微子的发现。本世纪 30 年代费米提出费米子理论，假设中微子的存在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方法。1941 年王淦昌先生提出了用 K 电子俘获的方法。许多人根据这个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实验，终于到 1952 年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从以上所述的事实，杨振宁得出结论说：“如果有适当的环境，中国人的遗传因子在科学发展的各方面不会比世界上其他民族为差。”

三

杨振宁热爱中华民族，希望新中国强盛并且愿意为之尽力。他在西方生活的几十年中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华民族和对华人的歧视而非常感愤。这在他的许多演讲中都可以看到。他寄希望于中华民族能够富强。当他一旦了解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消除了传统的社会制度，建设起了新中国，且日益强盛、繁荣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由衷地热爱的。在他目睹了中国“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后说：“我想新中国实现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怀有的深深地仰慕之情。在《哀悼周恩来总理》一文中所历数的周恩来总理一生的经历，也就是周总理为中国革命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和文中所表达的对新中国的发自肺腑的真切之爱时，他曾激动地说过：“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意义。”

他看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议，中英联合声明签字、粮食年产四亿吨和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时，欢呼“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他还称赞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他说：“我很赞成中国的一个口号：到 2000 年把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个口号很明智，没有头脑发昏，把目标提得太高。如果到 2000 年达到了这个目标，那将是了不起的事情。”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多次献计献策。首先，他提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路线的建议。他初次回到祖国的时候，当时正是“文革”，我国的科学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曾经建议“多注意基础科学的政策”。他在《寄给中国政府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认为：“中国已有的各体系内的研究工作，在物理学科内的，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或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的研究（Development）似乎没有被注重。”他在总结了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且做出了论证以后，建议进行原理研究和产品研究

的同时，要更加注意发展性研究。这些建议都受到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实现中国科技发展计划，他还多次著文沟通中美两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和促进两国科学家的友谊与合作。在实际工作中他表示“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普遍关心中国科技发展，且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应放宽高科技输往中国的限制；不过，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中国自力更生。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协助培训中国的科技人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中美两国建交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来，为中国的科技人员的培养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名誉教授和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主持人，为中国培养高级科人才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原载 1990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时由于报纸篇幅限制有删节，收入本集时，又补充了部分原文）

《技术美学与工业设计》第一辑出版

王真

工业设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植根于工程结构设计和产品造型。它解决工业产品与人相关的各种功能的最优化问题，从而完成产品造型，提供美的产品。由此提出的崭新课题，构成应用美学的新分支——技术美学。我国的技术美学正在兴起。工业设计师，将是一项时髦的职业称号。工业设计师兼具机械设计师和装潢美术师的特长，是决定产品命运和加速更新换代的技术美学家。

为了推动工业设计与技术美学在我国前进的势头，由汝信、李泽厚、胡国定、来新夏和唐海等著名学者为顾问的《技术美学与工业设计》丛刊编委会推出了第一辑，收录了日、美、德、英、法、苏等国的研究成果，均由难以收集的原文译出，从技术美学的角度提供最新的工业设计资料，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帮助读者扩大视野，为理论研究提供素材，为实际应用提供指导。本辑刊登钱学森、李泽厚分别提供的专稿，对技术美学和工业设计有精辟的论述。

（原载 1987 年 8 月 30 日《天津书讯》）

《侯德榜》前言

李祉川

侯德榜博士是著名的科学家，我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世界上制碱工业的权威。他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首先公之于世，为我国争光。他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纯碱工业做出了成绩。他为创造制碱新工艺，提高食盐利用率，成功地生产了纯碱及氯化铵双产品，付出了毕生精力。他为发展我国的化肥工业，领导开发化肥新产品碳酸氢铵，使小化肥在全国开花，做出了贡献。

我与侯博士共事四十年（1934~1974），深受他的言传身教、关怀培养。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博士生活朴素，治学严谨，工作踏实，刻苦认真，坚韧不拔，矢砥于成。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重视科研与科普工作，大力培养和使用人才，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博士的优良工作作风、严谨治学态度、高尚思想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他是我治事为人的楷模。

三中全会后，久有写一些回忆文章之心。拟将所知的关于侯博士的事绩写出来，介绍给我国青年一代，以此促进四化宏业。一九七九年以来虽曾写过几篇文章，仍感语焉不详。由于得到化工部秦仲达、冯伯华同志，大连市魏富海同志的鼓励与支持；得到化工部大连制碱工业研究所、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天津碱厂等单位的多方协助，又得到侯博士亲属以及‘永久黄’团体同人的积极提供资料与鼓励，这一愿望方得以实现。

由于搜集资料的困难和时间仓卒，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文学素养不济，所以本书中的观点、材料等方面谬误必多，恳赐指正是幸。

《侯德榜》一书，在编写过程中蒙梁膺庸、姜圣阶、章用中、徐盈、谢为杰、张燕刚、沈譔、李又新等同志提供资料和精心校勘，深表谢忱。

承蒙我的老师、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教授生前在重病中为本书撰写序言；又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教授题词，表示衷心感谢。

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王真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工作尽心尽力，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原载 1986 年 3 月 30 日《天津书讯》）

纪念侯德榜诞生 100 周年《侯德榜》再版发行

· 王真 ·

侯德榜（1890～1974），我国现代科学名人，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他的“侯氏制碱法”享誉世界。今年是他诞生 100 周年，全国将展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学习和弘扬这位著名科学家的伟大业绩、科学风貌和爱国主义精神。重版发行《侯德榜》这部传记，是全国性纪念侯德榜的十大活动之一。

侯德榜少年时代半耕半读，目睹洋人鞭打中国码头工人的凶横狠毒，萌生用科学和工业拯救苦难祖国的决心。后来在闽皖铁路学校毕业，任工程施工练习生。他憎恶洋人修铁路榨取中国人的血汗，毅然抛弃铁路的“铁饭碗”，报考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选择化工专业，冀希以化工救中国。在清华，这位被阔少们讥讽的“土包子”，以十门课程满分、一千分的总分，震惊全校，取得首批赴美留学资格。

侯德榜在美国苦读八年，获得博士学位。恰逢爱国实业家范旭东筹建永利制碱公司，急需化工人才，侯德榜被他的爱国赤诚和求才若渴所感动，又一次改换专业，从制革专家转而钻研制碱工业。

他愤恨国际财团垄断技术、指使国民党政府压制民族工业的狰狞行径，废寝忘餐，弃家不顾，披荆斩棘，和洋人、官僚斗，终于生产出中国“红三角”牌纯碱，一举获巴拿马金奖，使中国的民族化工振翅起飞。巨额财富、高位威名诱惑不动侯德榜，他出版了《纯碱制造》巨著，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世。他应邀五赴印度、远去巴西，热情帮助发展中国家创建制碱工业，为中华民族争光添彩。对德、日法西斯，侯德榜则寸步不让，据理力争，动员爱国舆论，索回被劫掠的工厂设备。

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和他共商国事，支持他发展化学工业。在解放前开花的“侯氏制碱法”终于结硕果。侯德榜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德榜的战友、学生李祉川总工程师，将他四十年相处的经历和感受，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生动翔实的情节，写成《侯德榜》传记。

该书在 1985 年问世后，深受读者欢迎。获中国化工学会举办的“1985～1986 年化工科普”二等奖，大连优秀科普作品奖。广大读者说，《侯德榜》是弘扬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它为我们树立了知识分子爱国、奋进的光辉榜样。诚如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为本书题词中所说的，侯德榜是“科技泰斗，士子楷模”。出版和阅读该书，是对侯德榜 100 周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原载 1990 年 7 月 5 日《天津书讯》）

南开大学教材建设的新成果
推荐两种化学实验教材
王真

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南开大学的化学教材历来令人瞩目，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新近出版的《基础无机化学实验》和《物理化学实验》，正是教材建设的最新成果。

这两部基础教材是两个教研室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称得上是精雕细刻的结晶。《基础无机化学实验》是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门实验课教材，循序渐进地编纂了六十个实验，其中有验证课堂教学内容的基本性质实验，也有扩展知识的新颖实验；有训练基本技能的实验，也有尝试独立设计的复杂实验。内容浓缩，切近实际，容易实行，有选择余地。有特色的是，与实验教材配套的无机化学实验预习报告和实验报告加强学生的规范化训练，是研究室特意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经验的一个创举。相配套的还有一本教师指导书，供担任实验课的教师和实验辅导教师备课及批改实验报告用。

《物理化学实验》除了传统的基础实验训练外，吸收了当代的物理化学的教学成果，增添了较多的现代仪器和新颖内容的实验项目，令人感到面目一新。和无机化学实验教材一样，物理化学实验教材也有意配合当代化学向生命科学的靠拢和渗透，着意增添了不少生命科学研究中必需的物理化学实验内容，使传统的实验注入了新的活力。

(原载 1992 年 8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姜立夫先生纪念册》编者前言

吴大任

姜立夫教授（1890.7.4~1978.2.3）是现代数学在我国最早而又最著成效的播种人之一，他的这项光辉事业是从1920年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开始的。他在南开大学任职到1948年冬专任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为止。1990年是姜立夫教授诞生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南开”元老，缅怀他对学校以及我国数学事业的卓越贡献，我们编纂了这本纪念册。

姜立夫教授191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他决心以毕生精力使现代数学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远大的抱负，艰巨的目标。姜立夫教授认为，最根本的是培养现代数学人才。他“单枪匹马”地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到1925年，数学系才有了另一位教授以及由毕业生选留的一位助教。数学系必须根据本系和理科其他系的学生情况和学习需要，逐年变更开设的数学课程。即便在数学系有了更多的教师以后，主要课程，包括几何、代数、分析等各个方面的讲授，仍都由姜立夫教授担任，学生作业多半还必须由他亲自批改。系里其他工作，如订购书刊、数学模型、数学家肖像等，也要躬亲动手。与此同时，有关数学的许多社会活动，他也主动承担。工作量之繁重，可以想见。由于他数学知识广博，基础深厚，有独到而完善的教学方法，工作认真周密，故能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

南开数学系初上轨道，对于姜立夫教授，只是走了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的第一步。1926年，他赴厦门大学讲学，为该校数学系的充实与提高，奠定良好基础。1931年，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新返自美国的江泽涵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江遵照他的指示，对北大数学系的教学工作进行了成功的改革。1934年，南开数学系基础已经巩固；他到德国，居留二年，先后在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进修。可以确信，他到德国，是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作准备，并已开始了他研究计划的构想。

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姜立夫教授到昆明执教。在昆明，他领导重建了已经停止活动多年的中国数学会，并开始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1949年，他创办了岭南大学数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任教于中山大学，直至1978年逝世。

对于中国数学事业的基础性工作，姜立夫教授都积极参与。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之外，他还领导审定了中国数学名词，参加了其他业务，诸如公费留学生的选拔，高级研究人员的资助，国外专家的延聘，数学专著的出版等。至于数学书刊的采集，他更是始终不懈地亲自动手。他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对自己、对工作严格要求；热情奖掖后进，结交同道，不分流派；他有力地促进了数学界的团结。

科学研究方面，姜立夫教授的主要贡献是用矩阵方法来改写并发展圆素和球素几何学。和他的理论相联系，他有一个分为三阶段的关于辛群几何学的研究计划。抗日战争期间，他在《科学记录》上发表了他的最初成果。后来在中山大学，他在科学讨论会和讨论班上又讲述了进一步的成果；这些构成他的第一阶段研究任务的基础，但没有公开发表。近几年来，他所开创的这个研究课题正由黄树棠、杨淦两同志继续进行，并已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参看本纪念册第73页的编者注。）

本纪念册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姜立夫教授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发表），他在《科学记录》上发表的论文，在中山大学科学报告会上的报告提纲，以及黄树棠根据该提纲、姜立夫教授的遗稿和黄本人的笔记整理的《姜立夫圆（球）素几何理论简介》。第二部分是姜立夫教授的几个学生写的回忆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各个时期他的工作，活动，兼及其高尚品德。最后是年谱简编（初稿），主要是根据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女士和几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所提供的素材汇总编成，详略不当，遗漏甚多，讹误难免，有待补充订正。

1988年4月

（原载1990年12月1日《天津书讯》）

化学界的泰斗 教育界的宗师
——读《杨石先传》
张蓓

杨石先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教育家和科学家，生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部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校长等职。他学识渊博、教泽广布，著述等身，为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前，杨石先抱着“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曾三次出国留学，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教育。早在1923年就开始执教于南开大学。他学力深厚，治学严谨。在教学中，他要求学生严格却不苛求，待人平易但绝不容忍学习懈怠。他器重人才，鼓励上进，奖掖后进，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指导学生求知的门径。现在有些双鬓已白的知名学者及脱颖而出的科坛新秀，都曾得到他的诱导和教益。

为了解决我国的植物保护问题，杨石先开创了我国有机农药化学的研究工作，开发出适合我国特点的有机农药，为我国农业的保护和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在50年代，他又开拓了元素有机化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另外，他不断追踪世界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领域的发展进程，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对科研工作给予权威性的指导。杨石先教授在我国教育和科技战线奋斗了60多年，为我国的教育和化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我国化学界的泰斗，教育界的宗师。

《杨石先传》的作者杨光伟同志在杨石先教授身边工作多年，搜集了大量的翔实资料，从童年时代、求学清华学堂、海外赤子、拳拳报国心、再渡重洋、南开罹难、执教西南联合大学、春风育人、赴美考察、神州春雷、新生、思想改造与周总理的帮助、励精图治十七年、向科学进军、走中国自己的农药发展道路、开拓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研究的领域、创办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为了解决我国农业生产的需要，为革命学好数理化、大匠诲人、科学的春天、为了祖国科学的发展、振兴南开、为人师表、业绩长存等方面，详细描述了杨石先教授那诲人不倦的精神，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高贵品德。正如著名诗人李霁野先生对杨石先的敬挽那样：

堪称德智体三全，抗日兴邦育俊贤。邀游九天存遗泽，永留英名在人间。

在南开大学建校72周年、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30年之际，南开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奉献给读者，以纪念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元素所的创建人杨石先教授。

（原载1991年11月10日《天津书讯》）

《行为学导论》译校者序

马祖礼等

行为学是生物科学领域内一门新兴的分支科学，目前研究范围涉及动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

70年代以来，行为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对于不同进化阶段动物行为的观察、行为产生机理的研究以及动物的语言、意识的起源等方面都已获得长足的进展，引起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重视。

国外有关行为学的研究资料和专著颇为丰富，已经充实到有关学科的教科书之中，成为独立的章节。但是在我国尚无较系统地介绍行为学的编著或译著出版。为了使我国读者对行为学有所了解，引起对行为学研究的重视和兴趣，我们选择德国著名行为学家克劳斯·伊梅尔曼所著《行为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Ethology)一书介绍给读者。

该书是著者在德国布伦瑞克、柏林和比勒菲尔特等大学讲授行为学课程，积12年之经验编著而成。德文初版于1976年问世，1979年修订第二版，1980年被译成英文，同时于纽约和伦敦发行。

本书共十二章，系统地阐述行为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内容丰富，论述简明，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并富有趣味性和启发性。既可作为学习行为学的教科书，又可作为研究行为学的入门指南。

我们真诚希望《行为学导论》一书，对我国从事行为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同志有所收益，并成为学习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大学生和广大生物学爱好者的有益读物。

由于我们外文和业务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0年

(原载1991年2月25日《天津书讯》) 祝您健康长寿(代序)

吴振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新时期，人民生活已经显著改善并且肯定还要继续改善。在这种形势下，天津中医学院和天津电视台联合录制了“中老年养生保健电视讲座”，并配合讲座编写出版了《祝您健康长寿》一书，给大家介绍保健长寿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不仅为中老年同志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好事。

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明显延长，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逐渐增加，据统计，目前，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近九千万，预计到本世纪末可达一亿三千万。因此，老年人的医学、社会、心理等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老年人是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他们更属于优先照顾的服务对象。中年人年富力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健康问题自然也应受到社会的关怀和重视。

在当前和今后，如何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健康长寿；如何使中年人防病抗衰，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课题。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老年学、老年医学、老年社会学的研究；进一步树立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努力为中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使他们健康长寿。这是党和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历史赋予我们医疗卫生部门和其它各有关部门的一项神圣的使命。祖国医学历来重视养身之道和老年人的卫生保健，并在这方面总结了系统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讲座和这本书的出版，能使更多的老年人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健体强身方法，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在耄耋之年仍能精神焕发，青春常在，使中年同志身体更加强壮，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地为四化做出更大贡献。最后，我衷心祝愿同志们健康长寿，精神愉快！

（原载 1990 年 9 月 1 日《天津书讯》）

养生学 益寿延年的科学
《祝您健康长寿》一书的代前言
戴锡孟

人们渴望健康长寿。为实现延年益寿的美好理想，人类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最初，人们把长生不老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灵身上，秦皇、汉武都曾先后派人远涉重洋寻找蓬莱仙岛。随后，又兴起了炼丹术，认为服食金丹可以使人返老还童。炼丹术在我国先后持续了几百年，并且经过波斯等国传到大洋彼岸。然而始终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多次失败的教训逐渐唤醒了人们。我国古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及医学家先后认识到，同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的寿命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人不可能长生不死，但是可以通过后天调养逐渐提高人体的适应能力，从而推迟衰老、延长寿命。他们主张从日常生活入手，通过一整套系统的保健措施来实现长寿的目的。这样，开始出现了养生的概念。而后又发展成为养生学。

养生学是研究生命规律及推迟衰老、延年益寿的一门科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中医养生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在这个阶段明确地提出了养生的概念。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子指出：“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他认为，养生的主要原则是头脑冷静、饥饱适度、勤于思考。庄子借屠夫杀牛的故事来说明养生的道理。他说：高明的屠夫能在牛骨间隙中巧妙运刀，所以屠刀得以经久不坏。人类如果能从中汲取经验，高度灵活地适应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就有可能健康长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则强调养生必须注意劳逸结合。上述养生思想在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中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内经》从中医的理论出发，把养生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两条：一是调摄精神和形体，提高抗病防老机能，二是适应自然环境，避免病邪侵伤。此外，《内经》之中还记载了许多养生的具体方法。《内经》的养生理论及养生方法对后世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隋唐时期。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一批养生专著，例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梁代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隋代巢元方的《巢源补养宣导法》以及唐代孙思邈的《千金》食治篇及养性篇等等。这些养生专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养生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养生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两宋、金元时期。这个阶段中医各流派之间出现了学术争鸣，活跃的学术空气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突出的特点是开始重视养生机制的研究。

养生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明清时期。这个阶段的养生学更加成熟，更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养生实践。例如清代曹慈山参阅了三百余篇养生著作，并结合自己的长寿经验，在《老老恒言》一书中编写了一百余种具有强身益寿作用的粥谱，既可用于平日养生保健，又可用于病时治疗、调摄。该书流传很广，深受人们喜爱。明清时代是养生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养生学专著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0种以上。

综观历代养生学专著，中医养生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以下的二十个字来概括，这就是：适应环境、畅达情志、勤于运动、节制饮食、慎重起居。

环境包括气候环境、地理环境和居住环境，环境与人类的健康长寿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医养生学强调应该在适应、改造环境之中求得健康长寿。元代邱处机写的《摄生消息论》是适应四时环境进行养生调摄的代表著作。孙思邈选择山青水秀的地区建造房屋、植树、种花、修筑水池一直活到一百岁（有的文献记载为 120 岁），是改造环境益寿延年的典范。

中医养生学重视情志与健康长寿的关系，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不论哪一种表现得过度，都会损伤人体健康。只有去掉私欲，清除杂念，保持达观的情绪和开朗的性格，具有高度的涵养，才能益寿延年。

中医养生学认为，适当的劳动和体育活动可以促进长寿。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可以分为导引及按跷两大类。导引是主动运动，以骨骼肌的运动为主，配合呼吸运动。华佗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都属于导引，现代气功也属于导引之类。按跷是被动运动，借助他人之力使肌肉关节作被动运动。现代的推拿、按摩，如果用于养生保健就属于按跷范围。名医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的姿势，结合古代导引创造“五禽戏”，华佗的徒弟吴普坚持习练“五禽戏”，活到九十岁仍然耳目聪明，牙齿完好坚固。

中医养生学认为，“起居有常”是健康长寿的重要保障。强调建立起一套符合生理要求的作息制度，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并对睡眠时间、睡眠的姿势和诱导入睡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中医认为，脾胃是人体消化水谷、运化水谷精微物质的重要器官。因此，中医养生学重视合理调配饮食，并且创造了独特的食疗理论。食疗方法简单易行，在民间流传很广。比如一般家庭都知道，吃海蟹时一定要佐以姜末和食醋，这实际是《日华子本草》上记述的食疗方“姜醋”，姜醋有防止鱼、虾、蟹肉腐变中毒的作用。又如老人们主张给肝火大、经常目赤眩晕的人多吃些荸荠、海蜇皮，这正是名医王晋三的著名食疗方雪羹汤。中医养生学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中医养生学是在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指导人们用科学的方法适应内外界环境，从而推迟衰老，延年益寿的科学。

（原载 1990 年 8 月 11 日《天津书讯》）

《中医思想方法与基本观点》序

吴咸中

王大鹏同志的新作《中医思想方法与基本观点》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指导，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及中医的诊治观和预防观，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作者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医学的新近成就，把中医学的基本观点与思维方法进行了归纳，使之更加系统深入，便于人们从宏观与整体上把握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毫无疑义，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作者还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中医科研方法，从选题、收集资料、科学实验，一直到推理论证及论文写作，这些内容对于青年医务工作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基础知识。

学习一门科学，研究一个课题，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符合本学科特点的学习与研究方法。随着学习与研究层次的提高，对于思想观念与方法论上的要求也越高。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用朴素的唯物论与自发的辩证法来解释古人的学说与经验，应当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把它提高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为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分支的医学辩证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与条件之下，得到迅速发展的。王大鹏同志的新作就是属于用自然辩证法来认识中医学和试图以此来指导中医研究的著作。本书可贵之处在于可给人以启迪、帮助人们从庞杂的中医理论、学说及诊治方法中，抓住要领，认识本质，进而可登堂入室，窥其奥秘。

用哲学观点分析中医理论及探讨中医研究方法的专著已经出版了几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在认真的探索中，在活跃的争鸣中，将会促进这一新领域的不断发展，从而为振兴中医带来活力。

1990年5月于天津医学院
(原载1990年11月3日《天津书讯》)

系统研读中医文献的指导书
《实用中医文献学》出版
王真

要发掘、整理和提高祖国医药学的宝贵财富，有效地使用中医文献，医学院、中医学院的学生急需一本基础教材，来掌握中医文献学的要领，弄清中医文献的类型和现状，学会寻找、选择、阅读、积累和评价中医文献的方法。祖国医学的科研人员、情报检索人员，在浩瀚深奥的古今中外我国传统医学典籍文献的海洋中，如何快捷准确地查索和利用文献？自学中医的西医或中医文献爱好者，如何找到系统研读中医文献的门径？……在新近出版的《实用中医文献学》中可以找到答案。《实用中医文献学》是这一领域里的探路之作。作者秦玉龙是北京中医学院首届硕士学位研究生，师从已故名中医家任应秋教授。秦玉龙毕业后在天津中医学院任教，讲授诸家学说。结合教学与科研之心得，为在中医界普及文献情报知识，开发中医信息资源，指点读书门径，传授学习方法而编著此书。本书前身系天津中医学院本科生教材、全国《实用中医文献学》函授班主要教材。主要内容包括：中医文献学、情报学简论、中医文献的类型、中医文献的寻找和选择、文献阅读、文献积累、评价及附录。

（原载 1987 年 12 月 30 日《天津书讯》）

我写《中医内科歌括提要》

王大鹏

大约是在 15 岁上初三时，我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学则已，既然学了就打算学好。我开始似懂非懂地读起了《脉经》、《伤寒论》、《内经》、《本草纲目》之类的医药书。那时并无名师指点，全靠自己硬啃，读了半天，心中感到茫茫然，毫无头绪，收效甚微。有一次，在我的同班同学家里看到一部线装本的《医宗金鉴》，那是他爷爷过去读的书，现在已无用处，我如获至宝般借回家去，刚大致读了读，心中就已有豁然顿悟之感。适逢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医宗金鉴》影印本出版，我赶紧买来，就当作基本教材仔细研读起来。这一次不但基本读懂了，而且感觉到编歌括是个好办法。

《医宗金鉴》所以能成为好读本久用不衰，与它多数内容是一段歌诀、一段说明的体例分不开。于是，我也试着编起我认为是能概括要领的歌括。最先编好的是脉诀，又编齐了四诊、八纲，各大类辨证。我把这些歌诀抄成一张张很小的卡片，在上学路上或者在其它可以利用的时间里看一看，背一背，几年坚持下来，到高中快毕业时，我就能给熟人开方子治些简单的病了。

我尝到了编歌括的甜头，到正式学医后，仍孜孜求索此道。特别是在学内科时，叹病候之繁多，感方证之难辨，这促使我编出了内科歌括，这帮助了我对内科常见病证治的学习理解和记忆。

岁月如流，往事悠悠，转眼间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学医时死记硬背的情景已如烟云，逐渐淡漠。唯有这边思考、边编写、边记忆歌括的印象清晰如昨日。既然歌括有益于我，或许也能有益于别人，如能对学医者多少有点参考价值，我就会感到万分欣慰。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将原作详加订正，惴然付梓，并借此敬祈贤哲指正。

（原载 1992 年 2 月 15 日《天津书讯》）

造就“神童”的奥秘 介绍《胎教育儿指导》 家师

天下造就“神童”的奥秘父母，谁介绍《胎教育儿指导》不盼望自家师自己的孩子健康、聪明，尤其是在科技飞跃发展的今天，都想将自己的宝宝培养成具有超群智慧的神童。如何实现这一美好愿望，对青年夫妇，尤其是对即将做母亲的朋友们来说，却是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课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实验设备的完善，为胎儿生理功能及新生儿行为能力的检查，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就为年轻父母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解决这个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代医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证明，胎儿在母腹就有知觉、有听觉、有记忆、能学习。从而为科学的胎教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根据和方法指导。

胎教是集优生、优育、优教于一身的实用性很强的科学。

胎教最早起源于我国，早在 2000 年前的医书中就有记载，以后历代都有关于胎教的成功范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胎儿教育已成为共同研究与开发的一项优生课题。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胎教学说几乎风靡全球，如美、英、日等一些发达国家，创办了研究机构和胎教学校，出版了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胎教理论与方法。近些年来，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国外有关胎教研究和智力超常儿的报道不断传入我国，祖国悠久灿烂文化的一部分——胎教学说，又在中国大地复苏。报刊也不断报道从民间开始的胎教及其成效的典型事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就在下一代，都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而民族的昌盛、国家的富强，都与这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智力水平有关。

本书作者根据古今中外有关研究成果，参考了大量资料，在总结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这本胎教育儿的指导性读物，主要内容包括：如何从下一代的健康、幸福的角度来考虑选择配偶；如何从人口的优生优育的角度选择最佳怀孕时机；妊娠以后，在孕早期如何保持合理的营养、优美的环境及良好的情绪；在孕晚期，如何对腹中胎儿进行直接的教育（包括音乐、语文、抚摸等），以及出生后的婴儿，如何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听觉、视觉、触觉的刺激和智力开发等等。具有实用性、知识性和指导性。

（原载 1992 年 1 月 25 日《天津书讯》）

创造“神童”的秘密武器——《胎教育儿指导》

张蓓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它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却真实地道出了父母对子女寄予的厚望。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生儿育女、培养人才不再是个人简单的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家庭幸福人类发展和社会未来的大事。为了给社会培养出更杰出、更优秀的建设者，提倡优生、优育、优教，提高人口素质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天下父母谁不盼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完美、资质聪慧，那么智力的早期开发是完全必要的。过去一般认为在孩子出生后，特别是满月或一周岁时就应开始教育，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提出超早期教育，即对怀孕4~6个月的胎儿就开始进行教育，这就是胎教。

胎教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直接对胎儿所施行的各种教育或称刺激。也就是从胎龄5个月开始对胎儿施行定期、定时的声音和触摸刺激。从广义上来讲，胎教还包括在怀孕前后，为保证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如选择最佳怀孕时机，加强怀孕后的营养，创造优美的生活环境，保持愉快、轻松的情绪，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等。

有人问对胎儿讲话、播放音乐有用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胎儿在怀孕6个月左右，外耳、中耳、内耳三个部分的结构基本发育完成，和出生时相同。外界震颤传音的刺激可使胎儿活动增加，心率加快。将胎儿在子宫内听到的声音、母亲的心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录制下来，当出生后的婴儿啼哭时再播放，婴儿就会停止哭泣，安然入睡。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妊娠6个月的胎儿还有记忆和回忆的能力，已具备了学习的三个先决条件——感性、理智和神经。

胎教是一门崭新而又古老的学科，它最早发源于我国，在我国史书上多有记载。周朝的周文王、周成王都接受过胎教，因而生来聪明、政绩卓著。胎教在国外兴起较晚，但发展很快，英、美、法、日等国家纷纷建立专门的胎教研究机构、胎教指导中心等，研究胎教理论，推广普及胎教知识。在美国有一所奇特的胎儿大学，胎儿5个月开始上课，“学生”出世后几小时就可以得到校方颁发的学士帽和毕业文凭。加拿大多伦多市著名交响乐团指挥勃罗牧在出生前就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年轻时演奏某些乐曲仿佛不需要看总谱。有时曲谱本没翻过来，就知道后面的调子和音符了。当他把这些事告诉他拉大提琴的母亲时，您猜怎么着，原来这些曲子正是她在怀孕时演奏过的。由此看来，音乐对胎儿所起的刺激和教育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美国休斯顿的“神童”大卫，9岁时智商已达159，并进入汤玛士大学读书，他母亲说在怀孕期间经常播放贝多芬的音乐，阅读有关智商训练和如何教育小孩的书籍，实行胎教。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胎教研究和胎教知识传播普及方面尚很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胎教育儿指导》一书，指导父母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培育自己的孩子。从选择配偶和最佳受孕时机开始，分别对孕妇的饮食营养、情绪和生活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各种细微之处均给与详细指导。还特别强调了丈夫在胎教中的责任。通过阅读这本书，您可以学会胎教的具体方法和正确使用胎教仪器。从各国现代胎教和典型范例中，您可以了解胎教的必要性、可行性，从而将造就“神童”的秘密武器交到您的手中。另外书中还用了一定的篇幅指导您对出生后的小儿进行继续教

育。

（原载 1992 年 12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光辉业绩万古长存
《周恩来研究文集》出版
张敬双

对于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崇高的品德以及他对革命的贡献，全国人民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过去有关周恩来一生的资料佚散不全，党内有些原始资料没有公开发表，再加之周恩来同志在世时，一直不让宣扬他个人。因此，人们了解他、崇敬他，但对他又未完全了解，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周恩来同志的了解就更少了。为了让人们更完整、更系统、更深刻地了解学习周恩来同志，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研究文集》。

《周恩来研究文集》是从国内各报刊近几年内发表的700多篇文章中编辑的。所选文章，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反映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期，在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南昌起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在白区工作时期，在抗战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读后令人赞叹，令人信服，周恩来同志革命而光辉的一生完整而系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从《周恩来研究文集》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不仅有丰富的革命实践，善于忠实地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而且在理论上也有着巨大的贡献。

他的光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他永远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原载1987年10月30日《天津书讯》）

学习和研究十三大文件的参考书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版
秉群

为配合全国深入学习和研究十三大文件而编辑的《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书，已经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根据深入开展学习、贯彻和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而编辑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为该书写了序言《写在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前面的话》，副校长陈维仁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全书共分 13 章，其中有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摘编），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述的回顾，有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于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和探索，以及当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划分标准，它的基本特征、政治特征、经济特征和思想文化特征的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基本路线和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并且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了专章的摘编。

该书是编者从党的十三大前后发表的党的有关文件和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以及出版的专著 500 多篇（部）中选编而成的。

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十三大文件，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一本适宜的必备参考书。

（原载 1988 年 3 月 2 日《今晚报》）

开卷有益—推荐《灵魂的奥秘》

郑远

灵魂到底是什么,人类又是怎样认识它的呢?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灵魂的奥秘》(大学生知识丛书之一,王元明著)一书,系统地追溯了人类对自己精神认识过程中,不同时间的中西方科学家、哲学家对灵魂——人脑这一特殊物质产物的不同认识,并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概括的论述和准确的评介。

《灵魂的奥秘》用15万字的篇幅,汇集了哲学、科学史、心理学、生物学等多方面的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将有关人本身的诸学科融汇贯通,用历史的、科学的、逻辑的方法,揭示了灵魂的奥秘,全书以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规律为线索,对人类认识灵魂的过程和结论以及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人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介绍,综合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人的灵魂即是人的精神活动,它是由意识和无意识两部分组成,意识又包括人的认识、情感、意志的结论,从而阐明了灵魂的真谛。

《灵魂的奥秘》还就信息论、系统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对于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大知识量的青年是很有帮助的。

(原载1988年3月5日《天津书讯》)

《社会学导论》简介

张衿荪

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科塞等人的一部力作。它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例生动地阐明各种社会学观点。它的特点之一是，凡介绍一种重要的社会学观点时，均附有具体的资料和文献，以供读者参阅，使读者通过实例理解理论。本书把抽象理论与形象思维结合在一起，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印象深刻。

本书从社会学的起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着手，然后逐一探讨文化的起源、社会的发展、科层制的作用、社会不平等现象、离轨行为的产生、种族和民族、两性关系的未来、家庭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改进、健康的改善、宗教和信仰、国家和政治、社会运动和变迁、社会冲突和革命、人口爆炸和资源等问题。本书末附有社会学方面的《英汉对照名词简释》，可供读者检索使用。

本书以美国社会作为实例，实际上却探讨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情况。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美国社会的特点，而这恰恰又是对我国有借鉴价值的。

本书无疑是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一本重要参考书，但是它的作用却要广泛得多。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前的社会情况，社会将怎样发展，会遇到哪些障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本书译文流畅，又附图表 26 幅，直观性很强，因此有较高的可读性。

（原载 1989 年 4 月 22 日《天津书讯》）

博采众长独具特色
——推荐《社会心理学》（十三所院校编）
陈岩

1989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社会学系（专业）主任联席会议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近10年来我国高等院校的社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发展迅速，相继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科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大家也感到，经过10年的恢复和发展，有必要在总结已有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力量集体编写一本较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学新教材。因此，会议决定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牵头，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集体编写这本《社会心理学》。参加编写的十三所高等院校依次是：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厦门大学。

全书包括绪论、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理论、社会化、自我意识、社会动机、社会认识、社会态度、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人际关系、人际沟通、利他行为、侵犯行为、社会影响群体心理、民族心理、性别差异心理和应用社会心理学，计十七章。每章末附参考书目，书末附主要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书中在阐述社会心理学原理的同时融汇了大量实例，使人读起来无乏味之感，对了解并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功效。

该书不仅充分反映了作者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心理学教学的成功经验，而且从内容到结构上博采众长，尽量吸收国内已有的同类教科书的长处以及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大不同的研究方向上介绍社会心理学，使之既具有心理学方面的优势，又带有社会学方面的特色。

在您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单位，只要承认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您就同家人、朋友或同事之间产生人际关系，因而产生社会行为，这些关系、行为的发生、发展或改变都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起着作用，所以它也是您生活中的“顾问”。

（原载1990年6月20日《天津书讯》）

《国际著作权公约》出版 男编五

《国际著作权公约》是苏联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系统地介绍国际著作权公约的产生、发展、现状及今后的发展趋势的一本专著。全书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著作权国际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作权保护；所谓“邻接权”的国际保护；苏联参加一九五二年世界著作权公约的后果。作者通过对国际著作权的产生和发展的论述，对目前国际上现行的两个著作权公约——保护文学与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著作权公约，作了比较详细的对比评论。该书译者李奇同志是国家版权局版权处的负责同志，近几年来一直从事著作权的研究工作，并为全国各大区举办过著作权学习班，因此该书翻译比较准确，选词用语比较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最新文本的“保护文学与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世界著作权公约”作为附件附于书后。该书在我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今天，对于我国制定著作权法以及将来参加国际著作权公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原载 1986 年 7 月 30 日《天津书讯》）

“东方之珠”——香港 ——《七色香港法》简介

庞标

香港，这个自诩为“东方之珠”的都市，在许多人眼中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这里，繁荣与贫穷；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香港法律自然也呈现着纷繁的色彩，多种色彩的交织为香港法律蒙上一层看不透的面纱。《七色香港法》旨在为读者展示香港法律的真面目，揭示其实质。综观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较系统。本书共分 10 个部分：即司法制度；婚姻家庭法；民事侵害法；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制度；刑法；信托法；房地产法；经济法；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规定等等；基本上反映了香港法律的全貌。

二是内容涉及面宽。本书不但介绍了古老的法律如信托法、家庭婚姻法、民事侵害法等，也阐述了最新法规如单面镜作证、同性恋立法，以及试管婴儿、借肚生子等现时问题带来的立法动议。

三是作者通过 70 余篇短文对香港法律的各个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介绍，将刻板的法律通俗化，使人读来轻松有趣。

四是本书作者曾在香港律师行工作，有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在介绍香港法时，力求使用最近发生的案例，以及正在讨论的立法动议，并予以适当的评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原载 1989 年 1 月 14 日《天津书讯》）

适应对外经济开放工作的需要 ——《涉外经济法要览》出版

庞标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发展很快，涉外经济法律事务与日俱增。但由于双方在社会制度、经济力量以及民族特点不尽相同，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各国之间为了各自的目的和利益，就是在这纷繁复杂的矛盾之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和交往，发生这样那样的经济法律关系。这样，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中便亟需一本既能对研究涉外经济法律有所帮助，又能使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有所依据和参考的教科书与工具书相结合的知识性专著。北京、河北、上海的三位年过半百的教授在工作之余费时两年半完成的《涉外经济法要览》将满足社会的亟切需要。

该书分为总论、经济合作、对外贸易、工业产权、涉外经济合同、外汇管理、涉外税法、仲裁、诉讼和法律运用、特区法律共 10 篇，421 个条目。该书在体裁上采用篇章条目式，便于读者阅读检索；选材拟题均以“实用”为宗旨，详略取舍均经过仔细推敲和广泛征询意见，该书所援引资料丰富，无论是较重要的国际协定，还是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从对国外法律制度、机构的介绍到我国各项工作的具体作法，应注意哪些事项，以及主要的涉外经济合同的参考格式等等，应有尽有。在本书编辑出版之时，正值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公布实行，为收取这一重要法规，南开大学出版社经与作者商议，重新补写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条目，保证了该书的“全、新、俗”的特点。

（原载 1989 年 3 月 11 日《天津书讯》）

监察“清水衙门”的必备工具 ——介绍《教育监察必备》 庞标

教育部门，神圣清廉，被人称为“清水衙门”。但近年来，社会上违法乱纪现象、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无孔不入，各类大中专院校乃至中小学内都出现了种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与教育工作和教育工作者的神圣称号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清水衙门水不清”的说法就反映出人们对教育部门、教育工作者的担心与忧虑。教育乃一国之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颁布了一系列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监察工作的薄弱，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很少有人问津。而各类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法律规范性解释更是散见于各个不同时期的书报杂志之中，叫人“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就给整个教育监察工作带来很大麻烦。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决心组织人马，专门编出一部有关教育监察工作常用的，必须具备的工具书。为此，国家教委监察司，也就是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的同志翻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及许多无法计算的文件汇编，从中选录出教育监察工作中经常使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法律规范性解释共近200件，约40万字，编辑成《教育监察必备》。该书将这些法律规范所涉及的问题的性质分为五大类，即教育政令类、行政监察类、财务法规类、涉外规章类、反腐倡廉类。文件排列采取法规性文件在前，具体性文件在后，同一类型文件相对集中，不依颁布时间排列，便于读者查找使用。国家教委的同志和南开大学出版社为编辑、出版此书作了很大努力，该书将成为负责监察工作的领导同志、监察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尤其是教育战线的监察部门不可缺少的工作依据。

（原载1991年12月10日《天津书讯》）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 经济史资料选编》内容简介

焦静宜

由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远、河北大学历史系傅尚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星光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四卷本，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不可胜数的奇迹，曾被全国誉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尤其当年战斗在财经战线上的同志们，在烽火遍地、极端残酷的环境中，认真做好财政工作，保障军民供给，为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基础。因此，收集、整理、编纂、出版边区财经史料是十分必要的。

《选编》是一部系统的丰富的根据地经济史料。采编的资料，包括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决议、政策、法令、指示、会议记录及调查资料等重要历史文献，当年报刊杂志中存留的珍贵资料也大部分按原文辑入，编者作了必要的题解。

全书共约 240 万字，分四卷出版。第一卷为总论编，包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边区的政治和经济概况、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工作报告和总结以及边区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另外，还附有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掠夺的资料。第二卷为农业编，包括战前边区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抗战中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发展、水利建设、劳武结合、劳动互助以及大生产运动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第三卷为工商合作编，主要内容有边区公营工业、军事工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合作事业等方面建立和发展的系统提案资料。第四卷为财政金融编，包括建立战时财政、实行合理负担、征收救国公粮、废除苛捐杂税、建立边区新税制、制定行政开支标准、发行救国公债、实行预决算和审计制度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在金融部分，有边区银行的建立、边币的发行、银行的法规和银行业务的开展、对敌伪货币战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原载 1984 年 5 月 15 日《天津书讯》）

经济管理的良友——统计信息分析 王真

南开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统计信息分析》，是在管理、经济、生产中处理信息方面的并不多见的著述。统计分析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对于众多可测因素的数据处理，但是在实际事务中，除定量指标外还有大量不可测的定性指标，如何分析？这就从统计分析跨入信息分析这一新颖而非传统的领域。本书将统计分析扩展到信息分析，介绍以概率及其分布为基础的信息量公式、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信息分析方法，从实用角度出发，从直观背景引入各种概念和数学模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常用的信息处理方法，附有大量实例，运用计算器和微型计算机即可解决实际问题。

摘引书中的例题如：

某市订阅 K 杂志的家庭占 20%，但近来订阅数有减少的迹象，为此随机抽取 100 户，调查有 16 户订阅，问订阅率是否显著下降？（答：无明显下降）。

某厂进行市场调查，了解购买本厂生产的牙膏的人数比率，要估计偏差不超过 2%，可靠性为 95%，问需要调查多少消费者？（答：2500 人）。

这些实用性极强的例题举一反三，将帮助企业管理干部、质量管理人员掌握统计信息分析的知识和技能，成为合格的企管、质管技术干部。本书作为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材，由沈世镒教授主审，还多次作为各级质量管理人员培训教材，将成为经济管理人员的良友。

（原载 1987 年 1 月 15 日《天津书讯》）

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必备书——《市场学》

葛华

市场学自 19 世纪诞生于美国以来,受到企业管理工作者和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很快成为各国企业管理人员的必修课程。我国过去在实行产品经济的条件下,片面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理论,市场学也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以至于几十年来,企业生产不注意市场需求,长期产销脱节,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学知识开始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理论工作者亦开始把国外市场学知识引进我国,试图指导我国市场的运行。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有着本质的区别,仅仅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理论亦非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理论工作者纷纷编写自己的市场学教材。在全国综合性大学管理学科协作组的领导下,由李景泰、汤国辉、马龙中三位副教授任主编,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近 10 所综合性大学 10 余名市场学教师合作编写的《市场学》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这本《市场学》吸取了国内已有的市场学教材编写中的教训,避免了要么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没有突出市场学特色;要么照搬国外市场学理论,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缺陷。它联系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实际,参考了国内外已有的市场学研究成果,从现代市场经营观念入手,以现代市场策略为核心,分析了市场学的基本理论。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作者不仅注意了国外市场销售与管理的经验,更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的特点;不仅介绍分析了国内市场的特点及企业进入市场的必要知识,而且展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特点,为开放条件下的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必要知识。

(原载 1988 年 6 月 25 日《天津书讯》)

研究旅游市场经营活动的《旅游市场学》 佚名

作为社会经济的研究对象和经营手段，市场学属边缘科学。市场学（英语 Marketing）又称市场营销学或销售学，最初出现在廿世纪初的美国、随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研究旅游市场经营活动的《旅游市场学》，始于二次大战以后的四十年代末。

进入六十年代，西方各国旅游企业从研究旅行者的需求入手，不惜工本地研究市场，开发产品，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在我国，《旅游市场学》还是一门新学科。为适应旅游事业发展和旅游专业教学的需要，国家旅游局教育司组织全国旅游院系和旅游企业部门的有关同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统编了这本《旅游市场学》。

《旅游市场学》一书不仅可供各有关旅游院系的专业教学使用，对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对旅游市场的调查研究和预测，旅游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的选择，旅游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和宣传策略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对我国旅游业中的各种经营单位（包括旅行社、旅游饭店、交通部门以及与旅游业有关的工商企业）如何熟悉旅游市场，开发旅游市场，提高社会效益等，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法。

（原载 1990 年 11 月 17 日《天津书讯》）

《市场竞争案例集粹》出版

李景泰 陈哲

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的进行，对企业来说，通过市场营销工作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已越来越重要，对市场竞争和市场营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日益普遍。

许多同志在工作和学习中都感到需要一本用实际例子来系统地叙述企业如何进行市场营销各方面的工作以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书，作为进行具体工作和理论学习的参考。

本书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本书主要以资料汇集为主。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取其精华，并在市场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市场营销工作的各方面内容对其加以系统化。

有些案例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自己撰写的。

在决定材料的取舍时，考虑到了它对不同层次读者的适应性。本书的打印稿曾给研究生、本科生和企业管理干部分别使用过，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欢迎。这是对笔者辛勤劳动的最大安慰。

本书既可独立使用，也可作为综合大学管理学科教材编选协调委员会编写的《市场学》教材的辅助教材使用。如果我们作一个粗略的划分，那么本书的第一、二篇可以和上述《市场学》的第一编相对应；第三篇和第二编相对应；第四至第七篇和第三编相对应；第八篇和第四编相对应。

（原载 1991 年 3 月 10 日《天津书讯》）

纵观众家之说—揽股市风云
——南开大学版《中国股票市场问题争鸣》
佚名

目前股份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股票市场也应运而生。面对这一崭新的事物，上至决策部门，下及平民百姓，无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经济理论界也对股份制理论问题提出了各种观点。人们议论纷纷，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股票交易是赌博，是投机倒把，对我国推行股份制表示疑虑与耽心；有的人则极力倡导、赞成搞股份制，开放股票市场，利用它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的人担心在中国发展股票市场会引起分配不公，助长投机行为；有的人则认为股票市场有益于企业筹措资金，投机可以活跃股市，股市在我国大有可为，等等。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 300 年的股票市场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股市仅仅是刚刚诞生的婴儿，只经历了三、四个春秋，一切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股市究竟如何搞？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还是使其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我国特色，或者是独辟蹊径，另起炉灶？对此，我国政界、理论界、经济界、金融界和证券界开始了深入的探讨。

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股票市场问题争鸣》一书汇集了众家之言，通过对争论问题的概述，从股市理论、股市管理、股市运作，到股市发展前景，提供了各种典型观点，使读者能了解同一问题的种种不同见解，便于读者对各种观点进行比较与思考，在实践中加以鉴别。本书是目前国内所见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股票市场问题综述的专著，因此，无论就其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来说，本书都不失为一本开阔视野，拓展思路的好书，也可以说是所有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问题感兴趣的政界、理论界、经济界、证券界的朋友们的一本必读书。

（原载 1992 年 1 月 10 日《天津书讯》）

《怎样修改病句》出版

晓咏

要做到说话和写作不出一毛病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如何防止病句，把病句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怎样修改病句》一书，将能够给广大读者以指导。

本书的作者赵运昌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深知如何消除病句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本书颇具一些特色，表现在：（1）内容分类排列比较科学合理。作者用由浅入深的论述把产生病句的原因和修改病句的方法清清楚楚地展现给读者，既不笼统，又不繁琐。比如“逻辑方面的病句”，作者就从“概念”、“判断”和“推理”三个方面讲常见的病句，使读者全面了解逻辑方面产生病句的情况。（2）结合评改病句将一些容易造成病句的原因介绍给读者，而这些知识往往正是正面讲语法规律时无法讲透的东西。比如一般在连词“和”、“或”、“及”、以及介词“对”、“向”等方面出现的病句，主要是对这些词的异同搞得不十分清楚。而本书正好结合病句加以细致的辨析，可以补充平常学习语法时容易遗漏的知识。（3）各节正文后附有大量练习，与正文互相补充，通过练习加深对正文的理解，使读者通过实践提高改正病句的能力。另外书后设有总练习，并附有参考答案。这在同类书中是不多见的。

《怎样修改病句》一书共 16 多万字。全书由怎样修改病句、各种病句的修改、总练习参考答案三大部分组成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大专院校学生、中小学教师、机关文秘干部和准备参加大学自学考试的同志必要的参考书。

（原载 1984 年 12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新编中学语文课本导学与训练》套书

张世甲

中学语文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对于学好其他各学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需要通过读写的反复训练才能学好。基于这一根本认识和多年的教学实践，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出发，由特级语文教师邢永庆、及树楠，依据新编语文课本，主编了《导学与训练》套书（全书共十二册，初、高中各六册）。

本书是按新课本编排单元编写。每个单元由知识重点、学法指导、导读与训练和单元练习四个部分组成的。

“知识重点”基本是按课文内容选定的，同时考虑到知识的系统性，除教材已规定的知识重点外，适当地作了一些补充。每个单元的“知识重点”既是学习本单元的入门向导和总纲，也是整套书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法指导”是按照学习的认识规律及作者多年教学实践的经验，结合具体课文指导的。旨在教给学生们掌握知识规律和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

“导读与训练”是逐课进行的，每篇课文的导读，不是课本的解谥，而是提出几个精当的要点，进行简明扼要又富有启发性的分析。然后通过反馈训练，巩固所学知识。训练题型多样，覆盖面宽，多采用标准化试题。

“单元练习”是一种综合性练习，重在训练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包括阅读练习和写作练习。写作练习中，有题目，有指导，有的还附有例文供参考。

最后附有初中学段和高中学段语文知识系列表，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掌握初、高中学段所学知识的重点。它有利于克服学习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原载 1989 年 4 月 22 日《天津书讯》）

写作指南
——一本实用高教自学考试辅导教材
丁介

高教自学写作课考试的内容，一般都包括写作理论知识和作文两大部分。面对一本厚厚的写作课教材，他们往往觉得无从下手；而对自己自学的效果如何，也常常是心中无底。这多方面的原因就造成了高教自学写作考试的及格率偏低。

如何使考生在有限的自学时间内比较好地掌握写作课基本知识，并使之有可能尽快把握各种文体的写作呢？本书作者积多年的教学经验，根据自学考试的具体特点，编写了这本《写作指南》。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布的《写作自学考试大纲》而编写的。主要特点在于：

其一，为便于读者记忆和掌握，本书作者把写作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列出来并给予简明扼要而又准确的回答，避免了读者在教材中找不准概念，抓不住核心的问题。

其二，本书特别突出了写作课的实践性。每讲完一个专题后，都附有大量的练习题，其中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以及不同类型的写作练习等各种类型的练习题。总之，在写作题库中所储备的各种类型的试题在这里都有所涉及，读者可得以全面练习。

其三，读者可借助本书各单元所附的大量练习题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测，既可全面检查自己对这门课程掌握的总程度，同时又可借以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

总之，《写作指南》是自学高考者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对偏远地区或求师不便的考生，有此一书在手，考试便多了一分成功的希望。

（原载 1991 年 9 月 25 日《天津书讯》）

一部了解欧美文学发展史的新书
——《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
史实

《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经原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审定后，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主编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赵澧。参加编写工作的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院、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十七位多年从事欧美文学教学、研究的教师。

这部教材没有采取按作家阶级性质、按流派分章设节的体系，而是按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描述，史的脉络清晰，论述中特别注意到一个时代的文学与上个时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不同流派的关系、同一流派在不同时期的异同。

本书全面系统介绍欧美文学史的知识，增加了有些文学史所没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文学，对有的文学史未加重视的很有影响的作家如左拉、肖洛霍夫、海明威等作了专节评述。本书对作家作品的论述、对各种文艺思潮的评介，都力求做到了符合历史的实际。

这部书，材料翔实，语言流畅，论述由浅入深，确是一部较好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也是一般外国文学爱好者的一部有益的重要参考书。

（原载《天津书讯》1985年11月30日）

《曹禺年谱》出版 崔国良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驰名中外的我国杰出戏剧家曹禺七十五周岁寿辰，今年也是他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反映他七十五年所经历过的生活和从事戏剧活动的《曹禺年谱》在祝贺他从事戏剧活动六十周年的时候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曹禺年谱》是作者采用大量的史料和他们亲自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年谱》记录了曹禺的家世及其生平，并用大量篇幅记载了曹禺在天津诞生、成长并在天津开始从事戏剧活动的史实。记录了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参加我国北方最早的新剧团——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活动，并在这里奠定了他一生从事话剧事业的基础，以及他如何成长为我国话剧发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戏剧家所走过的道路。《年谱》还反映了他如何走向世界成为国际闻名的一位杰出戏剧家的历程。书中附有曹禺的近期彩色像片、访问日本时的生活照片以及他一九三五年在天津参加演出曾经轰动华北的《财狂》的珍贵剧照。

（原载 1985 年 10 月 30 日《天津书讯》）

《王学仲研究》

佚名

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王学仲的首辑研究专著，已由南开大学副教授安旭、鲁南画院院长刘繁昌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学仲研究》分五部分：1、才华·黽求·名流；2、艺术哲学观点；3、艺苑开拓创新；4、书法·绘画·史论；5、人格·学格·国格。并附录“王学仲年表”及“王学仲书写重要碑刻表”。本书以翔实资料，简明文字，鲜明的艺术观点，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王学仲教授的翰墨生涯、主要艺术成就、美学观点及重要艺术史论著述。

本书融知识与科研为一体。书中透过了三十年代以来中国艺坛的风云变迁，名流交往，艺苑革新等艺术界的花絮和人物轶事，在介绍王学仲成功之路的同时，也为广大青年和艺术爱好者介绍了许多艺苑知识和趣闻。书中述及王学仲艺途履迹、艺术哲学观点和重要艺术作品，为有兴趣研究王学仲艺术的同行，提供了文献索引和资料，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遵循了艺术研究的客观规律。王学仲的艺术道路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的成功和党的领导的一致性。王学仲的人格、国格和艺术品格，具体地证明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的自爱、爱党、爱社会主义和爱国的一致性。

（原载 1989 年 11 月 11 日《天津书讯》）

《英语快速阅读》简介

汪彬

《英语快速阅读》自 1984 年出版以来，已连续印刷 4 次，销出近十万册。此次经编者修订后，依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精神，对原文作了部分调整和删除。

在选材方面，注意了难易适中（生词量严格控制在二十分之一以内），力求语言规范、体裁多样。课文内容涉及面较广，包括科普知识（如，饮食与健康；居里夫妇发现铀元素；水在自然界中的循环；纸及其用途；能源利用及短缺；火的发现及应用；冰船的建造等）、科幻小品（如，从地球到月球；金星上的首批人）、最新科技动态（如，人类最有用的新型材料——塑料；计算机及通讯卫星等）、生物趣闻（如，大象及其生活习性；绝顶聪明的海豚和鲸鱼；猩猩遨游太空等）、世界奇迹（如，埃及的金字塔，百慕大三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不明飞行物——飞碟等）、名人轶事（如，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献身现代科技的发明家诺贝尔；蜚声世界影坛的电影大师卓别林；世界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哥伦布；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等）以及反映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医疗保健、邮政通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短文。

（原载 1989 年 12 月 2 日《天津书讯》）

推荐《科技英语常用词快速记忆》

张彤

学习英语，人人都要度过记忆单词这一关，特别是当你走进科技英语世界的大门，就更需要有一部指南，帮你迅速掌握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层出不穷的英语词汇。要想在短时间内有效记忆单词、扩大词汇量，必须首先了解科技英语单词的构词方法和基本规律。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技英语常用词快速记忆》，恰似一本当代英语的“说文解字”，通过分析单词的内部结构，介绍了一种十分简易的新型记忆法。这是继《英语基本词快速记忆》之后，向广大读者推出的又一部实用性英语读物。

本书模仿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运用的“分析字形”、“解释词义”的方法，将 4000 个英语常用词按字母表顺序逐字“解剖”，指出词根及其基本意义、前缀及其补充含义、后缀及其类别。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但可以了解科技英语单词特殊的结构方式及构词意义，掌握“解剖词汇”的基本方法，还可依此进行判断、推理，达到“望文生义”，取得科学、简捷的记忆效果。

（原载 1990 年 5 月 5 日《天津书讯》）

迈向新阶梯的必经之路
——《大学英语六级模拟试题集》简介
佚名

对今天的高校学生来说，四级英语测试合格，不啻拿到了本科毕业生的通行证。但仅仅具备四级英语水平，在目前外语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尤其在出外深造的考核中，还不能算“实力雄厚”。因此很多有志青年把目光投向更高的层次——六级英语。

六级英语是大学英语的高级阶段也是衡量学生英语水平的关键一环。国家教委要颁布的《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大纲》，无论在训练学生的英语听力、阅读理解能力方面，还是在检验学生综合运用语言能力及基本的写作能力方面，都比四级英语“更上一层楼”。

许多人孜孜以求，力图在六级考试中，获得良好的成绩，但全国出版的有关指导材料目前却不多见。为了配合高等院校学生在第六级英语学习结束时进行全面复习，以便在考前有针对性地选用适量题目作测试训练，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的汪士彬、薛琛同志精心编写了最新《大学英语模拟试题集》，该试题在训练和检验学生的英语听、读、写综合运用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标准性。（书中附有参考答案，听力理解部分配有录音磁带两盒，读者可与南开大学公外教学部联系转录，不再与本书配套发行。）

经过两年的实际教学考察，证明该题集对学生在考试中更充分地发挥实际英语水平大有裨益，在提高成绩上效果显著。六级英语是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迈向英语新阶梯的必经之路，为广大学生和学者参加 TOEFL 和 EPT 考试奠定坚实的基础。

（原载 1990 年 7 月 28 日《天津书讯》）

不用死读看看便熟
——《英语基本词快速记忆》
白莉

记忆单词，是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亦是英语学习者最头痛的事情。《英语基本词快速记忆》则介绍给大家一种既轻松又科学的记忆方法。此书曾荣获 1988 年全国优秀图书奖。

不少读者反映：使用此书记忆单词记得快，记得牢。本书与同类的书比较有其自己的特点：

一、集中反映了解放以来许多学者对英语单词形、音、义的研究成果。介绍了英语构词法则（如缀合法、合成法、拟声法、缩略法、转化法等），以便使读者对英语单词的不同结构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掌握“解剖”词汇的基本方法。

二、模仿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所运用的“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方法，将现行初、高中的全部单词按字母表顺序逐词表行“解剖”，指出每个单词的结构（前缀、词根和后缀）及其构词意义和词源。使学生可以根据判断和推理，达到“望文（形）生义”，取得科学而简捷的记忆效果。

三、可作为词根词典和同根词词典。

本书还从所收录的基本词汇中筛选出 900 个词根，整理出由其派生的 5000 个同根词（绝大部分为大专院校学生应掌握的常用词）。

（原载 1991 年 9 月 25 日《天津书讯》）

拾阶而上 逐级提高
——向您推荐《大学英语阶梯阅读》（1—4册）
张彤

在国家教委颁发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一直把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放在首位，这说明了获得有效的英语阅读技能是对学生第一层次的要求，也是提高其它技能的基础和关键。鉴于目前大学英语泛读课教材亟待改进、学生所需要的适用教材尚缺，我们编写了这套新型的分级系列读物，以弥补教学上的不足。

本套书与大学英语1至6级的学习阶段紧密配合、相得益彰，为学生提供内容新颖、体裁多样、具有现代语言规范和特点的课外读物。从八十年代以来英美著名报刊杂志中，择取适合我国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兴趣和求知欲的材料，摒弃了已熟知的比较陈旧的知识，又注意避免学生较生疏的冷僻东西。本书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使他们逐步扩大阅读量，拓宽词汇量和知识面，在逐步增加的泛读中提高英语水平。此外该书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泛读习惯，循序渐进，有助于学生层层递进地提高阅读速度及直接理解文章的能力，增强语感，随着依次扩大的信息量，培养用英文思考的能力。

（原载1991年11月25日《天津书讯》）

彼岸文学的新探索
——英文版《美国文学选读》（上、下）
佚名

近年来，我国对美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日益重视，不少大专院校业已开设美国文学课程，高等院校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师生们迫切希望看到独立成书的美国文学教科书。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南开大学外文系英美文学研究室负责编写的《美国文学选读》现已出版。这套书像两扇敞开的窗口，将使读者领略到大洋彼岸文学领域的奇观异貌，结识那些创立美国文化的先驱人物以及群星璀璨、各领风骚的当代英才。上册从17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下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该书对作家作品的编选一直恪守重点突出的原则，每位作家项下均有四个部分：作者介绍简短明晰，作品介绍画龙点睛，原文的选择具有艺术成就的代表性，而注释则做到深入浅出，通俗准确。所附评语吸收了国内外评论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近年来美国文学批评的新发现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不拘一人之见，不守一家之言的前提下，对摘选的作品采取谨慎的态度，以其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为衡量标准。你想知道美国文学的原生状态吗？是谁提出了创立“美利坚文化”的口号？美国文学中欧洲文学、印第安文化因素、黑人文学乃至犹太人、亚洲人的文学成分是如何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学园圃的这朵奇葩？所谓“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别指什么群体？西方现代主义在美国文学中的典型流派有哪些？诸如此类，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和中肯的分析。从中亦能欣赏和品味作家们风格各异而又耐人寻味的艺术表现方法，对我们的借鉴和吸收将大有启发。它将能带动我们对这片文学领地进行更加深远的探索。

（原载1991年4月25日《天津书讯》）

《英汉双解最新学生多用词典》简介

张彤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增强，我国的英语教学水平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使得学生们迫切需要一种融语音、释义、语法和阅读为一体的新型工具书，为他们的英语学习提供迅速有效的帮助。

高伟忠、王宝敏两同志，创编的这本词书不仅顺应了英语教学辞书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而且特别加强了对中学英语词汇、语法的比较、分析和实例运用，是一部具备多种用途的中型双解词典。它的主要特点是：

一、收词精当而注意知识领域的开拓。本词典所收的词条不仅包括我国现行各版本中学英语教材的全部单词，还收进了实验教学中已经或即将采用的若干原版英文课本的单词，共有 18000 余条。

二、释义贴切而明晰，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力求使用中学生所熟悉的词语和句子结构，巩固中学教材的内容。

三、例句简练而生活化，配有中译文；注意了语法的全面应用，使学生对翻译中体现的语法特点有直观的了解。

四、本词后所附相关词句丰富多彩。除词条上收有普通科技术语和国名等地理名词外，在释义、例句之后都收有相关的常用短语以及复合词、派生词等共近万条。

五、根据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特点及应考的实际需要，本书对基本词汇，尤其是中学教材中易被误用的常用词语做了详细的解释和具体的说明；在基本例句后列举出不同的词句搭配，并进行区别、比较，避免了应用时的混淆，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六、书末附有“前缀和后缀表”，“常用缩略词语表”等共八个附录，对补充课外知识，熟悉国际标准的常用词语具有积极效果。

（原载 1991 年 4 月 25 日《天津书讯》）

《俄语商贸旅游手册》出版 霍彩素

当前，俄罗斯及前苏联各独立共和国，正在成为中国的商贸对象，尤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营和私营及个体商们前去进行商贸洽谈。在中俄商贸迅猛发展的情势下，俄语速成会话读本显得尤为需要。为了解决广大商旅读者走出国门的急需，南开大学出版社适时组织编写出版的《俄语商贸旅游手册》即是向中方商旅人员提供的一本既解决实际问题又适合他们水平的“短平快”教材。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俄语 600 句，分十二个单元，包括交际用语、海关检查、银行业务、旅游下榻、办理手续、签订合同、莫斯科旅游、圣彼得堡观光等俄语常用商贸旅游用语。考虑到口语实践离不开有关国情、商情、法情等背景，又编选了“赴俄商旅人员需知”做为下编，使之与语言实践配套成为系列。包括：出入境需知、商贸应遵循的国际惯例、俄文行文样例、俄文广告文例、前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简况及八大旅游城市简图等。

该书具有普及性、应急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既可做自修读本和赴俄商贸旅游之参考，又可选做商贸旅游人员的培训教材。

（原载 1993 年 1 月 30 日《天津新书目》）

《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

中译本出版

佚名

日本文化尽管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她毕竟有自己独特的土壤。历史上，日本民族曾无数次向中国文化及其它国家文化学习，乃至今天仍是如此。现在，应该是中国人回过头来认真思索、反省、研究一下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时候了。日本民族今天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可远溯到她的文化底蕴中。

该是日本民俗学会会长、日本博物馆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及考古学家樋口清之先生的一部著作。它全面介绍了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历史。向人们娓娓叙述了她的渊流、她的历史、她的演变、她的精神文化、她的民俗传承、她的科学技术。相信每个喜爱日本文化的读者都会从中得到教益和启示。

（原载 1989 年 1 月 21 日《天津书讯》）

了解今日世界的信史
——《当代世界知识新辞典》问世
张焕宗

在我国加速改革开放、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新形势下，各级干部和职工群众都需要更多地了解今日世界的各方面情况。最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象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知识新辞典》，正好适应了这方面的社会需求。这是一部专业性与普及性、学术性与知识性并重的中型工具书，综合反映了自二战结束到1992年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共收3000余条目，1200万字。

内容丰富、时代气息浓厚、覆盖面大、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是该书的最大特点。全书共分五部分：1、综合类，包括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共运、和平运动等；2、各国（或地区）的重要事件和组织；3、当代科技文化；4、各国（或地区）著名人物；5、新名词术语。其内容是如此广泛，几近百科全书，基本能满足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读者的不同要求。

资料丰富、翔实、实用性强为该书的另一特点。其释文虽然简要，但容纳的信息量却很大，且完整。例如重要人物的生卒年，精确到月、日。重要事件、人物、专有名词之后皆附原文和1—3种中外文主要参考书目。附录部分还包括各国独立日、国庆日、民族、语种、主要国家政府沿革以及世界经济、人口等各种统计图表，便于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时参考。

该书突出科技文化的内容。鉴于以往在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重视不足的缺陷而特别增加了独立编排的科技文化部分，并从当代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50多个学科中选编了800多个条目。由于这些条目均为有关专家撰写或审稿，故释文贴切，内容可靠。

该书编排科学，检索方便。除按分类目录编排外，还另有一套音序目录。由于各类条目皆以时间为序编排，故该书也可作为“当代世界编年史”来使用，这对于读者了解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新问题大有帮助。

（原载1993年4月15日《天津书讯》）

为高校提供一本急需的公共课教材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佳火

1984年2月，原教育部曾发出《关于在高校开设 文献检索与利用 课的意见》，指出：“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从国外的经验和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是一门很有意义的课”。因此，要求“凡有条件的学校可作为必修课，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可作为选修课或先开设专题讲座，然后逐步发展、完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一书即是根据这一《意见》中的具体要求而编写的有广泛适用性的一部教材，并成为正在陆续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之一种。

本书由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来新夏、天津商学院图书馆馆长惠世荣和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副主任王学荣编著，他们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实践，研究了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内容的安排和编写工作，既注意了基本知识的普及性，又注意了便于利用的实用性，同时还根据未来图书馆情报事业发展的趋势，适当地加进了现代化手段检索的介绍和利用、检索技能的作用及意义、国内外社科情报方法的内容。此书共七章，分别介绍了掌握社科情报系统与机构、国内外社科工具书简介、检索文献的具体方法及利用文献治学的经验等；更为可贵的是，本书附录了经编著者多方搜集、筛选的常用检索工具书刊，参考工具书刊举例和社会科学机读数据库简介，可供读者直接利用。因此，本书既是传授社科文献检索与利用入门方法的参考书，又是便于读者使用的工具书。

此书初稿完成后，曾分送有关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并在有全国52所高校有关人员参加的社科文献检索师资班上试用，收到较好效果，现经修订增补，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适用于高等院校各系科专业师生，社科学作者参考使用，尤其适用于图书馆专业师生和工会图书情报工作人员使用。

（原载1986年7月30日《天津书讯》）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材建设的新进展

王真

由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来新夏教授主持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自 1986 年以第一种——《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问世以来，陆续出版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文献计量学教程》和《国际联机文献检索》等教材。

刚刚面世的《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胡安朋编著）简明、精当地讲述科技文献检索的原理和方法。以最新版本检索工具书刊为实例，深入浅出地启发自学、指导应用。既有理论可供系统掌握，又有门径可迅速登堂入殿。因此，它既是大学理工科文献检索课的适宜教材，又是科技人员进行情报检索的指导书。结合国情，该书以介绍手检为主，兼顾计算机检索。随着计算机检索服务的日益普及，应用国际联机检索的手段已提到大学生和科技人员、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来。《国际联机文献检索》（何翠华、姚家训等编著）即为此而出版。该书由天津情报所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有关专家合作撰写，同样兼具教学和实用的特点，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均可使用。

《文献计量学教程》是我国第一本新学科文献计量学的系统论著，由著名情报学家王崇德教授在多年大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著而成。权威学者杨沛霆对该书稿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成功地在文献学领域内引入定量的高等数学研究手段，综合中外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促进了这门新学科的成熟和发展。预计该书将对科技成果的科学评价，文献的存贮、分布和半衰期，图书馆建设，学术书刊出版和发行等发挥指导作用。

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 1989 年 5 月 27 日《天津书讯》）

文献计量学教程
——文献计量学的新教材
王真

文献计量学是当今科学定量化大趋势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它研究文献学中的定量规律，如文献作者分布、文献分散、词题分布、文献增长、文献老化、引文分布等方面的数学和统计学规律。由此可以指导文献检索、图书购置、存书更新、单位的科研成果统计，作者成就评估……涉及科学学、未来学、情报学、决策科学等。例如，在浩瀚的科学技术文献海洋中，如何用最快速度、最高的效益检索到最多的有关文献？文献计量学告诉我们，集中查阅为数不多的“核心期刊”就能做到这一点。各门学科领域中都有各处的核心期刊。如何评定某期刊是否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提供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和统计公式。

文献计量学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文献学、情报学界受到高度的重视，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专家。其中，王崇德教授就是公认的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他是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理事、天津市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在担任南开大学分校情报科学系主任、主授文献计量学课程的同时，潜心研究，成果累累，成为我国一流的文献计量学者。他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系统化，以必要的数学知识辅佐理论解释，既有严谨的论述，又不唯数学、举例论证，旁征博引，文理兼容，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综合的大趋势。

这就是近期内即将付梓成书的《文献计量学教程》，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来新夏先生主编的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材之一。适合于情报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有关学科和专业大专院校师生和科研人员阅读参考。

（原载 1990 年 6 月 9 日《天津书讯》）

推进学术研究的《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王一鸣

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鲍觉民教授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较为系统地汇集了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论文，内容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开发）、旅游地理、国外人文地理学发展动态，地理学理论问题，国外的区域人文地理问题分析等，反映了鲍觉民教授和南开大学从事人文地理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的部分教师的近期研究成果，文集中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例分析和研究。作为了解学术动态，扩大知识领域的阅读参考。

近年来，国家多次号召加强对包括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薄弱学科的研究，但由于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除经济地理之外，起步都比较晚，还有些分支学科尚处在逐步建立之中。本书收集的论文侧重各薄弱分支，以期推动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促进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原载 1988 年 5 月 21 日《天津书讯》）

培训旅游人员的必读书
旅游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中国旅游地理》出版
秉群

世界范围的“旅游热”仍在不断升腾。各国旅游者来华和港澳台胞归国旅游也迅猛增长。我国广大青年和退休老年旅游者也在一年年地增多，他们都迫切地需要了解我国旅游地建设和旅游条件及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因此，大量培养有较高素养的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已为当务之急。为了满足上述需要，北京旅游学院有多年旅游地理教学经验的教师将他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定名为《旅游地理》，其缩编本更名为《中国旅游地理》出版，以飨读者。

该书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以简要的篇幅介绍了旅游地理的基本知识，包括什么是旅游的资源，旅游资源的分类及特征；如何观赏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旅游地建设及旅游交通状况。

第二部分是介绍中国旅游地理。这部分也是该书的主要部分。

我国是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作者用两章篇幅全面、广泛地介绍了我国的旅游资源情况，把我国风光美丽的自然旅游资源分为地貌旅游资源、气候旅游资源、水体旅游资源和生物旅游资源，并对此做了系统的介绍。

该书把我国的旅游地理分为十一个大的游览区，分为京畿要地北京旅游区、白山黑水的黑吉辽旅游区、民族摇篮的黄河中下游旅游区、大浪淘沙的长江上中游旅游区、山水神秀的长江下游旅游区、南国侨乡闽粤旅游区、石林洞乡滇黔桂旅游区、塞外风光的内蒙古宁夏旅游区，丝绸之路的甘新旅游区、世界屋脊的青藏旅游区和台湾省、香港、澳门地区。对每个旅游区旅游环境及旅游资源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

（原载 1988 年 6 月 25 日《天津书讯》）

《COBOL 程序设计》中译本介绍

王家骅

本书是翁瑞琪同志根据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NCC）出版公司 1981 年出版的由 J. M. Triance 编著的《COBOL 程序设计》一书翻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

COBOL 是英文 COmmonBusinessOrientedLansugc 等词的缩写，意思是面向企业的通用语言，主要用于解决各种数据处理问题，也能用于科学计算，在企业管理、工交财贸、银行会计、人事档案、情报检索、计划分配、报表汇总、成本核算等方面的数据处理、文件处理上有极强的能力，获得极广泛的应用。

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COBOL 语言及其程序设计方法。全书共有十五章，内容包括：COBOL 语言结构、文件与记录的定义、过程部及有关语句、COBOL 中的算术运算、报表的产生、表的处理、程序间的通信、排序、索引文件、文件的更新、字符串处理以及可变长度记录等。

本书是一本较好的学习 COBL 程序设计的入门书。书中每章都附有自答题，书末附有解答，特别适于自学，只要具有初等代数的知识，就能读懂本书。

本书既可作为计算机专业、企业管理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学习 COBOL 程序设计的入门教材，也可作各类干部和技术人员学习 COBOL 程序设计的自学用书或普及 COBOL 的短训班用书。

（原载 1984 年 9 月 15 日《天津书讯》）

向您推荐一套简明实用的微型计算机

IBM - PC 丛书

王家骅

为了满足广大的 IBM—PC 微型计算机用户的需要，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微型计算机 IBM—PC 丛书：《如何使用 IBM—PC》、《IBMFORTRAN 语言》、《IBMCOBOL 语言》、《IBMBASIC 语言》和《IBMPASCAL 语言》共五种。它将成为 IBM—PC 微型机及其兼容机用户以及计算机初学者的良师益友。

IBM — PC 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Corporation Personal Computer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个人计算机) 的缩写，是 IBM 公司生产的十六位的微型计算机。该机选择 Intel 8088 作为其中央处理机，价格比其它机型每台低约四、五百美元，而且还扩展了一些新的功能。因此，IBM—PC 问世不久，1982 年销售量即达 20 万台 (占市场销售总量的 18.8%)，1983 年达 60 万台 (占市场销售总量的 26%)。IBM—PC 的出现使个人计算机广泛进入办公室、实验室。IBM—PC 的软件也很丰富，其使用说明书多达 20 余本。

近年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 IBM—PC 微型计算机。但购置单位以初学者用户居多，难以掌握。为此，我社从英文说明书中选择其主要内容，组织了这套丛书的编写、翻译工作，以便使初学者用户能迅速掌握 IBM—PC 的使用方法。另外，这套丛书也将使初学者在学习微型机的使用、FORTRAN、COBOL、BASIC、PASCAL 等高级计算机语言的程序设计、dBASE 的使用、汉字库的使用等方面受到裨益。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套微型计算机 IBM—PC 丛书的内容：

《如何使用 IBM—PC》。朱耀庭、王治宝编。作者根据他们的操作实践的经验，选择了对于使用 IBM—PC 急需阐明的一些内容，集各使用说明书的有关部分于一处。因此，阅读了该书，就可以使读者迅速上机操作。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介绍了 DOS 下各种语言的使用，FORTRAN、COBOL、BASIC、PASCAL 程序的编辑、编译、连接和执行步骤以及 FORTRAN 和 PASCAL 的相互调用 DOS 1.10 和 DOS 2.00 以及 CP/M—86 操作系统命令的使用；第四章通过简单实例，逐一分析了 dBASE 命令使用方法，展示了它在科学管理上的用途；第五章介绍了软盘汉字系统 CCDOS 以及 FOR - TRAN、BASIC、dBASE 中使用汉字 C 的方法。

《IBMFORAN 语言》朱耀庭译、翁瑞琪校。主要内容有 FORTRAN 程序结构、数据类型等基本知识；FORTRAN 程序的编译；各编译元命令和语句；I/O 系统和各内部函数。

《IBMCOBOL 语言》。翁瑞琪译。主要内容有概括地介绍 COBOL 语言；介绍如何用 IBMCOBOL 操作 IBM—PC；COBOL 程序的建立、编译、连接和运行方面的知识；COBOL 程序的标识部、设备部、数据部、过程部以及各部中有关段、句子、子句和短语的语法与功能；文件组织与适用于顺序文件、相对文件、索引文件的各过程部语句；表处理以及程序间的通信。

《IBMBASIC 语言》。翁瑞琪、樊成译。主要内容有简述 IBMBASIC 的三种版本；介绍如何使用 BASIC 操作 IBM—PC 的有关知识；如何用 IBMBASIC 进行程序设计；按字母顺序介绍 IBMBASIC 的各命令、语句与函数的语法和定义。

《IBMPASCAL 语言》。陈有祺等译。主要内容有编译一个 PASCAL 程序；记号和术语；编译程序指令（元语言）；标识符和常量；数据类型；变量说明和使用；表达式；语句；过程和函数；文件系统和编译对象。

（原载 1985 年 9 月 15 日《天津书讯》）

您想提高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能力吗？
——请看《BASIC 实用程序设计方法与技巧》
王家骅

在学习、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最使人感到困难的是程序的编制工作，而要编制出优化的程序就更困难了。学习了计算机语言的基本知识而不能独立编制程序解决实际问题，这正是目前广大自学者存在的通病，也是不少单位购置了计算机却难以投入使用的原因之一。有关计算机语言的语法知识方面的书籍，目前已为数不少，但是培训编制程序能力方面的教材尚不多见，应广大读者的急需，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那莫西同志主编的《BASIC 实用程序设计方法与技巧》一书，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程序设计的实践，精选了大量实用的程序设计的例题写成了此书，它能循序渐进地训练、提高读者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语力。在读者已初步掌握了 BASIC 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通过多种形式的例题和习题，反复训练程序设计的能力，这样，既巩固了 BASIC 语言词法和句法的知识，又培训了独立操作、使用计算机的本领。

为了适合各类学校和不同专业的需要，本书的例题注意了选择人们比较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题目，尤其较多地选用了管理工作方面的实例，主要内容有财务管理、生产统计、人事管理、学籍管理、体育卫生统计、计划调动、电脑红娘、计算机做图等，题目形式新颖，具有实用价值。

本书对于初学者，可提供一个程序设计示范，使其逐步掌握程序设计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对学过一些 BASIC 语言的人，可使其迅速地开展大型应用软件的设计工作；对于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可提供一份完备的教育与教法。

本书是《BASIC 语言简明教程》的姐妹篇和续篇，这两本书可以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许多读者来信要求给出《BASIC 语言简明教程》一书中习题的答案，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本书在附录中给出了参考答案，从而丰富了本书的容量。

（原载 1986 年 10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向您推荐新书
《Lotus1-2-3 应用软件》
王家骅

Lotus1-2-3 是美国 Lotus (中文意义为荷花) 软件公司于 1982 年为 IBM-PC 微型计算机研制的一种应用软件, 这里的“1”代表表格处理, “2”代表数据库管理, “3”代表商用统计图绘制。它既具有灵活、丰富的功能, 又免除了繁难的编制程序的工作, 因此, Lotus1-2-3 是一种理想的多功能管理应用组合软件, 是 IBM-PC 微型机应用软件中的佼佼者, 通过它可以迅速有效地把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和办公事物处理等工作。

为了帮助广大的计算机使用者更好地学习和有效地使用 Lotus1-2-3 软件, 南开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Lotus1-2-3 应用软件》一书, 本书由南开大学管理学系魏学文老师等编写, 编写中除参考了有关资料外, 还写进了作者在南开大学管理学系讲授“Lotus1-2-3 软件”课程中的体会。全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括地介绍了计算机软件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及 Lotus1-2-3 软件的特点; 第二部分以贷款分析表、商场销售额统计表、人事档案管理、工资管理及数学应用等实例为基础, 由浅入深地介绍了 Lotus1-2-3 软件的使用方法。为了便于读者自学, 在每个实例中都提示了全部的键盘操作步骤; 第三部分是根据 Lotus1-2-3 软件说明书编写的 Lotus1-2-3 的操作方法和每个命令的使用方法, 读者可以把这部分内容作为资料性使用手册进行查阅参考。

全书共 65 万多字, 内容丰富、实用。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所讲的内容, 书中采用了近 200 幅插图, 形象鲜明, 一目了然。为了使插图中的内容清晰可见, 本书采用了 16 开本。书末还附有一个卡片, 将它套在计算机键盘的功能键区域, 便可提示各种功能键的作用。

本书可作为经济类、管理类大、中专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课程的教学用书, 也可作为计算机使用者的自学读本, 还可作为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经济类和管理类科研人员及计算机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原载 1987 年 2 月 15 日《天津书讯》)

《BASIC 语言简明教程（修订本）》出版 家骅

那莫西主编的《BASIC 语言简明教程》问世以来，深受全国各地各类专业读者的欢迎，被多个院校选为教材。为了适应这新形势的需要，那莫西同志主持修订了《BASIC 语言简明教程》一书，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修订后的《BASIC 语言简明教程》除仍保留了原书的特点外，又增加新的特色。新增的特色主要有三点：首先在引入一些语法知识后立即通过实例讲述用这些知识编制程序的方法和技巧，这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语法知识的理解，而且还提高了编程能力。本书将语法知识、编程技巧和操作技能三条线拧成一股绳，贯穿于全书始终；其次是大量充实了 IBM - PC BASIC 语言的内容；三是在每章的最后增加了小结，对本章内容按语法基本知识、编程基本能力和操作基本技能三个方面加以小结，以使读者能更清晰和有条理地掌握所讲的内容。

《BASIC 语言简明教程（修订本）》全书共 14 章，主要内容有计算机基础知识、BASIC 语言的词法和各种语句、数值计算常用算法简介、APPLE 机使用磁盘操作系统、IBM - PC 机的使用和磁盘操作系统等。书末有四个附录，分别是 APPLESOFT 保留字及代表数字；ASCII 字符代码表；BASIC 程序错误信息和 DOS 常用命令一览表。

（原载 1989 年 4 月 29 日《天津书讯》）

房地产管理工作者的佳音
——《IBM—PCdBASE 与 BASIC 程序设计》出版
王家骅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房地产管理工作的任务日益繁重，在此项工作中推广、应用电子计算机势在必行。但迄今为止国内尚未见到有关这方面的适宜的教科书，为了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职工大学编写的《IBM - PCdBASE 与 BASIC 程序设计》一书。

本书将电子计算机技术与房地产管理工作联系起来，应用电子计算机解决房地产管理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减轻了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还保证了管理工作的质量。本书语言简炼易懂，从基础讲起，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对于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的人，经过 90 学时的学习便可掌握编程方法和计算机的一般使用。本书在内容上突出了行业特点，涉及到了住房开发、建设、调换及资料管理中的程序设计问题，实用性较强。本书约 38 万字共 16 章，主要内容有计算机基础知识、BASIC 语言的词法和各种语句（其中包括了房屋修缮用料分配、房租租金管理、住房情况统计、房管局所属各房管站情况及其有关资料的统计等问题的处理实例），IBM - PC 型计算机的使用和磁盘操作系统、数据库、dBASE 的程序设计和编程技巧等，本书最后一章以一大型应用实例——房屋产权管理问题的计算机处理做为结束。书后还给出了四个附录，它们分别是 ASC 字符代码表、BASIC 程序错误信息、dBASE 函数表和 dBASE 命令清单。

（原载 1989 年 5 月 13 日《天津书讯》）

您想迅速准确地从世界各地
得到所需文献情报吗？
——请看《国际联机检索概论》一书
王家骅

文献与情报的国际联机检索，是当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包括卫星通讯在内的现代通信技术，以及图书情报事业高度发展并且相互结合的产物。它可使人们从很远距离（跨国）迅速而准确地获得所需文献情报。用国际联机手段来高速地实现对文献、数据、事件、人物，以及人们关心的各种事项的查找或检索，这种手段的社会化、商业化、是高度现代化社会的标志之一。

国际联机检索作为一种新型的图书情报服务业务，其内容、方式方法、对用户的要求等，都大大地有别于传统的手工检索，甚至于也有别于普通的计算机检索，至今我国有相当多的科技工作者、大学生、研究生，对这项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情报服务手段非常陌生，几年前出版的某些介绍性的书籍也已嫌不足，需要有一本适时全面介绍各国最新联机检索业务的书籍。

为此南开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国际联机检索概论》一书，并且是来新夏教授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之一。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的原理与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的服务功能；情报检索中的指令与策略；实现情报检索常用的基本方法、途径与步骤；以及联机检索自然科学、市场经济问题和社会科学方面文献的实例。本书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检索理论紧密结合具体的检索实例，多处附有图表以利于读者加深理解所讲的内容。在书末做为附录还给出了可提供联机情报检索资料的单位、DIALOG 系统数据库目录、美国 BRS 系统数据库目录、法国 QUESTEL 系统数据库目录、日本 JOIS 系统数据库目录等极为有用的资料。

本书除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教材外，还可作为在图书情报单位从事国际联机情报检索工作的有关人员的参考书，同时也是广大科技人员了解和掌握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组织的一本有益读物。

（原载 1990 年 4 月 14 日《天津书讯》）

一部颇具特色的习题集

王真

由日本道胁义正教授等编著的《应用数学例题演习》是一部流行于日本的理工科院校应用数学教学参考书，一共四册。其中的第二册复变函数部分，在 1979 年即已发行至第九版。之所以受欢迎，在于为刘书体例新颖，结构严谨，深入浅出，密切结合理工科数学教学的需要，采用大量的物理、电工、化学、建筑等方面的应用实例，辅以高等数学基础理论的简要回顾，循序渐进地详细推演了一千五百余道例题。可以独立成为教学用书，容纳高等数学的主要定理和公式以及典型的理工定律应用。

在我国，纯高等数学的习题集已为数甚众，而这种类型的尚不多见，据王梓坤教授介绍的情况，我国数学界翻译日文的书较少，仅有苏步青教授译的微分几何等。这部反映日本应用数学教学水平的习题集的翻译出版，必将受到我国数学界的欢迎。

本书由南开大学郑毓德等译，分别由有关领域的数学副教授、中年讲师认真校订，纠正了不少原书的错误和疏漏。共分四册：一、微分方程；二、复变函数；三、统计行列式和概率；四、向量、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变换和特殊函数。

（原载 1985 年 6 月 30 日《天津书讯》）

《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助你解出难析解的微分方程
王家骅

现代科学、技术、工程中的大量数学模型都可以用微分方程来描述，很多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方程本身就是微分方程。但是，绝大多数微分方程（特别是偏微分方程）的解不能以实用的解析形式来表示，这就产生了理论与应用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列出了反映客观现象的各种微分方程，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另一方面，人们又无法得到这些方程的准确解以定量地描述客观过程。于是就应运产生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新学科——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这个学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应用，把计算方法推向了人类科学活动的前沿。

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微分方程数值方法》一书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入门性质的教材，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第二部分是求解偏微分方程的差分方法；第三部分是有限元方法。本书主要内容有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椭圆型方程、抛物型方程、双曲型方程的差分方法，边值问题的变分原理、有限元方法的结构等。本书通过一些典型、常用、有效的数值方法来阐明构造数值方法的基本思想，使读者了解如何在电子计算机上应用这些方法求解一个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另外本书对数值方法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如方法的稳定性、收敛性和误差估计等）给出尽可能精确的叙述，使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在理论分析能力上得到一定的训练。本书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习题，以利于读者消化正文中的内容。

本书的作者胡健伟和汤怀民都是南开大学 60 年代初期的毕业生，现在都是南开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他们长期从事于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多年积累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整理编写成此书。

本书既可作为理工科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有关人员自学与进修的参考书。

（原载 1990 年 10 月 13 日《天津书讯》）

一本具有创造性观点的教材
——《力学原理导论》
王家骅

最近，南开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一本新书——《力学原理导论》，它是由南开大学物理系教师凌振芳等同志根据美国 W·Hauser 所著的《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cs》一书翻译而成的。

作者从现代物理学观点出发，系统地阐述了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主要内容包括：矢量、质点运动学、运动坐标系、质点动力学（一维运动）、拉氏方程、守恒运动、有心力场中的运动、质点系运动、刚体运动、线性变换理论、微振动理论、沿弦传播的波和狭义相对论等。

作者不仅对基本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而且还从近代物理的观点出发，采用了许多新颖方法处理经典内容。例如：矢量的狄拉克符号和矩阵表示；用格林函数方法求解微分方程；从广义坐标出发推导拉氏方程；……书中大量的习题和例题涉及了广泛的近代物理课题，很富有启发性。

在书中，作者还注意了启发式教学，一些重要的物理概念和数学方法都是逐步引入的，再加上对数学运算的较详尽地推导，从而使得该书较一般经典力学书籍易读易懂。

由于当今物理学正处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如何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物理知识，乃是当前教材改革的中心课题，可以说，该书在这方面作了一次较成功的尝试。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物理专业或其他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原载 1987 年 6 月 15 日《天津书讯》）

从事扫描电镜工作同志的佳音
——《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微区分析》简介
王家骅

为了适应许多科研工作对扫描电子显微镜日益增长的需要，鉴于国内关于扫描电镜和 X 射线微区分析方面的书很少，尤其是讲述 X 射线微区分析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的书更少的情况，南开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微区分析》一书，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微区分析》一书，是根据美国戈尔登等几位著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专家编著的《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yandX-RayMicro—analysis》一书编译而成的。原书共分成 3 部分，第 1 部分是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第 2 部分是 X 射线微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实践；第 3 部分是材料和生物样品的制备。《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微区分析》一书，基本上保持了原书的结构和特点，为了使全书重点突出，编译者对原书的第 1 部分作了较大的删减。由于原书第 2、3 部分是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和分析的关键技术，所以编译者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使其不但有工作原理的叙述，而且有具体应用技术的说明。读者通过这些实例，可以学习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措施和经验，提高实际动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为了方便读者进一步开发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微区分析技术，在书后还列出了较详细的参考资料和有关数据。读者在工作、学习中参考此书会感到方便实用。

（原载 1988 年 2 月 10 日《天津书讯》）

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的科学
——介绍《简明生物学》
张蓓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的科学。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奥妙无穷的生命本质，从古至今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大批有识之士去探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生物学爱好者。现代生物学正以领先科学的姿态向着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在分子生物学的带动下，生物科学正沿着高度分化、高度综合、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它不仅表现在理科各学科之间，而且文科与理科之间也是如此。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适应这种要求，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近年来许多高等院校的文科系也开设了生物学课程。目前生物学教材虽有几个版本，但没有一本是专门为文科系学生和生物学爱好者专门编写的。基于这种情况，南开大学生物系生物学教研室的张銮光、李玉和、钟贻诚、马祖礼等编写了这本教材。

生物学内容极为广泛。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各种版本同类教材。为了适应文科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内容的编排上，以少而精为原则，保证系统性和完整性，既可侧重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又反应出当代生物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全书共分十一章，首先介绍生命的本质、生命起源和生命的基本结构，从而引出形形色色的生物界，然后阐述生命活动的机理和规律，最后介绍生物的进化规律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还简要介绍了当前新兴起的行为学方面的有关内容。为了便于理解，在书中各章节相应内容处附有插图，全书插图二百余幅。为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巩固和加深所学知识，在每章之后还附有思考题以供思考。

《简明生物学》一书是广大生物学爱好者及各大专院校文科系师生的一部专业教材。

(原载 1989 年 10 月 21 日《天津书讯》)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酵母
——《酵母解剖》出版
张蓓

自古以来，通过面包制造，酒类及酱、酱油等的酿造，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酵母的利用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酵母虽是单细胞生物，却有着真核生物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且有着复杂的生活史。不论是细胞工程还是基因工程，都必须以真核生物细胞——酵母菌作为实验材料，通过它进行新遗传性状的基因表达。

《酵母解剖》是南开大学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副教授王岳五先生根据柳岛直彦、大崎泰治、大隅正子编写的日文版《酵母の解剖》一书翻译而成。从显微、亚显微及分子角度概括了酵母细胞的基本结构，以时间为核心论述了细胞分裂及减数分裂等基本过程的动态变化及其遗传调控，并介绍了酵母性细胞的凝集与接合及酵母的基因操作。全书约 25 万字，有显微、电镜照片及示意图、基因图约 170 幅，分为五章。第一章总论，简单地介绍酵母的定义、分类学地位和研究历史。第二章中记述了构成细胞结构的基本单位，重点介绍以电子显微镜观察为主的静态细胞学知识。第三章是以时间为核心论述细胞分裂或减数分裂等基本过程的动态变化。第四章则侧重概括基因对细胞活性调控方面的知识。第五章介绍了细胞融合和基因工程育种新技术。每章后均附有大量参考文献，供读者研究之用。

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酵母的基础研究发展成为广泛的应用研究，进而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推动我国生物学、分类学及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研究。

《酵母解剖》可作为各大专院校生物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及从事有关研究的同志们必备的参考书。

(原载 1990 年 9 月 8 日《天津书讯》)

对虾养殖者的必备读物
——《对虾养殖》已出版
张蓓

近年来，在党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及一系列富民政策的鼓励下，我国沿海地区对虾养殖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养殖面积每年以 59% 的递增速度向前发展，年总产量已达 15 万吨，对虾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但是，我国的对虾养殖技术、饵料配方、饵料工业等目前还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发展，饵料资源严重不足。因此，养虾业仅靠兴建新池、增加养殖面积等手段，难以使养虾业得以持续发展。

《对虾养殖》一书以发展对虾生产为目标，在介绍有关对虾的生物学知识的同时，重点论述了养殖对虾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各类问题及解决办法。全书共分七章，每章突出一个中心内容。书后还附录一些常用参数与有关术语，供读者随时查阅，以做到一本多用。各章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第一章，对虾的生物学。介绍了对虾的基础知识和生活习性，以及生殖和摄食规律，为养殖工作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第二章，对虾育苗技术。重点论述了对虾育苗的基本知识，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操作和如何解决育苗中出现的问题。

第三章，虾场建造。系统阐述了虾场的选址、建什么样的虾场经济效益最大、收获最快等问题，为新建虾场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必要的参数。

第四章，对虾养成。明确叙述了系统的养虾技术，对养成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第五章，亲虾越冬。介绍了亲虾越冬的全过程和人工移殖精英以及人工授精的基本方法。

第六章，虾病及其防治。详细描述了各种虾病的特征、发病的原因、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防治等。

第七章，对虾的营养。全面讲述了养殖对虾所需营养的需求量、如何满足这种需求等，并介绍了多种对虾人工配合饵料的配方以及生产工艺等。

(原载 1991 年 7 月 10 日《天津书讯》)

《生物反应工程原理》简介

张蓓

当前，生物工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工业领域之一，但有关这一工业过程，特别是生物反应过程方面的著作尚不多见，国内目前竟无一本，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反应工程原理》一书不仅填补了此项空白，而且有助于促进新型生物反应器的开发、生物反应过程动力学的研究以及计算机在生物工业中的广泛应用。

要正确地选择、设计和使用生物反应器，必须同时具备反应器的传递性能及反应系统的反应特征两方面的资料，二者缺一不可。生物反应工程即是将这两方面的知识加以联系以解决实际反应器的设计及操作中的有关问题的学科。《生物反应工程原理》正是系统介绍这一新的应用科学的入门书。

本书作者是天津轻工业学院青年教师贾士儒，他曾经在日本留学，掌握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并经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几易其稿。篇幅虽不大，但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层次清晰，详略得当。其内容包括：酶促反应过程、微生物反应过程和动植物细胞培养过程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酶促反应的特征，单相系统酶促反应动力学，多相系统酶促反应动力学，酶反应及其应用；

第二部分系统介绍微生物反应过程的特征，微生物反应过程的质能衡算，动力学培养技术，传递现象和微生物反应器及其应用；

第三部分介绍动植物细胞培养过程的特征，动植物细胞的生长模型，培养操作技术，动植物细胞培养用生物反应器及应用等。

考虑到读者知识结构各不相同，作者分别在每一章的开始简要介绍了酶、微生物和动植物的基础知识，以使工程学的读者对本书以后所要涉及到的生物催化剂，催化反应性能方面的学习中有所帮助。

另外书中主要技术术语，均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给出。

《生物反应工程原理》一书可供高等院校生物工程、发酵、工业微生物、医药、环保、食品、生物等有关专业的学生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适用于有关科研和生产部门的技术人员参考。

（原载 1991 年 7 月 10 日《天津书讯》）

《简明植物生物化学》出版

张蓓

生物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尽管国内外各种版本的生物化学教科书很多，但内容侧重于植物化学。避免与普通生物化学相重复的植物生物化学教材却几乎没有。北京大学生物系李雄彪博士和南开大学生物系张金钟博士合作编写了这本《简明植物生物化学》，以作为读者学习植物生物化学的参考资料。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光合作用。主要讨论了光合器官、光合色素、反应中心与原初光化学反应、同化力的形成及光合碳同化等问题。第二章，植物细胞壁。详细描述了细胞壁多糖、细胞壁蛋白、初生壁中各种组分的相互联系、木质素、角质和蜡等。第三章，植物的寡糖和多糖。着重论述了核苷二磷酸糖、寡糖、果聚糖、淀粉、淀粉与蔗糖生物合成的调节、淀粉的降解及其与蔗糖的相互转化等。第四章，植物的蛋白质。介绍了植物的贮存蛋白、凝集素、甜蛋白及阿拉伯半乳聚糖蛋白等。第五章，植物的脂类物质。重点阐述了脂类的结构、分布、功能以及代谢等。第六章，植物激素。系统说明了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脱落酸及乙烯的结构、功能与代谢等。第七章，植物次生物质。全面讲述了非蛋白氨基酸、类萜和甾醇、酚类化合物、类黄酮、生物碱、生氰糖苷的结构、功能及代谢等。第八章，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概括总结了根瘤的形成、固氮酶复合物、根瘤蛋白、根瘤中的吸氢酶与氢的吸收以及共生固氮的初级产物与利用的有关知识。

(原载 1992 年 6 月 30 月《天津书讯》)

保健药石——麦饭石

王真

麦饭石是正在开发的保健药石。日本对麦饭石的研究和应用已有二十余年历史，国际的“麦饭石热”波及中国。有趣得很，原来，麦饭石的故乡在中国。

麦饭石因其“状如握聚一团麦饭”而得名。在北宋苏颂（102—1101）的《图经本草》中，作为中药材已有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有详细论述：麦饭石“气味甘温无毒，主治一切痈疽发背”。《本草纲目》东传日本后，麦饭石受到重视。日本科学家采用当代科学技术，不仅论证麦饭石作为内服药对人体有益无害，而且在环境保护、保健食品、矿泉饮料、农牧渔业、医药卫生多方面开发应用，颇有成效，进入千家万户，成立了全国“麦饭石普及会”。

麦饭石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浸泡后的矿化水用于饮食与崂山矿泉水相当；用于美容洗浴可滋润皮肤、消除疲劳；用于养鱼花卉园林，鱼欢花艳促增产；麦饭石水灭菌、酸碱度适中；麦饭石粉末用于美容，是古代妃子用品。正因如此，它对脚气、痈疔、气管炎、关节炎、胃病等均有疗效。中国农科院的实验证明，麦饭石明显促进小麦发芽、生长和成熟。

为了指导日常应用，促进开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保健药品——麦饭石》一书。该书从麦饭石的历史谈起，深入浅出地介绍国内外的应用情况和研究资料，有说服力地引用南开大学麦饭石研究组的科研报告，科学地展示麦饭石的应用原理、方法和前景。这是一本麦饭石应用指南、将正确引导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和利用麦饭石。

（原载 1987 年 6 月 30 日《天津书讯》）

美味佳肴与营养保健的统一
——《营养保健西餐菜谱》
张蓓

在过去的膳食观念中,好吃的食品与营养保健食品并不是一回事,在《营养保健西餐菜谱》一书中,则要追求两者的统一,即让您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保证您身体健康所必需的营养成分,而不必担心体重的增加和引起心血管疾病。

《营养保健西餐菜谱》的第一特点是在烹饪原料中不使用黄油、奶油和酒精,并只用少量的盐和糖。在本书所介绍的菜谱中,以天然的奶酪、淡干酪等原料代替了黄油和奶油。结果制成的菜肴清淡、色泽鲜艳,充分显示原料本身自然的美味和颜色,使人赏心悦目。

《营养保健西餐菜谱》的第二个特点是其操作方法有独到之处。它的特点是用快速操作来保持原料的营养与色泽。

《营养保健西餐菜谱》的第三个特色是保持原料本身的味道和颜色。

《营养保健西餐菜谱》的第四个特点是所制的菜肴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在制做菜肴的过程中,您将得到美的艺术享受。

本书首先介绍了营养保健西餐的基本操作方法,然后分别介绍了调味汤底和少司、开胃小食、汤类、鱼类、贝类、肉类、家禽类、野味类、蔬菜类、甜食类、面包类等十一类西餐菜肴的制做方法,从选料、用量、制做程序等都有详细的介绍,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作为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和厨师培训班的教材,是家庭主妇、烹饪爱好者的帮手。

(原载 1991 年 4 月 25 日《天津书讯》)

研究遗传与变异的科学
——《遗传学》已出版
张蓓

遗传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是 1909 年由 Bateson 提出来的。顾名思义，它是研究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传递与继承。简单地说，它是研究遗传与变异的一门学科。实际上遗传学远不像词义上那么单纯，而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容。

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对遗传和变异的研究已从表面的规律深入到遗传物质的本质，探索它的结构、功能和变化；从性状的分析深入到基因表达的调节和控制。从而为揭示遗传对生物生长、发育的控制机制以及能动地改造生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提供有利的理论及实践依据。

现代遗传学已渗入到生物学的各个领域和其他学科，兴起了许多分支并向纵深发展。使其从整体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而发展起细胞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生化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等分支。

还有许多是在这些分支研究的基础上横向或纵向交叉发展起来的分支，如群体遗传学、数理遗传学、人类遗传学、免疫遗传学、行为遗传学、体细胞遗传学、医学遗传学、发生遗传学、辐射遗传学、生态遗传学、药物遗传学、毒理遗传学等等。

遗传学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林、渔及畜牧业中，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牲畜、家禽、蔬菜、鱼虾、林果、花卉等都需要提高产量，改进品种，而遗传学是动植物和微生物等育种的理论基础。最近兴起的遗传工程，给育种工作带来美好的前景。

遗传学与人类健康有着密切关系，已知与遗传有关的疾病多达几千种，对遗传病的研究与防治是改善人类体质、消除恶病传延的重要手段之一，将会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健康和幸福。

优生是改善人类素质的根本措施，它的实现也与遗传学的发展分不开。近年来随着癌基因的发现，也说明癌症和遗传学的密切关系，遗传学的研究也将为全面控制癌症作出贡献。

最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遗传学》一书系统地介绍了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在医学及农业方面的应用，全书共 15 章，主要阐述了染色体传递的细胞学基础，孟德尔遗传学，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真核生物基因连锁与遗传学图，细菌和病毒的遗传，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基因的表达，遗传的微细结构，突变和重组的机理，基因表达的调控，细胞质遗传，数量性状遗传，群体遗传及免疫遗传等。

内容丰富，概括面广，同时也反映了国内外近年来遗传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每章的后面都有一定数量的习题帮助同学们加深理解及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实在是一本很好的教材。

（原载 1993 年 4 月 15 日《天津书讯》）

